大学译丛

| 第二卷 |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VOLUME 2)

David Harvey

跟大卫·哈维读

《资本论》

[美] 大卫·哈维 著 | 谢富胜 李连波 等 校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我的目的和《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时一样，是促使你们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首先，我想提醒你们仔细研读《资本论》第二卷的重要性，并且要和第一卷联系起来。《资本论》第一卷主要关注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和动力，而把实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放在一边。第二卷则从相反的方向说明：假设剩余价值生产领域没有任何困难，而把其实现过程放到显微镜下进行分析。事实上，不重视《资本论》第二卷的后果更为糟糕，我们甚至连第一卷的内容都无法充分理解。

生产和实现的统一，就像商品一样，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生产和实现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危机频繁爆发。马克思说，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实际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日益严重地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本质”。

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存在深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中，这种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要么最大化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结果是威胁到市场上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要么改善工人的待遇，保持充足的有效需求，结果是影响生产中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

当然，有一种办法能够缓解甚至有效地管理生产和实现之间的矛盾，那就是乞求于信用的帮助。出于这个原因，我决定把《资本论》第三卷中说明商业和金融资本的部分连同对信用制度的说明，一起加入对第二卷的解读。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也是在第三卷中，马克思对实际危机——1848 年和 1857 年危机做了最贴近的分析。看看马克思的分析，对我们应对 2007 年后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很有帮助。

我个人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感激《资本论》第二卷，因为第二卷是关于资本循环如何塑造自己的空间和时间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历史以加快生产和削减空间移动成本与障碍为特征。第二卷把这一趋势置于永不停歇的再生产和阶级关系扩张的背景下，而这恰恰是资本是什么的核心问题。第二卷还提供了更严谨的理论基础，使我得以理解城市化的政治经济学和区域间不均衡发展的动力学，我自己的著作从中获得了很多灵感。

上架建议：外国哲学

ISBN 978-7-5327-6897-4



DAVID HARVEY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VOLUME 2)

定价：59.00 元

易文网：www.ewen.co

上海译文出版社：www.yiwen.com.cn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二卷——

[美] 大卫·哈维 著
谢富胜 李连波 等 校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 / (美) 哈维 (Harvey, D.) 著;谢富胜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
(大学译丛)
书名原文: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volume 2)
ISBN 978-7-5327-6897-4

Ⅰ.①跟… Ⅱ.①哈… ②谢… Ⅲ.①《资本论》—马克思著作研究 Ⅳ.①A81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5278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David Harvey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volume 2)

图字:09-2014-262 号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
[美] 大卫·哈维 著 谢富胜 李连波等 校译
责任编辑/张吉人 装帧设计/未氓设计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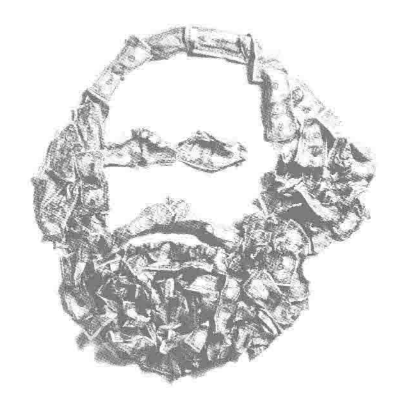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302,000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5327-6897-4/B·405
定价:59.00 元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VOLUME 2)

DAVID HARVEY



上海译文出版社

参考文献说明

以下是用到的文献：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London：Penguin Books in association with New Left Review，翻译者 David Fernbach，1978），页码直接引用。①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London：Penguin Books in association with New Left Review，翻译者 Ben Fowkers，1976），引用时在页码之前标注了“C1”。②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London：Penguin Books in association with New Left Review，翻译者 David Fernbach，1981），引用时在页码之前标注了“C3”。③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London：New Left Review and Penguin Books，翻译者 Martin Nicolaus，1973），引用时在页码之前标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④

鉴于《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是由我的讲义整理而成的，在这本书中我决定采用不同的方式。由于我经常能挖掘到《资本论》第二卷中的独到之处，所以我并不打算用一种常规的方式来对第二卷进行解读，而是把这一卷作为一个整体。因此，在讲课之前，我从

《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相关章节中整理出了很多材料，并在课后对它们进行修正，这些内容构成了本书的最初版本。然后我重新阅读马克思的原始文本，做出新的修正和评价。反复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经常会产生新的感受，带来更深层次的理解。因此讲义和本书不仅在表述方式上存在区别和分歧，有时更有本质上不同的解读。解读马克思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这也是反复阅读马克思著作的魅力所在。

在这里我要感谢参加《资本论》第二卷研讨会的学生和在纽约协和神学院认真听我讲课的学生，他们经常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另外还要感谢 Crystal Hall，Priya Chandresakaran，Nkosi Anderson 和 Chris Caruso，他们慷慨地帮助我把演讲制作成视频。我特别要感谢以下几个人：Chris Caruso，他管理着摄制组的工作，还帮助我打理我的网站；Chris Nizza，他对视频进行了非常专业的编辑；还有 Maliha Safri，她阅读了文章的初稿，并建议我进行一些说明和阐述。

---

① 本书采用《资本论》第二卷中文第2版，人民出版社，2004。——译者

② 本书采用《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第2版，人民出版社，2004。——译者

③ 本书采用《资本论》第三卷中文第2版，人民出版社，2004。——译者

④ 本书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79。——译者

目　录

导　言

我的目的和《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时一样，是“让你读这本书”。我本想再加上一句“用马克思自己的方式”，但我很快会向各位证明，他的方式并不容易掌握。首先，我想提醒读者仔细研读《资本论》第二卷的重要性，并且要和第一卷联系起来。在我看来这是不容置疑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只能作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统一”来理解。他是说，如果在市场上不能卖出劳动过程中生产的产品，在产品中包含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就不能实现。《资本论》第一卷主要关注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和动力，把实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放在一边。马克思实际上假定市场总是存在的，所有商品都能按价值出售。第二卷则从相反的方向进行说明：假设剩余价值生产领域没有任何困难，而把惊险且不稳定的剩余价值实现过程放到显微镜下分析。不幸的是，对第一卷研究得很多而且往往被过分抬高了，而第二卷一般被认为是相对次要的而受到了忽视，这样我们最多只能学到马克思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理解的一半。事实上，不重视《资本论》第二卷的后果更为糟糕：我们连第一卷的内容都无法充分理解，因为其中的发现只有在与第二卷的辩证关系中才可以恰当地理解。

生产和实现的统一，就像商品一样，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内在包含两个本质上不同的趋势。忽略了这种矛盾特性就像不通过劳动来理解资本，或是谈论性别时只看到男人而忽略了女人一样。生产和实现之间的矛盾导致危机频繁爆发。马克思说，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实际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

爆发出来，日益严重地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本身”。①

马克思在第一卷第1章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警告。在分析商品生产时，他一开始把使用价值的问题放在一边，似乎它们并不重要，似乎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但他随即总结道，“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②不能实现，就没有价值——当然也就没有剩余价值。第二卷研究了在什么情况下，生产中潜在地创造出来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有可能无法通过在市场上交换而以货币形式实现。

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存在深刻的矛盾。这一思想非常重要，所以我想事先指出它们实际上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是明智之举。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关注资本残忍地追求剩余价值给劳动者造成的悲惨后果。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在第25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达到了顶峰。马克思说，大部分劳动者的处境必然不断恶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③工人阶级会越来越贫困和悲惨的观点，已经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解释资本时的传统态度，并带有报复的意味。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一定会发生，因为它假定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市场上的实现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剩余价值在地租、利息、商业利润、税收和生产利润等形式间的分配无关紧要。

然而，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我们发现了以下说明，这与第一卷的阐述有着根本不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743—7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还有一个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全力扩张的时期，通常就是生产过剩的时期；因为生产能力从来也不能使用到这个程度，以致它不仅能够生产更多的价值，而且还能把它实现。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①

简而言之，市场上有效总需求的不足，会成为资本持续积累的严重阻碍，而工人阶级的消费是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论》第二卷的结尾，马克思(尽管有些不情愿地)提到工人阶级的需求，还有对工人阶级的欲求、需要和欲望的操纵是怎样对“理性消费”形式的实现起到重要作用的，后者会支持资本的持续积累。

在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中，这个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要么最大化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结果是威胁到市场上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要么改善工人待遇，保持充足的有效需求，结果是影响生产中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换句话说，如果经济像《资本论》第一卷中设定的那样运行良好，那么它很快会遇到《资本论》第二卷所切入的问题，反过来也是这样。比如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在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倾向于总需求管理，这和《资本论》第二卷的观点相符(强调价值的实现条件)，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剩余价值生产中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尤其是那些组织严密、政治力量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在与劳动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之后)转而倾向于总供给管理，与《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更相近，强调(通过降低实际工资、镇压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工人阶级组织和一般性的削弱工人阶级力量等方法）为剩余价值生产创造条件。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解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燃眉之急，但代价是加剧了剩余价值实现的问题，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信用扩张如何掩盖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达到顶峰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当然只是非常粗略的陈述，但也清楚说明了历史上生产和实现的矛盾统一运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变化也体现了这一矛盾。例如，以需求管理为主导的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占据统治地位，然而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理论在1980年之后成为主流。因此，把这些历史纳入《资本论》前两卷中潜在的生产和实现的矛盾统一体中非常重要。

然而，有一种办法能够缓解甚至有效地管理生产和实现的矛盾，那就是乞求于信用的帮助。这是因为，用扩大信贷供给来平衡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在原则上没有任何限制。最浅显的例子便是，金融家一面给开发商融资帮助其投机建造房屋，一面为消费者提供抵押贷款让他们购买这些房屋。当然，问题在于这个过程太容易引起投机泡沫，正是这种泡沫的破灭引发了2007—2008年惊涛骇浪般的金融崩溃。房地产市场泡沫崩溃主要发生在美国，但也波及了西班牙和爱尔兰。房地产市场繁荣、泡沫和崩溃的长期历史，证明了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历史中的重要性。但是，政府干预信用制度在某些方面也确实有效，它对困难时期资本积累的持续发挥了积极作用。

部分因为这个原因，我决定把《资本论》第三卷中说明商业和金融资本的部分连同对信用制度的说明一起加入对第二卷的解读。理论上讲，这个调整是符合逻辑的，因为《资本论》第二卷开始于对资本的三个完整循环——货币、生产和商品——的研究。但是马克思只是用纯粹的技术性术语解释了这些循环和它们的内在联系，而没有考虑控制资本在货币、生产和商品三种形式中配置的阶级当事人。当然，生产者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地位非常显著，但是商人和金融家的特殊作用只在《资本论》第三卷时才被提及。我们发现信用一直都是引发投机狂热

的源泉，这也带来了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资本能容忍信用这种多余事物的存在？尤其是当下信用在我们亲眼目睹下对价值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时。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资本论》第二卷之中，尽管马克思没有特意作出回答。事实上，马克思系统性地把信用完全排除在第二卷的分析之外（这种做法引起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读者的沮丧和不满）。但是我们从第二卷中可以看出，没有信用制度，资本家会被迫去贮藏越来越多的资本来解决固定资本流通、周转、劳动和流通时间差异等类似的问题。当资本被贮藏起来时，资本就丧失了活力。如果越来越多的资本处在贮藏状态，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会被大大减弱，资本的循环会黏滞并且最终停顿下来。因此信用制度对释放这些贮藏的、不活跃的货币资本至关重要，它帮助这些资本重新进入活跃状态。但是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信用投机活动的潘多拉魔盒一旦被打开，所有不好的事物都涌现出来。马克思没有明确指出这些问题，但他在第二卷中对完全排除信用的经济的分析，已经是很明显的暗示了。

我把《资本论》第三卷的一部分加入到对第二卷的解读中的决定性原因是，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通过把《资本论》第二卷和其他两卷结合起来阅读，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一卷在马克思的总体计划中的内容和意图。我们也建立起了理解马克思总体计划的基础。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是，不应该从这一卷或那一卷引用几段，好像它们是纯粹的、绝对的真理；即便是对那些说得很确定的命题（例如，第一卷中工人越来越贫困化），也应看作马克思想要阐述的总体关系下视情况而定的陈述。当然，第二卷的内容本身对我们的总体理解至关重要，但也必须将其置于马克思写作计划不断演进的框架中去。

就第二卷现行的文本而言，我怀着兴奋和忧虑的复杂心情对充分地阅读《资本论》第二卷进行了设计。兴奋是因为对我而言（而且我知道不只是我），马克思一些最有意思和最具创新的想法和深刻见解来源于对马克思著作的仔细阅读。第二卷从资本循环的不同形式（货币、商品和生产

活动的循环）而不是从生产出发，建立了一个与《资本论》第一卷中完全不同的、关于资本怎样发挥作用的模型。用我最喜欢的比喻来说，就是从世界的另一扇窗户看资本。从《资本论》一二卷这两扇窗户，我们看到的是很不相同的关系和活动方式；然而，每扇窗户里的景象又都是客观和真实的描述。我想，马克思称为“资本的运动规律”的一般原理，必须从这两个视角的统一中得出。可惜这个目标完成得始终不尽人意，部分原因是《资本论》第二卷没有完成和马克思手稿的模糊不清。《资本论》第二卷也因为种种原因成为了三卷中被阅读和研究得最少的一卷。

我个人在许多方面都非常感激《资本论》第二卷，因为《资本论》第二卷是关于资本循环如何塑造自己的空间和时间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历史以生产加速和削减空间移动的成本与障碍为特征。第二卷把这一趋势置于永不停歇的再生产和阶级关系扩张的背景下——这恰恰是资本是什么的核心问题。第二卷还提供了更严谨的理论基础，使我得以理解城市化的政治经济学和区域间不均衡发展的动力学，因此我自己的著作从中获得了很多灵感。比如在我的《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我创造并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时空压缩”这个短语，来描述资本将一个货币、商品、人、信息和思想流动的世界，以一种更加紧密、复杂和集中的方式连续不断地联系在一起。这个想法正是来自于我对《资本论》第二卷的阅读。

同时我也非常忧虑，因为这一卷是相当无趣的（可能这还是比较保守的说法）。《资本论》第一卷这样一本大部头，因为其文学风格、幽默的火花、尖锐的讽刺和横扫千军的气势而十分可读，而这些在第二卷里统统没有。此外《资本论》第二卷中没有吸血鬼和巫术，也没有像第一卷那样引用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巴尔扎克的作品，更不用说希腊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了。翻译者 David Fernbach 由于担心自己因为语言乏味而被责备，特意指出了《资本论》前两卷风格的巨大差异：第一卷“对公众而言是晓畅易懂的，既是一本科学的著作，又是一本世界文学名著”，然而第二卷“是第一卷语言平实部分的延续”。熟悉第一卷的

读者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在第二卷的大部分中，马克思就像一个枯燥乏味的会计那样记录着生产一件商品要花多少天和小时，把产品投入市场销售又花了多少天和小时。Fernbach 写道，写作的主题“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甚至是枯燥的”。这一卷尤其“因绿洲间的沙漠而出名”，这也“让很多非专业的读者选择放弃”。[①]坦白而言，这一卷的深刻思想被单调的行文和冗长的数学计算所掩盖了。

然而不只是写作风格存在着问题。第二卷同样也缺乏令人信服和清晰的叙述(有时可以称为辩证法)，第一卷则是如此令人信服。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咎于这本书没有完成，因此具有了某种不确定性。把整卷书串起来的线索就在那里，但是发掘起来却要花很多工夫。有时候这些线索即便勉强没有断，也遭到了破坏。读者理解全卷唯一的方法就是捡起最显著的线索，把它们编织成可以理解的片段。这需要想象力和耐心，即使这样还是很难保证你理解到的思想正是马克思所想的。所以有人说，对第二卷的评论更多地反映了评论者而不是马克思的思想。这句话对我在一定程度上当然也是适用的，可是阅读这一卷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除了理解上的困难，恩格斯对第二卷和第三卷文本的编写方法也存在问题。最近对马克思原始笔记和手稿的研究发现，恩格斯对原稿做了大量的改动，而且有时问题还不小。有些改动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更应该认为这两卷的作者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马克思原始的笔记和手稿已经以德语出版，随着马克思的研究者对原稿研究的深入，《资本论》后两卷不久可能有很多地方需要重新解释。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有必要告知读者有这种改动的可能。而目前我只能依据已有的版本进行研究。

《资本论》第二卷是高度抽象的，因此也缺乏第一卷的结合实际材料的品质。比如当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提出绝对剩余价值理论时，他用围绕工作日展开的漫长斗争史来加以说明，剩余价值和日常生活、政治的

---

① David Fernbach，80.

关系因而一目了然(还记得第一卷里因为过度工作而死的女工玛丽·安·沃克利吗?)。马克思在第二卷却似乎不太有闲心这么做,而当他使用例子时——如他查阅铁路手册以了解怎样维护、修理和更换固定资产部件(如枕木和机车)的工作时,他只能在流水账般的信息记录基础之上进行更为合适的抽象说明。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要像第一卷中对工作日那样,也给周转时间的变化配一个很长的说明性章节,写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原因不在于马克思缺乏说明的材料:流通时间(从生产到销售的时间)因铁路和电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对这种时空的重构,现在读者能轻易地用自己的例子加以补充(例如互联网和手机的影响)。但是,在一章接一章缺乏任何用来自日常生活的材料对抽象内容和科技发现进行的说明之后(更不用提用来自资本主义发生的历史地理演化的材料来说明了),第二卷很容易被人们放在一边。

缺乏政治性的内容让第二卷变得更为糟糕。正如欧内斯特·曼德尔在给企鹅版的《资本论》写的导言中指出的那样,恩格斯担心“第二卷定会使人大失所望,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纯学术性的,没有多少鼓动性的材料”。①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保守的说法。第二卷失去了贯穿第一卷并一次次赋予其活力的道义愤怒;阶级斗争不见了,阶级之间的活跃关系也一样;极为强烈的讽刺不复存在,也没有革命的号召。马克思好像只对资本流通的具体细节感兴趣,他把自己辛辣的批评这把利剑收了起来(只有批评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错误”时除外),并在大部分内容中进行了消极的描述。

尽管中断和危机的潜在可能性被反复探究,将其转化为现实力量的催化剂却很大程度上缺失了。这让人有时候觉得一个永存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能永远进行下去,只是偶尔会遇到点小麻烦。罗莎·卢森堡对第二卷结尾的抽象再生产图式表示强烈不满:“积累、生产、实现和交换,都按部就班地准确进行着。”她讽刺道(这基于马克思对一年到另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第5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积累扩张进行的冗长的数学计算，有时还有错误）：“毫无疑问这种特殊的‘积累’能无限进行下去，要多久有多久——只要墨水和纸还够你继续写下去。”

我在开始之际提及这些不是为了赶跑读者，只是事先提醒各位前方面临的一些困难和挑战。确有一些好理由解释为什么第二卷迄今为止在三卷中是阅读得最少的一卷。然而，马克思在第一卷法文版序言中的警告，在这里需要加倍地再提醒一次：“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①我向您保证，坚持阅读《资本论》第二卷从长远来看不仅是必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从一些光辉顶点处俯瞰的风景，往往出乎意料，充满了不确定性并具有启发性。

因为有着明显的困难，我在行文中行使了一些自由裁量权，以给初次阅读者方便。我尽可能加入了一些容易触摸的（尽量是当代的）例子，来说明马克思想要揭示的原理；补充了一些对政治含义和可能性的评论；从别的地方引入了一些材料（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来支持和描述一些在这里说得不充分的关键思想。更为显著的变动是，如前所述，我把第三卷中关于商人资本、货币、金融和银行资本的部分加入了第二卷对货币和商品资本循环的纯粹技术性描述中。第三卷中这些更为生动的资料（虽然不完整和经常令人失望）涉及了商人和金融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中的当事人职能，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非要在第二卷中把资本循环分解为货币、商品和生产活动几部分。将这些社会当事人（商人、金融家和银行家）的活动与行为和资本积累的技术方面结合起来，我们就对资本怎样运行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也是在第三卷中，马克思对实际危机——1848 年和 1857 年危机做了最贴切的分析。看看马克思的分析，对应对 2007 年后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很有帮助，也让文本的阅读和当今环境联系起来。我不是说马克思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一卷，第 2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解释我们目前的困难这个难题提供了现成答案，但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存在某些具有启发性的相似之处。比如马克思认为英国1844年的“错误”的银行法加剧和延长了1848年和1857年的商业和金融危机，这与2008年之后欧洲央行在加剧和延长欧洲危机中所起的作用有着惊人的相似。

正是由于第二卷没有完成，我们才需要超越文本以更好地理解它。如果不对各种可能性进行推测，那么从第二卷中是读不出很多东西来的。我不是说我的推测和解释就是对的，或是我有别人没有的洞察力，但我确实希望证明我这样来诠释第二卷可以更加有趣。如果你仍为其枯燥和技术性的叙述所困，我的解读可以帮你摆脱过度的枯燥。更有扩展性和推理性的阅读可以让你在文本中加入自己的政治见解，而这些文本表面看来并不能为政治激进主义提供多少材料。

《资本论》第二卷是关于资本运动的，资本持续经历货币、生产和商品这些不同阶段的“形态变化”。鉴于劳动过程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主导着《资本论》第一卷，以上这些在第二卷中不仅被视作资本在市场中实现剩余价值的过程中的某一时刻，而且也被视作资本通过循环支配社会劳动的权力不断更新过程中的某一时刻。循环的时间性(空间性相对次要)一下子成为了问题的焦点。第一卷中假定的资本持续循环在第二卷中成为了主要的分析领域。我们处理周转时间和加速问题时要考虑到复杂性，因为资本周转越来越是固定资本的周转——不仅仅是机器和工厂，还有整个复杂的运输网络、建成环境和基础设施。

在这里，资本的流通过程就像贯穿资本主义政治体的命脉，不顾一切地追求再生产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关系。在流通过程中，潜在的障碍、阻隔和不均衡都构成矛盾，需要分析，也埋下了政治斗争的潜在交锋点。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活动要想成功，就必须努力抓住第二卷中的这些发现(尽管它们可能是尝试性的)。虽然第二卷为政治鼓动者埋藏了很多潜在的良好材料，但很多发现都不太容易与左派马克思主义者(受到第一卷的很大影响)传统的政治假设相适应。问题提出来了——比如货

币和信用的未来，但是这些问题并不容易用经典形式的、以生产场所为核心的阶级斗争来解决。第二卷界定了如果我们不打算在革命到来之前一直挨饿的话，哪些问题需要在流通领域重新设定或被替换。

马克思在第二卷的开头说明自己的研究主题基于第一卷中关于货币的章节。这无疑令人沮丧，因为关于货币的章节又长又乏味，挑战性太强，很多人就是在这儿放弃读《资本论》第一卷的。所以我建议初次阅读的人在看第一卷时可以先快速扫读这一章，推进到其他更有意思的章节。但是这里，在第二卷，我们需要对这章多花点时间，详细地进行一些拓展。很容易这样做，先回想资本的定义(第一卷的第4章中)，资本不是*物*，而是一个*过程*，基本过程是价值在不同状态间的持续转化(涉及形式的变化，或者马克思所说的“形态变化”)：

$$M—C\begin{matrix}LP\\ \\MP\end{matrix}\cdots P\cdots C'—M+\Delta M$$

如果读者想知道真实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资本论》第二卷提供了深刻的见解——比如生产加速的驱动力，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愈发紧张的关系——这些见解经常令人感到惊讶，并给人很多启发。

马克思在研究的过程中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大量的简化假设，他也经常提到这让他能在“纯粹状态”下研究资本流通和积累的动力。因此，在第二卷的第一页中我们可以看到：

> 为了纯粹地理解这些形式，首先要把一切同形式变换和形式形成本身无关的因素撇开。因此，这里不但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而且假定这种出售是在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也把在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动撇开不说。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商品按照自身价值交换的假设(我们把它从日常生活中不断变化的市场价格里抽象出来)在第一卷中很常见，我想我们可以假定马克思提到的“不变的情况”是指第一卷第2章中运行良好的、合法的和充满竞争的市场交换。“纯粹状态”也假设了一个封闭的体系，没有和外部的贸易——除非另作说明——这时资本在封闭系统中完全占据了支配地位。真正的重点是最后一句话：“价值变动”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改变。实现它需要技术和组织结构的变革，第一卷占据大篇幅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对此进行了描述。在第二卷中，马克思排除了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构建了在技术和组织结构为静态时经济的模型。比如在第20章的开头，马克思又重申了他的假设：“一经证明，那么，价值革命……都不会改变这个规律。”①因此，虽然技术和组织结构为动态时的情况在第一卷中占有支配地位(在《共产党宣言》中构成了强大的革命性力量)，在这里我们还是暂时把它放在一边，好研究资本的运动规律的其他重要方面。

那么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探究的是什么呢？一旦剩余价值被生产出来(我们在第一卷中很好地理解了这一过程)，它是如何实现并作为积累的资本继续循环的呢？而且，随着它的循环，哪种资本的特殊形式必然会产生呢？马克思很明显已经意识到，商人、银行家、金融家还有地主等阶级与产业资本家有关，而产业资本家在第一卷中被刻画成是雇佣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直接和唯一占有者。他也知道，这些其他形式的资本先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工厂制度出现，因此这些资本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上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马克思反对仅仅把它们定义为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中产生的“余孽”。他想弄清为什么这些资本形式对于“纯粹状态”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续从社会上来看是必要的，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以及它们将通过什么方式成为矛盾和危机的发生地。

“纯粹状态下的资本”对马克思而言很重要。当面临危机时，总是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4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可以说危机是由纯粹或完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杂质”或故障引起的。近年来，我们经常听到新自由主义者这样的声音：他们说，危机不是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内在的深层矛盾产生的，而是因为没有正确地遵循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他们解决危机的办法是通过严厉的财政紧缩和解除国家权力让资本更加回归其“纯粹状态”。马克思试图揭示的是，危机内在于纯粹状态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是必然的和常见的。不仅调控措施不能解决问题，而且经济越接近纯粹状态，危机就越可能加深(欧洲在2012年采取的紧缩政策明显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然而，《资本论》第二卷显示，在流通体系中，形成危机的趋势总是独立地、自主地存在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太喜欢这个观点。这引发了怎样开展反对商人、银行家、外汇炒家等人的阶级斗争的问题，还有怎样理解这些人所参与的活动(保险、对冲、衍生品、抵押债券、信用违约掉期等)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矛盾是什么，并且识别独立地、自主地形成的商业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可能是怎么样的。我们要更好地理解金融巨头的作用，比如声名狼藉的“吸血鬼乌贼”——高盛集团、花旗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等金融巨头；同时也需要理解如沃尔玛、宜家、家乐福这样的商业资本家在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

对于理论框架中应当包括什么，不应当包括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自始至终都做了严格的限制和筛选，在第二卷[①]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取舍的道理在哪里，为什么是合理的呢？例如信用制度和生息资本的循环虽然经常被提及，但总是被放在一边，并补充一句“在这里没有必要考虑这种循环”。为什么不加以考虑呢？在缺乏信用制度的情况下讨论固定资本循环或周转时间的不同，在表面上看并不太合理。那么为什么马克思系统地把信用排除在了第二卷的研究之外，同时又承认考虑

---

① 对这一卷唯一的研究是 Christopher John Arthur and Geert A. Reuten, eds., *The Circulation of Capital: Essays on Volume Two of Marx's Capital* (London: Macmillan, 1998)。

信用制度后所有的情况都会改变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马克思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剩余价值理论》)和历史著作(比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之间非常令人担忧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否则很难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页就指出了这种矛盾关系。通过把商品定义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马克思绕开了使用价值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只在之后提到一笔)，认为“研究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从这里和其他的一些叙述我们可以合理地断言，马克思清楚地把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理解为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于是产生了应该怎样理解政治经济学重要性的问题。对第二卷来说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我相信回答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所做的取舍。

当然，政治经济学的著作绝不缺乏关于历史的内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理论研究的对象，它是一种脱胎于封建社会的历史性的建构，而且有潜力(如果不说必然的话)演变成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其他社会形态。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历史著作和新闻评论则较少用到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资本的运动规律——当然，尽管它们确实记录了真实的阶级斗争所引起的动荡。唯一的例外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之后很多《资本论》中研究的主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都能轻易找到。早期的历史著作中能找到政治经济学，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分析了法国经济危机和1847—1848年革命的后果；而到了《法兰西内战》，要发掘其中的经济学内容就需要付出很大努力了，这本书主要写1871年的巴黎公社①，关注点几乎都在瞬息万变的、有时看似偶然的政治动态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产业后备军的生产，利润

---

① K.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K. Marx and V. I. Lenin, *The Civil War in France*(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9).

率的下降，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等——即使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写的历史文章中也都没有提及。

要不是在流动的、偶然的和唯意志论的历史、政治作品的语调和严密的、科学的、强调规律的政治经济学语调之间存在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马克思著作的两种不同类型本不会如此令人困惑。这样看起来有两种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和唯意志论——它们本来没多大关系，除非在一些相当了无生气的争论中，比如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否是个科学的问题，或是辩证唯物主义是否是历史理论的组成部分，这些问题很多是由恩格斯提出的并在斯大林那里变成了教条。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文版的导言中，马克思列出了指导他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原则。这有助于解释马克思在建立理论大厦时遵循的规则，并揭示历史和理论之间的差距来自何处。我认为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被这些规则严格地(如果有人想批评的话，某种程度上我就是，我们应该说是“教条地”)限制住了(而且没有比第二卷更好的体现了)。这个框架让马克思超越了那个时代的特殊性(比如1857—1858年危机的细节在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激发了他的灵感)，产生了一个对资本的运动规律尝试性(虽不完善)的替代理论。他认为，这些规律激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的所有历史和地理变化的动力。但是，得到这个一般理论也付出了代价。马克思确立的一般性理论框架限制了这些规律的适用性，我们需要花很大工夫才能理解特殊的历史运动和重大事件。①

马克思追求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他希望这门学科能有类似于物理和化学知识结构那样的力量。马克思认为，即使考虑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规律能和自然法则一样起作用。他好几次将价值比喻为地心引力。更好的比喻是流体力学规律，它是所有关于大气与

① 更详细的争论参见 David Harvey, “History versus Theory: A Commentary on Marx's Method in Capit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 2(2012), 3－38。

海洋动力学的理论基础，也是不可胜数的其他种类流体运动现象的基础。流体力学不能被不加任何改变而机械地用来预报天气或分析气候变化，即使这样也还有很多不能解释的情况。马克思的资本的运动规律就是这种类型的规律，它没有也不能解释现行经济气候的所有方面，更不必说预测明天的经济形势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没有用。物理学领域中没有人因为流体力学规律不能准确预测明天的天气而无视它。

马克思一般的方法是这样的。他假设众多从 17 世纪就开始研究这个话题的政治经济学家和评论家为理解身边复杂的经济世界作出了真诚的尝试。当然有“庸俗的”经济学家试图为自己生来就享有的阶级特权进行辩护——但是威廉·配第，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不属于这种情况。即使是庸俗经济学家，其愚蠢的观点也揭示出了资本内在特性的一些重要方面(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西尼尔的最后一小时”的精彩剖析一样)。通过批判性地(运用了辩证法)探索他们的经济理论及其观点的内在矛盾，马克思的目的就如他在《资本论》前言中说的那样，是要对资本的运动规律做出另一种解释。

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经济科学，而没有直接用到历史、人类学和统计调查归纳。这一方法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最为明显，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存在。马克思引用了很多当局(有人认为过多了，很多情况下我同意这一批评)的资料，以理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文献(比如来自马克思所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的工厂巡视员报告)。那么马克思怎样诠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一般方法呢？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怎样确定研究主题的呢？①

---

① 马克思对自己观点的叙述很容易和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混淆起来。例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利润率的下降是“现代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规律”，提到的第一个例子是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一规律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对马克思的著作做深入研究才能解决。总的来说他接受了规律的主要内容，但是对规律的作用机制做了新的阐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到：

> 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生产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于社会的偶然情况，因此它能够或多或少地对生产起促进作用；交换作为形式上的社会运动介于两者之间；而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除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①

这段表述是理解马克思《资本论》方法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一般（生产）、特殊（交换和分配）还有个别（消费）之间的区别，这里的一般是确定的、规律性的，特殊是偶然的、视情况而定的（例如社会斗争的结果取决于双方力量对比），个别在我看来是变化莫测的，潜在地是混沌的。同样我们也要注意消费这一“个别”很大程度上在“经济学之外”（就像《资本论》第1页中写到的，可能属于历史王国）。这里的总体框架如表1所示。

表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采用的“弱三段论”分析框架

总生产	普遍性	自然规律	决定性	自然的新陈代谢规律	进化论（达尔文）
社会生产	一般性（土地、劳动、资本、货币、价值）	社会规律	决定性的	资本的运动规律	政治经济学
分配	特殊性（地租，工资利润，利息，商业利润，税收）	偶然的，不确定的	非决定性的	阶级和党派斗争的结果；地理发展不均衡	历史，地理，地缘政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续表）

总生产	普遍性	自然规律	决定性	自然的新陈代谢规律	进化论（达尔文）
交换	特殊性（产权，司法，竞争，个体，集中化，垄断）	偶然的，不确定的	非决定性的	制度，竞争与垄断，资本与劳动间集体与联合的形式	国家形式，历史，地理，地缘政治
消费	个别性	混沌的	不可预测的	人的激情，信仰，欲望，动机，社会性和政治主体性（感情）	文化和心理分析；人类想法、需求和欲望的生产

尽管这个三段论“被公认为是一致的”，马克思说它还只是“肤浅的”。所以他拒绝了这个三段论，而是用辩证法研究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怎样在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总体中结合起来。马克思对生产和消费、生产和分配、生产和交换的内在辩证关系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后得出了结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①马克思所想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机整体（总体）并不完全是黑格尔式的（尽管它来自于对黑格尔概念的革命性改造，而非仅仅是简单地颠倒过来使用）。它的结构是生态系统的，由葛兰西和列斐伏尔所说的不同时刻的“总体”或德勒兹所说的不同时刻的“组合”的关系组成。马克思抱怨道：“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等同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不仅社会主义美文学家这样做过，而且平庸的经济学家也这样做过。”②

读者也许期待马克思用辩证法和有机的理论来构建他的替代理论。但是从《资本论》的写作实践来看，即使他使用有机的思维和辩证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关系性的分析来建构他的批判和探索另一种理论，很显然他最后还是遵循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三段论架构框架。他始终尽可能地贴近资产阶级关于生产一般的规律层次的概念，排除了具有“偶然性”和社会特殊性的分配和交换(直到在第三卷的最后部分才进行了讨论)，至于混乱的消费的个别性当然更是如此。因此第一卷和第二卷都假定剩余价值怎样在利息、地租、商业利润、生产利润和税收之间进行分配并不重要。他还假设除了劳动之外，所有商品都按自身价值进行交换(消费者的需求总是能以让价值得以顺利实现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也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没有消费理论的原因(这是很不幸的缺失，尤其是目前消费在美国的经济活动中大约占了70%。相比之下，中国的这一数字是30%，也许更接近马克思所处时代的一般水平)。

更有意思的是，第一卷中对劳动的分配份额的特殊形式——工资进行的研究非常薄弱。对于劳动力价值的决定因素的讨论用了两页纸，马克思先列出了很多因素(从气候到阶级斗争的情况再到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然后说劳动力与其他的商品不同，因为它包含了道德因素，但是在一定社会一定时期内它的价值是已知的。后面的分析按照劳动力价值固定的假设(我们知道它从不是这样的)进行。之后关于工资的章节少得可怜。马克思没有尝试建立工资决定理论，他所做的只是无数次地重复剩余价值理论，并探究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对剩余价值的掩盖。他还写道，当国家间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不同因此劳动力价值不同时，贸易问题需要研究。

在第二卷中，马克思同样分析了资本的商品和货币循环而没有提及分配——货币资本的利息和商业资本的利润——而且排除了对信用制度的分析，尽管他无数次地承认信用是必须的而且当信用被纳入考虑范围后所有情况都会发生变化。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分析中发现了对这种情况的排除，几乎每次的原因都是它不属于马克思唯一关注的一般性的范畴。整部《资本论》都是这样。马克思在第三卷看似重要的“信用和虚拟资本”这章的开头写道：“详细分析信用制度和它为自己所创造的工

具(信用货币等)，在我们的计划之外。在这里，只着重指出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的特征所必要的少数几点。”①

在这里我要提出一点警告，这个排除有时是过分的(比如对劳动力价值的决定，马克思应该做出说明)。面对这样的情况，马克思通常的做法是对问题做一个简短的描述(比如与自然的关系或工人的消费需求)，然后在回到对生产一般的研究之前加入一些关于问题重要性的声明。马克思在这样的问题上几乎不费过多的笔墨(很少超过几段话，有时甚至只有一两句话)。

那么，在自己已经有了辩证的、关系的和有机的方法去理解资本如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马克思为什么还要如此严格地坚持资产阶级的知识结构呢？我对此也没有很好的解释。我能肯定的是他确实这样做了(由文本得出的证据不容置疑)。我最好的假设是，马克思根本的意图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古典政治经济学自己的术语批判它本身。所以为了说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矛盾和不足，他不得不接受了这些术语的一般性质。因此如果资产阶级理论家事先假定了一个非强制的自由市场，那么马克思也需要这样做(就像他在第一卷第2章中所做的那样)。如果一般、特殊和个别之间的区别是资产阶级思维模式的基础，那么马克思也需要使用这个基础。这是我能给出的唯一答案，但还是不能完全让人满意，因为马克思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术语而拒绝了其他的。比如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没有涉及供给和需求或效用的问题(我们不久将看到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从不对自己选择的逻辑进行解释。很明显他通篇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一般、特殊和个别这三个层次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还有第四个层次——普遍性——涉及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生产视作“包裹在独立于历史之外的永恒的自然法则中”的做法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强调是作者加的。

表示了强烈反对。马克思反对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自然化”，从不放弃任何抨击这种自然主义观点的机会(包括李嘉图学派和马尔萨斯学派认为利润率注定会下降是因为自然资源的缺乏和地租上涨的观点)。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性不能用自然法则的普遍性解释。

虽然马克思同意“资本主义生产”是规律般的一般性，他还是拒绝以自然科学的方式将其理解为纯粹“自然”的东西。资本主义虽然是具有规律性的，但是这些规律(包括那些关于私人财产关系的)是人类行为的产物。这些规律应该和我们赖以安身的自然界的法则(如物理、化学还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区别开来。这些自然法则是永恒不变的：我们不能脱离它们。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写道：“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①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②我们只能遵循自然法则。

马克思科学研究的焦点是揭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一般规律是怎样形成的，这些规律是怎样起作用的，还有这些规律为什么和怎样变化。马克思希望不涉及我们和自然之间永恒的新陈代谢关系的普遍性来做到这一点。

马克思把普遍性、一般性、特殊性和个别性之间的区别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并给它们注入了来自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的关系的和辩证的意义以及批判性的策略。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到，他将它们置于有机总体中以将其变成自己的理论。接下来问题就变成了理解这些不同的“时刻”(moments)——与自然新陈代谢关系的普遍性、剩余价值的生产的一般性、分配和交换关系的特殊性，还有消费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2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个别性——是怎样相互关联的。他接下来需要说明如何把规律般的生产与其他东西分离开来，以及这样做有什么必要。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在生产的一般性这一规律层次上开展分析的。为什么要赋予生产以优先权呢？马克思认为“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①这句奇怪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把“支配”自身的生产解释为产品和服务的物质生产，或是具体的劳动过程，甚至是商品的生产都是错误的。非常不幸的是，这是个十分常见的误读，导致了对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思想、人类欲望等是由物质资料生产决定的说法的误解。这是生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误读，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主导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关系。说到底，《资本论》第一卷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对物质劳动过程的动员是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当马克思说在“生产的对立性定义”中，生产支配其自身的时候，他的意思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具体的物质劳动过程在所有方面是最重要的。不产生剩余价值的物质生产过程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在马克思宏伟的计划中，这意味着为他人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需要扭曲和支配了人的感觉器官通过劳动过程所能获得的解放的潜能。这个结果是对人类自身潜在生产力和创造力的普遍异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一些最有说服力的章节再三强调了这点。

简言之，通过资本循环进行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规律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没有剩余价值，就没有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做出的根本性突破。马克思继续写道：“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6—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①这里“单方面的”是指物质劳动过程而不是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那么这里的“决定”是什么意思呢?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事实上采取了以下形式：各种各样可能的、偶然的分配和交换结构和多样化的消费体制在原则上都是可能的，*只要它们不会过度限制或破坏规模不断扩大的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比如说，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相对比较平等的社会民主的分配结构，可以与20世纪80年代智利的残忍的、不平等的、威权的新自由主义分配结构并存——只要这两个地方都有剩余价值的生产。从剩余价值生产的一般规律并不能直接推演出唯一的分配模式、交换体系或特定的消费文化体制。*但是*——这是个很重要的“但是”——*它的可能性不是无限的*。在任何时刻，包括与自然的关系，如果出现了过分地限制或破坏剩余价值生产能力的情况，那要么资本将不复存在，要么总体关系必须作出全面调整。这就是“决定”的含义。

这样的调整可以逐渐发生，常见的是通过竞争、国家干预或是不均衡的区域发展实现的。不均衡的区域发展是指世界经济中在剩余价值的生产方面一个地区胜过其他地区时发生的配置转变(就像目前的中国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德国那样)。变化也可以通过剧烈的动荡实现：因此区域性或是全球性的危机甚至是战争都有作用(请注意：我不是说所有战争和武装冲突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发生的)。

分配、交换和消费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但它们也影响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承认，这样是因为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作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动、资本。”①马克思指出资本本身“被提出了两次：（1）作为生产要素；（2）作为收入源泉，作为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同样，工资是在另一个项目中被考察的雇佣劳动：在雇佣劳动的场合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在工资的场合表现为分配的规定”。②所以虽然马克思认为分配层面(实际工资、利润率以及利息率、地租、税收、商业利润等特殊性)是不确定的、偶然的，从而没有规律般的性质(尽管不排除对经验和历史的概括)，他还是突出了土地、雇佣劳动、资本、货币和交换在规律般的剩余价值生产中的重要地位。结果是生产要素在其当事人和报酬被排除在外时显得格外突出(这在第二卷中最为明显)。这让很多学生有了疑问：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当事人都在哪里呢？答案是马克思在这里沿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他在历史著作中就没有这样做。

接下来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马克思是怎样严格地(教条地？)把特殊性和个别性排除在他的一般理论之外的。

交换的特殊性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章中，马克思假定“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③马克思在这里接受了斯密的完全竞争市场中“看不见的手”的观点。马克思建立的资本的运动规律也遵循这个虚构的假设。我们知道，结果是马克思对自由市场的乌托邦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论批判。马克思说，一方面资本家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得更为富有，另一方面工人变得更为贫困，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样的体系不可能像斯密设想的那样产生让大家都受益的结果。

完全竞争市场的乌托邦式的愿景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实现。但是当交换不符合乌托邦式的愿景时会发生什么呢？有两方面需要格外注意。

供给和需求

很多第一次阅读马克思著作的学生会问：供给和需求怎么样了？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假定供求相抵，而其他条件不变，价格的波动就会停止。这时，供求也不再说明任何东西了。"比如劳动的价格，"在供求相抵时，劳动的价格就是它的不依赖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价格，即它的自然价格"。①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着眼的都只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假设的所谓的"自然"或均衡价格。鞋子的成本平均说来比衬衫价格高，这和鞋子相对于衬衫的需求差异没什么关系。因为这是由包含的劳动量(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所决定的。供给和需求还有价格的波动对经济达到均衡状态很重要，但是均衡在哪里可以达到并不能用它们来解释。

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供给和需求不会总是处于均衡状态。这有很多系统性的原因，比如信息和权力的不对称还有政治上对货币汇率的管理(例如中国就是这样)会扭曲价格，使情况与马克思遵循斯密的假定在理论上推导出的发展路径大为不同。马克思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假设把这种扭曲排除在外，但有时因为系统的相关性他还是会把这些因素加入到思考中，比如在劳动价格问题上，他说：

> 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6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①

然而一旦当工人发觉了这一点，并且通过工会建立制度和机构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时，

> 资本和它的谄媚者政治经济学家就大吵大闹起来，说这是违反了“永恒的”和所谓“神圣的”供求规律。②

但是，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中，关于均衡假设为什么不能成立的问题，我们发现了更有力的解释：如果资本要存续下去，那么供求关系不均衡这一点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是因为资本可以调动的总需求为 c + v（这是资本花费在工资和购买生产资料上的部分），总供给是 c + v + s（这是生产的总价值）。资本的目的是使剩余价值最大化，因此扩大了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差额。所以，到哪儿去找到额外的（有效的）需求，来购买剩余价值呢？马克思在后面的第 9 章中提供了非常有趣的答案。

竞争的强制规律

“竞争的强制规律”在《资本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竞争一般来说是资本贯彻自己的生产方式的手段。”竞争“使资本的内在规律得到贯彻，使这些规律对于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一卷，第 73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一卷，第 73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个别资本成为强制规律。但是它并没有发明这些规律。竞争实现这些规律”。①其他力量建立起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竞争仅仅是执行者和实施者，就像供给和需求那样。

例如，关于绝对剩余价值和工作日的延长，马克思所描述的骇人听闻的做法的传播并不依赖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②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力的创新也同样由争取市场优势的竞争推动的。马克思说：

> 这里不考虑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怎样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怎样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怎样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然而有一点一开始就很清楚：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上的运动一样。但是，为了理解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每个资本家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的动机。③

在考虑迫使个别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追加投资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动力时，马克思用了相似的方法：

>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下册)，第2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368—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①

利润率平均化的压力对推导利润率下降理论是很必要的，类似地可以推测竞争的强制规律的作用。

但是，当竞争的强制力由于某些系统性的原因而失效时，会发生什么呢？马克思认为竞争总有导致垄断的趋势。但是垄断、寡头和资本集中的出现也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如果某个生产领域因为对初始资本的数量要求很大（如建设铁路），那么进入这个特定生产领域的壁垒就很高，此时“资本集中的规律”在信用制度的支持下会发挥作用。事实上，任何明显符合规模经济的生产领域都会产生一些类似寡头的情形。对此，我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在一个运输成本高昂的世界，地方工业（即使是小规模的工业）是免受竞争威胁的。运输成本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集装箱化是这一过程的无名英雄），显著地改变了竞争的地理特性。

接下来有两点比较重要。当垄断和寡头组织占据支配地位时，资本运动规律（甚至价值本身）会发生改变。这反映在20世纪60年代由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还有法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中。列宁描述了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相互联合的特殊构造，其动力机制已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规律相去甚远。②这是资本运动规律本身发生变化的一个例子。

但是，垄断阶段之后通常会进入另一个阶段，这时竞争的强制规律的恢复成为主要的政治关切。20世纪70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普遍经历了这个过程。毕竟，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中心议程。资本家经常抱怨竞争是“破坏性的”，但是垄断很容易产生“滞胀”，就像巴兰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6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Paul Boccara, *Études sur le capitalisme monopoliste d'État, sa crise et son issue*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74); Paul Baran and Paul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V. 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in *Selected Works*, Vol. 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3).

和斯威齐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经常试图在垄断(通过对经济“制高点”实行国有化)和竞争(通过反兼并、反垄断立法，以及或情愿或不情愿地走向私有化和全球化竞争)两者之间保持平衡。

在供给、需求和竞争都存在的情况下，问题就在于它们的执行力了。毕竟，如果没有有效的执行力，规律就没有任何意义。每当这个问题在《资本论》中出现时，就像第一卷讨论“资本集中的规律”时，马克思的典型做法是避开问题，并说“不可能在这里加以阐述”，①尽管他认为集中化在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的帮助下“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②这并不有损马克思研究分散化竞争下的规律的意义。但是，当考察这些规律在实践中能否很好发挥作用，为什么这些规律会发生变化时，执行力是很重要的。分散化的竞争和集中的垄断之间悬而未决的冲突，在特定情况下甚至会导致危机。

分配的特殊性

分配的特殊性和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之间的关系就更有意思了。尽管马克思认为当分配直接影响生产时，应该将之纳入这些规律，但这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当然，尤其是第一卷中关于工资和利润相对份额的内容)。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排除了一切关于剩余价值怎样分配为地租、利息、商业资本利润和税收的研究；在第二卷中，尽管马克思无数次地强调了信用和利息的重要性，他还是避免了对它们的研究(地租和商人资本的利润也一样被排除在外了)。他强调了商品资本的循环，却很少提及商业资本的利润。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把第三卷中关于商人资本(马克思理解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所有材料加入到第二卷关于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循环(生产资本的循环在第一卷中已经研究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7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7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过)的纯技术性描述中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来，不仅将技术关系与阶级当事人的概念联系起来，而且也展现了恩格斯曾担心第二卷中如此缺乏的革命前景。

例如，第二卷论证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劳动过程中)和剩余价值在流通中的实现之间可能存在的鸿沟。如果商业(商品)资本的力量足够强大——比如沃尔玛——那么大部分已生产的剩余价值就可能由商人来实现。货币资本家也能分到一大块肉，地主和收税者同样如此，留给直接生产者微薄的利润(因此只看生产部门的货币利润就试图估计利润率下降的做法是十分错误的)。组织起来的劳动者，有时似乎能通过生产场所的斗争获得更多一部分价值，但最终往往还是要还给资产阶级整体：乱要价的零售商、兜售债券的银行家和金融家、地主，当然还有收税者——他们擅长向穷人征税，然后通过大手笔的减税和慷慨无比的补贴把剩余价值返还给企业和资本家。

马克思在《资本论》通篇都说，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史前”形式的资本，土地所有权也一样。接下来的问题便是理解这些先出现的榨取剩余的方法是怎样屈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的。高利贷对腐蚀封建主义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需要变革成自由运作的货币市场中的生息资本；商人曾经通过贱买(或通过抢劫和偷窃)贵卖获利，可现在却只能通过服务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占有剩余价值中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和资源的租金相对于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来说是固定的，而租金的水平可以引导资源和土地流向能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的使用方式。这大体上就是马克思研究分配的这几个方面的思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约束着分配的安排和份额(或者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说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支配”着分配)。

在特定时间和地点，金融家、商人和地主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比产业资本家更有权力。然而，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马克思只将他们的报酬视为对从生产中剥削活劳动得到的剩余价值的扣除。因此，分

配制度影响了生产的一般性，以马克思不情愿的方式。

消费的个别性

剩余价值的生产取决于消费对剩余价值的实现。因此，作为一个一般范畴，消费不能被排除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因为它“会反过来作用于(资本积累的)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用几页纸说明了消费和剩余价值生产之间的关系。他说区分以下两者是很重要的：（a）原材料、中间投入品、机器、能源等资本家为开展劳动过程而进行的生产性消费；（b）构成每个社会秩序的工人、资本家和各种“非生产阶级”(军队、国家公务员等)的个人“最终”消费。消费对以商品形式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实现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需求要以支付能力作为保障。简单来讲，资本家只承认一种需求：有效需求。

那么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之外还有什么呢？把消费视作“个别”就是把消费当作一种理性计算范围之外的事物，也就是说它是潜在地不可控制的、混乱的和不可预测的。因此，想法、需求和欲望的实际状况(还有日常生活中的品质和政治活动)都在一般理论之外。资本不知道要生产什么样的使用价值来满足最终消费，人们是否想要马匹、马车还是宝马汽车都无所谓。资本家似乎对消费者说：只要你有足够的钱，任何你想要的，我们都可以生产。从而实际消费模式在历史上和地理上的发展，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的问题都被回避了。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假定有效需求总是存在的，商品(除了劳动力)按照自身价值交换。这让马克思得以建立起了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这一理论适用于完全不同的最终消费体制。这就是将所有使用价值的特殊体制抽象掉的优势所在。要是马克思把自己局限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消费习惯中，我们现在就不会以我们的方式来阅读他的文本了。

可是，也有一些起作用的一般力量需要进一步阐释。如果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已不再被人们需要、喜爱，那这个商品就没有了价值。因此

必须刺激新的和旧的用途与需要，来保证积累进行下去。问题在于，“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①自马克思的时代以来，一个巨大的产业发展起来了，它通过时尚业、广告业和对生活方式选择的强调等，刺激需求。但是人类的好奇心和欲望并不是一张等待书写的白纸。只需要给一个孩子一台 iPad，看他多么乐意去玩，你就能看出，史蒂夫·乔布斯在理解人类需求和欲望这方面的精明丝毫不逊于他所拥有的高超技术能力。

操纵和调动人的欲望一直处在资本主义历史的中心，但马克思把它排除在了政治经济学之外，认为这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不过，它并非完全处于理论思考之外。

例如劳动者可以选择怎样花钱和用钱买什么，因此知道他们的想法、需求和欲望就变得非常重要。马克思认为，为了在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保持必要的均衡，资产阶级必须操纵大众消费，以使工人的消费相对于资本主义积累是“合理的”。资产阶级的博爱于是经常体现为教导劳动者的消费习惯，使之有利于积累。最明显的例子是后来亨利·福特的做法，他在自己的工厂里引入了八小时工作日和每小时收入五美元的制度，并利用社会工作者监控和引导工人的消费习惯。奢侈品和工资品之间的差别也变得很重要，因为资产阶级和工人消费的动力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整部《资本论》中，消费影响生产的各种方法大部分是以正规和专业的术语来说明的，而不是将它们描述为有自身动力的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方式。马克思避免具体描述任何最终消费习惯的属性和形式，也避免提及任何文化偏好、时尚和审美价值或人类欲望的冲动（比如性欲在塑造消费方面的作用）。但是，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十几年前满大街都是自行车的国家，目前却是宝马汽车最大的市场？我们能从马克思的一些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阐述中清晰地找到解释。

因此，马克思留给我们的一部分工作是对当代的消费主义找到比目前更好的解释。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在解释消费方面不太有效(马克思反对把太多消费的例子加入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这同样适用于生产性消费——在商品生产的劳动过程中用劳动消费原材料。控制劳动者在工作中的个性的困难已经被认识到了(尤其是在马里奥·特隆蒂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作品中)，正是这种个性蕴含着巨大的革命性潜力。①

在当代，大量对消费和消费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领域；但不幸的是它们之中大多没有将其置于马克思构想的总体关系之中。确实，很多研究都反对资本积累的规律性。很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反对是正确的，马克思认为消费是个别性而不是一般性也是因为这个道理。但是，马克思的历史著作的最终目的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演进的有机整体来理解(与强调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相反)，因此任何对当代形势加以理解的尝试，都要求我们把消费、政治主体性和个体的审美、文化、政治偏好加入到研究框架中——作为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和补充，而不是作为替代品。

当然，人类的欲望世界无法摆脱资本的运动规律的显著影响。资本改变物质世界的方式，影响了我们的精神理念、心理、想法、需求、欲望和自我认识发生变化的方式。当资本的运动规律使郊区化成为了对过度积累这个固有问题的回应时，品位、偏好、想法、需求、欲望和政治主体性也会随之改变。一旦这些成为了一种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偏好的刚性会对革命性的变化造成重大阻碍。例如，如果为了给资本积累开辟新道路，或者是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而需要进行再城市化，就需要发动

① Antonio Negri,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London: Pluto Press, 1991); Harry Cleaver,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Leeds-Edinburgh: Anti/Theses/AK Press, 2000).

革命和拒绝郊区的生活方式，那么需要首先面对并最终克服的便是强大的支持郊区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的选民。

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在三卷《资本论》的大部分中使用的是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浅显的三段论”式的理论框架，而且把研究限制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性层面上。在我们看到的文本中，马克思忽视和经常排除了关于普遍性（与自然的关系）、特殊性（交换关系和分配）和个别性（消费和消费主义）的问题，即便他在很多研究计划（比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承认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比如关于竞争（事实上在第三卷中关于这个问题的章节并没有太多的信息）、国家和世界市场——来完成他的计划。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遇到研究框架不起作用的地方后，正如我们将要在生息资本循环的章节中看到的那样，他最终克服了不足。但是马克思没有尝试去重新说明在分析框架失效的地方加入新情况后，资本运动规律可能是什么样的。

《资本论》第二卷基本上完全是按照“浅显的三段论”的框架写的，马克思向这个框架中加入他所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几乎不敢跳出这个框架。尽管在一些方面研究得很深入和有启发性，马克思描述的理论世界在其他方面被严格地束缚住了。在一般性方面的严格限制让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的历史特殊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至今仍能阅读马克思著作的原因——即使是第二卷——而且还能够理解很多他想要表达的内容。另一方面，很难将这个框架直接用于分析我们的现实状况，这也是我们将要进行的工作。然而，如果我们能理解马克思给自己的一般理论施加的限制和在这样的限制下这些理论能为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能更深入地理解这部著作的性质。这是我提出的阅读第二卷的核心精神，也是我现在所面临的令人兴奋但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一

资本循环（第二卷 第1—3章）

典型的资本家会以既定数量的货币开始。他们进入市场，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使用特定的技术和组织形式将其投入生产，最终生产出新的商品。然后，商品会进入市场，按开始投入的货币数量加上利润（马克思称之为剩余价值）的价格进行售卖。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处理的资本循环的基本形式。资本被定义为运动中的价值，用图式表示为：货币——商品……生产……商品′——货币′（M—C…P…C′—M′，M′代表 M + m，m 即剩余价值）。① 马克思的中心命题是劳动有能力比它在市场上作为商品所要求的价值，创造更多的价值（即剩余价值）。新鲜出炉的产品中"孕育着"剩余价值，被拿到市场上售卖以获得利润。因而资本的再生产依赖于将全部或部分 M′重新用于购买，即购买新一轮商品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

"在第一册中，"马克思写道，"我们只是在为理解第二阶段即资本的生产过程所必要的范围内，对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M—C] 和 [C′—M′]）进行过研究。因此，资本在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形式，它在反复循环中时而采取时而抛弃的不同形式，在那里没有加以考虑。现在它们就成为研究的直接对象了。"②

在第二卷前三章，马克思把循环过程分解成三个独立但相互交织的循环，即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在第4章中，他研究了他所称的"产业资本"的循环，即把三个不同的循环过程结合为一个整体。实际上，马克思以货币、生产和商品这三种不同的视角分析了循环过程。总体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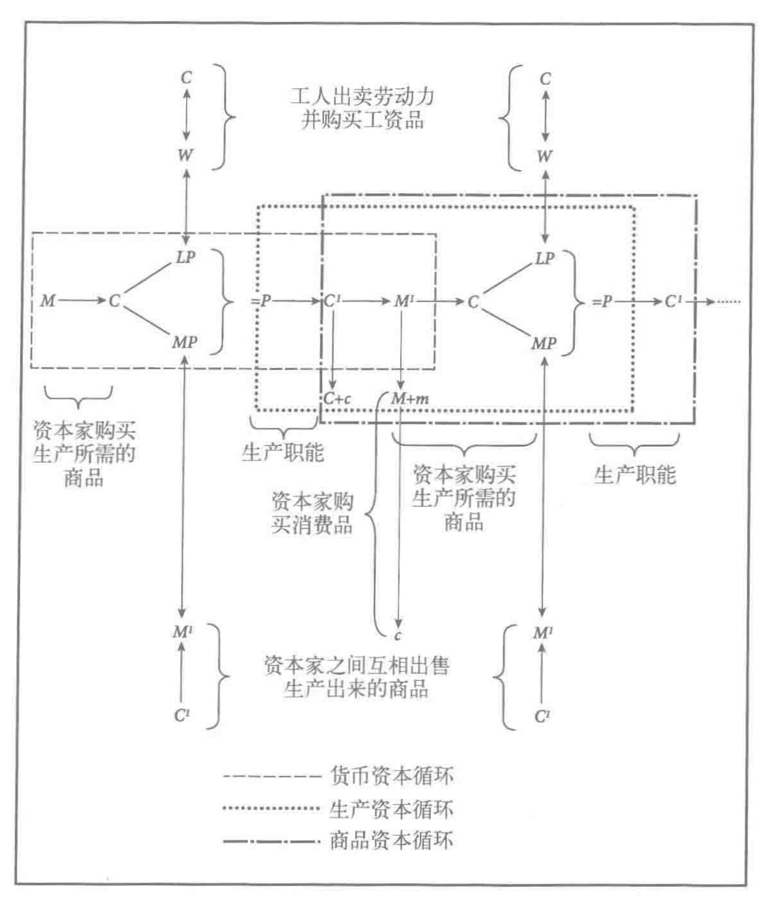


图 1

表面上看，整个方法似乎非常简单，甚至有点平庸。他假定循环持续进行，并把三个不同的循环过程放到这个方框之中。很难看到它的价

① 哈维在书中采用英文企鹅版《资本论》的符号，用 M 表示预付货币资本，而中文版《资本论》中用的是 G。类似的区别还有 M′(G′)、C(W，即商品)、C′(W′)等，为保持译文统一，我们按照英文企鹅版《资本论》的符号用法，适当修改中文版《资本论》的引文中的符号。——译者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二卷，第 3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值。但是，通过这种方法，他揭示和剖析了这种循环过程的内在逻辑中存在的困难和矛盾。从每扇窗户或每个视角，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现实，这也使我们能够识别可能发生扰乱的地方。

纵观这些章节，马克思关注了三件事，两件是明确的，第三件则是不明确的。第一件是形态变化。这个概念来源于第一卷第3章，马克思在那里剖析了他所称的资本的“社会新陈代谢”中的形态变化。形态变化是指资本所采取的形式的改变，即从货币到生产活动再到商品。马克思感兴趣的是资本进入并暂时存在的不同阶段的特征，以及资本怎样从一个形态转变为另一个形态。他提出的中心问题是：这些不同的形式有哪些不同的可能性和能力？从一个形态到另一个形态的转变会遇到什么问题？用蝴蝶的生命周期来类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蝴蝶产卵；卵变成毛虫，到处爬行，寻找食物；毛虫变成蝶蛹，生活在起保护作用的茧中。最终，一只美丽的蝴蝶从茧中蜕变；蝴蝶会自在地飞翔，直至产卵，重新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在每一个阶段中，有机体会显示出不同的能力和力量：作为卵或蝶蛹，它是静止不动的，但是在成长着；作为毛虫，它到处爬行觅食；作为蝴蝶，它可以自由飞翔。资本也是这样：在货币形态，资本可以像蝴蝶一样到处自由地“飞翔”；在商品形式上，资本就像毛虫一样，到处寻找想要、需要或是渴望得到它，有支付能力并最终消费它的人；作为劳动过程，资本植根于“生产的隐秘之处”（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提到），在这里，物质活动将自然要素转化为商品的生产。它通常是被限制在一处的，至少在生产商品的时间内是这样的（我们会看到交通运输是一个重要的例外）。

对我来说，这些差别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资本在不同形态下进行的空间和地理运动的差异，对于理解我们统称为“全球化”的过程有重要启发。循环过程中的每一个“时刻”——货币，生产活动，商品——表现出不同的可能性。货币是最具备地理移动性的资本形式，商品的移动性差一点，生产活动移动起来则难得多（尽管也不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一般性描述中也有许多可变性。一些商品形式要比其他形式更容易移

动，其便捷性也和交通运输能力有关（集装箱化使得从法国或斐济将瓶装水运往美国成为可能）。不同形态的资本在移动上得到不同的授权，这对资本如何在世界舞台上运作有巨大的影响。赋予金融资本相对于其他形式的资本（例如生产资本和商业资本）更大的流动权力，就等于引入这种具有高度流动性或“自由飞翔”的资本形式——这正是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特征。这些话题马克思并没有研究，但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研究。马克思关注的是形态变化的其他特征，以及可能出现的差异和矛盾。

这引出了马克思感兴趣的第二个主要问题。第二个问题聚焦于循环过程本身发生扰动和危机的可能性。他在第一卷中清楚地表明，从一个时刻到另一个时刻的过渡从来就不轻松。例如，从价值的一般形式（货币）过渡到价值的特殊形式（商品）要比从相反方向进行的过渡容易（他说商品可能“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通过售卖商品得到货币的人，没有必要立刻去购买。个人可以持有或贮藏货币。这印证了马克思在第一卷中对萨伊定律的严厉批判。萨伊认为买和卖总是保持均衡的，因此绝不会有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李嘉图也接受了这一命题）。但是正如凯恩斯后来指出的，持有或贮藏货币具有永恒的诱惑力，因为货币是私人占有的社会权力的一般形式。马克思指出，贮藏货币也具有社会必要性（我们会在第二卷中频繁发现这样的例子）。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持有货币，却没有人购买商品，那么循环过程就会阻塞，直到最终轰然倒塌。“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在第一卷中谈道，“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①第二卷在某种程度上关注这些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可能方式，尽管是以令人沮丧的含糊不清和技术性的方式。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135—1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马克思也在第一卷中指出，独立形成的货币危机是非常有可能的。商品数量和价格不断波动，我们必须找到调节货币供给的方法，使之适应商品生产的波动。在这里，贮藏货币是绝对必要的，它为经济极度活跃时期提供了可利用的储备资金。当货币成为计算货币时，对商品货币（金银）的需求就可以避开了。余额可以在年末结清，从而减少了对实际货币（硬币，铸币，纸币）的需要。但是使用计算货币创造了一种新的关系，即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第一卷中谈到，这产生了一种矛盾，一种对立，它

> 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制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成坚硬的货币。这时，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品来代替的。①

换句话说，你不能再用欠条结账；你必须找到现金，即一般等价物和价值的代表，然后付清账单。如果不能找到现金，那么

> 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惟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②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161—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第二卷的分析阐明这个问题了吗？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在第二卷中，马克思为理解流通中危机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那些条件奠定了基础。但是，他并没有充分证明为什么这种可能性必然而不是可能成为现实，也没有说明它是在何种条件下成为现实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由马克思不愿意讨论分配的特殊性造成的。马克思没有在第二卷中分析信用的作用，因为那是分配的特殊性。但很明白的是，在整个第二卷中，信用对生产的一般性具有重要的影响，进而也影响了实际的资本运动规律。不考虑任何分配和交换的特殊性，形成一个一般的危机理论似乎也就无从说起。

第三个问题更不明确，出现在涉及资本自身的“本质”的定义的那些章节。我不确定“本质”这个词语是否恰当，但我认为这些章节确实为思考资本可以采取的不同形式提供了可能性，并且询问了某种形式是否具有优先权。这不同于说资本仅仅是“运动中的价值”，或是图1所示的总循环。可不可以说资本循环的某个阶段要比其他阶段更重要，尽管它们谁也离不开谁？我们需要注意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有着深刻的政治含义。但是马克思自己并没有梳理这些政治含义。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马克思在第二卷的第一页勾勒出资本循环的总公式后，规定了他自己的研究所基于的假设前提。他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而且假定这种出售是在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也把在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动撇开不说”。①第二卷中不考虑任何系统性的技术和组织的变革，正如已经提过的，这与第一卷的关注点极为不同。劳动生产率不变（实际上是抽象掉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假设使第二卷与事实有差距。但是马克思坦率地认为，他只有这样才能够识别资本循环中的关键关系，可以日后再将其综合到一个更加实际的资本循环和积累模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型中。

组成资本循环的交换链条的第一个环节（形态变化）是用货币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货币资本“表现为预付资本的形式”。和往常一样，“表现为”这个词意味着虽然看上去如此，但实际可能是另一回事。“作为货币资本，资本处在能够执行货币职能的状态中。在当前考察的场合，就是处在能够执行一般购买手段和一般支付手段的职能的状态中……这种能力所以产生，不是由于货币资本是资本，而是由于货币资本是货币。”不是所有的货币都是资本，也不是所有的买卖活动——甚至是劳动力的买卖（例如个人服务或家庭帮佣的情形）——都是资本的循环和积累中的一环。货币职能之所以变成货币资本是“因为货币职能在资本运动中有一定的作用”，这取决于它们和“资本循环的其他阶段”的联系。只有嵌入到资本总循环中，货币职能才具有资本职能。那时，且只有那时，货币才成为“资本的表现形式”。①所以，既有货币，也有发挥资本职能的货币。两者不是一回事。

当被用来购买劳动力（M—LP）时，货币实际上退出了资本循环，即使劳动者用他们的货币工资购买他们在资本家控制下生产的商品。劳动者为了获取货币以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放弃了他们的商品（劳动力），所以货币又返回了资本循环。劳动者生活在 C—M—C 的循环形式（马克思更喜欢标记为 L—M—C）中，这不同于 M—C—M′的资本循环。在 L—M—C 的循环运动中，马克思指出，“它的资本性质消失了，但它的货币性质保留下来”。②随后他扩展了这个主题：

> 雇佣工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过活。劳动力的维持，即工人自身的维持，要求每天进行消费。因此，必须每隔一个较短的时期付给他一次报酬……因此，资本家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家，他的资本必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和雇佣工人相对立。另一方面，要使广大的直接生产者，广大的雇佣工人能完成 L—M—C 行为［L 指出卖劳动力］，必须不断有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可买形式即商品形式和他们相对立。因此，这种情况要求产品作为商品的流通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从而商品生产也已经有了广泛的规模。①

在马克思看来，M—LP 的运动经常被错误地看作“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一个具有特征性质的因素”，因此，“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但是“货币很早就已经作为所谓服务的买者出现了，而 M 并没有因此转化为货币资本，经济的一般性质也没有因此发生变革”。②真正开始资本的循环，需要劳动力首先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成为特征的，并不是劳动力这种商品能够买卖，而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可以被当成资本花费，“只是因为劳动力处在和它的生产资料分离的状态中”，也是因为生产资料所有者所处的位置，可以：

使劳动力的使用权归属于买者。而使用这种劳动力的界限，和劳动力本身价格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的界限，又决不是一致的。资本关系所以会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只是因为这种关系在流通行为中，在买者和卖者相互对立的不同的基本经济条件中，在他们的阶级关系中本来就已经存在。不是由于货币的性质产生了这种关系；相反，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单纯的货币职能才能转化为资本职能。③

所以，资本循环发生的第一个主要先决条件是，“资本家和雇佣工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二卷，第 4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二卷，第 3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二卷，第 3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人的阶级关系……已经存在了”。[①]这是第一卷的重要主题，尤其是在原始积累部分。马克思在这里重申了劳动力作为商品的存在“就得先有一定的历史过程，把原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分开”。[②]

“生产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是由商品构成的”，所以资本家就得“通过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来完成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如果要让工人立即开始干活，那么资本家必须“在购买劳动力之前，首先购买厂房、机器等生产资料”。[③]但是这要求这种商品——生产资料——也容易在市场上获得。“要使资本能够形成并且能够支配生产，需要商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因此也需要商品流通从而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④]只有这样，客观因素（生产资料）才能在生产中与主观因素（劳动力）结合起来。

资本循环发生的第二个主要先决条件是：*以售卖为目的的一般商品生产必须已经存在*。只有这样资本家才能在市场上购买到生产资料，也只有这样雇佣劳动者才能获得再生产自身所需的消费品。如果这些先决条件没有实现，那么货币就不能执行资本的职能。

马克思在这里纠正了把资本主要理解为货币的观念，他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原因。但是，一旦雇佣工人阶级存在，并且能够再生产自身，那么转化的动力就开始运转了：

> 那些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即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的情况，也促使一切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越发展，它对主要是直接满足自己需要而只把多余产品转化成商品的每一种旧生产形式，就越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它使产品的出售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事情，它起初并没有显著地侵袭到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生产方式本身，例如，资本主义的世界贸易对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人民最初发生的影响就是如此。但是接着，在它已经扎根的地方，它就会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是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①

在这些历史转变发生之后，资本就会以“纯粹的”方式自由地开始循环：

> 因此，不言而喻，只有在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M—C…P…C′—M′，才是资本循环的当然形式，因为它是以雇佣工人阶级的社会规模的存在作为前提的。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生产商品和剩余价值；它还再生产并且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雇佣工人阶级，把绝大多数直接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②

我在别处讨论过——不仅和马克思在第一卷的叙述有关，而且也是我自己的观点——马克思更偏向于我所说的“辩证的、协同演化的社会变迁理论”。③这个观点和第二卷的论述是兼容的。这似乎是摆脱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鸡与蛋”式争辩的惟一办法。阶级关系和一般商品生产（暗含的是货币形式）必须先于资本而出现，但是资本的发展使这些先决条件一般化了。

资本循环的第二个阶段是生产资本阶段。马克思没有花费太多精力阐述，因为毕竟它是第一卷中的分析的基本形式。这个阶段承担了劳动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David Harvey,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London: Profile, 2010), Chapter 5.

过程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生产性消费。

> 运动表现为M—C…P，这里的虚线表示：资本流通被中断，而资本的循环过程在继续，资本从商品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因此，第一阶段，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只是表现为第二阶段即生产资本的职能的先导和先行阶段。

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的特殊方式“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就资本主义来说，

> 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形成商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这样结合起来一同进入的现实过程，即生产过程，本身就成为资本的一种职能，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而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我们已经在本书第一卷作了详细的阐述。商品生产的每一种经营都同时成为剥削劳动力的经营；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①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于是都转变成了“预付资本价值的存在形式”。同样地，它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正如人类劳动力并非天然是资本一样，生产资料也并非天然是资本”。马克思又一次总结了剩余价值理论：“生产资本在执行职能时，消耗它自己的组成部分，使它们转化为一个具有更高价值的产品量。” 因此，“产品不仅仅是商品，而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且是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商品”。[1]生产资本的职能是“资本价值借以生出价值的唯一职能”。[2]

在循环过程的第三个阶段，我们需要面对商品资本形式的资本。正如货币形式的资本只能执行货币的职能，生产资本只能进行生产一样，商品形式的资本“必须执行商品的职能”。[3]现在，C′的职能（含有剩余价值的商品）

> 是一切商品产品的职能：转化为货币，卖掉，经历流通阶段C—M。只要现在已经增殖的资本保留商品资本的形式，停滞在市场上，生产过程就会停止。这个资本既不会作为产品形成要素起作用，也不会作为价值形成要素起作用。由于资本抛弃它的商品形式和采取它的货币形式的速度不同，或者说，由于卖的速度不同，同一个资本价值就会以极不相同的程度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和价值形成要素起作用，再生产的规模也会以极不相同的程度扩大或者缩小。[4]

我们在这里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维度引入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从一个形态转到另一个形态的速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它受“和资本的价值量无关的新的潜能，即资本的作用程度的新的潜能，资本的扩张和收缩的新的潜能”[5]的影响。当资本家受竞争的强制规律驱动，使用加速生产、缩短周转时间等方法时，不仅改变了当时的资本循环的框架，也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框架。那些促进加速的“独立的、新的潜能”的性质需要得到研究。这形成了第二卷中的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研究领域。

C′—M′的循环使“同时包含在商品资本中的剩余价值”以货币形式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实现，于是结束了资本形态变化的第三个阶段。但是要记住，剩余价值

> 只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它是第一次在商品市场上出现，并且以商品形式出现；商品形式是它的第一流通形式，因此，c－m行为，也是它的第一流通行为或它的第一形态变化，因而还要由相反的流通行为或相反的形态变化m－c来补充①（小写字母表明马克思这里只是讨论剩余价值的运动，不是总资本——C′和M′——的运动）。

剩余价值的生产实际上是资本的生产，并且将剩余价值的全部或部分用于追加投资是资本再生产的基础。

因此，这里要指出两点。“第一，资本价值最后再转化为它原来的货币形式，是商品资本的职能。第二，这种职能包含着剩余价值的第一形式转化，即剩余价值由原来的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②结果，“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现在都是作为货币存在的，因而都处在一般等价物的形式中”。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暗示，所暗示的事情随着文本的展开会越来越重要：商品资本在整个循环过程中具有与众不同的重要地位，即作为商品中蕴含的剩余价值向货币形式转换的转换器。

> 因此，资本价值在过程终结时，又处在它进入过程时的相同的形式中，因而能够重新作为货币资本开始并完成这个过程。正因为这个过程的开始形式和终结形式都是货币资本的形式（M），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循环过程的形式叫做货币资本的循环。在终结时发生变化的，不是预付价值的形式，而只是它的量。③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因此，货币资本循环反映了“开始形式和终结形式都是货币资本的形式”。一旦剩余价值作为资本实现，作为“一个已经生出价值的价值”实现，作为循环过程的“目的和结果”实现，那么M“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货币，而是明显地成了货币资本，它表现为一个已经自行增殖的价值”（马克思在第一卷所说的“会下金蛋的鹅”）。然而，当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再次进入循环过程时，它仅作为货币发挥作用，已收回的初始预付货币和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消失了。它再次执行纯粹的货币职能。所以，尽管我们想从概念上区别一种“货币资本”（作为资本使用的货币）和另一种“货币资本”（返回到货币形式的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都是资本的存在方式……使它们互相区别的特有职能，只能是货币职能和商品职能之间的区别”。

然而，“商品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产物，使人想起它的这种起源，因而，它在这种形式上比货币资本较为合理，不像货币资本那样没有概念，在货币资本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任何痕迹都已消失，正像在货币上商品的一切特殊的使用形式都消失一样”。①

当区别消失时，我们需要坚持“概念上的区别”，因为这揭示了资本的运动规律的奥秘。转化成货币的剩余价值m，可以被花费掉。但是花到哪里去呢？一部分进入资本家的消费（花费在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上，马克思稍后会进行解释）。但也有一部分被用作货币资本，因此巩固了积累的扩张。

自始至终，马克思坚持了一系列的看似微不足道的区别。他为什么这么做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最后一部分表现得更为明显，他在那里考察了作为整体的循环。马克思写道，

> 资本表现为这样一个价值，它经过一系列互相联系的、互为条件的转化，经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而这些形态变化也就形成总过程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一系列阶段。在这些阶段中，两个属于流通领域，一个属于生产领域。在每个这样的阶段中，资本价值都处在和不同的特殊职能相适应的不同形态上。在这个运动中，预付的价值不仅保存了，而且增长了，它的量增加了。

在这个形成了一个“循环”的“总过程”中，确切的职能和类别可以定义如下：

资本价值在它的流通阶段所采取的两种形式，是货币资本的形式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它属于生产阶段的形式，是生产资本的形式。在总循环过程中采取而又抛弃这些形式并在每一个形式中执行相应职能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这里所说的产业，包括任何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①

考虑到这个词语现在的内涵，产业资本不是一个合适的概念。但是马克思想用这个词语表达的是这种资本循环：它经历了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过程，之后它通过总过程的其他环节得以实现和再生产。“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并不是指这样一些独立的资本种类，这些独立的资本种类的职能形成同样独立的、彼此分离的营业部门的内容。在这里，它们只是指产业资本的特殊的职能形式，产业资本是依次采取所有这三种形式的。”

通过把他自己限制到纯粹的形式化分析中，马克思避免了讨论不同的当事人。这些当事人确实依附在不同职能的资本上。金融和货币资本家依附于货币职能，产业资本家依附于生产职能，商业资本家依附于商业职能。因此，从历史上看，产业资本循环的总体不仅包括相互交织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60—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不同循环，而且包括不同当事人的活动——不同的资本派别从剩余价值中攫取不同的份额。然而在第二卷中，马克思并没有讨论这些派别的作用。他更偏向于使任何事情都处于完全合乎逻辑和有条理的状态。我认为他这样做是因为，如果马克思介绍了不同当事人的历史作用以及在他们之间发生的斗争，全部的阐释将变得模糊不清，以致会掩盖马克思当作基本职能的东西。的确，在第一卷的很多地方，他批评了亚当·斯密认为这些不同派别的资本是完全独立和自主的资本形式的观点。马克思把它们看作是由产业资本分化出来却又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的不同形式。

然后，马克思插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 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 M—C 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置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 C′—M′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

在这里提出了阻碍或堵塞循环过程的思想，但仅仅是以纯粹形式化的方式：

> 理所当然的是，循环本身又要求资本在各个循环阶段中在一定的时间内固定下来。在每一个阶段中，产业资本都被束缚在一定的形式上：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产业资本只有在完成一种和它当时的形式相适应的职能之后，才取得可以进入一个新的转化阶段的形式。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这意味着资本不可能平稳、持续地通过循环，它在运动中必然要经历一些停顿。后面将频繁研究这些潜在的阻碍、停顿和堵塞，尽管没有提及各派资本的利益和当事人。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们可以看清资本持续循环可能遇到的障碍，也指明了也许能阻止这些障碍成为不可克服的堵塞的方法。坏处是它使对第二卷的分析处于一种形式化区分的枯燥无趣状态；它使我们阅读第三卷时心里想着这个形式化的基础——大部分关于历史上的危机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在本章中，马克思还插进了一些关于运输业和通讯业对循环过程的作用的评论。①由于第5章末尾又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讨论。

那么，总体画面是怎样的呢？我们用下面的形式来表示产业资本的循环：

$$M—\underset{MP}{\overset{LP}{C}}\cdots P\cdots C+c—M+\Delta M$$

我们立即就能在图1中发现，这一公式可以分解成三个互为条件的不同循环——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如果要实现剩余价值，货币资本循环必须协调好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循环的条件。生产和商品资本循环也受到相同的限制。任一循环的中断都会对其他循环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作为总体的循环过程有发生多种危机的可能。当我们引入第三卷的内容，将资产阶级分解成在同一循环过程中具有不同利益和观点的派别时——生产者、商人和金融家，我们将有更具说服力的理由来担心马克思称之为产业资本的整个循环过程的稳定性。

货币资本形式对于整个产业资本循环过程的重要性还有待估计。货币不仅仅是过程的起点，而且也是终点。然而，要记得，货币形式仍然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是价值的代表，这也是我们能具体衡量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惟一方法："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 M…M′，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①货币可能是终极的拜物教，但它确实是资本家的圣杯，因为"发财致富本身才是生产的自身目的"。没有"金光闪闪的货币形式"，资本家就没有动力；没有资本的货币形式的实现，报酬就没有可捉摸的衡量载体。

但是这种实现取决于消费——不仅包括其他资本家的生产性消费，还包括其他人的最终消费。在第二卷中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观点，即工人阶级的消费可能有一定的作用②。但是马克思随后添加了一段关于国家间贸易和重商主义的有趣的评论。他说，重商主义的辩护人有一套"冗长的说教"：

> 资本家个人只应该和工人一样消费，资本家国家应该把它们的商品让给其他比较愚昧的国家去消费和进行消费过程，而相反地应该把生产消费当作自己的终生事业。这种说教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往往使人想起教父们类似的禁欲诫条。③

有一些人，例如凯文·菲利普斯④，相信我们在过去十几年里经历了重商主义阶段，而美国担当的正是最愚昧的国家的角色（进行债务支撑的消费主义），中国人和德国人则以美国消费者为代价储蓄和积累了大量的贸易盈余。奥巴马当局在出席 2010 年秋季在首尔举行的 G20 峰会时，提议减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二卷，第 6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二卷，第 68—6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二卷，第 7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美国政治评论家，其著作《金融大崩盘》（*Bad Money*）已有中文版。——译者

少全球体系中的贸易不平衡，中国和德国是反对这个提议的主要国家。所以，某种形式的重商主义确实存在，而且状况良好——美国似乎仍然乐于担当最愚昧的国家的角色。

马克思为本章写的结束语很重要："货币资本的循环，是产业资本循环的最片面、从而最明显和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产业资本的目的和动机——价值增殖，赚钱和积累——表现得最为醒目(为贵卖而买)。" 和往常一样，我们必须意识到"表现"并不意味着"是"："只要货币资本的循环始终包含着预付价值的价值增殖，它就始终是产业资本的一般的表现。"然而，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资本的货币表现，只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过，M—M′的循环最为醒目是有原因的，因为它不仅作为起点出现，而且它促进了购买力以工资的形式流向劳动者，也促进了利润流向资本家，从而促进了他们的消费；它"在形式上具有欺骗性"，甚至带有一种"虚幻的性质"。①"只要把这种形式不是当作循环形式的一种，而是当作惟一的循环形式，它的虚幻的性质以及与它相适应的虚幻的解释就会存在。"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货币循环不能"仅凭自己"存在，而必须"指出其他的形式"。当我们着眼于通过不同形式(货币、生产、商品)不断重复的资本循环时，我们看到货币"只是生产资本不断反复的循环的转瞬即逝的准备"。从这点来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早已作为前提存在的"。②

论第2章：生产资本的循环

生产资本循环的重要性如此明显，以至于马克思并没有多费笔墨：剩余价值是而且只能是在生产的"隐秘之处"生产出来的。从生产资本的立场来看，在返回到劳动过程中去开始生产剩余价值的真正的游戏之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前，所经历的流通过程看起来是必须做的恼人的事："产业资本的总流通过程，它在流通阶段的全部运动，只是作为始极使循环开始的生产资本，和作为终极以同一形式即以循环重新开始的形式使循环结束的生产资本这二者之间的中断，从而只是二者之间的中介。"①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能预期到，商品和货币形式的运动会面临许多陷阱和危险。形式化要求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必须通过销售并以货币的形式实现；原有的货币和部分利润被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在扩大的规模上重复进行生产过程。从形式上看，循环步入到下一个阶段，即C′—M′，紧接着是M—C，以及额外的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的循环，m－c。

我们需要考虑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简单再生产，即所有的剩余价值都被消费掉，没有用于投资(见第一卷第23章和第二卷第20章)；第二种情况是扩大再生产(见第一卷第24章和第二卷第21章)。虽然马克思知道单纯的简单再生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下了大力气来研究。我猜测部分原因是，他发现在简单再生产的模型下，更容易建立产业资本愉快地不断循环下去所需要的形式关系和条件。他认为这些强制性条件也适用于(尽管以更加复杂的形式，取决于资本家怎样分配再投资和消费)更加实际的扩大再生产模型中。

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剩余价值m必须全部用于个人消费。如果资本家阶级持有货币，却没有去消费的话，那么商品资本就不能以货币形式实现。因此，我们第一次发现资本家消费对于资本主义的稳定性的重要作用："m－c是一系列用货币进行的购买。资本家或是用这个货币购买真正的商品，或是用来支付他自己的尊体或家庭的服务费用。这种购买是分散的，是在不同期间进行的。因此，这种货币暂时采取专供日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75—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常消费之用的货币储备或贮藏货币的形式。”①这种货币“不是预付的，而是花掉的”。所以资本家必须已经持有货币。

这是一个有趣的主题，我们会在第二卷中多次看到。用来购买剩余价值的额外的货币来自哪里呢？资本家用自己的货币购买凝结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以增加个人消费。当然，这以生产资本生产了资本家想要的商品为前提（尽管马克思在这里没有提到这一点）。m－c 循环（小写字母表明我们没有涉及总资本，只是涉及剩余价值），“以资本家的存在为条件，而资本家的存在又以他消费剩余价值为条件”。②

顺便提一下，马克思注意到资本家支付商品的方式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所生产的商品的性质。马克思提到了一个关于伦敦建筑业的有趣的案例（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这种营业大部分依靠信用经营，建筑业主依照房屋建造的各个阶段取得垫款”。③进一步，最终商品的消费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同这个商品量作为资本家的商品资本执行职能时所经历的形态变化完全分离开来”。④商品和支付如何随时间和空间移动在这里有所暗示，但是并没有发展成一个分析的领域。这是我在我的一些著作中努力研究的事情。

已复归的初始货币资本必须通过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再度循环到生产性消费领域。虽然初始的 M 是预付的，再次进入循环的货币不得不重新定义为货币资本——它已经通过 C′—M′运动生产出来并且得到了增殖。这个含义上的改变非常重要。它呼应了在第一卷中提出的观点，即经过一段时间后，劳动再生产出了原预付资本的全部价值的等价物。根据马克思对洛克的观点的解释——所有权应归属于将他们的劳动和土地结合起来创造价值的人，流通中的价值的所有权应该属于劳动者，而不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79—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是资本家(资本家实际上消费了初始资本)。马克思指出，再次进入生产的M是“过去劳动的表现”，并不仅仅是纯粹的货币资本。

但是，循环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时间上的差异。“C—M和M—C的实现在时间上可以有相当显著的差异。”循环的时间性很重要。马克思立即在这里列举了一些例外的情形。在一些情形中，“M可以代表在市场上还根本没有出现，将来才会出现的商品的转化形式”。①为还未生产的商品预付货款是可能的。甚至连工人也能提前预支尚未生产出来的商品——实际上是支出未来劳动的工资。可能的时间安排是非常复杂的，正如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信用制度的作用变得很重要。

但是，从商品到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运动变得困难，也有结构性的原因。“如果第二形态变化M—C遇到障碍(例如市场上缺乏生产资料)，循环，再生产过程的流，就会中断，这和资本凝结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情形一样。但有一个区别：资本在货币形式上，比在易逝的商品形式上，能坚持较长的时间。”②在第一卷中，一般认为C—M比M—C更加困难，因为货币是一般等价物，而商品只是特殊等价物。我们在这里又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因为生产资本需要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资料才能实现再生产。如果铁矿石的供给枯竭了，那么钢铁生产就不能实现再生产。钢铁生产对固定资本的高度依赖(比如高炉)，使得它们的供给的任何中断都会给钢铁生产者造成巨大损失。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指出，但是再生产也假定随时能获得有必要技能的工人。但是至少M不会腐坏，所以循环在该点受到阻碍要比资本在商品形式(尤其是商品易腐坏时)受到阻碍问题要小得多。货币及时转化为生产性消费的要素对生产资本的再生产来说是必须的。马克思又给了拥护萨伊定律的经济学家一记猛烈的重击：“这样一种由剩余价值的生产所决定的用商品代替商品，和本来的产品交换(只是以货币为中介)完全不同。可是，经济学家们竟以此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证明生产过剩是没有可能的。”①

然后，我们需要考虑工人的消费。他们通过参与L—M—C循环谋生，出卖劳动力以获得货币，用它们购买生活必需品以按照一定的标准生活。这只不过是暂时将价值从资本循环中取出来，很快又会重新投入到循环过程中，就像第一卷中描写的“老板自己开设的杂货店”关系那样。“第二个行为M—C不进入单个资本的流通，虽然它是从单个资本的流通中出来的。不过，对于资本家阶级来说，工人阶级的经常存在是必要的，因此，以M—C为中介的工人的消费，也是必要的。”②我们随后会在第20章和21章中发现，这些观点为什么不是从单个资本家的视角，而是将资本的总循环看作一个整体时得出的。

我们现在看看所有这些内容是如何被概念化的。货币，当在资本家手中通过购买劳动力转化成可变资本的时候，执行资本的职能。但是，同样的货币一旦流到工人的手中，就不再执行资本的职能。它也经历了形式的形态变化，因为它现在仅仅是市场上的购买者手中的货币，从而可以按工人需要的、想要的或喜欢的方式使用。一旦工人用它购买了商品，货币就再次回到了资本家手中；如果资本家不将它用于消费的话，货币就能回到资本的形式。这正是马克思用关联的视角从全局看问题的方法。需要着重指出一点，如果工人将收入用来赌博（甚至是储蓄），而不是用来购买商品，那么循环过程的连续性就会遭到破坏。因此第二卷最后关注建立工人阶级的“合理消费”，将之作为稳定积累的条件的问题。如果假定货币资本在循环过程的每一个时点上都完全处于控制之下，那么问题就不存在了。尽管就工人的消费与资本的关系而言，马克思在别处一般将工人阶级整体描述成被关在“老板自己开设的杂货店”里消费的群体，但是他在这里为质疑这个假设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马克思认为，商业资本家介入并接管协调C′—M′转化的工作，不会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对这些内容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在最后的分析中，“整个过程继续进行，与此同时，由此决定的资本家和工人的个人消费也继续进行。这一点在考察危机时很重要”。如果出现某种形式的危机的话，我们不应该从根本上把它归因于商业资本家的运营(例如，不应该责备沃尔玛)。我们需要深入考察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消费的作用，将其看作是潜在的症结：

> 产品只要卖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者看来，一切就都正常……那么随着资本的这种再生产，工人的个人消费(需求)也可能扩大……这样，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可以增长起来，整个再生产过程可以处在非常繁荣的状态中，但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的手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留在市场上。这时，商品的潮流一浪一浪涌来，最后终于发现，以前涌入的潮流只是表面上被消费吞没……以前涌入的商品还没有变成现金，支付期限却已经到来。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无力支付，或者为了支付不得不给价就卖。这种出售同需求的实际状况绝对无关。同它有关的，只是支付的需求，只是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绝对必要。于是危机爆发了。它不是表现在消费需求，即个人消费需求的直接缩减上，而是表现在资本对资本的交换，即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缩减上。①

马克思区分了两类需求：工人和资本家的最终消费需求，以及资本家之间关于维持生产性消费的商品的贸易和需求。他在这里提出了这个非常新颖的观点：危机可能产生于资本和资本之间在组织与生产性消费有关的商品流和货币支付流中的关系。在个人消费领域表现出来的工人和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88—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本家的有效需求不足，事实上可能是由于生产资料的购买和售卖的循环过程出现了问题。这是危机的一般性理论，还是在讨论生产资本循环时顺带提出的可能性呢？我的基本观点是，我往往首先把这样的论述当作因情况而异的、在给定条件下才会出现的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论述也许最终也不能被证实具有更广泛的一般性，但是我们必须证明这一特殊视角是如何阐释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的。

例如，关于工人阶级的有效需求和消费，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有两处看似非常矛盾的论述：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还有一个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全力扩张的时期，通常就是生产过剩的时期；因为生产能力从来没有能使用到这个程度，以致它不仅能够生产更多的价值，而且还能把它实现。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①

但是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

> 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除了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消费或“盗贼”的消费以外，资本主义制度只知道进行支付的消费。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费者（因为购买商品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但是，如果有人想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么，我们只须提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①

第二个论述与第2章的精神更为一致，所以很明显，马克思认为从生产资本的角度展开的论述具有更普遍的重要性。于是我们就面临一个难题：该追随哪个观点？我自己的想法是（你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这种情形可以出现，正如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样，劳动所得占国民产出份额的上升，即便不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也至少是其先兆。但是，不可能用这个观点来分析2007—2008年的经济崩溃。工人阶级的分配份额，无论是过高还是过低，虽然有重要影响，但还不足以解释资本的危机倾向。我们需要着重关注第二卷所说的内容（当然也包括其他地方的内容），探索这些理论内容可能是什么。此时此刻，从生产资本的观点来看，我们至少有了一部分危机形成理论。

当资本循环遇到障碍，以至于“中止它的M—C职能”时，货币资本就会转化成“非自愿的货币贮藏”。这些货币因此“具有闲置的、潜在的货币资本的形式”。②马克思稍后会称之为“闲置的资本”。③这些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56—4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是接下来的论述中的重要术语。

扩大再生产的那部分内容并没有包含任何新奇的东西。我们从第一卷中得知，对于资本家来说，“他的资本的不断增大，成为保存他的资本的条件”。惟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剩余价值中被资本化为新资本的比例是多少，对于这个问题并不存在黄金法则。P…P′循环所表示的，“不是剩余价值被生产出来，而是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已经资本化”。①这又一次改变了我们对资本循环这个概念的认识。资本化的第一步是贮藏一定数量的从售卖商品中得到的货币，为扩大生产做准备。贮藏潜在的或闲置的货币是必要的，因为大多数工商业的扩张都需要资本达到一定的最低限额（建立更大的工厂，投资于机器设备，等等）。在得到充分财力以满足扩大再生产所需的最低限额之前，可能会要求“资本的循环必须多次反复”。这导致了以货币形式贮藏的必然性，因为“一个在资本循环之外完成的、为使剩余价值转化为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所进行的职能上确定的预备阶段……只要它停留在贮藏状态中，它就还不是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而是闲置的货币资本；不是像前面所说的那种职能中断的货币资本，而是还不能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②坦率地讲，正如马克思所承认的一样，信用制度在这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没有信用制度，越来越多的资本会沉淀在“闲置”的状态，货币贮藏也会成为资本积累顺畅进行的严重障碍。但是我们不在这儿处理这个问题。

论第3章：商品资本的循环

第二卷中更令人吃惊的一面是马克思对商品资本循环的关注。这样做的原因已经在生产资本循环的研究中预示过了。在将特殊形式的价值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97—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和剩余价值转化成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的困难之外，我们现在再加上另一个困难：在市场中寻找必要的商品以满足特定劳动过程中的生产性消费的需要。资本家必须依靠其他资本家生产自己所需的生产资料。因此，主要是在商品资本的循环中，我们面临资本家之间特殊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赖的难题。随着第二卷内容的展开，越来越明显的是，这种资本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到充足供应（adequate supply）危机的可能性的困扰，更明显的问题可能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危机。

然而，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主要局限于形式的职能和技术性的分析。商品资本的循环有许多特性。首先，商品含有等待实现的剩余价值。然而在货币和生产资本的情形，当循环过程重新开始的时候，剩余价值会“消失”，货币只能执行货币职能，生产活动只在它自己的范围内继续进行。在商品资本的情形，我们面对的始终是含有剩余价值的商品——循环的开始和结束阶段都如此。因此，我们来看看 C′…C′的循环形式，在扩大再生产的情形，这意味着 C′…C″。这里强调的是，正是在商品资本的循环中，剩余价值以货币形式实现和对剩余产品、价值的吸收——不仅以个人消费，而且以生产消费的形式——对于作为总体的产业资本的持续循环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个特性是生产性消费的作用。“在一个单个的产业资本的循环中作为 C 的 C′，不是这个资本的形式，而是另一个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资本的形式。第一个资本的 M—C（即 M—mp）行为，对这第二个资本来说，就是 C′—M′。”①问题是剩余价值作为剩余产品（特殊的使用价值）隐藏在商品形式之中，将价值和剩余价值分开是不可能的，除非当商品价值以货币形式实现的时候。将已实现的 M′分解为 M + m，然后决定有多少 m 需要在扩大再生产中资本化，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件事不能用铲车来完成。这对于某些产品来说也许是可能的，马克思使用了纱的例子，因为原则上是可以将初始价值 C 从 C′中分离的。这促使马克思进行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二卷，第 10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了复杂的和看似冗长的计算，以发现这是如何实现的。

但是在所有这些背后，在商品资本的循环中有一个其他循环已经消失了的区别：既有剩余产品（以商品形式存在的已经扩大了的使用价值）又有剩余价值，后者实现的条件是为前者找到容身之地。不能不考虑使用价值的特殊性。相反，如果把部分处于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资本化以扩大再生产，那么在市场上必须存在着剩余的使用价值，可以将之买来，作为额外的生产资料投入特定的生产活动："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撇开对外贸易）只有在剩余产品的待资本化的部分已经包含追加生产资本的物质要素时才能进行。"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坦率地讲，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就会给资本积累的顺畅进行造成严重的损害。

生产性消费当然不是参与到该循环中的惟一的消费形式：

> 在C′…C′形式中，全部商品产品的消费是资本本身循环正常进行的条件。全部个人消费包括工人的个人消费和剩余产品中非积累部分的个人消费。因此，消费是全部——个人的消费和生产的消费——作为条件进入C′的循环。②

但是马克思继续谈到，所有的事情都被假定为社会的而不是个体的行为。他接着谈到了最重要的结论：

> 正因为C′…C′循环在进行中要以另一个在C（=L+mp）形式上的产业资本为前提（并且mp包括各种其他资本，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包括机器、煤炭、润滑油等），所以，这个循环本身就要求我们不仅把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14—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它看作循环的一般形式，即能够用来考察每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第一次投资的场合除外）的社会形式，因而不仅看作一切单个产业资本共有的运动形式，而且同时看作各单个资本的总和即资本家阶级的总资本的运动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每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的运动，都只表现为一个部分运动，和其他部分运动交织在一起，并且受他们制约。例如，如果我们考察一个国家的全部年商品产品，分析其中一部分补偿一切单个企业的生产资本，另一部分进入不同阶级的个人消费的运动，那么，我们就把C′…C′看作社会资本和由这个社会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运动形式。①

商品资本的循环很特别，它允许我们着眼于整体经济中的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总的流动。它能做到这点，恰恰是因为它必须集中于个别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这些资本家之间的活动相互交织，在总体经济中计算自身的投入和产出。它使我们形成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不仅从个别资本的角度，更是从总资本的角度来看，要保持投入和产出的比例性。比例性的问题——需要生产多少钢铁，来满足其他部门的活动对这种生产资料的需要，又需要多少铁矿石来生产钢铁——事实上是第二卷中的主要问题之一。这就提出了机制的问题：什么样的机制能确保这些比例性可以大致地实现？市场能做到吗？利润率平均化能保证这一比例吗？如果不能的话，会导致比例失调的危机吗？正如马克思在本章的末尾指出的，这种思维模式的先驱是魁奈。这些问题构成了马克思在第20章和第21章创新性地拓展魁奈的图式的基础。

请注意，在第3章，使用价值和价值、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总是成双成对地出现，这在其他循环的研究中是看不见的。当钢铁被当作生产资料售卖时，不仅引出了使用价值的物质流动问题，而且引出了价值转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12—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移的平衡问题，这两个方面并不必然完全匹配。在其他循环的情形，剩余价值“消失了”（因为货币只是货币，只能执行货币职能，也因为生产在它开始的时候没有包含以往的剩余价值生产的痕迹，尽管它生产了剩余价值）。在其他循环中，我们可以只关注个别的产业资本，而不必关心加总的情形。加总的情形只在商品资本的循环中出现。在商品资本的循环中，起点的商品中含有剩余价值，特定的使用价值对生产的持续进行也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从商品资本循环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够研究运动的加总的规律，并阐明资本再生产所必需的物质使用价值比例和价值比例。

上述全部内容如何整合到作为总体的资本循环过程之中呢？我们下章再讨论。

二

循环的三个公式和资本流动的连续性（第二卷 第4—6章）

论第4章：作为整体的资本的不同循环

在对第二卷前三章的考察中，我是透过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这三个不同的窗口来观察资本循环过程的。在第4章，为了分析循环的统一，马克思把三种不同的循环放在了一起。这一章的语言有些复杂难懂，但是我认为要点表达得很清晰：不同的循环是相互交错、相互围绕的，而且不停地相互运动。每一种运动都是所有其他运动的条件。“价值增殖”（马克思的意思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是“决定目的，是动机”。当从整体上来考察时，“过程的所有前提都表现为过程的结果，表现为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前提。每一个因素都表现为出发点、经过点和复归点。总过程表现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成为流通过程的中介，反之亦然”。[①]马克思把整体比作一个

> 不断回转的循环中，每一点都同时是出发点和复归点……资本在它的任何一种形式和任何一个阶段上的再生产都是连续进行的，就像这些形式的形态变化和依次经过这三个阶段是连续进行的一样。可见，在这里，总循环是资本的三个形式的现实的统一。[②]

这里强调的是资本在这三种循环运动中的连续性、继起性、并存性和流动性。问题的反面则是阻碍和可能的中断。“资本的循环过程是不断的中断，是离开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是抛弃一种形式，存在于另一种形式；其中每一个阶段不仅以另一个阶段为条件，而且同时排斥另一个阶段。”③这种中断，像蝴蝶的生命周期中的那些中断一样普遍存在且不可避免。它们威胁到资本运动的连续性，但是它们不一定引起危机。通过研究这些，我们就有希望理解危机为什么会以特定的形式发生——例如，为什么危机有时会以一种无法处置的过剩商品资本的形式出现，或以一种缺乏投资机会的货币资本的过度贮藏的形式出现，或以一种积累进一步扩张所需的生产资料或劳动力的短缺的形式出现。资本流动在不同转化阶段中的任一个时点上都可能被阻塞。

马克思将这些中断和“连续性”进行了对比，“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基础所决定的，虽然这种连续性并不总是可以无条件地达到的”。资本流动的连续性的技术和社会必要性在这里远比第一卷中描述的重要。“由于资本的每个不同的部分能够依次经过相继进行的各个循环阶段，从一个阶段转到另一个阶段，从一种职能形式转到另一种职能形式，因而，只是由于产业资本作为这些部分的整体同时处在各个不同的阶段和职能中，从而同时经过所有这三个循环”。④

因此我们需要处理四个概念：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产业资本”——最后一个要理解为三个循环的统一。在任何时候，任何个别的产业资本都要按一定比例分为三个相应的部分。它的一部分会被吸收到生产中，一部分会以货币的形式存在，另一部分会以商品形式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存在。但是，马克思坚称这种“并列存在本身只是相继进行的结果”。① 通过不同的循环来实现连续的资本运动的必要性压倒一切。直接的结果就是，如果

> 商品卖不出去，那么，这一部分的循环就会中断，它的生产资料的补偿就不能进行；作为C′继续从生产过程中出来的各部分，在职能变换中就会被它们的先行部分所阻止。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段时间，生产就会受到限制，整个过程就会停止。相继进行一停滞，就使并列存在陷于混乱。在一个阶段上的任何停滞，不仅会使这个停滞的资本部分的总循环，而且会使整个单个资本的总循环发生或大或小的停滞。②

虽然马克思没有提出来，但是这种情况潜在地增强了工人的权力。工作中断和罢工不仅会影响到生产资本，也会影响到其他循环的所有时点，而且在商品资本的情况下，这会中断对其他资本来说必要的生产资料的流动：

> 资本作为整体是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但是，每一个部分都不断地依次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由一种职能形式过渡到另一种职能形式，从而依次在一切阶段和一切职能形式中执行职能。因此，这些形式都是流动的形式，它们的同时性是以它们的相继进行为中介的。每一种形式都跟随在另一种形式之后，而又发生在它之前……而这些特殊的循环只是形成总过程的各个同时存在而又依次进行的要素……只有在三个循环的统一中，才能实现总过程的连续性，而不致发生上述的中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断。社会总资本始终具有这种连续性，而它的过程始终是三个循环的统一。①

然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批判性评论。但是阐述的方式有些平淡(这一卷的典型做法)，以至于很容易使人忽略它的意义。实际上，这个引导性线索的含义是相当惊人的："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②通过这样一个陈述，在第一卷中以资本和劳动的阶级斗争为中心之外，马克思开启了在循环过程中出现矛盾和危机的思路。资本—劳动关系并不是资本运动规律中唯一存在矛盾的地方。矛盾也可以出现在资本循环和增殖过程自身中。产业资本的循环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揭示出来。

马克思然后研究了这个"只能被理解为一种运动"的循环过程中的矛盾实际上表现出来的一些方式。"那些把价值的独立化看作是单纯抽象的人忘记了，产业资本的运动就是这种抽象的实现。"③"独立化"暗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价值可能是一个抽象概念，但是它却有真实的影响(或者用第一卷的话来说，价值是"幽灵般的对象性")。总循环过程中的矛盾是独立发生的，马克思这样说的意思是以独立于劳—资矛盾的方式发生的。"在这里，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④价值增殖的时机(剩余价值的实现)和生产一样重要。为了进行说明，马克思舍弃了没有技术和组织变革的假定，以考虑"资本价值在它的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革命"，"但是很明显，尽管发生各种价值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强调是作者加的。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时，也就是在它作为独立化的价值进行它的循环过程时，因而只有在价值革命按某种方式得到克服和抵消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①从个别产业资本的视角来看，它们希望第一卷中描述的通过技术和组织变革来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影响，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得到吸收，得到“克服和抵消”。但是要注意这里用的自主性和独立化的措辞。

让我们从商品资本循环的角度看一下循环过程，它在整个第二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如果社会资本的价值发生价值革命，他个人的资本就可能受到这一革命的损害而归于灭亡，因为它已经不能适应这个价值运动的条件。价值革命越是尖锐，越是频繁，独立化的价值的那种自动的、以天然的自然过程的威力来发生作用的运动，就越是和资本家个人的先见和打算背道而驰，正常的生产过程就越是屈服于不正常的投机，单个资本的存在就越是要冒巨大的风险。因此，这些周期性的价值革命证实了它们似乎应该否定的东西，即证实了价值作为资本所经历的、通过自身的运动而保持和加强的独立化。②

这完全可以算是对我们现在所谓的“去工业化”导致的资本贬值危险的理论再现。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股巨大的工厂倒闭浪潮冲击了底特律、匹兹堡、巴尔的摩、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埃森、里尔和都灵等老工业城市。这种现象不只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孟买的传统纺织业区和中国北部的老工业基地同样遭受了猛烈的冲击和损失。所有集中于工业生产的社区几乎都在一夜之间被摧毁了。比如谢菲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的三年时间内，失去了大概六万个钢铁生产的工作岗位，到处是荒凉的景象。当人们寻找原因时，却被告知，这一切都是由一股被称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全球化”的神秘力量引起的。当工会和社会运动抗议并寻求遏止工作和谋生手段流失的途径时，却被告知这种神秘的力量是无法避免和不可阻挡的。

回顾过去，我们知道这种神秘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尽管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称为“全球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纺织工业的工作岗位就开始从美国传统的工人阶级中心如纽约、波士顿以及新英格兰的许多其他纺纱小镇，向西南迁移到从洛威尔延伸到巴尔的摩的所谓的“瀑布线”上的小镇（“瀑布线”之所以得名，是因为水力因素使纺纱厂最早选址在阿巴拉契亚流域横穿大西洋冲积平原的河流旁边）。工作岗位迁移到美国南方（特别是卡罗来纳州），甚至溢出到墨西哥境内。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纺织业的工作岗位也减少了，因为来自其当时的殖民地香港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长期以来，工作岗位在空间上的变换和社区的毁灭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所走过的道路。

在这里，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从理论上理解所有这些现象的特殊视角。详细阐述一下的话，他的理论阐明了这种危机——不是系统性的危机，而是广泛的、局部化的破坏——如何以及为何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是不可避免的。在相互竞争中，产业资本推动了技术上和组织形式上的革命，这转而产生了价值革命。这就是一般认为的那种使整个工业区去工业化的神秘力量（以一种类似于自然力的形式出现，因而据说超出了人类的控制）。

更正式的表述就是：个别的资本家为了追求相对剩余价值而组织价值的生产，但这样做产生的新的价值关系反过来会摧毁他们自己。资本不仅生产自身统治的手段，还生产毁灭自己的手段。因此，资本家常常对毁灭他们的危机报以俄狄浦斯式的愤怒：难道他们没有正确地参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游戏，没有能够正确地计算和计划剩余价值的生产吗？难道他们没有按照资产阶级美德的标准来行动吗？他们怎么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更糟糕的是，现在怎么被扔到了破产的黑暗里？但是他们不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愤怒，反而对外国生产者、移民者、投机者和其他一

些仅仅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中秘密的、隐藏的当事人感到愤怒。

许多人在阅读马克思的时候都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把价值的概念理解为一个抽象的，因而是幽灵般的对象性的社会关系。但是“价值”和普遍接受的“全球化”的力量相比并不更加抽象和神秘。奇怪的是，很多人都很容易接受后者(难道是因为我们习惯它了？)，而经常认为前者太抽象而回避它。但是马克思这个概念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这种抽象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它集中在一起的力量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而我们又是如何——就像马克思在某些地方说的那样——变成资本的抽象概念的受害者的。在《资本论》的开头，我们了解到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构成的，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是由通过生产和流通过程的“产业资本运动”配置的。抽象的价值概念(和它的货币表现形式)通过市场竞争这个看不见的手成为一种调控的力量。

但是，回想一下，如果劳动不能生产出人们想要的、必需的或渴望的使用价值，那么它就不是社会必要劳动：生产和流通的统一在第一卷的第一部分就已经假定了。因此，价值就是一种由许多个别产业资本共同创造出来的抽象的社会关系。但是个别产业资本必须受制于它们共同创造的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中的许多最终都会屈服于自己不断创造的价值革命，甚至被其摧毁。我们明白它们实际上是在自掘坟墓。这里，与求助于所谓的“全球化”这个从天而降的神秘力量相反，我们有一个将这种自我毁灭的动力机制内部化的理论，通过这个机制资本家创造了使自己灭亡的条件。只要承认“价值作为资本所经历的，通过自身的运动而保持和加强的独立化”，我们就能接受这一理论。为什么我们能接受“全球化”这种空洞的字眼，却接受不了这个理论呢?

当然，插入这些段落，并不是说所有的产业资本都要毁灭。那么，需要提出这个问题：哪些资本能存活，它们是哪种类型的，它们在哪里？即使马克思在这里并不关心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它太“特别”了，所以马克思没有直接的兴趣)。看到这些简短的段落，作为一个一直研究不均衡的地理发展、地域变化和城市化变迁路径的人，当我发现我所关

注的东西如此整齐地陈列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时，自然会抑制不住地感到欣喜。

但是，为了朝这个方向转变，马克思必须改变一下在第二卷中不讨论生产力、技术和组织变化的理论方法。在此处可以对马克思的方法做些反思，为什么排除这些因素是必要的。如果价值革命在循环过程中不断发生——循环过程恰恰是第二卷的焦点，那么会产生种种后果。如果生产资料的价值下降，那么即便是简单再生产也会释放出货币资本。“只有在价值关系保持不变时，过程才能完全正常地进行。”①对作为整体的产业资本循环如此重要的平稳性、连续性和流动性，只有在没有技术变革的条件下才能维持。只要引进新技术，就会导致价值革命和循环过程的不稳定。例如，一种新技术进入市场，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就会发生变化。很明显，这会扰乱先前的流动关系：

> 只有各种干扰在循环反复中被排除，过程才能够在事实上正常进行；干扰越大，产业资本家就必须持有越是大量的货币资本，才有可能等到干扰被排除；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每一个单个生产过程的规模会扩大，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量也会随之增加，所以除了其他情况外，又加上这个情况，使产业资本家的职能越来越转化为各自独立或相互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②

这是一个重要的论断。由于技术变化，需要预备货币以应对在循环过程中会发生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技术快速变化的时代，最好成为一个货币资本家而不是一个生产资本家。在过去的三十年左右，金融和货币资本取得了对工业资本的优势，也许就与这个因素有关。然而，马克思在这里引入了货币资本家的角色，从而更加偏离他的假设(没有特定的当事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人)——他迄今为止一直在这个假设基础上进行纯粹的形式化论证。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垄断趋势的产生源于控制价值革命中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中断和破坏的需要。它和马克思在第一卷中论述的资本的日益集中(不同于资本的积聚)有关。实际的资本主义历史中一直存在显著的集中和垄断趋势，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出资本家如何利用它应对市场变化和不确定性。这些变化来源于通过技术进步取得相对剩余价值的激烈的竞争性且不稳定的驱动力。垄断力量使资本能够控制具有破坏性的技术革命的速度。

马克思还暂时搁置了另外一个隐含的假设：资本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运行，所有的生产资料都由其他产业资本家生产。当生产资料可以从其他还未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方获取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旦进入资本运行的轨道，它们就会成为商品，和其他商品没有什么不同，这主要归功于将它们从其他地方取来的商业资本家。在这里，产业资本的循环

> 是和各种极其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的……不论商品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产的产品，还是农民的产品(中国人，印度的佃农)，还是公社的产品(荷属东印度)，还是国家生产的产品(如在俄罗斯历史早期出现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国家生产)，还是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等等，它们都作为商品和货币，同表现产业资本的货币和商品相对立。①

资本可以将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纳入进来。

> 作为它们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它们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执行职能，作为商品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和商品资本所包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含的剩余价值的流通。因此，商品来源的全面性，市场作为世界市场的存在，是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特点。①

从《共产党宣言》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正处在一个世界市场快速形成的时代(通过铁路、蒸汽船和不久之后占据主导地位的电报的发展，商品价格几乎瞬间就能传遍世界上所有的主要港口城市)。他们也对产业资本循环与世界交织的方式非常敏感，不管是改变它(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占据支配地位)还是被它改变(由于便宜的原材料和其他商品可以从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获得)。关于这个过程，马克思指出了两点。第一，生产资本的再生产需要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受到在它的发展阶段以外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但是，它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而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而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产业资本的侵入，到处促使这种转化，同时又促使一切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②马克思没有说明这一过程是否会和平地发生，也没有说明它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实践。

第二，"不管其来源如何，不管生产它们的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如何，已经以商品资本的形式，以商品经营资本或商人资本的形式，出现在产业资本面前"。③这引发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商人资本和批发、零售商人的作用的一些简要的思考(我们到后面再详细阐述)。类似的，货币经营资本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像通常那样诉诸信用制度。以后我们将回过来讨论商人和货币资本家的角色问题。

在第132页，马克思还提示了第三点。流动的连续性对于资本循环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6—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过程很重要，它需要以稳定而非多变、不可靠的方式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生产者那里得到商品供给。一旦非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被纳入产业资本循环的过程，就必须采取措施确保这些商品的流动不受阻碍地持续下去。这是在非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某种权力关系的最可信的原因了。明显的做法就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或者和外国统治者(如沙特阿拉伯)达成协议。通过这些做法，可以与纳入资本循环的关键商品的非资本主义供应商达成合作，从而保证商品供应的连续性。

在这里，马克思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多少暗示。但是，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那样，一旦我们的想象开始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漫步，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第二卷是个丰饶的灵感之源，源源不断地为建构各种理论提供基础。例如，不均衡的地理发展；与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行商品交换的体系；上述体系发展的顶点，是通过商业或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使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资本循环最终统治一切。虽然文本中实际提到的材料相当枯燥晦涩，这些段落也显得很随意和离题，但是当我们沿着这些方向继续思考时，这些见解为我们开辟一个令人惊奇的理论领域。参考马克思在其他作品里的洞见，我们就对资本是怎样在各种特定的情形中站稳脚跟的(包括在非资本主义世界中)，有了更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马克思只是在这里添加了一些历史概括。“人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三个具有特征的经济运动形式。”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但绝不是和自然经济对立的两种不同的独立的交易形式”。[①]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的区别基本上指的是生产者间的“交易方式”不同。在自然经济中，交易方式是物物交换。

不得不说，我不觉得这种分类和时期划分有特别的启发作用。这些区分是未加批判地从亚当·斯密那里拿过来的，而且这些时期划分没有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任何历史依据。这只是马克思不加怀疑地依样复述资产阶级神话的情形之一。然而，它的重要意义在于马克思强调“信用经济”需要特别的分析方式。可是这一分析方式可能是什么，他在这里什么也没说。对于商业模式间的历史关系，以及高利贷和信用的历史意义，马克思在别处说得更好（我们可以在后面的分析中看到）。

这一章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一个对整个第二卷，从而对马克思所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都有重要影响的难题。因此，我们要仔细阅读。

我在第一章中提到过，马克思非常不愿意分析供给和需求的问题（因为当两者达到均衡时，“它们就什么也解释不了”）。但是，在第二卷中的这个地方，马克思遇到了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的情形。问题在于需要考虑实现剩余价值的最终需求来自哪里：

> 资本家以货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小于他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这是因为他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大于他以商品形式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既然他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只是作为产业资本家执行职能，他供给的商品价值，总是大于他需求的商品价值……资本家的供给和需求的差额越大，就是说，他所供给的商品价值越是超出他所需求的商品价值，资本家的资本增殖率就越大。他的目的，不在于使二者相抵，而是尽可能使它们不相抵，使他的供给超出他的需求。就单个资本家来说是如此，就资本家阶级来说也是如此。①

资产阶级需要生产资料（c），这是需求的来源之一。但是，它远小于将要生产的商品的价值（c + v + s）。资产阶级为工人提供了购买力（v）。工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3—1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把他的工资几乎全部转化为生活资料，并且最大部分转化为必要的生活资料”，所以“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间接地也就是对进入工人阶级消费的消费资料的需求”。如果我们忽略工人的储蓄并且“撇开一切信用关系［!］”，①那么“资本家需求的最大界限是c+v，但他的供给是c+v+s”。这意味着生产的剩余价值越大(或利润率越高)，“他的需求同他的供给相比就越小”。②因此，供给和需求间的均衡不仅看起来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也不是资本家想要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过剩资本的处置或吸收问题”。资本家的一天以一定量的资本c+v开始，以数量为c+v+s的货币等价物结束。那么，在这天结束时购买剩余价值的需求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这只是寻找更多货币的问题，那么在某处的某人(例如我们时代的联邦储备系统；对马克思来说是黄金生产者，他随后考虑了他们潜在的作用)能简单地满足这个要求。但是我们必须从价值而不是货币的范畴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剩余价值在交换中实现，那么我们必须解释最终与剩余价值交换的等量价值是从何而来的。从理论上说，我们得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不能在资本主义范围外寻求答案(例如马克思在本章前面提到的需求和供给的非资本主义来源)，也不能假设存在一个专门进行挥霍性消费的阶级(例如地主和其他封建残余，比如国王和教会)——这个阶级的惟一作用就是只消费不生产，以保持生产和消费的均衡。顺便提一下，后者(包括国际贸易)正是马尔萨斯处理有效需求不足和吸收生产出来的剩余的思路。他走得太远了，以至于为寄生阶级的炫耀性消费辩护，例如牧师、国家公务员(包括皇室)和游手好闲的贵族——因为他们在一个不协调的资本主义中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显然，马克思不愿用这样的办法解决问题，即便它在长期中可以维持均衡(事实上并不能维持)。

马克思像往常一样引进了一些复杂的因素，比如周转时间和固定资

① 感叹号是作者加的。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本投资(两者都将在后面分章节阐述)问题，然后寻求从再生产的角度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资产阶级把整个剩余价值都消费掉，而只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重新投入生产，那么供求就恢复了均衡。但是这意味着，所有剩余价值都必须被资本家购买和消费。也就是说，资本家必须用他们自己的价值储备(我们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获得的，可能和原始积累有关)购买(实现)在一天结束后生产的剩余价值。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上述分析背后的逻辑是天衣无缝的。想象一个只有资本家和工人的两阶级社会，很明显，工人不能提供吸收剩余的额外需求(如果有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剥削程度的加深，他们可能减少自己的需求)。因此，唯一能够提供额外需求的阶级必定是资产阶级。为了在后来的一个时点上实现他们企图占有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必须在某一时点占有货币(价值)储备。这个体系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例如，它假设资本家对数量日益扩大的消费品有无尽的需求。

然而，对于马克思的看法，这里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在这一章的开头，他说“过程的所有前提都表现为过程的结果，表现为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前提。每一个因素都表现为出发点，经过点和复归点”。①我们能说这对于资产阶级的总体而言是正确的吗?在第一轮循环中，资本确实得付出额外的价值(货币)来购买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但是，一旦这个过程完成，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就属于资本家了，而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消耗掉了他们的初始资本。在第二轮循环过程中，资本家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而是早些时候从工人那里得到的剩余价值的货币等价物。因此，资本家阶级可以通过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不断地进行再生产。资本家实际上用工人生产出来后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提供了额外需求。当然，这正是第一卷第23章的论点。额外需求来自哪里的问题似乎消失不见了，因为工人已经把它生产出来了，而资本家唯一要做的就是无偿占有它。或者，像马克思一开始说的那样，前提(资本家的有效需求)现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表现为结果(剩余价值的占有)。在简单再生产中这可能会起作用，但是，由这些章节的主要观点可知，这个过程不太可能不受任何干扰和中断地顺利进行下去。

但是，如果资本家如此行事，那么他就成了“非资本家”，“他作为非资本家花掉的，不是花在他作为资本家的职能上，而是花在他的私人需要或享受上”。①马克思还说：“这个假定等于假定资本主义生产不存在，从而假定产业资本家本身不存在。因为只要假定发挥作用的动机是享受，而不是发财致富本身，资本主义就从根本上被废除了。”②享受和发财致富的区别似乎对马克思的推理很重要。说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个人自身的享受欲望的基础上的，就违背了马克思在第一卷第24章中论证的观点。在那里，他认为资本主义基于“为了生产而生产和为了积累而积累”，是独立于资本家的个人欲望之外的。尽管总存在消费和享受的欲望与追加投资的必要性相互冲突的“浮士德时刻”，但是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资本家无可奈何地选择了后者。所以，把资本家假定成贪恋消费品的个体，并将其作为资本积累的驱动力，是不充分的；假定资本家的驱动力是通过攫取货币占有更大的社会权力，也是不充分的(尽管我们以后会看到，与这个动机有一定的关系)。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

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建立在追求纯粹的享受和贪欲上的体系，“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能的。资本家不仅必须形成一个准备资本，以应付价格的变动并等待买卖上最有利的行情；他必须积累资本，以扩大生产，并把技术进步合并到他的生产机体中去”。③例如，为了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需要而从循环中取出货币进行贮藏，这减少了可用的需求：“货币停止流通；他为提供的商品从商品市场中取出了货币等价物，但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并没有为这个货币等价物从商品市场中取出商品形式的等价物。”①这扩大了资本家向市场供给的价值和可用的需求之间的缺口。

当部分剩余价值被再投资于扩大再生产时，上文提出的解决有效需求问题的办法就更不可行了。资本家不仅要为购买和实现最初循环的剩余价值提供必要的资金，而且得寻找更多的资源来实现再投资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因此，问题将会一直存在。

所以，中心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如果需求不是来自资本家的消费(似乎事实就是如此)，那么它到底来自哪里？在这里，马克思给了我们提示，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在我看来，本章末尾的这个评论非常重要：“这里撇开信用不说，例如，资本家随着货币的积累，把货币作为有息的活期存款存入银行，这就是属于信用范围的问题。”②固定资本形成所需的必要储备可以由信用制度组织起来。这样，所有贮藏的价值都可以被花费掉。因此，这里是信用制度似乎能在释放更多的货币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情形之一。但我们不知道这种作用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它与积累过程的动态中产生的供求的明显失衡是如何相关的。

对这个难题的解答在第二卷很靠后的位置才出现，经过了几个连续的阶段，最终到达第二卷末尾的再生产图式。与其一直留着这个谜题(马克思倾向于这样做)，我宁愿大略说出我对马克思论点的理解。资本家的消费分为两种类型：个人消费(必需品和奢侈品)和生产性消费。后者要求将初始资本收回，用于另一轮的剩余价值生产，并追加投资于扩大再生产，这意味着对更多的生产资料和额外雇佣的劳动力所需的消费资料的需求(假设没有劳动节约型的技术改进)。竞争的强制规律推动了扩大再生产(因此，重点是发财致富，而不是享乐)。所以，来源于明天的扩大生产的需求(加上资产阶级消费)，为今天生产的过剩商品提供了市场。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以上过程中，时机是至关重要的。分解开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任何时点上都有一些资本家在花钱进行再投资，另外一些则把货币贮藏起来用于未来的投资或再投资(例如固定资本)。再投资提供了额外需求，贮藏则减少了需求，但是仍然在提供供给。在这里是否存在供给和需求均衡的可能性？这似乎只有在引入信用制度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它使我们可以随时利用其他人的贮藏货币(通过银行的业务)，来进行更多的再投资。实际上，需要用出售明天的产品得到的货币支付今天生产的剩余价值。资本家的供给和需求间暂存的缺口只能在信用货币(马克思在第二卷中刻意回避这个问题)的帮助下填补。实际上，资本家没必要向别人借钱。他们只需要打个欠条，先买后付——这种做法由来已久了。因此，资本积累和债务积累紧密相连，谁也离不开谁。遏制债务进一步发展(像共和党在2011年做的那样)，实际上是一场终结资本主义的战斗。这就是为什么紧缩政策，如果无限期执行的话，不仅会阻碍经济增长，而且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

这一章中只简略地提示了这个解决方法及其相关的问题。我在这里提前向大家介绍了后面的内容。事实上，马克思不愿讨论信用和利息的范畴，以及金融家和银行家的角色，这使他在第二卷中并没有完整地阐述在纯粹的资本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如何平衡供给和需求。

对资本定义的反思

在第二卷中，马克思并没有提出政治性的观点。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能从文本中得到怎样的政治启示呢？这些章节中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的定义问题。当再次讨论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时候，准确界定到底要反对什么是有帮助的。

在第一卷中，资本被定义为运动中的价值。马克思说“资本是货币，资本是商品”。

> 但实际上，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货币是每个价值增殖过程的起点和终点……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货币，从而也就成了资本。①

但是，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资本表现为什么，而不是资本实际上是什么。例如，在这些段落中，他提到资本如何“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②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这些金蛋是如何在生产的隐蔽之处，在资本的指挥和控制下，通过工人的劳动生产出来的。

但是，在第二卷中，“运动中的价值”被分解为货币资本循环、商品资本循环和生产资本循环。难道这些循环中的某一个比另外一个更适合作为资本的定义？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不同的循环之间或之内是否存在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的重要转折点呢？我们该如何理解由循环过程产生的，而不是直接源于劳资对立关系的矛盾呢？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个简单的事实呢：如果价值没有在循环中实现，价值(和部分剩余价值)就会消失。

在这些章节中，马克思极力强调货币不是资本。他说货币只能执行货币职能：买卖商品。此外，在资本取得支配地位之前，货币形式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尽管资本不能归结为货币，有一些比较好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资本不仅表现为，而且实际上也能成为货币资本。货币是一种由私人占有的社会权力形式。对更多货币权力的渴求激励着一大批资本家，这肯定可以成为私人积累欲望的驱动力之一。更进一步说，只有在货币形式下，剩余价值才是可计算的。在循环开始时，资本家很清楚他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1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1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花费了多少，并且可以很容易地算出他能挣回来多少。因此也难怪当提起资本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它的货币形式。从这里我们能看出货币就是资本这种拜物教信仰是怎么生根发芽的。承认这种拜物教信仰的力量非常重要。确实，货币的力量不仅很重要，而且也是人们欲望的对象。但是，货币拜物教，像第一卷中精辟论述过的商品拜物教一样，掩盖了潜在的社会真相。货币本身不能创造出任何东西：它只会执行货币职能。因此，马克思表明，认为货币资本是资本循环最耀眼的形式是一种错觉。在循环的某个时点，产业资本采取了货币形式，当它这样做的时候，就产生了货币资本。

商品同样也只执行商品职能。即使不是资本的产品，商品也可以存在。事实上，马克思指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整个世界，以及货币和市场形式，必须在资本形成之前就存在。如果市场上没有商品，资本家将从哪儿购买生产资料和工人生存所需的消费资料呢？因此，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化，甚至是直接的商品生产，都不能定义资本。特殊之处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中包含着剩余价值，而且商品自己不能孕育出商品。但是商品也不能定义资本。尽管它在第二卷中很重要，商品循环也不能定义资本。

更令人吃惊的是，马克思断言，通常作为资本定义的基础的劳动力买卖可以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存在。劳务支付可以在所有的资本循环范围之外进行。这种做法在封建制度下很普遍。阅读狄更斯的小说，你会发现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完全建立起来的伦敦，这样的情况也到处存在。这个区分仍然很重要：如果我付款给一个孩子，让他下午在我家附近为我遛狗；或者，我给花了几小时帮我修门廊的邻居一箱啤酒，这些经济活动都不需要预先假定资本或资本循环的存在。马克思说，为了取得货币或者其他商品而进行的劳务交换，在资本可以以商品的形式购买劳动力之前就必须存在。所以，尽管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是资本产生的必要前提，它也不能定义资本本质的全部内容。

马克思也指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必须按“生产一般”的方式进

行，并且和“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没有任何特殊的物理属性上的差异。①种玉米就是种玉米，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是如此。因此，使用价值生产的物质实践也不能定义资本。原则上来说，同样的生产过程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下都能发生。

我们被迫下这样的结论：资本的本质就是资本和劳动在生产中的阶级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系统性地生产和占有价值与剩余价值。这个资本的定义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的观点是一致的：资本是生产——理解为剩余价值的生产（不是物质生产），它支配着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所有环节，更重要的是，支配着生产的物质过程本身。资本的再生产总是被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阶级关系的再生产（在第一卷第23章中解释得很清楚）。

马克思描述的故事是这样的：货币、商品、劳务的买卖和给定的生产的物质与技术能力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先于资本存在。它们结合起来，为有利于系统性地生产和占有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劳资之间的阶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但是，只有后面的这个中心特征才能定义资本的特性。因此，如果我们想探讨“共产主义假说”或反资本主义政纲，那么，核心的目标必定是消灭生产中的阶级关系。

这样，人们自然倾向于得出下面的结论：在一个存在货币化、商品化甚至有劳务买卖的世界里，原则上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只要从生产领域铲除资本和劳动的阶级关系就可以了（用“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取代，马克思在考虑替代性选择时经常提到它）。毕竟，如果所有这些特征在资本出现之前就存在，那么它们为什么不能在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社会中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呢？

但是在这些章节中还有一个更复杂的故事。一旦劳动和资本的阶级关系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那么产生它的前提必然会发生转变。货币、商品的流通和劳动力市场的运行都会发生转变，以便支持甚至控制和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训生产领域中阶级关系的再生产。在这些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货币资本循环、商品资本循环和生产资本循环三者之间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如果不同时改变所有的循环，就无法改变任何循环。但这并不意味着变革是不可能的。确实，一个循环在某一时点上的中断对其他循环有直接影响，这使变革有可能发生。马克思向我们表明的是，中断是必然要发生的，因此它为政治活动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只要深入理解，我们就会发现整个体系是十分脆弱和不稳定的。

尽管货币、商品和劳务交换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比作为阶级关系的资本先出现，但是这些交换那时候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当大部分个体对自己的生产资料拥有一些控制力时，或者（如奴隶制和农奴制下）在社会秩序中确保有固定（尽管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地位时，直接生产者的再生产总是全部或部分地在市场交换之外进行的。有些劳务和商品的交换可能是在极度饥饿和作物歉收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但更多的是对超出社会再生产所需的剩余进行的交换。这些交换发生在交换价值施加的规训之外。在所谓的“部分无产阶级化”的情况下，全球劳动力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拥有一些土地和其他家族或血缘资源，当他们遭遇失业、生病或残疾时就会回到这种状况。例如，在当代中国就是这种情况，很多社会再生产的成本都是由农村地区承担的。更为冷酷无情的是，美国的农业综合企业就是以这种方式把社会再生产的成本转嫁到墨西哥身上的：雇用非法移民来从事有致癌作用的杀虫剂的喷洒工作，直到他们病入膏肓，从而不得不返回墨西哥农村，在那里接受照顾或者死去。

在第二卷开篇的前几章，马克思要我们注意这样一个总体观点：随着劳资之间的阶级关系逐渐在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在马克思的年代就已经如此），它对货币、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形式和运行的转变产生了影响。马克思指出，一旦货币成为货币资本，它就不仅仅是资本家拜物教欲望的目标和对象。它也承担了极其不同的职能，特别是以信用制度的形式，被独自地组织起来支持阶级关系的再生产。不同的资本循环缠

绕交错，相互支持，偶尔也发生矛盾，而阶级关系和剩余价值生产始终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心。资本“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①这和马克思的“总体”这个辩证性的概念是一致的，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阐述过。资本的特性存在于有利于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的阶级关系之中，其一般性存在于由货币、生产和商品资本循环构成的产业资本的循环过程之中。

因此，认为在不对其他循环的运行进行根本变革的条件下，就可以在生产领域实现深刻变革的想法只能是妄想。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过渡，不仅需要通过激烈的斗争去消灭生产中的阶级关系，还需要逆转或者重建其他循环，以表明货币化、商品化和劳务的交换是怎样实行变革，为生产中的联合劳动提供支持的。例如，如果为了便利交换，需要保留与货币类似的东西，那么我们如何避免它成为货币资本，如何防止货币内在的社会权力被那些利用它为自已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的阶级所攫取？商品交换是一回事，作为所有人类交易的调节者的交换价值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没有这些辅助性的变革，废除生产中的阶级关系似乎是不可能的。

这个结论在这些漫长而往往自负的历史中找到了支持：尝试在非资本主义方式的基础上重新改造资本主义生产，特别是在联合劳动的口号下。工人控制、自我管理、工人自治和合作工厂的尝试(20 世纪 70 年代在欧洲和 2001 年经济危机后在阿根廷兴起的那种)一直受到怀有敌意的商人和金融资本的控制力的威胁，在某些情况下一度被摧毁了。工人控制和工人自治的梦想，经常在货币和商品资本力量，以及规训它们的交换价值规律的岩石上撞得粉碎。价值增殖从而榨取剩余价值的驱动力难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二卷，第 121—12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以阻挡。显著的例子是1956年西班牙法西斯专政时期巴斯克县的工人合作社蒙德拉贡，它之所以能长期存在，部分是因为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信用机构和市场机制，从而在三个循环中贯彻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它继续存在并且繁荣发展着，其两百家企业中的大部分仍把参与者的回报差距控制在3∶1(相比之下，美国公司是400∶1，甚至更高)。

联合劳动形式面对的困难主要来自一直存在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价值规律支配并常常摧毁个别资本。一旦进入由价值规律支配的世界，企业就得服从这些规律的规训力量。远离这种规训力量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为了生存，蒙德拉贡和那些在阿根廷复兴的工厂不得不寻找与价值规律相妥协的方式。这使我们得出了一个至少表面上令人气馁的一般性结论，马克思已经在他对资本贬值和去工业化的分析中使我们为这个结论做好了准备：不废除资本的运动规律和支撑这些规律的价值规律的无形却客观的力量，就不能废除生产中的劳资阶级关系。但是马克思经常被历史转变的协同演化理论所吸引。如果我们在这里加入协同演化理论的轮廓，那么一种反资本主义斗争的策略就浮现出来了。尽管劳动和资本的阶级关系处在资本定义的核心，它被深深的嵌入到了循环过程的其他方面之中，以至于不废除或者取代它旁边的支撑物就很难消除它。尽管我们仍然相信联合劳动、工人自治和自我管理的原则，也为尝试实行这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漫长的斗争史感到光荣，我们还是得面对社会变革的所有其他方面，它们是把全社会从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所必需的。

虽然共产主义最后必须要废除劳动和资本的阶级关系，但它没必要废除货币(或其等价物)，也没必要废除劳务和商品的交换。正如它之前的资本所做的那样，共产主义必须找到重组其他所有的循环过程的方法，使之支持联合劳动，而非支持资本的阶级关系。这就提出了一些非常普遍而且似乎很难的问题，即货币、商品化和市场在将来的作用和本质是什么。例如，劳务是如何交易的，劳动又是如何从一个生产线或生产地点流动到另一处的？劳动分工如何与社会目标相协调？会有劳动和

商品的交换么？向共产主义过渡必然要求改变其他所有的循环过程，以使它们不再支持资本。但是试图通过完全废除所有这些补充性的形式，以建立共产主义的实践，像朝鲜那样，也是不可行的。

尽管马克思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但他似乎赞成这个想法：将联合劳动者自主控制并决定以什么方式生产哪种使用价值，作为对基于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占有的、无情的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替代方案的基础。但是在第二卷最后两章，当我们研究再生产的整体条件时就会发现，如果没有某种指挥和协调机制或者治理权威，没有有意识地计划如何以一种合作的方式生产使用价值，这就不可能发生。当然，所有这些离马克思的实际文本已经很远了。但是我认为阅读第二卷时需要对这些过程和问题多做思考，这样才能在创造性的政治思考中把阅读这样一本枯燥无味的书转变为更加有趣的经历。

但是此处还有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观点。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特别是美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概念总是和国家集权的独裁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完全不信任国家和国家权力运用的正当性的人随处可见。但是马克思在这里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的核心是：在一个分散化的经济中，让自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控制自己的生产过程并在工作场所自主地行使权力。我想起了数年前的一个公共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很多美国人认为工人控制是一个好主意。在2008年危机的时候，当芝加哥的共和国门窗厂的工人占领了他们的工厂时，他们被美国的主流媒体描述为当地的英雄，而不是红色的共产党恶棍。如果你问社会主义的最大的反对者，包括“茶党”，[①]问他们是否同意工人控制，而非国家或政府控制，他们肯定会回答同意。事实证明，许多人至少支持这种版本的共产主义假说。因此，这些章节中出现的不仅仅是一个清晰的资

① 茶党运动(Tea Party Movement)，一个于2009年初开始兴起的美国社会运动，主要参与者是主张采取保守经济政策的右翼人士，代表的是下层保守派利益。主要分布在保守势力强大的美国南方和中部的农业州。TEA并非茶叶之意，而是指“已缴纳够多的税”(Taxed Enough Already)的简写。——译者

本的定义，更是一个甚至很多美国人都非常赞同的共产主义替代性方案的概念。

第二卷第5—6章概述

接下来的两章处理和先前几章中描述的流通过程相关的时间和费用问题。在这里马克思展开了对持续的资本积累的时间性的研究。尽管他完全专注于资本运动的规律，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难看出这些循环过程如何必然影响和塑造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时间性。实际上，这几章的细节中隐藏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居于统治地位但不断变化的时间性和不断涌现的空间性问题的深刻研究。那么，资本的时空演变是什么样的？它背后隐藏着什么力量，为什么它有特殊的运动轨迹？当我们阅读文本细节的时候，脑海中应该带着这些问题。

这里需要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它是理解马克思这几章内容的基础，源于他长期坚持的观点——价值和剩余价值无法通过交换行为产生。这个基本观点就是：价值在生产中产生，生产中创造的价值才是价值。根据这一观点，花费在市场上的流通活动的时间和劳动是不生产价值的。市场上的流通活动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和劳动。马克思认为这造成了时间损失和可用于价值生产的劳动时间的损失。因此，人们有探求降低这种损失的方法的动机。结果之一是资本一直以来都对加速运转着迷。把商品转化为货币和把货币转化为商品的劳动消耗是非生产性劳动（非生产不意味着劳动是没有用或者不必要的，也不是说从事这些劳动的是闲散、懒惰和不生产的工人，而是说它不生产价值）。当然，商品流通中雇用了很多劳动，而且商人、批发商和零售商之类的资本家组织这些劳动并从中获利，部分是通过像生产领域内的资本家那样剥削所雇用的工人而得到的。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仍然是非生产性劳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围绕着它进行了大量没完没了的争论。欧内斯特·曼德尔在他为《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导言”中，对一些讨论做了很好的概括（尽管很

多学者对曼德尔的解读存在争议①)。

我不想深入探究这些争论。但是有些一般性的问题还是需要看一看，即使它们不能在这儿得到解决。例如，有一个与马克思在第一卷中的构想有关的潜在的难题。在第16章中，他把焦点从个体转向了“总体劳动者”。显然，在他的脑海中有一个工厂，生产线上的直接生产者与清洁工、维修工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混杂在一起，马克思很乐意将所有人都看作是总体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尽管其中的一些人并不会把他们的劳动力投入到正在生产的商品中去。正如我在《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说的，准确定义总体劳动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是个难题。它包括工厂里的设计者、管理者、工程师、维修工、清洁工和主管贸易的人么？如果就像马克思在这里坚持的那样，重要的是总体劳动的生产力，而不是个体劳动者的生产力，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哪些工人的生产力应该被计算在内，生产价值的“相关劳动者”包括哪些人。工厂中的总体劳动的一部分职能(例如清洁工作和平面广告设计)被转包出去时会出现什么情况？难道它们会突然从总体生产性劳动的一部分转化为非生产性劳动么？资本主义企业有一个显著的、系统性的趋势——特别是在过去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那就是越来越依赖于外包。这产生了更加“精简和合适”的总体劳动者，并提高了他们个人的利润率(尽管它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总效应还是模糊不清的)。清洁、维修、设计、市场营销等工作日益被组织为“商业服务”，很难分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马克思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它们是生产性的劳动还是非生产却必要的劳动。公认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存在这个问题(有人批评蒙德拉贡越来越依赖外包合同，因此是通过剥削其他地区而生存)。

我不能集中于这个问题，只能告诉你我们在这里进入了一场核算上

---

① 对曼德尔导言中的观点的批评意见，参见 Patrick Murray，“Beyond the ‘Commerce and Industry’ Picture of Capital”，in Christopher John Arthur and Geert A. Reuten，eds.，*The Circulation of Capital: Essays on Volume Two of Marx's Capital* (London: Macmillan，1998)，57 - 61。

的噩梦之中(在我看来，它是无解的)，结果会导致一大堆的争论(马克思主义者一向最擅长此道)。我把这些问题留给你，请你有时间再看。这样做的话，你会发现在亚当·斯密的书中，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马克思为了更好地形成自己的定义，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卷中用了大部分篇幅分析并批判亚当·斯密的观点。但我本人并不相信马克思找到了这个问题的合理答案。我也并不认为别人已经找到了让我信服的答案，这就是它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遗留问题的原因。

对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区分，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核算上的解决方案时，我们面对的难题就是：如果既要保留马克思的直觉洞察力，又要承认实施这种区分的困难性(不可行性？)，我们该怎样继续研究下去？直觉洞察力来自对资本的三个循环的分析。存在生产的时刻(劳动过程)，因此能找到生产循环。但是如果没有协调好货币和商品界定的流通条件，生产循环就不能完成。很明显，劳动被卷入到三个循环中，产业资本循环(总体程)的连续性依赖于所有三个循环所界定的连续性条件。压倒一切的想法是：连续性和流动速度(加速)的必要性，以及为确保这种连续运动而采取的措施。

如果连续性是唯一的顾虑，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生产、流通和实现过程的所有劳动(也可以延伸到用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家庭劳动)都是维持并再生产资本的总体劳动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认为所有参与产业资本循环的劳动者都算生产性工人。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将会粉饰和掩盖一些重要的东西。如果价值和剩余价值只在生产资本循环的生产时点产生，那么产业资本流通中的费用和付出的劳动必须通过扣除生产中产生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来支付。很明显，不管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社会的角度，资本再生产都极为关注这部分扣除的数量。如果所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被用作流通费用，那么谁会愿意费力生产呢？因此，减少这一扣除的策略以及最大限度减少流通中损失的时间的方法，在资本的历史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感受到这些策略的影响。

因此，这种冲动——通过加速（甚至加速我们的消费）和“用时间消灭空间”（就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说的那样）不断变革资本主义的时空结构——正是来自这里。反过来，我们可以推知，如果施加在这些扣除额（或者不能促进资本循环运动加速）上的权力过大的话，危机可能会发生。如果所有权力都在货币资本家（金融家）和商业资本家（商人）手里，那么它会对这部分资本最终依赖的价值生产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例如，2007年后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可能是因为非生产性的资本和商品循环（例如高盛和沃尔玛）攫取了过多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绝大部分是虚拟的）利润，吸干了生产活动的能量；相反，也可能是因为生产循环的状况严重恶化，刺激资本涌入了非生产性资本和商品循环中，通过掠夺而不是生产来进行资本积累。怎样证明哪个原因是正确的，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但是问题立即表现为：如果价值可以在流通中产生，那么为什么还要费力生产？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以这种形式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它暗含在分析中。我宁愿对付这个问题，也不愿陷入核算的泥塘之中。而且，这似乎就是最符合马克思直觉洞察力的问题。这个问题碰巧与我们的时代密切相关。带着所有这些问题，让我们看看马克思是怎么处理细节的。

第二卷第5章

第5章以看起来很简单的流通时间（资本在流通中从商品转化为货币所需要的时间）和生产时间（资本停留在生产活动中的时间）的区分开始。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的总和在后面被定义为资本的周转时间①。但是，这里有一些复杂情形。固定资本（机器等）可以在生产领域停留更多的时间，不管它们有没有被使用。生产中的所用资本（包括全部固定资本，例如机器和厂房）和所费资本（只包括在生产活动中消耗掉的那部分固定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本）有重要差别，后面的章节讨论了这个问题。然而，只有在给定的时间范围内，这种区分才有意义。除非特别说明，马克思通常假设周期为一年。此外，“劳动过程的周期性中断，例如在夜间，虽然会使这些劳动资料的职能中断，但劳动资料仍然留在生产场所”。①生产也需要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储备（存货），以应对投入品供应的突然短缺和预料之外的波动。

这使马克思区分了职能时间或随后所说的“劳动时间”（通过生产性消费积极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和“生产时间”（它包含资本储备的时间和生产过程中不活跃的时间）。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存在生产过程继续进行却没有劳动投入的情形——例如，“播在地里的谷种，藏在窖中发酵的葡萄酒”。②因为所有这些原因，生产时间几乎总是长于劳动时间。

当资本没有被积极地使用时，它就恢复到马克思所谓的潜在资本的状态，“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但不处在劳动过程中……它的闲置是使生产过程连续不断进行的一个条件。为保存生产储备（潜在资本）而必需的建筑物、装置等等，是生产过程的条件，从而也是预付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③但是闲置资本不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尽管它是生产资本必需的“生涯的一部分”。

> 显然，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越吻合，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生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价值增殖就越大。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是尽可能缩短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部分。不过，资本的生产时间虽然可以和它的劳动时间不一致，但前者总是包含后者，而且超过的部分本身就是生产过程的条件。④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流通时间是卖掉商品并把货币资本再次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用的时间。马克思写道，“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是相互排斥的。资本在流通时间内不是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因此既不生产商品，也不生产剩余价值”。①这就意味着

> 流通时间的延长和缩短，对于生产时间的缩短或延长，或者说，对于一定量资本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规模的缩小或扩大，起了一种消极限制作用。资本在流通中的形态变化越成为仅仅观念上的现象，也就是说，流通时间越等于零或近于零，资本的职能就越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殖就越大。例如，假定有一个资本家按订货生产，因此他在提供产品时就得到支付，又假定支付给他的是他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那么，流通时间就接近于零了。②

马克思注意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忽视了分析生产和流通时间的重要性。因此，许多经济学家，以及资本家自身都出现了拜物教幻觉，即认为剩余价值可以“从流通领域 ”得到，因为“更长的循环时间是更高的价格的基础”。这造成了一种假象：“资本有一个神秘的自行增殖的源泉，它源于流通领域，与资本的生产过程，从而与劳动的剥削无关。”被价值可以从流通中产生这种拜物教信念(现在仍然存在)迷惑，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资本具有加速生产并提高流通效率的内在动力。毕竟，如果价值可以通过流通来生产，那么为什么还要努力减少流通时间？放慢时间不是会增加更多的价值吗？

不幸的是，马克思仅仅以一种纯粹形式化的方式列举了这些，而没有尝试揭示其历史意义。但是把这些节点联系起来并拓展到历史中并不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困难。例如，马克思回顾了第一卷[1]，资本如何为了“缩短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多余时间”而有一种“夜间工作的欲望”。[2]然而，马克思本可以走得更远。要是他在这里引入了“竞争的强制规律”——就像他在第一卷中介绍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时那样——那么他将会推导出一个强有力的、合乎逻辑的论证，来解释资本家为什么总是通过缩短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距(和成本)来寻求竞争优势。类似的，他也可以指出资本缩短流通时间并寻找更高效的分销方式的必要性(沃尔玛现象，如果你愿意举例的话)。我经常想，如果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插入一个简短的章节，就像第一卷中的工作日那章一样，描述为了减少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流通时间之间的差距而进行的技术和组织变革的历史，那么第二卷的可读性会强得多，吸引力也会大得多。那样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资本拼命地追求缩短一切过程的时间。它花在这些阶段的时间越少，它就能越快地收回剩余价值。

例如，猪最初的“自然”繁殖周期已经从一年一胎加速到了一年三胎；屠宰和肢解都在流水线上高效进行；包装和运送被整合在及时(just-in-time)的运输体系中；超市用计算机实行严格的存货控制。在整个过程中唯一难以捉摸的因素就是消费者选择的个别性。今天，纽约的消费者会购买多少猪排呢？这就是资本生产出来的世界。我们这一章要解释资本为什么非这样不可，其动机何在。

在第一卷中，我们定义商品流通的基本形式为C—M—C。流通时间被分成“两个相反的阶段”——从货币变成商品(投入生产)所需要的时间，“和从商品变成货币所需要的时间”。在第一卷，马克思认为这存在不对称性，因为从价值的一般代表(货币)变成价值的特殊代表(商品)要更容易。但是在这里，马克思却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描述了这些关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367—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系。对那些寻求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来说，货币转化为商品伴随着另一个转化——“资本要转化成在一定投资场所形成生产资本的一定要素的商品”。①这和用货币消费的最终消费者的情形是不同的，如果消费者找不到鞋子，那么他们可以轻松地购买衬衫。与之相比，资本主义生产者面临特殊的购买需求：

> 生产资料也许在市场上还没有，还必须生产出来，或者要取自远方市场，或者它们的通常供给出现了障碍，价格发生了变动等等，总之，发生了许多这样的情况，这些情况在M—C这个简单形式变换中看不出来，但会使流通阶段的这个部分耗费的时间时而较长，时而较短。像C—M和M—C可以在时间上分离一样，C—M和M—C也可以在空间上分离，购买市场和销售市场可以是空间上不同的市场。②

因此，生产资料供给的地理和空间条件给资本主义生产施加了限制，因为把生产资料运输到劳动进行的生产地点需要耗费时间。

但是重要的不仅仅是耗费的时间，“例如就工厂来说，采购者和推销者甚至往往是不同的人”，而且既然这些流通当事人(例如商人)“在商品生产中……也和生产当事人一样必要”，③所以他们都需要获得报酬。简而言之，为了获得生产所必需的使用价值，资本家要面对各种潜在的供给约束和成本。他们还得面对由其他资本，以及具有地缘政治雄心的国家权力所施加的约束。我需要稀土金属来生产风力涡轮机，但是中国控制了稀土金属95%的产量和世界贸易。当日本和中国发生领海权纠纷时，中国海关停止了对日稀土出口，日本生产商只能干瞪眼。有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数这样的障碍可以影响货币转化为用作生产资料的商品。

马克思的总体观点是有道理的：从货币到生产资料的形态变化可能存在问题。获取这些生产资料所花的时间越久，被困在非生产状态的资本就越多。反过来说，物资供给的改进提高了资本的总体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这并没有否认实现剩余价值的销售行为的重大意义："M—C 在正常条件下，对于表现为 M 的价值的增殖来说，是必要的行为，但它不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它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导论，而不是它的补遗。"①剩余价值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

商品使用价值的特殊性在第二卷中比在第一卷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这对于 M—C 的转化和最终消费的运动 C′—M′来说都是正确的。"商品本身的存在形式，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使商品资本的流通 C′—M′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果"它们没有在一定时间内卖掉，它们就会变坏，并且在丧失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同时，也就丧失作为交换价值承担者的属性。商品中包含的资本价值，资本价值中增长的剩余价值，都将丧失"。②问题在于

> 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坏的快慢程度不同……由商品体本身会变坏所决定的商品资本流通时间的界限，就是流通时间的这一部分或商品资本作为商品资本能够经过的流通时间的绝对界限。一种商品越容易变坏，因而生产出来越要赶快消费，也就是越要赶快卖掉，它能离开产地的距离就越小，它的空间流通领域就越窄，它的销售市场就越带有地方性质。因此，一种商品越容易变坏……它就越不适于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对象。这种商品只有在人口稠密的地方，或者随着地域的距离由于运输工具的发展而缩短时，才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对象。而一种物品的生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和人口稠密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二卷，第 14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二卷，第 14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地点，甚至能够为这样一类产品，如大啤酒厂、牛奶厂生产的产品，造成较大的市场。①

在这里，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循环领域中的技术创新——最重要的无疑是罐装和冷冻技术(和桶装啤酒！)，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当然，这些简短的段落也为经济地理学的知识“磨坊”提供了很多“谷物”——关于资本积累是如何通过穿越空间生产出独特的区位结构和地理联系的。生产资料的供应链和为空间上完全分离的、遥远的市场提供最终消费的商品供应链，在竞争的强制压力下不断地被重新塑造成更有效的结构。在这章的结尾，我们会分析马克思对运输和通讯的一般观点，并理解地方性的需求。

最后还要提出一点。马克思很晚才开始对劳动、生产、流通和周转时间问题的研究。例如，他在第三卷(大部分内容写得比较早)中没有对周转时间进行任何分析。恩格斯认识到周转时间的变化会影响利润率。因此他在第三卷插入了一个关于这个话题的尝试性的章节。我认为他这样做很对。因此，我认为在阅读第三卷时，心里牢记这些问题，包括下一章分析的流通费用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卷第6章

商品流通需要劳动力，流通活动也产生了费用。因此，流通领域是一个资本家奋斗的特殊场所，它是一个独特的阶级分支——商人——的活动范围。M—C—M的转化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并吸收劳动，为商业资本家提供了获取金融收益的机会。那些在流通领域内工作的人可能想“借此机会占有超额的价值量”，但是马克思坚持认为，这种劳动“由于双方的恶意而增大，但并不创造价值，正像花费在诉讼程序上的劳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并不增加诉讼量一样”。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而是为了使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①]致力于商品买卖的人，不管是资本家自己还是资本家雇佣的劳动者，都是如此。在这里，“一种职能本身是非生产的，然而它是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的因素……一个商人……通过他的活动，为许多生产者缩短买卖时间。因此，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机器，他能减少力的无益消耗，或有助于腾出生产时间”。[②]商人是有用的，“他的作用……是使社会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只有更少一部分被束缚在这种非生产职能上”。[③]剩下的必要费用(意外开支)必须从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中扣除。

我们马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类比：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把商人比作机器。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指出，机器不能生产价值，但它们可以成为个人(拥有先进机器的资本家可以赚取超额利润)和社会(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降低了工资商品的价值，从而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的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因此，一些不是价值来源的东西，可以是剩余价值的来源。这个命题似乎可以延伸到流通领域内的活动。尽管价值不是在这个领域中产生的，但是剩余价值可以在其中实现。当资本家(例如，一个商人)按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来雇佣工人，并让他过度工作来为自己获取剩余价值时，剩余价值就被个别地实现了；当商业资本家通过过度剥削他们所雇佣的劳动力来减少流通的平均必要成本时(这可以解释这一领域经常出现的令人发指和高得离谱的剥削条件)，剩余价值就被社会地实现了。到那时，为支付流通中的意外开支而从价值生产中扣除的价值量就会减少。因此，正如生产领域中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一样，流通领域中生产率和剥削程度提高带来的收益要在商人和生产资本家之间瓜分。然而，后者是资本家之间而非资本家与工人之间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的关系。事实上，在第二卷当中，关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的内容要多于关于劳资阶级关系的内容。“生意人碰在一起，就像‘希腊人遇到希腊人就发生激战’一样。”①当我们继续往下看时，要留意这个“激战”。

马克思接下来分析的是簿记费用。虽然簿记成本明显也属于流通费用，但它和通常的买卖的费用大为不同。“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生产过程的监督和观念上的总括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重要。”②(最后这句评论是否意味着簿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呢？)类似地，货币的供应和更新也会产生必要的费用：

> 这些执行货币职能的商品，既不进入个人消费，也不进入生产消费。这是固定在充当单纯的流通机器的形式上的社会劳动。除了社会财富的一部分被束缚于这种非生产的形式之外，货币的磨损也要求不断得到补偿，或要求把更多的产品形式的社会劳动转化为更多的金和银。这种补偿费用，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是很可观的。③

和货币供应相关的必要费用随着时间不断增加(马克思没有想到电子货币)：“它是社会财富中必须为流通过程牺牲的部分。”④

然而，“保管费用”则被当作一个主要的问题。对于个别资本家来说，这些费用具有“创造价值的作用”，并“成为它的商品出售价格的一种加价”。“因此，使商品变贵而不追加商品使用价值的费用，对社会来说，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则可以成为发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53—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财致富的源泉。”①这是因为这些费用实际上是生产成本的延续，尽管它们是在流通过程内产生的。马克思在这里考察的问题类似于冷藏的费用问题：冷藏并不增加产品的使用价值，但它可以阻止使用价值的腐坏，从而保存了价值，不然价值就会流失。同样，我认为这些细节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们对于获取竞争优势至关重要，比如沃尔玛采用的最优调度和及时运输系统等。要安排库存，那么就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库存多少？由谁保管？我冰箱里的库存接近于零，因为不论白天还是晚上，我随时都可以走到纽约的大街上买些吃的。零售商那里有大量的库存(尽管当有飓风来临时，往往会发生抢购，导致超市的货架空空如也)。住在偏远的地区的人们家里通常有很多储备。在马克思看来，这些都是闲置资本，减少库存可以释放出这种闲置资本，并将其用于生产性用途。因此，伴随着一整部资本主义历史的是一整部库存管理的历史(围绕这个话题可以写一本优秀的书或者博士论文)。

接下来马克思论述了与储备形成相关的费用，但是我不打算详细阐述。重要的观点已经提出来了：对于资本积累来说，由于种种原因，储备和库存是必要的，但是它们把资本从活跃的生产中带走，并使其处于潜在或闲置的状态。“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要求相当数量的商品(生产资料)不断处在市场上，也就是形成储备。”②在这种状态下，资本显然是非生产性的。储备或库存管理的改进会把资本从非生产的状态下释放出来。因此，储备和库存管理在资本主义历史中有重要的作用。像沃尔玛和宜家家居这样的公司在这方面有极高的效率，因此比其竞争对手有更大的优势。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汽车公司引入了及时生产系统，大大减少了生产流程中的不同节点对存货的需求，从而在与底特律的汽车公司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

这些都证实了马克思所强调的保持资本主义生产连续进行的必要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性。但是这要求市场上随时都有大批可用的商品。“对M—C来说，商品不断存在于市场，即商品储备，却是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的条件，是投入新资本或追加资本的条件。”①但是

> 商品资本要作为商品储备停留在市场上，就要有建筑物，栈房、储藏库、货栈，也就是要支出不变资本，还要对把商品搬进储藏库的劳动力付给报酬。此外，商品会变坏，会受有害的自然因素的影响。为了保护商品不受这些影响，要投入追加的资本，一部分投在劳动资料上，即物的形式上，一部分投在劳动力上。②

这些流通费用“同第一节所说的流通费用的区别在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加入商品价值，因此使商品变贵”。③简而言之，它们可以归为生产费用，因为直到以可出售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商品才算真正完成。因此，表面上是流通的过程也可以创造一些价值。这种互相掺杂的情况使核算噩梦变得更糟：把商品放在容器中会增加它的价值，而它待在货栈里的时间则要从价值中扣除(例如，货栈的租金)。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不需要充足的储备和存货就能纯粹地运行的资本流通过程。储备有三种形式：生产资本投入储备、最终消费者家里和储藏室里的储备、市场上待售的商品资本储备(在批发商和零售店那里)。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形式可以相互变换。如果市场上有大量容易获取的商品资本储备，生产者的生产资本投入储备就会变少；商店拥有大量储备的话，家庭内部对储备的需求就会降低。

然而，资本越发展，资本储备就越有增加的趋势。这种增加“既是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55—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1]但是一个资本家手中的储备量"取决于各种条件，而这一切条件实质上不外就是，要使必要数量的原料能够更迅速地、更有规则地、更有保证地不断得到供应，而不致发生任何中断。这些条件越不具备……生产资本的潜在部分……就必然越大"。[2]因此，"例如，纺纱厂主必须准备好够用三个月的，还是只够用一个月的棉花或煤炭，就有很大的差别"。[3]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过程的产品能够以什么样的速度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另一个过程，取决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在这方面，运费的低廉有很大的作用。例如，如果从矿山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向纺纱厂运输煤炭，那么，所需的费用就会比利用较便宜的运输为较长时期供应较大量煤炭所需的费用更贵。"[4]但是也有其他方法可以使流通更为顺畅地进行："纺纱业者在棉花、煤炭等等的储备的更新上越不依赖于他的纱的直接出售——信用制度越发展，这种直接依赖性就越小——为保证既定规模的连续的棉纱生产不受棉纱出售上偶然情况的影响而需要的这种储备的相对量，就可以越小。"[5]我在这里注意到，在马克思的思考中运输和信用在确保资本流通的连续性中存在一种没有言明的联系。事实上，这两个因素在改造资本主义的时空关系中共同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又遇到了这个问题——"许多原料、半成品等等需要有较长的生产时间，农业提供的一切原料，尤其是这样。"因此，要使

> 生产过程不致中断，就要在新产品还不能代替旧产品的整个时期，储备一定量这样的原料、半成品。如果在产业资本家手中这种储备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59—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减少了，那不过表明，它在商人手中以商品储备的形式增加了。例如，运输工具的发展，使存放在港口的进口棉花可以迅速从利物浦运到曼彻斯特，这样，工厂主就可以根据需要以相对较小的规模更新它的棉花储备。不过，这时作为商品储备存放在利物浦商人手中的棉花的数量就要相应地增大。①

由此得出了一个一般性的结论。首先，生产者手中持有的储备量取决于运输的难易程度和成本。其次，“世界市场的发展，从而同种物品供应来源的增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物品会从不同国家和在不同时期一批一批地运来”。②

例如，如果埃及、印度和美国的棉花丰收发生在一年中的不同时间，那真是一件大好事。

作为结尾，马克思追问“这些费用在多大程度上加入商品价值”。对个别资本家来说，保管费用是一个确定的损失。由于它们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一部分，所以买者不用为其支付。即使在资本家预计到价格上涨而囤积居奇时，这种投机活动也只是资本家的个人行为。但是自愿和非自愿的储备形式之间是有差别的，后者出现仅仅是因为一定的储备是社会所必需的。因此马克思认为，可以将它看作是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也是与所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相关的社会必要开支的一部分。“不管这种储备的单个要素的流动性有多大，其中一部分总要不断地停留下来，以便储备可以始终处于流动状态。”③马克思在这里清楚地阐释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一般主题：整个资本主义动力学中固定和运动之间的关系。

生产和非生产活动，进而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区别，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60—1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实际上是很难辨别的。正如我所多次指出的，这制造了一场核算的噩梦，在那里仓库的守夜人是非生产性的，而给容器打包的工人则是生产性的。试图为这一问题寻找简单的会计解决方法的人一定会发疯。我自己的结论是，放弃会计核算，转而集中于分析加速运动、库存费用管理等做法的实质影响。马克思已经说明，这些做法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来说都是极端重要的。当我们把交通运输和通讯的问题，及其暗含的空间生产问题纳入进来时，这些问题就更加重要了。

交通运输和通讯问题

流通费用，以及作为储备和库存而被束缚的资本，都受到运输关系的重要影响。在第二卷的头几章中，马克思曾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运输业是工业的一个不寻常的分支。它不生产玉米或铁棒这样的有形物体，并且它的生产过程就是消费过程（流通时间为零）。但是它能产生价值。它的产品是空间位置的变动：例如，“现在纱不是在产地英国，而是在印度”。因此“运输业所出售的东西，就是场所的变动本身”。“这种效用的交换价值，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都是由其中消耗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价值加上运输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所决定的。”①

这些评论出现在第一章中，但是在第6章的结尾，马克思做了进一步阐释：

> 商品在空间上的流通，即实际的移动，就是商品的运输。运输业一方面形成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从而形成生产资本的一个特殊的投资领域。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如下的特征：它表现为生产过程在流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通过程内的继续，并且为了流通过程而继续。①

这是因为“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而物品的消费可以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因此，投在运输业上的生产资本，会部分地由于运输工具的价值转移，部分地由于运输劳动的价值追加，把价值追加到所运输的产品中去。后一种价值追加，就像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下一样，分为工资补偿和剩余价值”。②位置的变化可以是小范围的，像棉花“由梳棉车间运到纺纱车间”的运动，也可以是更长距离的，到达遥远的最终市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由运输追加到商品中去的绝对价值量，和运输业的生产力成反比，和运输距离成正比”。③这个规则可由运输的商品的特征和性质——体积和重量——加以修正，但是也取决于“物品容易破碎，腐烂和爆炸的相对程度”。费率表是很复杂的：当要决定对商品每英里收费多少时，“铁路大王们在幻想的物种形成上，比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展现了更大的天才”。④

与这里相关的动力学的重要性只有一点暗示，所以我需要详细阐述一下。自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起，运输和通讯的系统性进步既减少了商品在空间中运动的时间和成本，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区位的可能性和必要条件。这是因为时空关系共同参与确定了总体资本的周转时间，以及特定行业资本的周转时间。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指出这一点，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阐述了很多通过减少距离摩擦来缩短总周转时间的内容。我认为这证明了第二卷的未完成性质，因为在这里马克思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67—1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68—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没有采用一些概念，例如“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永恒趋势，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可以找到相关内容。交通运输和通讯的创新对世界市场形成的总体意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得更深刻。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已经出现了多少加速生产和加速周转时间的创新？有多少是关于减少阻碍商品和信息运动的距离摩擦的创新？有多少在这两方面都有影响？阅读第二卷，我们能理解资本是如何将不断进行时空变迁的必要性内化到自己的运动规律之中的，而不是把所有的历史都当作偶然，或者是一些渴望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个人愿望的产物。不幸的是，马克思没有试图把《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天才洞见与第二卷强调的生产、流通和周转时间的技术性质联系起来。

但是他在这里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

> 没有商品的物理运动，商品也可以流通……A 卖给 B 的房屋，是作为商品流通的，但是它并没有移动。棉花、生铁之类可以移动的商品价值，经过许多流通过程，由投机者反复买卖，但还是留在原来的货栈内。这里实际运动的，是物品的所有权证书，而不是物品本身。①

要是马克思能多做一些研究的话，他也许会发现：在货币、商品和生产资本循环中，空间流动的可能性和条件看上去极为不同；现在和未来的所有权凭证（即对未来劳动的索取权）在世界市场上的流通，注定要成为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运动规律的、越来越重要的特征。

和其他行业一样，交通运输和通讯行业的竞争也很激烈，这导致创新快速扩散，从而影响了行业的生产力、效率和空间范围。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这个行业的竞争经常受到所谓的“垄断竞争”的限制——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为一旦铁路线在华盛顿和纽约之间建立起来，很难想象在旁边铺设几条别的线路和它竞争。但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创新，它们容许空间竞争，从而改变了资本运作的地理条件(当然包括所谓的“方式变换”，比如说，货车运输比铁路运输更灵活、高效、廉价)。

三

固定资本问题（第二卷 第7—11章）

总体介绍和评论

对于马克思而言，固定资本是一个虽有问题但至关重要的范畴。一些评论家非常激进地认为这个范畴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出现了致命的漏洞。我之后会解释为什么我不同意这一观点。由于固定资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出现了很多次，在这里特别关注它就不足为奇了。但是第二卷的论述并不比马克思在其他地方的论述更有启发意义。比如，当我在《资本的限度》（见第685—743页）一书中试图重构马克思关于固定资本形成和流通的观点时，我发现自己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引用比第二卷多。在《大纲》中，马克思的陈述更加精彩：

> 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是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①

每当我看到纽约市的地平线或者飞向伦敦、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城市时，我总会想起这段话，而且我将这些地方——不论好坏的方面——看作“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当我看到办公室、工厂、车间、住宅、学校和医院，看到各种美丽的宫殿、街道和小巷，看到公路、铁路、机场和码头，看到公园和英雄纪念碑时，我觉得它们不仅是物体，更是人类建造的物质世界，是亿万人类日常生活的基本场所。它们是由人类劳动创造的，并被赋予了社会意义。资本在这个世界里没日没夜地流动——摊销贷款和创造大量的租金、利息支付流，同时混杂着大大小小的财产所有者的投机幻想、梦想和冰冷的预期。资本主义的城市无疑是某种已经对象化了的欲望、知识和实践的力量的最具震撼力的例子。

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部伟大著作的中心，马克思指出了一个在第二卷中也能发现的深刻的矛盾。

“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②(这个想法在第一卷关于机器和大工业的第15章中也提到过，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也是唯一合适的技术基础。)

> 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固定资本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而加入生产过程。因此，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恰当的形式，而固定资本——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则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另一方面，就固定资本被束缚在自己一定的使用价值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下册)，第219—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下册)，第2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存在中这一点来看，它是不符合资本的概念的，因为作为价值来说，资本对采取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形式都是无所谓的，它可以把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形式作为自己一视同仁的化身来加以采用或者抛弃。从这方面来看，从资本对外部的关系来看，**流动资本**同固定资本相比表现为资本的适当形式。①

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连续性、流动性和加速是资本流动的本质特性，但是现在我们遇到一个范畴：它的目的是促进流动，但是它本身是固定而不是流动的。一部分资本不得不固定下来，以使余下的资本能保持运动。如果我们不将对固定资本的印象局限在机器上，我们的脑海中会出现一幅全景式的资本大厦的画面：清理好的场所、工厂、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海港、机场、水坝、发电站、输电网、灯火通明的城市和巨大的产能。这些资本建造的、用来促进它的运转的景观，将资本积累困在一个固定的、与流动资本的流动性相比越来越僵硬的世界中。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资本，容易遭受货币资本的“蝴蝶效应”的攻击，甚至容易受到更加呆板但是也无法预测的商品资本、生产资本的转移和流动的攻击。这预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危机形成方式。货币资本自由轻快地流动，将固定资本孤立无援地留在原地，任由其遭受残酷的贬值。我认为矛盾是这样的：资本在一个时点创造了一整套适应其需要的景观，而在未来的某一时点，为了适应资本积累永恒的扩张的力量，会破坏它并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景观。资本或者在别处，或者在旧的废墟上建立新的地理景观；留下的是去工业化的或废弃的景观，它们是孤立和破败的。这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这一过程周期性地使资本循环和积累的地理景观发生贬值和变革——以惊天动地的方式。

固定性和运动之间这种深刻的、易引发危机的矛盾是明显的：固定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下册)，第2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资本是这个矛盾的核心。简而言之，固定资本的问题恰恰在于资本是运动中的价值，而固定资本是固定的。这种对立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原则上（尽管实际中并不总是这样），固定资本一直是永远对立的资本—劳动关系之外的一个常见的危机来源。危机在固定性不能适应扩张性的运动时发生。后者不得不打破已经固化的那部分资本所施加的限制。随着高度流动的货币资本流向别处，结果是大量固定资本的贬值。（1970年以来的去工业化留下了很多荒废的工厂、仓库和破败的基础设施——甚至衰退的城市，比如底特律）。

这些矛盾在第二卷中有所体现，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论述得更为有力。所以在阅读第二卷的时候想一下《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的相关内容是有帮助的。一方面，这让阅读更加有趣；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我们对一些可能被忽视的关键问题的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没有把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精彩论述（即使有些华而不实）写进他将近二十年后的《资本论》第二卷是一个谜。可能是由于他希望在第二卷中表现得更加科学和实事求是。无疑，他过多地关注了细节，比如，当时的铁路工程手册揭示的固定资本的修理和补偿的区别。但是我推测马克思之所以搁置更广泛的问题，是因为他在第二卷中有明确且有限的目标。正如在第7章开头简短的介绍性材料中提到的那样，他探究的真正目标是资本的周转时间。他知道，如果不讨论与长期固定资本投资的周转时间相关的复杂问题，他就不可能全面地研究周转时间。我推测，这一顾虑使他缩小了范围，可以暂不研究固定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理中更为普遍的意义。不过，通过马克思的论述，我们可以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怎么变成如今这个样子的，以及通过固定资本形成进行的资本积累过程实际上是怎样的。但是第二卷在技术方面也让人感到失望：一些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其他地方出现过的至关重要的系统性问题，在第二卷中缺失了。当然，基本原因是第二卷尚未完成。所以在下文中我会指出一些分析中的缺陷，以及这些缺陷可以用哪些辅助著作来弥补。

马克思关于固定资本的思考的总体框架都在这五章中，不过是零零星星地散布在这几章中的。我不知道这是否与恩格斯对材料的重新编辑有关，但结果是我认为有必要跳出文本，而不是沿着文本顺序(似乎它是一个清晰的、逐渐展开的论证)来解读，我提前为此道歉。

例如，马克思对固定资本最基本的看法在后面几章里表达得最清晰，那几章对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进行了极度详尽的批判(那些章节只需要略读即可，除非你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史或者马克思对重农学派的看法感兴趣)。马克思这样写道：

>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本能地坚持亚·斯密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范畴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范畴混同起来的做法，并且在一个世纪中一代一代不加批判地沿用这种做法。在资产政治经济学那里，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和投在原料上的那部分资本根本没有区别，而仅仅在形式上——看它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还是完整地通过产品而流通——和不变资本相区别。因此，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从而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运动来说，基础一下子就被破坏了。问题就只是预付价值的再现了。①

即使是对剩余价值理论有一些原始的见解的李嘉图，“也由于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混同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犯了极大的错误”。他从没有成功克服这个错误，即“他的研究是从完全错误的基础上出发的”。②

虽然马克思在对固定资本论述的开篇就提出了这个“基本的错误”，③但他没有详细阐述它的含义。那么在这里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呢？在第一卷中，马克思清楚地指出了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别。可变资本——对可以创造价值以及剩余价值的劳动力的购买；不变资本(生产资料)——即使物质形态发生改变，其价值在数量上也不会变化。由此可见，剩余价值来自生产过程中对活劳动的剥削。

但是，对固定资本的研究要求我们对进入生产过程的要素按照不同的方法分类。有一些要素在一个给定的周转时间中将它们的价值全部转移到完成的商品中，包括劳动投入(劳动主体)，原材料(劳动对象)，以及辅助材料比如能源(劳动资料)。所有这些要素都被称为“流动资本”。它们的价值在一个给定的周转时间内完全地进入和退出生产过程。机器、厂房以及其他要素，在周转完成后依然存在，并且可以在多个周转时期反复使用。在一个给定的周转时间中，这些劳动资料只有部分价值转移到了最终产品中。这些要素被称为“固定资本”。下面的图2显示了这些范畴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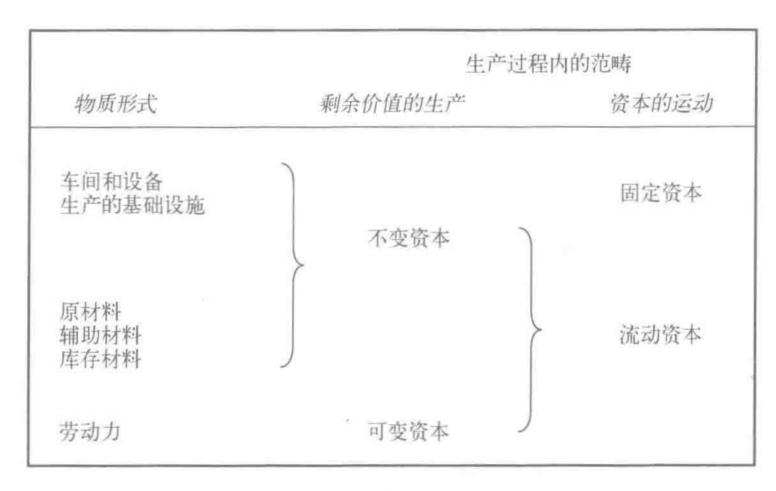


图2

剩余价值理论不能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范畴中得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这些范畴的迷恋(不论有意无意)，掩盖了劳动在剩余价值(利润)生产中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分对马克思来说

是不重要的。它影响了资本一般的总周转时间，从而影响了积累的整个动态。但在马克思的书中，它这样做并不以掩盖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为代价。

马克思还指出了另一个源于亚当·斯密的语言上的混淆，但是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重复了这一错误。在这些章节中，与留下来反复使用的固定资本相对，“流动资本”(circulating capital)是指那些在一个给定的周转时间内全部耗光的资本。在前面有关资本循环的章节，“流通资本”(circulating capital)则是指在回到生产过程之前在市场上流通的资本。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定义。马克思在较晚的时候才强调了这种潜在的混用，同样也只是在批评亚当·斯密的时候提到的。①因此，他提出应该区分市场上的“流通资本”和“生产中的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事实上，马克思在第8章经常用“流动资本”(fluid capital)代替“流通资本”，并且用“固定”和“流动”的对比来展开分析。用这样的术语更为合适，但他并没有严格地坚持使用。在本章中，我将按照马克思的意思使用“流动资本”这个术语(偶尔用到流动性—— fluidity)。但是请记住，这里的流动资本和前面关于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实现过程的章节中的“流通资本”不一样。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范畴只在与生产过程有关的讨论中有意义，并不能在资本的货币、商品形态的循环中使用(亚当·斯密就犯了这样的错误)。

重述定义：流动资本——不管是不变资本还是可变资本——在一个周转时期内被用尽；固定资本是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可以从一个周转时期用到下一个周转时期。请记住上述所有的问题和定义，接下来我们仔细研读相关章节的内容。

固定资本的“独特性”

马克思在第8章开头注意到，“一部分不变资本和它帮助形成的产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品相对立，保持着它进入生产过程时的一定的使用形式。因此，它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在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中，总是反复地执行着相同的职能。例如厂房、机器等”。①马克思反复使用的用来描述固定资本流通的词是“独特性”。他在第二段的开始说：“因此，这部分不变资本——真正的劳动资料——的特征是……”接着，在下一页的中间，我们看到，“但这里考察的这个资本部分的流通是独特的流通”。②那么，这种独特性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是重要的？

“首先，这个资本部分不是在它的使用形式上进行流通，进行流通的只是它的价值，并且这种流通是逐步地、一部分一部分进行的，和从它那里转移到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产品中去的价值相一致。”只要生产还在运行，就还有一部分价值固定在机器或厂房中，而且固定资本总是与它帮助形成的商品相分离。“由于这种特性，这部分不变资本取得了固定资本的形式。在生产过程中预付的资本的其他一切物质组成部分，则与此相反，形成*流动资本*。”③

固定资本没有以实物形态加入到产品中，但是固定资本的价值进入到了产品价值中。所以固定资本是在观念上的(社会决定的)价值形式而不是在物质形式上流通的。固定资本(比如机器)实物上作为劳动资料发挥作用，与转换成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的劳动对象(原材料和其他的生产资料)相对立。固定资本作为劳动资料的特征与不变资本中一些投入生产的辅助材料有共同之处。能源——蒸汽机的煤或者照明用的瓦斯——也并不进入生产出的产品的物质使用价值。当它的物质形式在生产过程中耗尽时，它的价值加入到了产品价值中。对固定资本来说，这个消耗过程持续很多个周转期，而对能源投入来说，它们“在参加的每一个劳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77—1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强调是作者加的。

过程中被全部消费掉”。[1]由于这个原因，前面关于资本周转时间的章节非常重要。固定资本就周转时间而言是“固定的”，而周转时间在各工业部门之间有很大差异。

固定资本的物理寿命

“这部分不变资本，按照它在丧失自身的使用价值时丧失掉自身的交换价值的比例，把价值转给产品。”[2]这揭示了一种关系——事实证明有不少问题——在转移到产品的价值与不断变化的机器的效能之间。机器的效能为什么以及怎样变化？这种变化的发生既有物理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

> 这种生产资料把多少价值转给或转移到它帮助形成的产品中去，要根据平均计算来决定，即根据它执行职能的平均持续时间来计量。这个持续时间，从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时起，到它完全损耗，不能使用，而必须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或再现出来时为止。[3]

马克思在这里想说的是机器有一个平均的使用寿命，比如说十年。一些资本家比较幸运可以使用十一年，另外一些资本家则要提前用新机器把它替换掉。在把价值转移给产品时，重要的是机器的社会平均寿命，而不是单个机器的寿命。没有顾客会仅仅因为我使用的机器的寿命比社会平均寿命短而为我生产的商品付更多的价钱。

在还能用的时期，固定资本的价值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不断地减少，一直到劳动资料不能再用；因此它的价值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分配在由一系列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产生的一批产品中。但是，只要它还起劳动资料的作用，就是说，只要它还不需要由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就总是有不变资本价值固定在它里面，而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原来固定在它里面的价值则转移到产品中，从而作为商品储备的组成部分进行流通。劳动资料越耐用，它的损耗越缓慢，不变资本价值固定在这个使用形式上的时间就越长。但是，不管耐用的程度如何，劳动资料转移的价值份额总是和它的全部职能时间成反比。如果有两台价值相等的机器，一台5年磨损掉，另一台10年磨损掉，那么，前者在同一时间内转移的价值就是后者的两倍。①

但是马克思没有立刻解释什么叫做“还起劳动资料的作用”，或者如果由于一些原因机器在价值被消耗完之前不再起劳动资料的作用会怎样。在这章开头，“起作用”似乎纯粹是在物理层面上理解的——即重要的是物理的腐烂和磨损速度——但是之后会主要从社会层面上理解。奇怪的是，马克思并没有立即提到所谓的“无形损耗”，他在第一卷中提出的这个问题。当一部老式机器的拥有者不得不与拥有更新、更“起作用”、更便宜的机器的人竞争时，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只有在第190页和随后的那一章，还有第206页，“无形损耗”才被纳入讨论，但内容不是很多。这问题非常重要，我们之后会再讨论。

而在这段话的背后，有一个棘手的问题：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一部机器不得不被替换？是机器在物理上被耗尽的时候吗？存不存在由于能在市场上得到更高效、更便宜的机器而使老的机器更早地被替换的情况？这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我们要多久换一次电脑？每两年么？我们换电脑是因为电脑已经在物理上被耗尽了还是因为它们过时了？马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克思在这章举的大多数例子都是关于有形损耗的，但同时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社会问题。我推测，马克思不想进一步讨论他能建立的正式关系之外的问题是主要原因。毫无疑问，很多社会和历史内容都缺失了。

当马克思更深入地研究固定资本的使用和流通的形式方面时，他遇到了例外情况以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模糊不清的情形。比如，充当固定资本的物质承担者的劳动资料，

> 只被生产地消费，不能进入个人消费……在它完全损耗以前一直保持独立的形式。运输工具则例外。运输工具在它执行生产职能、从而停留在生产领域时产生的那种有用效果即场所变更，同时可以进入个人消费，例如旅客的个人消费。这时，旅客使用运输工具就像使用其他消费资料一样，也要支付报酬。①

我对这种例外情况很感兴趣，它意味着“场所变更”（从而，空间关系的生产）的有用性不仅适用于生产过程（原材料的移动），也适用于消费（人的移动）。换句话说，“场所变更”的生产本身就是一种商品，不论谁使用它，也不论是为了什么目的（进一步的生产或者最终消费）。当然，运输业是一个吸收了大量固定资本的部门，很多固定资本（如铁路和地铁轨道）会持续很久（当然是在得到维护、修理的情况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运输以及通讯的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它们的价值大多在固定资本流通的形式上观念地存在着。机车和铁轨都是固定资本的形式（尽管我们将看会到，它们有不同的特点）。

当辅助材料是一点一点被使用，而不是一次用尽时，固定资本和辅助材料的使用（比如能源）之间的区别也变得“模糊”了。这发生在“化学工业中……劳动资料、辅助材料、原料之间也是如此。例如在农业中，为改良土壤而投下的物质，就有一部分作为产品的形成要素加入植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物产品。另一方面，这些物质会在较长的时期如4—5年内发挥作用”。[①]比如说，在农业中为灌溉而修的沟渠明显是固定资本的一种形式，一袋肥料对几个生产周期的产出都有影响，即使它看上去像是流动资本的一种形式。

双重使用与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们讨论非常困难但也很吸引人的双重使用的问题（用当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联合产品”）。“牛作为役畜，是固定资本。如果它被吃掉，它就不是作为劳动资料，从而也不是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了。”[②]牛养殖同时生产出来了两种商品形式。关于如何使用这些牛的社会决策规定了它是不是固定资本：

> 这样，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个以劳动过程的性质为基础的区别，就以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新形式的区别再现出来。只是因为如此，那种执行劳动资料职能的东西，才成为固定资本。如果按照物质属性，它除了执行劳动资料的职能之外，还能执行别的职能，那么它是不是固定资本，就要根据它的职能的不同来决定。牲畜作为役畜，是固定资本；作为肥育的牲畜，则是原料，它最后会作为产品进入流通，因此不是固定资本，而是流动资本。[③]

马克思后面又回到了这个问题，并把它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讨论：

> 同一物品可以时而成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时而属于直接的消费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78—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基金。例如，一所房子，用作劳动场所，是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用作住宅，就根本不是资本的形式，而只是一所住宅。在许多场合，同一些劳动资料，可以时而充当生产资料，时而充当消费资料。①

更加微妙的是街道：它可以用于生产过程，也可以供人们行走。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了消费基金的概念，然而他没有进一步解释。很明显，消费也像生产一样需要一些长期的辅助物品——房屋、瓦罐、刀叉，还有一切塞满住宅的、可以帮助人们消费的东西，以及汽车、火车、飞机等。消费基金里的物品的使用价值，像生产过程中的固定资本一样，被一点点地消耗，常常持续很多年。在当代社会，这些消费基金中的资产的存留价值非常巨大，而且里面的很多物品（比如车、房屋以及刀叉）在生产出来很久之后仍然可以在二手市场进行买卖。

就像马克思在这里说的，这些物品与固定资本有复杂的联系，因为它们原则上任何时候都可以在消费和生产之间来回转换。因此马克思抱怨说："李嘉图忘记了工人居住的房屋，他的家具，他的消费工具如刀叉器皿等等，它们都具有和劳动资料同样的耐久性。同一些物品，同一类物品，在这里表现为消费资料，在那里表现为劳动资料"。②

马克思认为固定资本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范畴，这取决于物品的使用方式，而不是它们固有的物理属性。他强力地批判说："资产阶级经济学特有的拜物教……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被打上烙印一样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③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48—2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土地上的固定资本

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物质主义”或者“自然主义”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需要我们考虑，它让固定资本的范畴更加具有“独特性”。固定资本范畴自身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他们把劳动资料在物质上具有的某些属性，看成固定资本的直接属性，例如像房屋具有的物体不动性。但是我们也很容易证明，其他一些本身也是固定资本的劳动资料具有相反的属性，例如像船舶具有的物体可动性。”①固定资本的可动性与不动性的形式区别并不是绝对的。缝纫机可以很容易地移动，鼓风炉却很少被移动，只是因为移动它的花销太大(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把整套钢铁工厂拆卸分解后通过船舶从德国运到中国)。

> 一部分劳动资料，包括一般劳动条件在内，一旦作为劳动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或准备执行生产职能，就固定在一定的地点，例如机器；或者一开始就在这种不动的、同所在地点不能分开的形式上被生产出来，例如土壤改良、厂房、高炉、运河、铁路等等。在这里，劳动资料在它们执行职能的生产过程中的持续固定存在，同时也由它们的可感觉的存在方式所决定。另一方面，一种劳动资料，也可以在物体上不断变更位置，不断运动，然而却不断处在生产过程中，例如机车、船舶、役畜等等。在一个场合，不动性不会使劳动资料取得固定资本的性质，在另一个场合，可动性也不会使它丧失这种性质。不过，劳动资料固定在一个地点，把根牢牢扎在地里这个事实，使这部分固定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它们不能被运往国外，不能作为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流通。这种固定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却可以变换，可以买卖，就这一点说，可以观念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地流通。这种所有权证书，甚至可以在国外市场上流通，例如股票的形式。但是，这一类固定资本的所有主的人身变换，不会使一个国家财富中不动的、物质上固定的部分和可动的部分之比发生变化。①

之后，在第10章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这一主题。一个未来的固定资本的要素，比如纺纱机，“可以从出产国输出，在国外直接或间接地卖掉，换成原料等或换成香槟酒。这样，它在出产国只是执行商品资本的职能，而绝不是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即使在它出卖之后也不是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②对机床、钢梁和预制的建筑材料来说也是一样。它们是商品资本——直到被真正固定在某些生产过程中。“相反，那些和土地连在一起，固定在一个地方，因而只能就地利用的产品，例如厂房、铁路、桥梁、隧道、船坞等等，以及经过改良的土地等等，却不能作为物体原封不动地输出。它们是不能移动的。它们要么是没用的，要么在卖掉之后，必须在生产它们的国家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它们的资本主义生产者为了搞投机而建造工厂或改良土地，目的是要把它们卖掉，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是他的商品资本的形式……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这些东西要成为并非没用的东西，归根到底就要在本国，在一个固定在它们本身所在地的生产过程中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③

这种位置的固定性对于资本活动的地理格局有影响。如果这些商品不能在它们所在的位置发挥作用，那它们就是无用的、无价值的。注意，效用(有用性)的评判标准如何悄悄地进入了我们这里的讨论。就像需求和供给一样，效用是传统经济学的重要范畴，马克思一直与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81—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其保持很大的距离。效用理论的应用并不局限于生产过程。“不过，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不能移动的东西本身一概都是固定资本。它们，例如住宅等，可以属于消费基金，因而根本不属于社会资本，虽然它们是社会财富——资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要素。”①房屋很大程度上是固定在空间和地点上的，但是正如我们这些年看到的，抵押贷款的证券化以及将它们打包成为抵押债务证券，使它们的一些所有权证书（我们现在发现这类所有权证书的真实意义和法律基础是相当模糊的）可以在国际上流通，这也造成了各种灾难性的后果。对于运输来说，机车是可动的，但是轨道是不动的。然而，“铁路的所有权证书，每天都可以易手，它们的所有者甚至可以在国外出售这种证书而获得利润，因此，铁路本身虽然不能输出，所有权证书却是可以输出的”。②

在这些段落中，我们不断遇到资本主义活动的地理景观中的固定和移动的冲突。飞机、轮船、机车都能在空间中移动，但主要依靠不能移动的飞机场、海港以及火车站。不能移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它的使用情况：一个没有飞机起飞的机场是没有价值的。但是，没有机场的飞机也是没有价值的。注意，在这个例子中很明显的是，可移动的固定资本形式（包括它们所携带的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资本）在地理上的移动模式，受到另一些固定资本的增殖要求的限制——这些通常数额巨大的固定资本被固定在了某个地方。不可移动的固定资本价值的收回，取决于运动中的资本对特定地点的不可移动资本的使用。这产生了诸如城市间竞争的现象——将高度流动性的资本吸引并保留在城市中（往往以对私人企业大量的公共补贴告终）。

特定地点不可移动形式的固定资本价值的升值并不罕见，而且这种变化可能很剧烈，尤其是在商品移动和更一般的人的移动出现根本性变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化的时候。马克思只是提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但从这些段落中我们可以推导出更一般的问题：去工业化所产生的区域和地方性危机，以及不可移动形式的固定资本贬值等问题。这里与地租和房地产价格也有联系，马克思并没有提到这种联系。地租和房地产价格在不同地方差异很大，主要取决于嵌入到这些地方的固定资本的资产质量。这使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全部历史纳入了一条某种程度上与资本运动规律相一致的轨道。反过来，这也开辟了一条实际的道路：城市化反过来对这些运动规律如何运行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我个人多年以来一直非常感兴趣的问题，通过这类关于无法移动的固定资本的作用的段落，我发现，把马克思的一般理论扩展到城市建设和城市化进程领域是可能的。但是马克思仅仅暗示了这种联系的存在。

空间的生产过程

马克思的分析中有一处地方富有启发意义，出于个人对城市化研究的兴趣，我认为它非常重要(尽管可能没正当的理由)。当马克思考虑嵌入在土地上的固定资本的替换如何可能演变成扩张时，他有如下评论。他写道，这全都取决于，

> 可以利用的空间。有些建筑物可以加高几层；有些建筑物必须横向扩张，这就要有更多的地皮。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方面有许多资财被浪费掉；另一方面，在企业逐渐扩大时，又有许多这种不恰当的横向扩张(部分地说对劳动力有害)，因为一切都不是按照社会的计划进行的，而是取决于单个资本家从事经营活动的千差万别的环境、资财等等。由此就产生了生产力的巨大浪费。货币准备金(即再转化为货币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再投入企业，在农业中实行起来最容易。在这里，有一定空间的生产场所，能够最大限度地逐渐地吸收资本。在进行自然再生产的地方也是这样，例

如畜牧业。①

在我的著作中，我经常诉诸空间生产来满足吸收资本的需要(我特别强调那些投机的和浪费的方式，比如资本主义的郊区化)。马克思在这里也谈到了资本吸收的空间方面——经常是浪费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缺少社会规划。我引用这段文字，不是说马克思是后来一切关于空间问题的研究的伟大先驱，也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对空间生产问题的传统解释(以亨利·列菲伏尔为代表)和现代很多激进地理学者的理论都被这几段证明是正确的。②其实我认为，如果我们有兴趣把空间生产的理论与马克思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整合到一起(我认为这样做很有必要)，那我们首先应该对这里零星散布的，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关于固定资本的形成和流通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扩展——尤其是关于嵌入到土地中的那部分固定资本的材料。比如，马克思在这里说的过程并不局限于农业，它们也能在理论上解释吸收剩余资本的独立产权公寓的增加和卷心菜的生长。空间生产中的危机——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它的后果，最终来源于马克思明确提到的固定性和移动性之间的矛盾。

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

在这些章节中提出的观点还有很多引申意义。例如，生产中的“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③的区别。除了指出这种区别的存在，以及随着资本发展，前者的增长速度经常超过后者，马克思并没有更多的论述。特别是，他没有探究这个区别在度量资本的价值构成方面的意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Neil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4); David Harvey,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义，而这在他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理论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显然，如果强调的是所用资本，那么资本的价值构成会更高（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利润率会更低）。很多学者更偏爱所费资本，但是数目巨大并且不断增长的所用资本，直觉上看对利润率下降理论极其重要（看看社会中存在的与过去相比数量极其庞大的物质性固定资本，显然资本的价值构成正在快速增长）。在一个给定的周转时间内，大笔固定资本投资可以增加所用资本，但对所费资本没有影响。确实，如果这笔投资有助于节约所使用的流动不变资本，这将会使所费资本的价值构成降低，同时使利润率上升。但是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的区别对周转时间的变化很敏感。恩格斯认识到了所有这些问题对测算利润率的重要影响，因此在第三卷的分析中插入了周转时间变化对利润率影响的尝试性的一章。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固定资本的范畴取决于使用者的用途："一台机器，作为机器制造业者的产品或商品，属于他的商品资本。它只有在它的买者手里，即在生产上使用它的资本家手里，才成为固定资本。"① 一旦一个新的商品被生产出来，它的生产过程中的固定资本价值和流动资本价值的区别就消失了。如果用途改变了，固定资本就会立刻消失或者被创造出来。例如，像之前提过的，住宅并不是固定资本，但是厂房是。但是如果我在家中制造东西——安装好缝纫机，雇几个移民做衬衫——那么这间房子立刻变成了固定资本。如果一个以前用于生产衣服的阁楼现在变成了住宅，那它就从固定资本的范畴变成了消费基金。进一步说，固定资本被称为固定的，只是在周转时间方面相对于流动资本而言的。一个每天制造冰淇淋的机器是固定资本，而一个与它相似的机器，被用于生产两年才能造好的远洋油轮，如果它在这个生产周期中被磨损尽，就不再是固定资本了。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马克思的关系性定义的历史意义

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来自马克思对基本范畴——比如固定资本——的关系性的（relational）定义。简单来说，固定资本的范畴本身并不是固定的。马克思并没有试图评价关系性含义变换的历史意义。而在我看来，这种变换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比如，沃尔特·罗斯托在他的《经济成长的阶段》（写于1950年，又叫“非共产主义宣言”，曾风靡一时，是所有学生的必读书目）一书中，认为强劲的固定资本形成阶段（主要是基础设施，比如马路、水坝和港口）是一个国家随后的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为之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接着是“大众消费驱动阶段”。大量财富的创造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减少了共产主义的威胁。按照罗斯托的说法，这是一个连续的路径，可以与共产主义对所谓的不发达世界做出的过上富足生活的承诺相抗衡。然而，强劲的固定资本（基础设施）投资这一前提条件需要一定的牺牲。需要勒紧裤腰带，抑制当前的消费，以促进固定资产形成。来自外部世界的帮助也很重要（世界银行的主要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帮助、援助这种基础设施的投资）。

罗斯托使用历史数据来支撑他的发展理论。每个国家都被视为一个发展空间，他收集的历史数据表明，一个强劲的固定资本形成阶段是每个国家强劲的经济增长的重要先导。先不管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独立的单位这一古怪的想法，罗斯托忽略的问题是——就像列宁很久前描述的——支撑了帝国主义扩张的国际资本流动。进一步说，英国，这个最早“起飞”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符合罗斯托的模型。英国并不存在可以识别的、固定资本加速形成的阶段，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和商业资本掠夺才是它的重要前提。事实上，就像几位经济史学家（如波斯坦）指出的那样，英国的问题是从17世纪以来一直拥有大量的剩余资本

（如同今天的中国）。[1]问题是找到能使这些剩余得到有效利用并产生利润的方式。基础设施（国内和国外的）建设方面的固定资本形成是吸收这种剩余的合适方式。而且，在英国，很容易将大部分为消费目的建造的基础设施转化为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固定资本。包买商制度——商人让农民在自己家里加工原料——事实上相当于把家变成了工厂（就如同当今的小额信贷把农民的房子变成了生产过程的固定资本）。所以罗斯托的“非共产主义”发展理论有根本性的错误，尤其是它强调此时此刻的节俭和牺牲是为了资本主义在将来的发展。罗斯托的目的是为帝国主义强权产生的剩余资本向全世界的流动打开大门，并且将允许高剥削率存在的“节俭”条件美化为实现未来繁荣的必要措施。因此，资本输出和国际资本流动并没有出现在罗斯托的数据中。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相关叙述（不幸的是并没有出现在第二卷中）更有说服力：

> **再从另一方面看，固定资本的发展也表明一般财富发展的程度，或者说资本发展的程度。**直接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以及直接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其对象都是供消费用的产品本身，生产固定资本的那部分生产既不生产直接的消费品，也不生产直接的交换价值，至少不生产可以直接实现的交换价值。**因此，越来越大的一部分生产时间耗费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这种情况取决于已经达到的生产率水平，取决于用一部分生产时间就足以满足直接生产的需要。**这就要求社会能够等待；能够把相当大一部分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从直接的享受中，也从以直接享受为目的的生产中抽出来，以便（在物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把这一部分财富用到非直接生产的劳

[1] 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M. M. Postan, *Medieval Trade and Fin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动上去。这就要求已经达到的生产率和相对的富裕程度都有高度水平，而且这种高度水平是同流动资本转变为固定资本成正比的。正如相对剩余劳动的大小取决于必要劳动的生产率一样，用于生产固定资本的劳动时间——活劳动时间和物化劳动时间——的大小也取决于直接用于生产产品的劳动时间的生产率。过剩人口(从这个观点来看)，以及过剩生产，是达到这种情况的条件。这就是说，用在直接生产上的时间所取得的成果相对说来必定很大，超出了这些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的再生产的直接需要。固定资本带来的直接成果越少，越少参与直接生产过程，这种相对的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应该越多；因而，修建铁路、运河、自来水、电报等场合，同制造直接用于直接生产过程的机器的场合相比，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应该多些。由此(我们以后将回过头来谈这一点)就产生出——通过现代工业中经常生产过剩和经常生产不足的形式——这样一种状态：流动资本向固定资本的转化有时过多有时过少，这种不平衡状态经常波动和痉挛。①

这个卓越的理论阐释，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怎样在英国起步的描述，也能很好地说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进程。它同时指出了一种潜在的、周期性的威胁——对物质基础设施建设的过度投资，这可能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另一种危机形成模式。与固定资本形成有关的危机在第二卷中很少提及，主要集中在马克思对“无形损耗”分析的文本中，我们马上会提到。然而，对于这个主题，我们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地方。

然而，对这些观点还有一些更实际的应用。比较著名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歌颂中，一开始就声称血汗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下册)，第220—2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厂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住宅仅仅因为用途的改变就可以成为固定资本。我们时代的情况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在波士顿、曼彻斯特的纺织工厂里，昂贵的固定资本已经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转为了消费用途，而从洛杉矶到马尼拉，无数密室和地下室变成了血汗工厂的固定资本。随着小额信贷的扩展，在墨西哥和印度的农村妇女开始买缝纫机，她们的农舍也就免费地成为了生产过程中的固定资本。这是抵消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有效方法，因为它大大降低了固定不变资本投入与劳动的比例。

我认为马克思对固定资本形成的关系性的叙述，特别有助于解释资本的历史。他的叙述开启了许多理论可能性，很多源于马克思这个看似随意的观察——一头牛可以用来消费，也可以用作生产过程中的固定资本。我们身边的很多东西都有这种特点：从铅笔到房屋、街道甚至整个城市。定义的流动性与其功能上的创造性一样重要。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将这些内容整合进正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中，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不能处理这些灵活的范畴定义。固定资本，在正统的经济学家眼中，显然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定义。不幸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所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理解马克思定义的关系性是如何起作用的。因此，他们重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错误。

维护、补偿和修理

马克思非常关心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比如固定资本（如铁路）的不同组成部分寿命不同所造成的问题，以及补偿、修理和维护的费用等问题。即使不深入细节，也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点。

固定资本的寿命由磨损而定，而磨损取决于使用情况（公路、铁路、汽车等使用越多，磨损越快）、环境因素和暴露在自然力中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固定资本的各个要素有不同的寿命，从而也有不同的周转时间。例如就铁路来说，铁轨、枕木、土建结构物、车站建筑物、桥梁、

隧道、机车和车厢，各有不同的执行职能的期间和再生产时间，从而其中预付的资本也有不同的周转时间”。[1]我们都有房屋、汽车以及消费基金中的其他要素的部件在不同的时间进行更新的经验。就像马克思说的，补偿和再投资、扩张的区别是模糊的。给房屋换一个新的、更好的屋顶是补偿，还是对一间事实上的新房屋的再投资呢？而固定资本也需要维护。工人适当地使用机器使它维持在好的工作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工人无偿提供的维护。但是为了维护机器，“不断地追加劳动”是必需的，马克思把这种劳动归入流动资本。[2]另一方面，修理被看作是原来的固定资本的“追加的价值组成部分”。“根据需要……任何固定资本都需要事后在劳动资料和劳动力上一点一滴地支出这种追加资本。”[3]马克思随后说明了这对于理解周转时间（正如已经提到的，马克思在这里主要关注这个问题）的意义：

> 有的通过擦洗（包括清扫场地），有的通过每有必要时进行的修理始终把固定资本保持在工作状态中。由固定资本损耗而引起的价值转移，是按固定资本的平均寿命计算的，而确定这个平均寿命本身，又是以维修所需要的追加资本的不断预付为前提的。[4]

当然，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当资本家不顾一切地想要节约不变资本的开支而推迟对固定资本的修理和维护时会发生什么呢？这经常会发生，特别是在建成环境方面。这将从多个方面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质量和所用固定资本的总体效果。对纽约市地铁系统、桥梁隧道和公立学校建筑的维护被推迟了二十年，这使基础设施无法有效地促进进一步的资本积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95—1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累。但是，由谁负担修理和维护的成本也是关键问题。马克思以房屋为例：

> 在房屋及其他对所有者说来是固定资本并作为固定资本出租的物品的租约中，法律都承认正常损耗和临时性修理的区别。前者是由时间、自然影响和正常使用本身引起的，通常由所有者承担；后者是在房屋正常寿命和正常使用期间为了保持房屋完好而不时需要的，通常由承租人负担。修理还分小修和大修。大修是固定资本在实物形式上的局部更新，所以在租约没有明确的相反规定时，也由所有主负担。①

马克思之后引用了英国法律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说明。

马克思有些迷失在了技术细节上，我认为重要的是强调一般性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现存的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的维护、修理、补偿不仅需要更多的资本，也需要更多数量的劳动。在大都市地区，比如纽约市，与创造新产品（甚至考虑到局部补偿与整体更新的模糊界限）的资本、劳动相比，甚至有同等数量的资本与劳动被用于了对现存固定资本的维护、补偿和修理。所有这些如何影响了价值的生产和流通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否则就是——就像马克思经常做的那样——一个核算的噩梦）。但是很明显，为了补偿和修理而投入的数目庞大的新的固定资本，以及逐步上升的维护费用（想想纽约的地铁系统，或那些先竖立起脚手架，然后又将之拆除的人们），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对于个别资本家来说，这改变了对周转时间的计算。在某种程度上，抛弃固定资本投资（可移动的或不可移动的）并在其他地方安装新设备也许反而更加经济，因为修理和维护的费用不断上升。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固定资本流通的货币方面

马克思用以下方式分析了固定资本流通的货币方面。

> 固定资本的独特的流通，引起独特的周转。固定资本因损耗而在实物形式上丧失的那部分价值，作为产品的一部分价值来流通。产品通过流通由商品转化为货币；从而劳动资料中被产品带入流通的那部分价值也变为货币，而且随着这种劳动资料在多大程度上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价值承担者，它的价值也就在多大程度上从流通过程中作为货币一滴一滴地落下来。因此，这种劳动资料的价值这时获得双重存在。其中一部分仍然束缚在它的属于生产过程的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上，另一部分则作为货币，脱离这个形式。①

接下来我会重点讨论这个固定资本价值“双重存在”的观点——一部分在几个连续的周转期间内逐渐以货币形式从生产中收回，另一部分是固定资本(例如机器)不断减少但还没有完全用尽的残值。

在固定资本的使用期内得到的货币作为准备金积累起来。在缺乏银行和信用制度时，资本家不得不贮藏货币资本，直到最后补偿整个机器的时机到来。只有在补偿完成后，货币才重新回到流通过程。如果资本家的步调都一致，结果将使货币流通时而极度充盈，时而极度匮乏。幸运的是，他们不会这么做，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始终都能保持货币流通的平衡：在缺乏信用制度的情况下，剧烈的技术创新确实会导致货币的盈余或者短缺。

因此，固定资本的货币周转时间有非常特殊的性质，与流动资本有很大的差异。辅助材料——比如能源——在生产和销售商品的整个周转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时间内被全部消耗了，所以等值的货币定期地流回。对于作为劳动对象的不变资本要素也是如此，它不断以商品的形式重新出现。就劳动而言，可变资本定期地（比如，每周）预付给工人，工人再根据他或她的需求将其花费在商品上。后面的交易，就像马克思在后面经常强调的一样，“不再是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而是在作为商品的买者的工人和作为商品的卖者的资本家之间进行”。因为“是工人自己把出卖劳动力所得的货币转化为生活资料”。[①]这一点我们之后会谈到，工人作为买者有相对自主的购买选择权，但他某种程度上也是被强迫的：他必须购买以维持生存。

回想一下，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只是就生产资本而言的：“这种对立只有*对生产资本并且在生产资本之内*才是存在的。”[②]然而，在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内，流动资本已经完成了多次周转。固定资本的价值是“全部一次预付的……这个价值是由资本家一次投入流通的；但它只是通过固定资本一部分一部分地加进商品的价值部分的实现，而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再从流通中取出的”。[③]但是在固定资本的寿命期间，资本家并不总是需要将这笔钱用于补偿：“这种由货币到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的再转化，要到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期间结束，即生产资料完全不能用的时候，才会发生。”[④]

但是固定资本补偿的时间安排受到自然规律的影响。“就活的劳动资料来说，例如马……它们作为劳动资料的平均寿命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这段时间一过，损耗掉的头数就必须用新的来替换。一匹马不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替换，只能用另一匹马来替换。”[⑤]因此，固定资本投资——包括初始购买和补偿——的“团块结构”（lumpiness）是一个显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87—1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著的特点。它在货币方面的影响是决定了在特定时刻有多少货币资本应该从流通中撤出或回归流通：

> 此外，在再生产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使已经损坏的部分在较短时间内换新的地方，在这种补偿能够实行之前，必须根据生产部门的特殊性质，事先积累一笔或大或小的货币。为了这个目的，不是拥有随便一个货币额就行，而是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货币额。①

各种组合在这里都是可能的。铁路直到整条线路的工程都完成后才可运行，所以必须提前花费一定数量的货币。不像马的例子——它的轨道可以零碎地进行局部更新。

第8章的最后又简要地提及了以上所有问题的货币后果。和往常一样，马克思提到如果将信用制度考虑进来，情况会如何的不同。在缺乏信用制度的情况下，“一部分作为贮藏货币闲置不用，另一部分则执行流通手段或直接流通的货币的直接准备金的职能”。结果，

> 货币总额分为贮藏货币和流通手段的比例会不断地变化。用我们的例子来说，那种必须作为贮藏货币大量积累在一个大资本家手中的货币，在购入固定资本时一次投入流通……固定资本的价值，按照它的损耗的程度，以折旧基金的形式流回到它的起点。通过这种折旧基金，流通货币的一部分，又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在那个曾经为购置固定资本把贮藏货币转化为流通手段并使它离开自己的资本家手中，形成贮藏货币。这是社会现有贮藏货币的一种不断交替变换的分配，它交替地充当流通手段和贮藏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后又作为贮藏货币离开流通货币的总量。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它的发展必然是同大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行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的——这种货币不再执行贮藏货币的职能，而是执行资本的职能，不过不是在它的所有者手中，而是在另一些使用这种货币的资本家手中。①

固定资本流通的货币形态和实物形态的“二重性”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货币形态从它的实物磨损过程中脱离出来，作为潜在的货币资本游离出来。

“无形损耗”

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提到的“无形损耗”或“无形贬值”这一重要问题，在第二卷中只有简略的叙述。生产过程中的革命或者使过去的固定资本更加便宜，或者在老设备的寿命尚未终结时生产出更先进的机器来代替它。结果是加速了贬值过程，或者降低了老机器的有效性——效用，这两者是同一回事。因此，对于本章开头提到的固定资本“还起作用”这个诱人的说明，我们可能期望这里会有一个完整的解读。但不幸的是，马克思没有给我们太多启发性的思路，除了说“大量固定资本投在一定的实物形式上，并且必须在这个形式上达到一定的平均寿命……成了迅速普遍采用改良的劳动资料的一个障碍”。②由于这个原因，下面这种做法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在所有老式的固定资本全部摊销完之前，资本家都是不情愿迎接技术进步和新式固定资本的。在垄断控制的情况下，这种不情愿就会演变为停滞（尽管马克思并不关心这点）。在这样的背景下，“竞争斗争，特别是在发生决定性变革的时候，又迫使旧的劳动资料在它们的自然寿命完结之前，用新的劳动资料来替换。迫使企业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02—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设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大灾难即危机”。①

这个问题在第9章中再次出现。固定资本的寿命缩短，即

> 生产资料的不断变革——这种变革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加快——又使它缩短。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变换也加快了，它们因无形损耗而远在有形寿命终结之前就要不断补偿的必要性也增加了……这种由一些互相连结的周转组成的长达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住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

加速折旧引起了现有固定资本的贬值，它的价值还没有通过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而全部回流。如果这种情况大规模地发生，显然会引发危机。正如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所说的，它对工人的影响就是以换班和夜间工作的形式来劳动，以在无形损耗还没有冲击自己时就尽可能快地收回固定资本的价值。但是第二卷一点也没有强调“无形损耗”或者其他社会力量(比如那些使固定资本陷入困境的位置变化)导致的固定资本大规模贬值的普遍意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提到了这一问题。所以我们要靠自己来探索这些意义。

马克思说，普遍的危机(显然，资本遭受了价值损失)也许是更新、补偿现存的固定资本的好时机。这个观点需要进一步的论述。危机中，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90—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06—2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很多现存的固定资本处于闲置、贬值的状态(资本利用率非常低)，所以有货币贮藏的资本家或许就会抛弃现存设备来进行更新(尤其是因为新固定资本的花费比较低)。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一个近期的实例是由联邦政府在2008年启动的所谓“旧车换现金”计划。消费者在旧车还没废弃时被给予现金，让他们买新车、弃旧车。这样做的目标是活跃汽车市场，促进汽车产业的繁荣。对加速折旧的税收减免是另外一个影响固定资本的更新和再投资的公共政策因素。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总统在位时实行过。这是对大量现存的和新的固定资本进行加速折旧的公共补贴。事实上，这实际上补贴了资本向美国南部和西部的运动以及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去工业化。当然，这样做是否具有更普遍的“有效性”，取决于新的技术可能性和区位可能性的存在。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是技术和制度更新在危机条件下发生的显著时期，结果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固定资本投资模式(以汽车、电气化以及加州的开发为基础)，它在二战后为美国带来了繁荣。它“也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在当前萧条的情况下，是否存在相似的固定资本投资环境的重组过程呢？如果存在，那在哪里？中国吗？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马克思危机形成和解决理论的这些方面的普遍意义，很少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尽管有很多相关历史证据：商业周期与新技术浪潮，商业周期与大规模的“无形损耗”浪潮，都以马克思概述的方式出现。生产能力利用率(主要是固定资本)被看做是经济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人们只要看看中国应对2008—2009年危机时的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就可以明白这些关系是如何重要。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点是多么必要，“必须不断地有超额生产，也就是说，生产规模必须大于单纯补偿和再生产现有财富所必要的规模——完全撇开人口的增长不说——以便掌握一批生产资料，来弥补偶然事件和自然力所造成的异乎寻常的破坏”。①尽管马克思这里主要考虑的是地震、海啸的影响，但没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有任何理由不将这个见解扩展到分析中国2009年经历的出口市场萎缩的情况。中国有大量的剩余资本(就像英国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那样)，所以不需要紧缩(如罗斯托和美国现今的共和党所鼓吹的那样)就能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投资浪潮提供资金。然而，就像马克思如此有预见性地指出的那样，这里也有"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①的周期性危机的"物质基础"。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心领域，各式各样固定资本(包括固定在土地上的大量基础设施)的"无形损耗"能够也确实周期性地通过无数种方式演变成严重的破坏和危机(尤其是资产价值)。马克思指出了这种一般的可能性，但没有深入阐述，这在我看来是个遗憾。马克思提供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想法，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要做的工作。

固定资本和价值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中都存在如何给固定资本估值的争论。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三种方法。首先，他从直线折旧法引出了这个问题。一台机器可使用十年，每年消耗它价值的十分之一，直到它的价值全部实现或者它的使用价值全部耗尽，此时资本家会用他贮藏的货币购买一台新的机器。第二种给固定资本估值的方式是成本补偿的方式。一台机器在它寿命期内的任何时点的残值都取决于以相同机器替换它的费用。第三，机器的价值取决于相互竞争的资本家在特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固定资本的社会平均寿命和一般有效性。在这里，固定资本的"无形损耗"观点和"有效性"或"效用"(尽管马克思不用这个术语)问题占支配地位。技术进步使新机器更便宜和更有效，这会影响已经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生产力提高，商品价值就会降低，由于现存固定资本(比如机器)的"效能水平"或"有用性"减弱了，所以它们的社会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平均价值也降低了。当商品价值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由于可以获得更便宜、更有效的固定资本设备)而猛跌时，个别资本家就不能在市场上收回他的固定资本的全部价值。没有购买者会愿意听我说，“请对我的商品付更多的钱，因为我的年久失修的固定资本还没有折旧完”。

但是马克思没有进一步研究这个关键因素。沉没资本价值问题和固定资本的估价问题还是没有定论。固定资本的估值问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也是令人讨厌的问题，也被许多人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深层问题。特别是，这个问题有时被看作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概念的“阿喀琉斯之踵”。毫无疑问，固定资本的“独特性”确实挑战了劳动价值论中的一些概念的正确性。如果价值被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投入，它总是确定了商品的“真正”价值，同时是市场上观察到的“自然”或均衡价格的基础，那么马克思确定某物什么时候是或不是固定资本(消费基金或联合产品情形中的相关项目)的关系性的分析方法就直接摧毁了这整个理论框架。可以很肯定和令人信服地表明，固定资本的流通是不能与这样一个价值理论调和的——这种价值理论认为，价值仅仅是由过去和现在确定数量的劳动时间凝结而成的。但是，在《资本的限度》一书中，我提出这是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而不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 “马克思经常为了方便把社会必要劳动等同于凝结劳动，但是后者并不包含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价值的所有方面。价值，我们回想一下，‘只存在于某种使用价值中’，所以，‘使用价值丧失，价值也就丧失’。这是因为‘商品在能够作为价值实现以前，必须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因此，‘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①

①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Chapter 8; John E. Roemer, “Continuing Controversy on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Fixed Capital and Other Issu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 (1979), 379 - 398; Ian Steedman, *Marx After Sraffa* (London: Verso, 1977).

现在，出于一开始就指出的原因，马克思不愿意研究供给和需求的特征，当然也不想涉及任何版本的效用论。所以一般假定某物具有或者不具有使用价值。不难看出，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是如何在它的寿命期内依赖于它的"有效性"的变化而变化的。更一般的是，我认为"价值不是一个用来描述变化着的世界的固定标准，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其核心体现了矛盾与不确定性。因此，在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和固定资本流通的'独特性'之间不存在什么矛盾。矛盾内化于价值本身的概念之中"。①

有一个有意思的方式可以使所有这些观点更直观，而且马克思确实提到了联合产品理论，但却没有深入研究。在一个周转时间结束时，比如说一年，两个商品被同时生产出来——商品和残余的固定资本(比如，缝纫机)。在周转时间结束时，我可以选择把衬衫和缝纫机都当作商品资本，并实现它们的价值。被使用了一部分的缝纫机在市场上有一个价值。但是就建成环境而言，存在一个问题。很难在二手市场上为整个产业的景观估价。尽管现在有将整个工厂在德国拆卸并运到中国重装的令人惊奇的案例，运输费用可能会严重降低获取这些已经贬值的固定资本的成本。但是，预期的未来价值(这是一种虚拟的资本形式，后面我们会遇到)也可能起作用。因此，买下土地上旧的、部分贬值的固定资本的资本家冒着极大的风险，他们希望直接使用它，或者转换成别的用途(例如，把一个废弃的棉纺厂变成独立产权公寓)。

在对固定资本投资的估值方面——不论新的或者旧的——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些针对这些问题的策略，比如有计划地报废或者按年租用固定资本，这样风险就从使用它的生产者身上转到了出租它的所有者(通常只是作为利息回报)那里。在实践中，州政府和当地政府通常会介入，低价提供一些在土地上的固定资本，将某些固定资本投资的负担和风险社会化。

我提到所有这些问题和可能性都是为了说明看似简单的固定资本这

---

①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215.

一范畴的复杂性。马克思分析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但没有涉及这些复杂性的所有方面。但是，他采用了一种关系性的分析方法，强调了在资本一般的流通和积累过程中，固定资本是如何以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的方式发挥作用的。第二卷的未完成性意味着在这个主题上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而马克思不愿意采用他之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其他地方对这个范畴的论述是让人难以理解的。尽管有这些特殊的缺陷，固定资本各种形式(尤其是移动的和不可移动的)的流通问题以及它的各种关系(特别是和消费基金)，构成了马克思对“纯粹状态”下的资本运动规律的批判性研究的重要特征。相关研究使马克思接近了信用制度在固定资本的形成、流通和使用等方面如何运行的问题，也为更仔细地研究信用制度本身是如何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发挥作用的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四

商人资本（第三卷 第16—20章）

我们现在进行一个“伟大实验”：把第二卷中对流通过程的技术分析与第三卷中与其对应的分配形式结合起来，看看马克思的理论是什么样的。在大胆进入第三卷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直接由文本性质造成的困难。

恩格斯在从马克思手稿中重建这些内容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第四篇关于商人资本的内容，陈述得很有条理；但是关于货币资本、金融和信用的第五篇呈现出“主要的困难……那里讨论的也是整个这一册最复杂的问题”。[①]我觉得，恩格斯这样说不仅是要传达第五篇的重要性。我也认为第五篇十分重要，而且很遗憾它还没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中进行更广泛的分析和争论的中心。

对于恩格斯来说，问题是“不但没有现成的草稿，甚至没有一个可以按照其轮廓来加以充实的纲要，只不过是开了一个头，不少地方只是一堆未经整理的笔记、评述和摘录的资料”。经过三次重写的尝试之后，恩格斯放弃了，仅仅尽他最大的可能整理材料，“只作一些必不可少的补充”。恩格斯说，真正的困难是从关于“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的第30章开始的。“从这章起，不仅要整理引证的材料，而且要整理思路，因为思路不时为插入的句子、离题的论述等等打断，然后再在别处展开，而且往往完全是附带地展开的……接着是题为《混乱》的一长篇东西。”[②]简言之，这些材料的情况相当糟糕。

从马克思的许多论证中重现总体思路，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有些地方可以做到，但在其他地方，我觉得最好还是从冗长的

文本中摘录出似乎是核心观点和想法的内容，来看看是否能提炼出更一般的分析框架——例如，除了投机性地阅读关于投机的材料外别无选择。

马克思用下面的观察开始了第三卷的第四篇："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分为两个形式或亚种，即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③在商品经营和货币经营之间有明显的重叠(例如，频繁的商业交易需要信用支持)，马克思用与第二卷中区分货币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时完全相同的方式把它们分离开来。但是请注意，当马克思使用术语"商人资本"时，他结合了商品经营资本(我们通常所说的商人的活动)和银行家、货币经营业者的活动。

马克思也清晰地表达了不会偏离他集中于资本运动一般规律的任务(正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里描述的)的决心，甚至当他处理分配的特殊性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不断宣称，我们只"在分析资本的核心构造所必要的范围内，较详细地说明"。他的目的是找出商人和货币经营业者的活动在这些一般规律中的位置。问题是，马克思并不总是肯定什么和一般规律有关，什么和一般规律无关。我们阅读的时候，要对此保持一种批判的眼光。

我们必须敏锐觉察到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 既然像读者已经感到遗憾地认识到的那样，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现实的内部联系的分析，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既然把看得见的、只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那么，不言而喻，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和流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2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通当事人的头脑中，关于生产规律形成的观念，必然会完全偏离这些规律，必然只是表面运动在意识中的表现。商人、交易所投机者、银行家的观念，必然是完全颠倒的。工厂主的观念由于他们的资本所经历的流通行为，由于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而被歪曲了。在这些人的头脑中，竞争也必然起一种完全颠倒的作用。①

注意这暗含着什么。金融当事人（以及更一般的资本家当事人）的自我描述、自我感知和想法都是妄想的。这并不是说他们很疯狂（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经常很疯狂），而是在于他们必定像马克思在拜物教理论中描述的那样被迷惑。在那个理论中，我们都要对其作出反应的市场交换信号（例如价格和利润）的表面现象，隐藏了我们社会关系的真正内容。我们必须在这些市场信号的基础上行事，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它们掩盖或没有掩盖某些别的东西。因此，资产阶级的观点和理论在意识和思想世界里复制了具有误导性的信号，这不足为奇。马克思整个资本论的总体意图，是深入到商品交换的拜物教内部，并超越它，看看"正面朝上"的世界。这是恩格斯在他的前言中猜测的马克思写作《混乱》的意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五篇第30章后收集的材料仅仅包括"议会关于1848年和1857年危机的报告的摘录。在这些摘录中，汇集了23个实业家和经济学著作家的证词，特别是关于货币和资本、金的流出、过度投机等等的证词，并且有些地方加了简短而诙谐的评注"。②这些证词是看清"正面朝上"的世界所需的基本原材料。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商品拜物教理论在第五篇清楚地再现了——最终产生了"虚拟资本"这个极其重要的范畴。

马克思的这些观点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在，我们不仅必须处理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48—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数对华尔街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包括国会调查)——它们被认为是真实可信的，还被淹没在了这种华丽的辞藻中间：银行业如此复杂，以至于只有金融专家能明白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被告知：我们只能仰赖金融专家解决他们自己造成的问题。但是如果马克思是正确的，我们就不该相信这些银行家的解释(甚至在拜物教意义上是“可信的”)，当然也不应该相信他们设计出的那套制度能控制资本运动规律的内在矛盾(大部分矛盾仍未得到承认)。在某种意义上，银行家和金融家是最不应该相信的人，不是因为他们都是诈骗犯、说谎者(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很明显是)，而是因为他们可能已经沦为自己的故弄玄虚和拜物教观念的牺牲品。劳埃德·布兰克费恩①在国会面前宣称，他的银行——高盛——只不过是做了上帝该做的工作而已。如果有机会对他加以评论的话，不难想象马克思会怎样讽刺他。

马克思承认，银行业和金融业构造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他坚持认为我们应当只关注与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有关的方面，这种坚持对我们既有帮助又有不利之处。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是在所有表面的混乱和无数复杂的情况中探寻实际的内部运动。我们应当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努力，这将使我们免于陷入这个或那个新的金融工具如何运转的具体细节之中。但令人失望的是，马克思从未成功理清哪些该研究，哪些该舍弃。并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马克思在试图这样做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他也没有实现将那些银行家的观点纠正过来的雄心。

所以让我们首先回忆一下论证的立足点在哪里。我们从第二卷开头展开的分析中知道，产业资本循环是由三个相互交织、各有特色的循环过程组成的：货币、商品和生产资本的循环过程。正如第一卷所揭示的，货币和商品循环(交换关系的货币化和商品化)必须在一个特殊的、由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占有逻辑驱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之前存在。

商品资本在产业资本的整个流通中至关重要并具有特殊的性质，第

① 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高盛集团董事长兼CEO。——译者

二卷第3章单独对其进行了考察。然而，为了理解商品资本在流通过程的总体动态中的正式地位，马克思在那一章中谨慎地限制了自己的讨论范围，只对其进行了必要的考察。在第三卷中，他准备在这里继续深入探讨——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仍然不愿意对任何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人和生产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分析。

在整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这些事先存在的资本形式称作“资本的洪水期前的形式”（参阅第一卷的第4章和第三卷的第20章和第36章）。那么，所有这些独立自主地运行着，并且有（或没有）自己的行为和交换规则的洪水期前的形式（尤其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如何被规训，以满足一个受规则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呢？从理论上说，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详细说明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的独特和必要的作用，需要表明它们的运行模式（像往常一样，以某些普遍矛盾为标志）是如何影响资本的运动规律的。这引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最先在第一卷有关货币的章节中提出的，即与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的总体动态有关的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作用，例如马克思在1848年和1857年经历的危机（和我们从2007年开始经历的）。这些就是我现在将要着手处理的问题。

论第三卷第20章：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

我发现从阅读第20章开始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这章概括了商人资本这一“资本的洪水期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正如我们看到的，马克思对历史的重建经常受到人们的质疑，但是在这个例子中，他的解释即使信息含量一般，也是富于启发性的。

许多经济学家仅仅把商人资本看作是众多社会劳动分工中的一个分支，马克思以对所有这些经济学家的批判开始了这一章：

> 相反地，作为生产资本的产业资本和处在流通领域中的同一资本之间的区别，所以会在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上独立起来，是因为资本在流通领域中暂时采取的一定的形式和职能表现为资本的一个分离出来的部分的独立形式和职能，并且完全同资本的这个部分结合在一起。①

注意所使用的语言：通过“表现为”一个“分离出来的部分和独立”的资本形式，商人资本“独立起来”。即使马克思在这里的意思是从封建社会关系中独立出来，正如前面所界定的，这仍然留下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它有独立和自主于资本运动规律的可能性。

然而，把银行业、批发业和零售业的活动，看作与社会总分工中的矿业、冶金业和农业等价值生产活动没有本质差别的活动，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这样看待这些部门的；我们目前的国民核算也是这样处理它们的。马克思坚持认为，它们是源于流通领域内，而非生产领域内的资本流动的活动，因而是根本上不同的活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混淆”首先表现在：第一，通过“他们没有能力就商业利润的特性来说明商业利润”；第二，通过“把那些……商品资本形式和货币资本形式……说成是生产过程本身必然产生的形态”。②“生产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确实来自马克思，但是他在这里想说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错误绝不是从狭隘的决定论意义上来说的。“斯密、李嘉图等人考察的是……产业资本……因此，他们遇到商业资本这种独特种类的资本，就陷入了困境”，因为，“考察产业资本时直接得出的关于价值形成、利润等等的原理，并不直接适用于商人资本。因此，他们事实上把商人资本完全搁在一边了”。③如何处理商人资本的作用问题在今天和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61—3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在马克思的时代一样令人困惑。所以现在正是把这个“混淆”弄清楚和提出一些基本问题的好机会。商人（商品经营和货币经营）资本的利润来自哪里？既然它本身不是生产价值的生产部门，那么怎样证明它在资本运动规律中的正当性呢？这几章正是要尝试纯粹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并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内”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古老，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最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它要存在，仅仅需要“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①当然，贸易的范围依赖于生产方式。在一个高度自给自足的农民社会，只有超过基本需要以外的剩余产品被用于贸易，所以商人的贸易受制于这些剩余产品。“在资本主义生产充分发展时，即在产品只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时，商业的规模扩大了，达到“自己的最大限度”。商人资本“只是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但是“商人为许多人而进行买卖。买和卖都集中在他手中；因此，买和卖就不再与购买者（作为商人）的直接需要联系在一起了”。②尽管马克思在这儿并没有这么说，但是很明显，商人尽力从他或她经营的规模经济中获利。

商人的财产“总是作为货币财产而存在，他的货币也总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尽管它的形式总是 M—C—M′，这意味着商人经营的目的和目标必定是获得ΔM③。问题是：这个ΔM 来自哪里，商人对它的占有意味着什么？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马克思断言，

> 要理解商人资本为什么在资本支配生产本身以前很久就表现为资本的历史形式，这丝毫也不困难。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1. 因为这种存在和发展是货币财产集中的先决条件；2.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为贸易而生产……另一方面，商人资本的一切发展都会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面向交换价值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①

商人资本的存在可能是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②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商人资本从它原来的独立存在，下降为投资的一个特殊要素，而利润的平均化，又把它的利润率化为一般的平均水平。它只是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③

正如我即将说明的，我们必须在如何理解这个陈述方面相当的小心。马克思随后的评论可能会造成误解。例如，他说，“在商人资本占优势的地方，过时的状态占着统治地位”，而且，“商业城市”甚至在同一个国家里，“和工业城市完全不同，而呈现出类似过去的状态”。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敏锐的历史观察。例如，在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没有出现在像布里斯托尔和诺里奇（他们是由保守派和行会组织形式统治的）这样的主要商业和贸易城市中，而是出现在缺少这些组织形式的曼彻斯特和伯明翰这类的乡村“未开发地区”。这使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作为商人资本而实现的独立的、优先的发展，意味着生产还没有从属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于资本”，所以“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①换句话说，处于霸权地位的商人阶级将试图压制产业资本的发展，因为他们剥削弱小的、易受伤害的生产者榨取超额利润的能力将受到这种发展的抑制。

对于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的：资本“首先是在流通过程中出现的。在流通过程中，货币发展成为资本。在流通中，产品首先发展成为交换价值，发展成为商品和货币。资本在学会统治流通过程的两极，即以流通为中介的不同生产部门以前，能够而且必定在流通过程中形成”。②一旦资本统治了流通过程的两极，那么“生产过程完全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上，而流通只是生产的一个要素，一个过渡阶段”（正如第二卷第1章所描述的）。这导致“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这个规律”。③“纯粹商业民族的优势的衰落和这些民族的以这种转运贸易为基础的商业财富的衰落”，反映了“商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进程中从属于产业资本”。④

马克思评价了威尼斯人、热那亚人、荷兰人经营的转运贸易的实质，以此阐述了这种规律的力量。这些地方都严重依赖“纯粹的商人资本”，而且通过作为汇兑的中介和积累货币资本，以及通过贱买贵卖，有效地积累起了他们的财富。尽管所交换的商品是人类劳动的表现，因而具有价值，但“它们不是相等的价值量”。但是正如他之前所说的，商人越是把商品交换的世界转变成一个交换成为“正常的社会行为”的世界，那么价值度量标准就越来越处于支配地位。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从历史角度来看，价值概念和马克思以价值概念为基础建立的整个理论的重要性，依赖于商人资本家在世界市场上创造交换网络的活动。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65—3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尽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准确的，但是假定这样一个“规律”的存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过去三十年中，强大的商业资本(例如沃尔玛、宜家、耐克、贝纳通、盖璞，等等)的崛起表明：要么这个“规律”已经不再有效，要么它需要更细致的解释。或者我们仅仅是被表面现象误导了吗？我们稍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阶段中”，马克思接着讲道，

> 商业支配着产业；在现代社会里，情况正好相反。当然，商业对于那些互相进行贸易的共同体来说，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越来越从属于交换价值……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它增进了货币流通。它已经不再是仅仅掌握生产的余额，而且逐渐地侵蚀生产本身，使整个整个的生产部门依附于它。①

一开始，商人资本从“侵占和欺诈”中获得它的大部分财富。当它占“主要统治地位”时，它“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②我们应该注意，这种掠夺制度完全违背了《资本论》中通常假定的自由公平的市场交换规则，并且让我们回到了第一卷中描述的原始积累的世界。但是它越来越规范，所以越来越受到规则的限制。而且至少在理论上，这些规则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设定的，商业的发展满足了这些需要。

> 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使它多样化和世界化，使货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因此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到处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但是它对旧生产方式究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①

因此，并不一定会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以极大的热情，用相当长的篇幅详细地阐述了货币如何“瓦解”了古代的共同体并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然而，

毫无疑问……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倍增，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宝藏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②

虽然“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但是在某一点上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动力的不再是商业和世界市场的扩张，驱动力转换为资本主义生产，使得工业化国家（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取代商业强权（荷兰）夺得霸主地位。读过乔万尼·阿里吉的《漫长的20世纪》因而熟悉全球资本主义中霸权转移的历史的人，能马上明白这个观点的正确性。③正是资本主义生产驱使着商人成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先锋，摧毁了印度的手工业，为英国生产的商品创造了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市场。

“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①马克思后来增加了第三种途径，“商人把小老板变成自己的中介人，或者也直接向独立生产者购买；他在名义上使这种生产者独立，并且使他的生产方式保持不变”。②

这里有两点富有洞见。第一，商人资本压倒性的力量和它的组织形式，经常既促进又抑制了成熟的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相当多的历史证据支持这个观点。但是第二个更现代的观点是，当商人保持着控制权时，他们经常保存和保留按照传统方式组织的古老的、落后的生产形式。这种做法

> 到处都成了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障碍，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消灭。它不变革生产方式，只是使直接生产者的状况恶化，把他们变成单纯的雇佣工人和无产者，使他们所处的条件比那些直接受资本统治的人所处的条件还要坏，并且在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占有他们的剩余劳动。同样的情况在伦敦一部分手工家具制造业中也可以看到，不过略有变化。这种制造业，特别在陶尔哈姆莱茨区，经营的规模非常大。③

陶尔哈姆莱茨区的例子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洞见：

> 整个生产分成许多互相独立的营业部门。一个部门只做椅子，另一个部门只做桌子，第三个部门只做柜子等等。这些部门本身或多或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少都是按手工业方式由一个小老板带领几个帮工经营的。不过，如果是直接为了顾客个人而劳动，生产规模就未免太大了。他们的购买者是家具店主。每星期六老板都上家具店主那里去，并把产品卖给他们……这些老板单是为了在下一周能够重新购买原料并支付工资，就需要逐周出售自己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实质上只是商人和他们自己的工人之间的中介。**商人是真正的资本家，他把剩余价值的最大部分装进了自己的腰包。**①

这种生产体制在资本主义历史中长期存在，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急剧扩散了（尽管拥有了现代的外观）。贝纳通、沃尔玛、宜家、耐克等商业资本家组织，几乎必定把来自于他们转包的生产者的“剩余价值的最大部分装进了自己的腰包”。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说“生产占主导地位”呢？

在第一卷中，马克思承认，在他的时代，资本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或“混合的”劳动体制（从工厂到家庭劳动）组成的。但是，马克思的这个假定中似乎有一种明确的目的论的推力：陶尔哈姆莱茨区那种混合劳动体制只是向工厂体制的过渡形态，而后者将在所有方面居于主导地位。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厂就是一切。我在《和大卫·哈维一起读〈资本论〉》（第一卷）中质疑了这一目的论的假定。在我自己对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巴黎的产业组织的研究中，我发现陶尔哈姆莱茨区的组织类型在增加而不是缩小。不过，马克思正确的地方在于他评论了这种劳动组织形式下的残酷剥削。左拉在他的小说《小酒店》中，对一对夫妻的悲惨生活有着入木三分的描述，他们在公寓里制作金链，商人按月提供金子并收回产品。在当代世界，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过度剥削是许多由商业资本动员和组织起来的分包网络的特点（因此丑闻不断出现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73—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在主流媒体上，包括丽诗加邦的服装、耐克的鞋、童工制作的毯子和足球——踢这些球的球员可以赚到数百万——以及可可豆的收割）。

但是在这里发现的过度剥削在另一种意义上非常重要。由于工厂体制的确在扩散和增长，有时会对其他生产体制造成难以置信的竞争压力，工人就开始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在工厂劳动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他们建立了工会并施加政治压力，这种做法上世纪60年代末的时候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国家成为普遍的行为。在这种政治条件下，回归古老的商业模式以进行过度剥削，就变得更加有吸引力。因此，出现了商业资本家的复兴（甚至重商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复兴），以及高度剥削的网络和分散的、分包的生产链的激增。但是，在特定场所和地区的生产中，这种实践从来没有消失过；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工厂生产的竞争优势。例如，香港因为这种形式的作坊和家庭劳动生产而驰名——相比之下，新加坡更多是公司化的组织，韩国则选择了大规模工厂生产的经典道路，结果导致了在香港无法想象的强大的劳工运动。在我看来，目的论的假定是不成立的。我将提出，不同劳动体制间的竞争仍然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这反过来意味着生产者和商人相对作用的差别。全球经济中存在特定的部门和特定的场所，在那里生产者似乎的确支配着商人；然而在其他地方和部门，情况则恰好相反。例如，在汽车工业，生产者倾向于支配着分销商；但是现在纺织品行业几乎总是完全相反。然而，在通用汽车的案例中，一种叫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混合形式出现了，这个公司成为通用汽车组织汽车信贷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分支（最终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中取得了银行资格）。

马克思主张"生产占主导地位"以及商人的活动"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命题，仍然有明显的合理性。尽管商业资本家一度依靠贱买贵卖的欺诈和掠夺性勾当牟利，他们现在不得不组织受它们影响的直接生产去实现剩余价值生产的最大化，同时他们—商人—拿到了价值的最大一部分。因此，马克思关于商人资本从属于剩余价值生产的命题仍然有效。这并不意味着商业资本家不得不从属于，或者现在就从属于生

产者的力量；也不意味着商人不再进行掠夺性积累(在这方面他们有大量的历史经验)的勾当。例如，在美国最近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危机中，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这样的按揭贷款机构被证明在2000年到2007年的房地产繁荣期间，诈骗了上百万人的数十亿美元价值的资产。

马克思乐意承认这种做法的继续存在和周期性的回归，但是他的目的是把商人资本利润的根源定位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则中。这要求他给商人资本一个逻辑定位，并界定商人和他所雇佣的劳动者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所做的贡献。这就是这些关于商人资本的分析性章节的焦点，我们现在进行讨论。

论第三卷第16章：商品经营资本

马克思通过提醒我们这一章和第二卷介绍的商品资本流通的联系，开始了他关于商品经营资本(定义为商人资本中主要经营商品的那一部分)的章节。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

> 总是作为商品处在市场上，以便转化为货币……社会总资本总是处在这种转化即这种形态变化的运动中。只要处在流通过程中的资本的这种职能作为一种特殊资本的特殊职能独立起来，作为一种由分工赋予特殊一类资本家的职能固定下来，商品资本就成为商品经营资本或商业资本。①

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理解这“特殊一类资本家”在资本积累中起了什么作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297—2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为了理解纯粹形式的商品经营资本，马克思提醒我们有某些特定的活动——最显著的是运输业——是价值生产的一部分，尽管它们经常由商品经营资本来开展。马克思建议我们在这里忽略掉这些职能。①这使他将产业资本总循环过程中的资本仅仅区分为流通（或者流动）资本和从事生产的资本。“商品经营资本”

> 不外是这个不断处在市场上……的流通资本的一部分的转化形式。我们说一部分，是因为商品的买和卖有一部分是不断地在产业资本家自身中间直接进行的。在这里的研究中，我们把这个部分完全抽象掉，因为它对于规定商人资本的概念，对于理解商人资本的特有性质毫无帮助，另一方面，在第二册中，我们已经对这个部分做了为我们的目的所需要做的详尽说明。②

商品经营者“作为资本家一般，首先是作为某个货币额的代表出现在市场上”，其目的是获取利润（ΔM）。为了经营商品，“他就必须首先购买商品，因此必须是货币资本的占有者……这种商品经营资本同作为产业资本的一个单纯存在形式的商品资本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③这是个问题。

麻布厂主“靠商人的货币实现了他的麻布的价值”。对麻布厂主而言，这完成了资本流通，使他或她解放了出来，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些货币继续或扩大生产活动。但是麻布本身仍然作为商品存在于市场上，只是其所有权改变了。现在拥有它的商人的特殊业务，是在市场上实现麻布的价值。这种特殊业务是“与产业资本的其他职能分离的、因而是独立存在的业务。这是社会分工的一种特殊形式，结果是，一部分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2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2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299—3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本来要在资本在生产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里就是流通阶段）中完成的职能，现在表现为一种和生产者不同的、特别的流通当事人的专门职能”。①这说明历史上如此重要的商品经营资本或者商业资本的“独立存在”，在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中保留了下来。那么，“独立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注意到，生产者手中简单的C—M交换行为，在商人手中采取了M—C—M′的形式。“因此，商品资本会在商品经营资本形式上取得一种独立资本的形态，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商人预付货币资本，这种资本所以能作为资本自行增殖，能执行资本的职能，是因为它专门从事这样一种活动，即作为中介实现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实现这一资本作为商品资本的职能。”商人预付的货币资本是专门用于买卖商品的，而且“总是处在资本的流通领域中”。②

对产业资本家来说，好处是他的资本周转时间缩短了。他的生产过程就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不会发生中断”，因为“对他来说，他的商品已经转化成货币”。③这并不意味着流通时间的问题就消除了。但是，如果没有商人的介人，“流通资本中以货币准备金形式存在的部分，同以生产资本形式使用的部分相比，必然会不断增大，与此相适应，再生产的规模就会受到限制。而现在，生产者能够把他的资本中较大的部分不断地用于真正的生产过程，而把较小的部分用作货币准备金”。④而且，“如果商人仍然是商人……生产者就可以把出售商品的时间节省下来用于监督生产过程，而商人则必须把他的全部时间用于出售商品”。⑤这就是商人资本的活动在逻辑上和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则相一致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强调是作者加的。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06—3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的原因。或者更准确地说，这就使一个独立的商人资本家阶级的出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是有益而且逻辑上也是必要的。

然后马克思列举了专门从事买卖的资本形式的一些重要职能。通过销售不同生产者的产品，或社会劳动分工中的几个不同生产部门的产品，当达到一定的规模经济时，他们能补偿和平抑不同的周转时间。他们越有效率，周转越快，他们需要的资本就越少。同样，在提高他们自己的货币资本的流通速度和影响消费的速度方面，他们也可以发挥作用。这最后一点，我认为现在对我们所处的消费主义世界非常重要，可以进一步地详细阐述。但是，

> 商人资本不外是在流通领域内执行职能的资本。流通过程是总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但是在流通过程中，任何价值也没有生产出来，因而任何剩余价值也没有生产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同一价值量发生了形式变化。事实上不过是发生了商品的形态变化，这种形态变化本身同价值创造或价值变化毫无关系。如果说在生产的商品出售时实现了剩余价值，那是因为剩余价值已经存在于该商品中……**商人资本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①

但是这章描述的间接效果极为重要：

> 既然它有助于流通时间的缩短，它就能间接地有助于产业资本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既然它有助于市场的扩大，并对资本之间的分工起中介作用，因而使资本能够按更大的规模来经营，它的职能也就提高产业资本的生产效率和促进产业资本的积累。既然它缩短流通时间，它也就提高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的比率，也就是提高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1—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强调是作者加的。

> 利润率。既然它把资本的一个较小部分作为货币资本束缚在流通领域中，它就增大了直接用于生产的那部分资本。①

正如我们一直以来看到的，资本必须保持运动的连续性、平稳性和流动性。商品经营资本在这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第三卷第17章：商业利润

正如马克思在第二卷中说明，又在第16章中坚决重申的那样，“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纯粹的职能……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但是产业资本家总有一些货币资本被束缚在了流通领域。“为此所需要的时间，客观上对商品来说，主观上对资本家来说，都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形成界限”。②当然，也就是说，这些界限的任何放松都有助于增强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能力。我们现在面对由一种特殊资本执行这些职能的情况：

> 商品经营资本——撇开可以和它结合在一起的一切异质的职能，如保管、发送、运输、分类、散装等，只说它的真正的为卖而买的职能——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它只是对它们的实现起中介作用，因而同时也对商品的实际交换，对商品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的转让，对社会的物质变换起中介作用。③

但是这里的商品经营资本仍然是资本，而且必须像任何资本一样，“提供平均利润”。如果它的利润率高于产业资本的利润率，那么一部分产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业资本就会转为商品经营资本(反之亦然)。“没有哪一种资本比商人资本更容易改变自身的用途，更容易改变自身的职能了。”①

马克思在这儿借助了第三卷第二篇中详细考察的利润率平均化原理。既然我们还没有考虑这个原理，我在这里简要说明一下它的含义。马克思说，资本倾向于流向利润率最高的地方(尤其是在竞争条件下)。从直觉上看，这是讲得通的。结果所有部门的利润率都趋于均等——从纺织业到农业再到石油开采。问题是这种趋势不会引导资本流向生产剩余价值最多的地区。资本密集型部门(资本的价值构成或者有机构成高的部门)从劳动密集型(资本的价值构成或者有机构成低的部门)部门获取剩余价值。这种与价值和剩余价值相关的投资错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复杂后果(包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因为在既定的市场力量下，资本家对利润率而不是剩余价值生产做出反应)。后面的章节偶尔提到了这个趋势的效果。然而在这儿，马克思仅仅断言商人资本的利润率与产业资本的利润率趋于相等。他后来在别的地方说，如果一般利润率趋向于下降，那么商人资本的收益率必定也会下降。货币资本的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利润率是否趋于相等呢？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进行讨论。

回到文本，马克思说，很明显，如果商人资本的利润率与产业资本的利润率趋于相等，如果商业经营的投资本身不生产价值或者剩余价值，那么“以平均利润的形式归商人资本所有的剩余价值，是总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于是问题就在于：“商人资本怎样从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中获得归它所有的那一部分呢？”②

在进行了惯常的冗长和细致的计算之后，马克思揭露了从商品经营资本的立场得到的一种“假象”：商人资本增加了价值，因为它从产业资本家那里便宜地买进，以更高的价格向消费者卖出。买进和卖出时的价值差额，被解读为和表现为它自己创造的价值的估计值。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商业利润就不是以这个方式实现的。”尽管似乎“商人是高于商品价值出售一切商品的”，①但事实上，商人资本“会按照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作为一个决定的因素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如果我们“就商品的总体来看，产业资本家阶级出售全部商品的价格，小于这全部商品的价值”。②因此，“商人的出售价格之所以高于购买价格，并不是因为出售价格高于总价值，而是因为购买价格低于总价值”。③换句话说，“在平均利润率中，总利润中归商业资本所有的部分已经计算在内了”。④

“商人资本虽然不参加剩余价值的生产，但参加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的平均化。因此，一般利润率已经意味着从剩余价值中扣除了属于商人资本的部分，也就是说，对产业资本的利润作了一种扣除。”⑤结果，“同产业资本相比，商人资本越大，产业利润率就越小。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尽管马克思没有证明，但这一点对于理解商人资本在当代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和力量至关重要。一旦承认产业资本利润和商人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因情况而异的，那么不均衡的力量关系便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从而扭曲和干扰马克思假定的通过利润率平均化而实现的均衡。这也意味着对产业资本和商人资本之和的投资得到的利润率，低于只对产业资本投资时得到的利润率（后一种计算方法在第三卷前面的章节中用过）。

然后马克思继续指出，“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商人资本（但零售商人的资本例外，它是混合类的东西）的相对量，是和它的周转速度成反比的，因此，也是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活力成反比的”。⑥然而在历史上，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因为是商业资本（正如我们在“关于商人资本的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历史考察”那章所看到的）首先使商品价格“或多或少由商品的价值决定的……而最先形成一般利润率的领域，是对再生产过程起中介作用的流通领域”。历史上，“最初是商业利润决定产业利润”。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趋于成熟，这种关系以“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那一章中描述过的方式发生了逆转。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产业资本家的一系列内部成本和负担的外部化过程——通过将他总资本的一部分专门集中于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实际上，产业资本家把所有的流通时间和费用问题都推给了一个不同的资本，这个不同的资本则尽最大可能地处理这些问题，作为回报，它以平均利润率的形式收到了一部分剩余价值。

在本章稍后的地方，马克思更明确地重新阐述了这个观点：

> 因为商人资本决不是别的东西，而只是一部分在流通过程中执行职能的产业资本的独立化的形式……问题首先要在这样的形式上提出，即商人资本所特有的各种现象还没有独立地表现出来，而是还和产业资本直接联系在一起，作为产业资本的一个分支表现出来。①

当然，商人资本也产生了费用。这些费用中的许多在形式上类似于第二卷中考察的流通中的意外开支，固定资本（办公室空间）也包括在内。“价格计算、簿记、出纳、通讯，都属于这类活动”。尽管“这种事务所，同产业工场相比，从一开始就总是小到极点……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为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而需要的劳动及其他流通费用也就越增加”。②

然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商业资本家即在这里所说的商品经营者所雇用的商业雇佣工人的情况，是怎样的呢？”③商业资本家当然可以完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靠自己经营。但是随着积累的发展，他不得不雇用雇佣工人。“从一方面说，一个这样的商业工人，和任何另一个工人一样，是雇佣工人。第一，因为这种劳动是用商人的可变资本，而不是用作为收入来花费的货币购买的……第二，因为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是由他特有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和再生产费用决定的。”但是也有一个差别：“商业工人，也不可能直接为他［商业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①尽管商业资本家可能通过向工人支付低于他们的劳动力价值（当然，这在现实中经常发生）的工资而获取额外利润，但我们假定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做法并不存在。很明显，商人资本也不会为产业资本家使用的无偿劳动付款，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共同参加了对劳动者的剥削。所以商人资本“使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产业资本手里转移到自己手里，从而占有这部分剩余价值”。②但是

> 对单个商人来说，他的利润量取决于他能够用在这个过程中的资本量，而他的店员的无酬劳动越大，他能够用在买卖上的资本量就越多……这些店员的无酬劳动，虽然不创造剩余价值，但能使他占有剩余价值；这对这个资本来说，就结果而言是完全一样的。因此，这种劳动对商业资本来说是利润的源泉。否则，商业就不可能大规模地经营，就不可能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了。正如工人的无酬劳动为生产资本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一样，商业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也为商业资本在那个剩余价值中创造出一个份额。③

商业资本的剥削率越高，它从产业资本那里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份额就越大。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但是有一个遗留的难点：如何解释商人资本为购买劳动力而花费的可变资本呢？即使它不生产剩余价值，也应该把它包括在总资本所使用的总可变资本中吗？它是生产性劳动还是非生产性劳动呢？马克思承认对于这个主题还有许多东西需要研究，并且以他一贯的一丝不苟的态度试着加以解释，在这儿我不打算重复了。他尝试性的结论是

> 商人用［他的可变资本］购买的，按照假定，只是商业劳动，即只是对资本的流通职能即对C—M和M—C起中介作用所必要的劳动。但商业劳动是使一个资本作为商人资本执行职能、对从商品到货币和从货币到商品的转化起中介作用所必要的劳动。这种劳动实现价值，但不创造价值。并且，只是由于一个资本执行了这些职能……这个资本才作为商人资本执行职能，才参加一般利润率的规定，也就是说，才从总利润中取得它的份额。①

结果，商业工人的工资

> 并不与他帮助资本家实现的利润量保持任何必要的比例。资本家为他支出的费用，和他带给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同的量。他给资本家带来利益，不是因为他直接创造了剩余价值，而是因为他在完成劳动——部分是无酬劳动——的时候，帮助资本家减少了实现剩余价值的费用。②

这种对减少费用的必要性的强调，给与商业资本有关的效率、组织形式、工资率和剥削率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商业工人是属于报酬比较优厚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那一类雇佣工人，他们的劳动是熟练劳动，高于平均劳动。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展，甚至同平均劳动相比，工资也有下降的趋势。这部分地是由于事务所内部的分工；因此，劳动能力只需要有片面的发展”，而且，“其次，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使教学方法等面向实践，随着科学和国民教育的进步，基础教育、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就会越来越迅速地、容易地、普遍地、便宜地再生产出来。由于国民教育的普及，就可以从那些以前受不到教育并且习惯于较差的生活方式的阶级中招收这种工人……因此，除了少数例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这种人的劳动力会贬值”。①

对于商业工人阶级后来的遭遇和它现在的处境，显然需要更细致地研究。从马克思的时代以来，现实条件明显改变了。

尽管如此，关键仍然是要明白，“这种劳动的增加，总是剩余价值增加的结果，而决不是剩余价值增加的原因”②——这个观点非常重要。

论第三卷第18章：商人资本的周转

“商人先是买，把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然后是卖，把同一商品再转化为货币；并且这样反复不断地进行下去。”③简言之，商人参加两类形态变化——M—C和C—M，但是他仅仅在流通领域经营。由此可见，周转速度对商业资本家是非常重要的：“正像同1个塔勒流通10次就是买了10次价值1塔勒的商品一样，商人手中的同一货币资本……实现了价值10倍的总商品资本。”唯一的区别是，“同一货币资本（不管它是由哪些货币单位构成），同一货币价值，却是按其价值额反复买卖商品资本，因而作为M＋ΔM反复流回同一个人手里”。④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但是，这个周转过程有一些界限和限制：

> 当然，商人资本对生产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但这只是就它缩短生产资本的流通时间来说的。它不会直接影响生产时间，而生产时间也是对产业资本周转时间的一个限制。这对商人资本的周转来说是第一个界限，第二……商人资本的周转最终要受全部个人消费的速度和规模的限制。①

最后提示的这一点在后面基本被忽略了，大概是因为消费对马克思来说属于政治经济学范围外的“个别性”，正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论证的那样(我想不到其他原因了)。但是，历史上，商人资本对消费的作用恰恰是：刺激消费者的欲望，用产业资本家提供的商品挑逗公众，尽可能地确保潜在的消费者拥有足够的可支配货币(通常是信用)来迅速吸收产品，并使消费动力的增长和产业资本寻求的无止境的积累同步进行。但是马克思将消费的周转时间所造成的限制描述为“决定性的”，我很惊讶他没有进一步讨论这个观点。

后面的章节提到了一些相关的内容，但是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是在流通领域内从商人资本的独立性中产生的。“当再生产过程有巨大的弹性，能够不断突破每一次遇到的限制时，商人在生产本身中不会发现任何限制，或者只会发现有很大弹性的限制。”而且，“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商人资本支配着社会总货币资本的一个很大的部分，因此，它可以在已购买的物品最终卖掉以前反复进行购买”。②因此，由于它的独立化，商人资本总是不断越出市场承受力的界限，甚至还会“驱使再生产过程越出它的各种限制”(也就是越出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所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38—3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施加的“决定性的限制”）。

> 尽管商人资本的运动独立化了，它始终只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运动。但是，由于商人资本的独立化，它的运动在一定界限内就不受再生产过程的限制……内部的依赖性和外部的独立性会使商人资本达到这样一点：内部联系要通过暴力即通过一次危机来恢复。①

这句话非常重要。商人资本是独立的，可以驱使整个系统远远超出它的限制（尤其是在信用的帮助下）。但是价值规律与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之间有内在联系，正是这种内在联系在商业（和金融）危机中重新宣布了自己的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研究的一般命题。我们将看到，它在后面处理生息资本流通的章节中起了很大作用。我们现在来思考，为什么资本主义内部的危机如此频繁地首先以商业和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

在接下来的段落中，马克思列举了一些证据支持这个观点。例如，他断言，商业危机最初起源于批发商业和银行业，而不是零售业（我不确定这在经验上是否正确）。资本和劳动的充分就业导致了过度扩张，这使得

> 由于所期望的需求的刺激，这种生产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安稳地进行下去，因此，在这些部门，商人和产业家的营业非常活跃。一旦那些把货物运销远处（或存货在国内堆积起来）的商人的资本回流如此缓慢，数量如此之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这时，强制拍卖，为支付而进行的出售开始了。于是崩溃爆发了，它一下子就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结束了虚假的繁荣。①

这实际上转换了问题：为什么银行会突然催收贷款？（我们后面再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我认为，这里的文本正在研究什么是很明显的：我们正在向一个领域移动，在那里，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形成和作用在这个背景中被试探性地提出来了——商人资本（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独立性与价值生产和实现的某些内在联系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系。

马克思论证这种内在联系的途径之一是利润率平均化，然而利润率平均化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不同周转时间很敏感。商业资本的周转能够同时或者连续地"对极不相同的生产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②另一方面，产业资本的周转，是由生产和再生产的周期性设置的，这里流通时间也"形成一个界限……它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形成或多或少起着限制的作用，因为它对生产过程的规模发生着影响……从而参加决定一般利润率的形成"。③通过减少流通时间来减少产业资本的周转时间可以提高利润率。不管周转时间是多久，商业资本（理论上）能获得一般利润率。那么，尽管商业资本不能通过加速它的周转时间来提高自己的利润率，却可以影响一般利润率，因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的商业资本减少了。"商人资本的绝对量和它的周转速度成反比。"而且，"各种会缩短商人资本平均周转的情况，例如，运输工具的发展，都会相应地减少商人资本的绝对量，从而会提高一般利润率"。④

马克思认为，这里有"双重影响"在起作用。周转越快，需要的商人资本的数量就越少，而商品化的规模和多样性的普遍扩张增加了对商人资本的需求，用它处理快速增长的大量商品。结果是"不仅商人资本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的量会增加；而且投在流通中的一切资本，例如投在航运、铁路、电报等等上面的资本都会增加”。马克思也承认，“随着商人资本容易挤进零售商业，随着投机的发展，随着游离资本的过剩，不执行职能或半执行职能的商人资本会增加”。①我一直对《资本论》中的过剩资本的作用感兴趣。它总是突然被提起，但是很少作为一个基本的问题被强调（我早就说过它是个基本问题）。

作为这一章的结束，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了拜物教的观念和信条是怎样轻易地从商业和生产活动的复杂交织中建构起来的：“一切关于再生产总过程的表面的和颠倒的见解，都来自对商人资本的考察，来自商人资本特有的运动在流通当事人头脑中引起的观念。”②他进一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和流通当事人的头脑中，关于生产规律形成的观念，必然会完全偏离这些规律，必然只是表面运动在意识中的表现。商人、交易所投机者、银行家的观念，必然是完全颠倒的”。他甚至断言，“在这些人的头脑中，竞争也必然起一种完全颠倒的作用”。③

“因此，从商人资本的观点来看，周转本身好像决定价格。另一方面，虽然产业资本的周转速度，由于它会影响一定量资本所剥削的劳动的多少，所以会对利润量、从而会对一般利润率起决定和限制的作用，但对商业资本来说，利润率是外部既定的，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的形成之间的内在联系已经完全消失。”④当我们进入分配领域时，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在处理生息资本流通的时候会再次遇到这个现象。与剩余价值生产相关的一切联系都在社会的表面上抹去了，这是各色拜物教信条的来源。

不过，个别的商业资本家的确能通过加快周转速度，使其超过社会平均水平，而在竞争中获得额外利润，这强化了表象世界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赚到超额利润，正像在比平均条件更有利的条件下进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行生产的产业资本家会赚到超额利润一样。"①(这不就是在第一卷提出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吗？)而且，"如果那些使他能加速资本周转的条件本身是可以买卖的，例如店铺的位置，那么，他就要为此付出额外的租金，也就是说，把他的一部分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②这将我们带到了商人资本和地租的关系领域，以及这种关系在城市环境下建构的方式(看看麦迪逊大道③或者牛津街④，你就明白马克思的意思了)。

第19章是通往研究货币、金融资本和信用制度的第五篇的过渡章节。它主要集中于"货币在产业资本和现在可以补充进来的商品经营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因为商品经营资本把产业资本的一部分流通运动当作自己特有的运动承担起来)所完成的各种纯粹技术性的运动"，⑤并进一步指明，"当它们独立起来，成为一种特殊资本的职能，而这种资本把它们并且只把它们当作自己特有的活动来完成的时候，就把这种资本转化为货币经营资本了"。结果，

> 从总资本中有一定的部分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分离出来并独立起来，这种货币资本的资本职能，是专门替整个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完成这些活动……所以，这种货币资本的运动，仍然不过是处在自己的再生产过程中的产业资本的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⑥

这种资本形式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术语是至关重要的，对后面的分析有许多提示。然而，由于本章最重要的命题在后面马克思对货币资本和金融的研究中得到了详细阐述，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区，许多广告公司的总部聚集在此，因此该大道逐渐成为美国广告业的代名词。——译者

④ 牛津街(Oxford Street)，英国伦敦的一条著名的商业街。——译者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五

利息、信用和金融
（第三卷 第21—26章）

总　述

首先，我想对马克思在开头几章中关于货币资本的论述做一个总括性的说明。因为对马克思来说，通常很难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事实上，这一部分的总体论述非常有趣，这几章的内容之间也有着很紧密的联系。

但是，首先我必须提醒你们，接下来所要讨论的这部分文本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付出巨大努力后重新整理撰写的。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恩格斯在做这项工作时已经尽力遵照马克思的原意，但后来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研究却表明，恩格斯的取舍可能并不完全正确。比如说，每一个章节都由恩格斯从连续的手稿中分离出来并拟定标题——正因为如此，并不奇怪，这些章节之间的联系才会如此紧密。你也会注意到恩格斯在原文中插入了一些自己的长篇论述，为的是完善、改正和更新马克思的工作。在这里，我不会详细阐述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会把原文看做是对马克思的观点的准确概述，尽管不是很完整。

首先，马克思注意到，除了我们至今为止已经知道的以外，货币作为资本还有其他一些待发掘的东西。拥有货币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开辟了道路（也是其必要前提），从而也为资本的生产开辟了道路。因此，货币资本（定义为用于生产剩余价值的货币）可以采取商品的形式。它既有交换价值（价格）也有使用价值。它的使用价值即它促进了剩余价值的生

产；它的交换价值(价格)就是利息。这和马克思在第二卷中的阐述差异很大。在第二卷中，马克思说货币作为资本只能执行货币的职能，也就是被用于买和卖。这种概念的转换非常重要。我并不认为这是马克思改变了他的想法或是前后不一致。这更不是关系性概念的含义随着研究内容的展开发生变化的例证。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认为，当遇到这类问题时，从整体上考察马克思论述的变化是非常明智的。这些章节之间的重要线索是马克思再一次明确提出了拜物教的概念。这一概念在第一卷的第1章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那里，他提出资本的真正基础(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埋藏在了真实存在却有误导作用的表面现象之下。的确，我们会去市场用货币购买商品(包括劳动力)。但问题在于，这些市场关系掩盖了凝结在商品生产和将商品带入到市场的整个过程中的劳动的社会性和官能性。马克思所做的工作就是深入到表面现象背后。

马克思为什么要在《资本论》第三卷的这一位置回过头讨论表面现象的拜物教性质呢? ①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在《资本论》的其他部分对这一问题进行如此明确的阐述。这里他宣称："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物神的观念已经完成。"②听起来，他为这一结论感到兴奋并对其抱有必胜的信念。他宣称，生息资本为"资本神秘化的最显眼的形式"。

我认为这些论断非常重要。在我看来，在一开始把拜物教定义为一种妨碍正确理解的外在、客观和真正的障碍之后，马克思现在似乎可以回过头来，转入问题的核心，对拜物教毁灭性和潜在暴力性的力量进行深入内部的主观的理解。简单地说，我们现在有希望看看那些华尔街投机者们的脑袋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了。但是，我们之中有谁可以拍胸脯说，我们能对这个纯粹金钱的欲望的拜物教女妖和它似乎能以复利速度

① Enrique Dussel 集中分析了这个问题，*Towards an Unknown Marx: A Commentary on the Manuscripts of 1861－1863* (New York: Routledge, 2001)。这本书值得仔细研读。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进行无尽积累的无限威力有免疫力呢？我们现在有希望理解那些早已进入我们脑袋里的东西吗？

从更技术性的角度说，货币在第一卷中被描绘成完美的物神（它同时代表和掩盖了劳动的社会性）。而货币作为资本如何流通是第二卷的研究主题。这里，在第三卷中，生息资本的流通以资本流通的完美的物神形式再次出现了。但是现在，我们应该理解货币资本是如何看上去拥有不断自行创造更多货币的神奇和神秘力量的。这种力量有着实际影响。它以令人迷乱的可怕效果，“扭曲”和“神秘化”了（这是马克思经常用的词）资本运动的规律。因此，资本将永远处于这样的危险之中：沦为自己的拜物教形式和由此造成的错误、虚幻的理解的受害者。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将血肉加到这一论点的骨架上的呢？

货币资本商品的价格（即交换价值）称为利息；货币资本的循环现在表现为生息货币资本的流通。然而，资产阶级理论提出的那种“自然利息率”并不存在。回想一下，马克思将“自然”价格（当市场上供求均衡时的商品价格）看作是价值的近似物。但是在这里，“自然价格”无法存在。

那么，在作为商品的货币资本没有内在价值的前提下，是什么决定了利息率，或者说是任何“自然的”利息率？马克思认为，利息率首先是由货币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到目前为止一直将供求视为“特殊性”，认为它们在均衡时无法解释任何现象。在这里，没有什么“自然的”均衡点。相信这点也就意味着接受了这个同义反复的命题的正确性：价值可以被加到一个价值上。马克思认为利息率可以通过竞争决定。但是竞争的强制规律也被视为特殊性，因为资本运动内部规律的实施者并不是由竞争决定的。供给和需求以及竞争到目前为止都是作为“特殊性”而被忽略掉的（正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理论分析框架一样）。然而，在这一阶段，它们登上舞台中心，并对所有事情做出解释。这是概念上的一个巨大变换。

我认为这里有一个马克思分析的重点。他在第二卷中不愿意（甚至达

到强迫性拒绝的程度）讨论特殊性，和在这里他为理解生息资本流通而研究这种情况的必要性形成了对比。

这就提出了这些特殊性和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只有在这个语境下，从第二卷中对根本事实的考察转向第三卷中拜物教性质的表面现象才是有意义的。我们明白了为何没有拜物教的形式，资本就无法存活，也清楚了这些拜物教的形式是如何扭曲和神秘化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的。但正如一些资产阶级评论家指出的，如果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在其表面形式的基础上运作的，那么为什么不只是简单地描述这些形式，并忽略所有这些有关根本事实、价值理论以及其他类似的一些复杂的东西呢？马克思对此的可能回答是，表面运动所展示出来的强烈矛盾只有通过研究内在动力才能被预见和理解；这一内在动力不仅生产出拜物教的形式，而且巩固了拜物教对资本运动规律的干预。因此，我们阅读这些章节的目的就是去揭露内在规律和表面形式之间的这些关系实际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马克思认为利息同时具有“自主的和独立的”（马克思的原话）的性质，但是又把它包括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世界之中。他所说的“包括在”的意思即必须被确立的东西。换句话说，利息率和生息资本的流通可以以自主的、独立的方式运动，因为它们是由不断变化的供给、需求以及竞争所决定的特殊性。借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话，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能使这些特殊性反过来以决定的而非偶然的方式来影响生产的一般性？如果存在，那么当这些特殊性自由运行时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又是如何作用的呢？或者说这些特殊性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吗？

这个问题变得尤为重要，因为马克思明确承认集合到货币市场的大量货币资本能够也确实作为“阶级的共有资本”发挥作用。货币资本就是在这样的形式下导致了1847—1848年和1857年两次巨大的金融和商业崩溃，与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发生的2007—2009年的经济危机动摇资本主义根基的方式相差无几。如果生息资本的流通执行“阶级共有资本”

的职能，①那么我们怎么有可能把它从资本运动一般规律的特定情形中排除出来？我尽可能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不管答案为何，一般来说它都会对我们如何理论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危机形成机制，尤其是对我们如何利用马克思的观点去分析近来发生的事件，产生巨大影响。

第一步就是要考察与通过产业资本循环产生的剩余价值（利润）相比，生息资本是如何获得它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马克思首先区分了货币资本家（那些拥有货币权力的人）和产业资本家（那些组织剩余价值生产的人）。利息率是由这两类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竞争所决定的。于是，从历史角度——如果不是理论角度的话——来看，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就被放到了中心位置。

这一关系的历史有时候被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解释：相对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自1980年左右起就不可避免地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这一事实催生了一种不同的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比如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相比，金融资本有迥然不同的运动规律。马克思并没有（尽管在一些段落中看起来有）对其做一般性的论证。我也不打算这么做。但毫无疑问的是，同一阶级的这两个派系之间（也包括他们和这一阶级的其他主要派系，比如地主和商人之间）的力量平衡从未达到一种稳定状态。霸权的转换肯定已经发生了。例如，在乔万尼·阿里吉的著作中，有一个貌似有理的观点：世界经济霸权的转变（比如20世纪上半叶从不列颠到美国的转变）是在金融化阶段（在20世纪早期由希法亭、霍布森和列宁所描述的那种阶段②）之后发生的。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确定无疑的金融化浪潮似乎预示了又一次的霸权转移（从美国到东亚？）。要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我们需要理解不同阶级中的不同派别之间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实际的力量平衡，以及他们之间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Rudolf Hilferding, *Finance Capital: A Study of the Most Recent Phase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John Atkinson Hobson, *Imperialism*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5.

的竞争所带来的一系列结果。

但是马克思走得更远。起初表现为阶级派系之间关系的东西事实上内部化到个别资本家的人格特征中去了。所有的资本家都同时扮演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产业资本家必须总是以货币的形式持有一定量的资本。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随时选择把自己的钱用于扩大生产以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利润)，或者仅仅为获取利息将其借给他人。这一决策的逻辑为资本家提供了诱人的可能性。你会如何选择呢？是选择遭受实际生产剩余价值的一切麻烦(和爱闹事的工人、不靠谱的机器或变化无常的市场打交道)，还是选择将货币借出去，一边在巴哈马群岛上享受生活一边吃利息？根据马克思的记录，英国的许多产业资本家的野心是不断进行生产，直至他们的财产足以使他们成为食利者或者金融家，那么在退休后，他们单靠利息就可以在田庄里过上舒适的生活。但马克思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试图做靠利息或者租金生活的食利者而没有人愿意去生产剩余价值，那么利息率就会降到零，与此同时，再投资于生产的潜在利润会涨到一个无法预计的高度。①在这里，我们至少碰到了这样一种情形，即生息资本的流通必须服务于并且服从于剩余价值的生产。

这立刻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产业资本的利润率和货币资本的利息率之间存在着某种均衡吗？利息参与商业资本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吗？在商业资本的情形中，存在一种形态变化(真实的交易)；在这种变化中，商品形式的资本以货币形式实现了。但是利息不同，因为它是货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形态变化。问题是，正如马克思在第一卷中坚持认为的那样，②货币的积累是可以没有限制的。简单来说，生息资本好像拥有以复利(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比喻道，它就像一只会下金蛋的鹅)速度增长的神奇(拜物的)力量。把货币存在一个存款账户里，然后它就像拥有魔法似的自行增殖。如果货币可以没有限制地不断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1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积累，那么货币资本也可以。这是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最极端的幻象。

复合增长会永远持续下去的幻象——马克思在这里通过引用1772年出版的一个小册子里描绘的美妙景象而强调了这种幻象——“一个先令，在耶稣降生那一年以6%的复利放出（大概是投放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会增长成一个比整个太阳系所能容纳的还要大的数目”。①顺便提一句，这或许解释了为何我们不得不放弃金本位制度，直到最后纸币的发行不再需要任何的商品基础。于是，世界货币的供给是无限的，因为它们仅仅是数字而已。美联储可以转眼之间立即增加约一万亿美元的货币供给（但增加金块就另当别论了）。虽然无限积累的观点“胜过一切信仰”，但马克思表明，它实际上促使了1847—1848年和1857—1858年两次金融和商业崩溃的发生。借贷关系能够脱离控制并产生越来越多的信用货币（欠条数目的增加）。这必然会带给所有的信用市场一种虚拟的性质。

因此，在这里，马克思使用了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又不成熟的概念：虚拟资本。这给了货币资本的拜物教性质一个更为形象可感的形状和形式。它的作用是在对1847—1848年的商业和金融危机不完整的——甚至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令人困惑的——考察中发现的，并且整个考察和对一个叫奥维尔斯顿的人的观点的批评混在一起。我再次强调，拜物教正如在第一卷中定义的那样，是真实和客观的，即使它掩盖了深层的价值关系。超市里的商品的确是用来交换回货币的，但却是以掩盖创造了它的劳动（价值）的信息的方式。虚拟资本的概念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它并不是因为嗑了药而精神错乱的华尔街银行家创造出来的东西，而是一种真正的资本形式——以有价格的商品形式存在的货币。虽然这种价格可能是虚拟的，我们也不得不回应它（不管是支付抵押，为我们的存款寻求利息，还是借钱去做生意）。

细节部分我们会在后面进行讨论。但是在马克思对借贷资本（为扩大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生产而借的货币)和扩展到贴现票据(促进市场上价值的实现)范围内的货币之间区分的讨论之中，有一个重要且简洁的说明。货币资本从完全不同的两方面介入了产业资本的流通——即循环的开始阶段和结束阶段。同一个金融家可以一面借钱给开发商建造住宅，一面借钱给买方购买那些住房来保证市场需求。因此货币资本同时增加了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很容易看出这是怎么成为一个封闭循环的(比如，在住房的生产和实现过程中产生的资产泡沫)。这便是利息率和利润率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极为重要且经常是投机性的方式。

因此，这些章节中论证的思路从流通的技术层面转移到了更加深层的领域。在第二卷中提到的所有的弱点、脆弱性和潜在的崩溃点变得越来越明显了。货币资本和更为重要的货币资本家，拥有了自主性和独立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服从于剩余价值生产。货币形式的拜物教特征容许了这些幻象和谎言的产生，但是它们总是周期性地爆发为不可控的、剧烈的金融和商业危机。

但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两个角色却被内化到同一个人身上了。因此，个人如何感知他们所处的环境并作出反应，对理解资本积累的动态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并不习惯于探索这些“个别性”，比如企业家精神的内在作用、预期的心理学和信任在金融事务中的作用。但在这些章节中，确实出现了足够多的旁白，可以看出他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在整体分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然，有关心理方面的问题在之后由凯恩斯作了更明确的分析，并且“预期”现在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

这里的分析有助于理解2007—2009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和之前的一系列金融危机。但是，我们必须当心，不能曲解马克思的原意；当运用马克思在分析1847—1848年和1857—1858年危机时所提出的不完整和经常是模糊不清的理论时，也不能对其进行过度的拓展。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技术分析所围绕的哲学主轴体现在下面这段评论中：

> 如果我们把利息叫做货币资本的价格，那就是价格的不合理的形式，与商品价格的概念完全矛盾。在这里，价格已经归结为它的纯粹抽象的和没有内容的形式，它不过是对某个按照某种方式执行使用价值职能的东西所支付的一定货币额；而按照价格的概念，价格等于这个使用价值的以货币表现的价值。①

这完全是对价值的价值的同义反复。在这之前，我们遇到过类似的论述。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写道：

> 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在这里，价格的表现是虚幻的，就像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另一方面，虚幻的价格形式——如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这种土地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类劳动对象化在里面——又能掩盖实在的价值关系或由此派生的关系。②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关键例子是未开垦土地的租金和价格。他本来同样也可以指出货币也是类似的情况。但是，在第一卷中有关货币的那章本身就足够晦涩难懂了，如果马克思这么做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它将更令人费解和难以置信。目前我们知道，虚幻的价格形式适用于货币本身。这提出了一些更加深刻和特殊的问题：相比于“真正的价值关系”，这种拜物教性质的“虚幻的价格形式”隐藏了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作用呢？

还有，马克思在这里用“不合理的和完全矛盾的”想要表达什么？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他并不想以莎拉·佩林①的演讲或者格鲁乔·马克斯②的独白那样的方式，说利息是不合理的、矛盾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把利息作为一个古怪的、任意的范畴而不予考虑，在挫败中放手不干，而只为可能的结果而悲伤或欣喜。我相信，马克思是在用数论做类比（因此，在上面引用的第一卷的部分提及了“数学中的某些数量”）。在数论中，有理数和无理数的区分至关重要。无理数是那些不能被简化为一个分数的数，众所周知的例子有根号2和π（这完全不是古怪或任意的数，相反，它是数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常数之一——即圆周长和其直径的一个固定比例）。

实际上，马克思想表达的是，在利息率的决定中存在某些不能比较的东西，所以才是不合理的、矛盾的。当用维基百科搜索无理数时（在这方面我可不是专家），我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希帕索斯（Hippasus）是一名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人，第一个证明了无理数的存在，并说明它们是（正如利息率一样）“不可比的、不合理的和矛盾的”。而根据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世界上所有的关系都可以用整数或整数之比表达，因此他的这一发现令其信奉毕达哥拉斯学派信条的同伴感到震惊。据说，希帕索斯是在出海时发现无理数的，而且他立即就被扔下了船。这当然是学者们对那些不赞同他们所信奉的理论的人的一种典型反应。很久之前马克思就被其他经济学家扔下船了。他们至今听到自己理论中最基础的范畴之一——利息率——是不可比、不合理且完全矛盾的时候，或许仍然会感到恐惧吧。但马克思是历史潮流中最擅长游泳的一位。他一次又一次地试图爬回甲板上去提醒所有人他说的就是事实，这对每个目睹——即使是以最粗略的方式——2007—2009年发生的事情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他是否会再次被扔出甲板，取决于世界

① 莎拉·佩林（Sarah Palin），美国女性政治家，阿拉斯加州州长，2008年美国副总统候选人。——译者

② 格鲁乔·马克斯（Groucho Marx），美国喜剧演员。——译者

是否能再次回到资本和财富可以无限制积累的状态。

资本利息不合理和矛盾的特征必须要在这种数论意义上理解。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更容易地看到虚拟形式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它具有什么效果——类似工程学中常数 π 的作用。沿着这个思路思考，我们将能更好地理解由此产生的实践和理论影响。

接下来，有必要提出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问题。首先，马克思的坚决主张——即对作为虚拟资本范畴基础的利息的拜物教性质的观点——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资本运动一般规律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解？虽然商业资本分配范畴似乎可以纳入到马克思之前建立的一般理论框架之中，但相比于产业资本的流通，生息资本流通的影响似乎是另外一回事。在我看来，马克思理论中另一个重要的“无理数”——地租——也不能纳入到他的理论框架中，尽管他已经做了相反的说明。和利息一样，地租也是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一种真实存在并产生了实际影响的形式。当你到曼哈顿定居时，你不能说因为地租和房价是虚拟的，你就不需要为一个虚构的东西支付任何费用。大多数人通过为房屋抵押贷款支付利息而买到了房子——这种利息也是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

那么，留给我们的问题是，使利息率服务和服从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力量来自哪里呢？虽然我们清楚，若没有人生产价值，所有人都依靠利息或租金生活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也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在商业和货币危机中，比如1847—1848年和1857—1858年，以及我们所遇到的2007—2009年危机，某种规训力量在起作用——它把投机性金融活动的所有幻象和谎言拉回到了实际生产的尘世之中。但是，马克思的分析中同样存在令人不安的迹象——金融和生产之间的权力关系可能反过来。

其中一个迹象来自于对马克思分析的附加说明，看起来相当有趣。当一个产业资本家以货币形式积累资本并将其存到银行中获取利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涉及固定资本流通时，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因为资本家必须贮藏货币资本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换代）时，利息就表现为一种

纯粹的对所有权的回报率。这种纯粹财产所有权的消极回报与通过对生产的组织和监督进行的积极的剩余价值创造形成了对比。那么，为什么资本家不愿意给某些人支付监督工资来照看生产，自己获取纯粹的财产所有权的回报？这就引出了一个资本主义历史中非常有趣和至关重要的区别——所有权与监督管理。记住这些要点，让我们开始讨论文中的细节部分吧。

论第三卷第21章：生息资本

本章一开始，马克思就提醒我们，一般利润率是由产业资本和商人资本(即商业资本)的活动共同创造的，并且利润率在这两者之间平均化。“不管资本是作为产业资本投在生产领域内，还是作为商业资本投在流通领域内，它都会按照它的数量比例，提供相同的年平均利润。”① 然而货币与之不同。货币

> 取得一种追加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在这里，它的使用价值正在于它转化为资本而生产的利润。就它作为可能的资本，作为生产利润的手段的这种属性来说，它变成了商品，不过是一种特别的商品。或者换一种说法，资本作为资本，变成了商品。②

货币所有者既可以利用货币资本生产剩余价值，也可以把它借给别人来获取利息。货币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在货币资本家和生产者之间分配。利息是“一部分利润的一个特殊名称，一个特殊项目；执行职能的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77—3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资本不能把这部分利润装进自己的腰包，而必须把它支付给资本的所有者”。[1]因此，马克思把纯粹的资本所有权看做是一种索取一定回报率的权力。

商品、货币在产业资本循环中不停地进行着运动和交换；在每一时刻，商品和货币都有被用来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潜能。但是，在这些交易中，货币只执行货币的职能(即方便买卖)，而商品只单纯地作为商品执行职能(被售出，用于最终消费或生产消费)。但是，“生息资本”，马克思写道，

> 却不是这样。它的特有性质也在于此。要把自己的货币作为生息资本来增殖的货币占有者，把货币让渡给第三者，把它投入流通，使它成为一种作为资本的商品；不仅对他自己来说是作为资本，而且对他人来说也是作为资本；它不仅对把它让渡出去的人来说是资本，而且它一开始就是作为资本交给第三者的，这就是说，是作为这样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具有创造剩余价值、创造利润的使用价值……它既不是被付出，也不是被卖出，而只是被贷出；它不过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转让：第一，它过一定时期流回到它的起点；第二，它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流回，流回时，已经实现它的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那种使用价值。[2]

资本既可以作为货币贷出又可以以商品形式贷出，这点可能令人感到疑惑。工厂和机械设备可以像货币一样很方便地借出以获得利息。诚然，某些商品“例如房屋、船舶、机器等等，按照它们的使用价值的性质，始终只能作为固定资本贷放。不过，一切借贷资本，不管它的形式如何，也不管它的偿还会怎样受它的使用价值性质的影响，都始终只是货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币资本的一个特殊形式”。①此后，马克思把以商品形式进行的借贷归为生息资本循环的一般形式。然而，这样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含义。如果财产(比如房屋)和土地都可以被借出，那么租金和生息资本的循环之间就一定存在一种内在联系。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我在其他地方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而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越深入，我就越觉得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缺失环节。

几页纸之后(也就是在转向批评蒲鲁东的观点之后)，马克思对这一部分的论证做了总结：

> 借贷资本家把他的资本放出去，把它转给产业资本家时，没有得到等价物。放出资本根本不是资本现实循环过程中的行为，而只是为这个要由产业资本家去完成的循环作了准备。货币的这第一次换位，不表示形态变化的任何行为，既不表示买，也不表示卖。所有权没有被出让，因为没有发生交换，也没有得到等价物。②

在产业资本家利用它去生产剩余价值之后，货币必须回到借贷资本家手中。这一切都是法律意义上的交易问题。

> 第一次支出，使资本由贷出者手中转到借入者手中，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交易手续，它与资本的现实的再生产过程无关，只是为这个再生产过程做了准备。资本的偿还，使流回的资本再由借入者手中转到贷出者手中，这是第二个法律意义上的交易手续，是第一个交易手续的补充。一个是为现实过程作了准备，另一个则是发生在现实过程之后的补充行为。因此，借贷资本的出发点和复归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84—3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88—3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点，它的放出和收回，都表现为任意的、以法律意义上的交易为中介的运动。①

那么，这些法律意义上的交易手续与剩余价值生产这一根本现实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作为独特的商品，资本也具有它的独特的让渡方式。因此在这里，回流也不是表现为一定系列的经济行为的归宿和结果，而是表现为买者和卖者之间的一种特有的法律契约的结果。回流的时间取决于再生产的过程；而就生息资本来说，它作为资本的回流，好像只取决于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协议。因此，就这种交易来说，资本的回流不再表现为由生产过程决定的结果，而是表现为：好像贷出的资本从来就没有丧失货币形式。当然，这种交易实际上是由现实的回流决定的。但这一点不会在交易本身中表现出来。②

换句话说，法律关系和契约掩盖了生息资本循环过程和剩余价值生产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句子中反复出现的词“表现为”——就像我经常强调的那样——一般情况下提示了一些我们不易察觉的事情正在发生：

在资本的现实运动中，回流是流通过程的一个要素。货币先转化为生产资料；生产过程把它转化为商品；通过商品出售，它再转化为货币，并在这个形式上流回到那个最初以货币形式预付资本的资本家手中。③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90—3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但是法律交易契约只规定了 M—M′而没有其他更多的东西，这样所有这些中间过程都被忽略了。“货币作为资本进行的现实的循环运动，就是借入者必须把货币偿还给贷出者的那种法律上的交易的前提。”①于是，马克思总结道：“这种贷放就是把价值作为资本而不是作为货币或商品来让渡的适当形式。”②

接下来就要专门研究利息问题。这里我们所考察的流通过程是 M - M + ΔM。在这里，ΔM就代表利息，“或者说平均利润中不是留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而是落到货币资本家手中的部分”。③“就其余的商品来说，使用价值最终会被消费掉，因而商品的实体和它的价值会一道消失。相反，资本商品有一种特性：由于它的使用价值的消费，它的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不仅会保存下来，而且会增加。”④因此，“借贷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也表现为这种资本生产价值和增加价值的能力”。并且，“这个使用价值与普通商品不同，它本身就是价值，也就是由于货币作为资本使用而产生的那个价值量超过货币原有的价值量所形成的余额。利润就是这个使用价值”。⑤

这段论述非常重要。马克思在第一卷同样提出，货币和其他商品不同，它一旦进入了流通过程就不再退出（马克思生动地形容为“流通不断地把货币像汗一样渗出来”），因此生息资本可以无限期地循环。在这里我们也能弄明白它是如何无限增长的。

更确切地说，“贷出的货币的使用价值是：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并且作为资本在平均条件下生产平均利润……价值额，货币，在没有等价物的情况下付出去，”——同样，有一个条件能把这种交易和其它形式的商品交换区别开来——“经过一定时间以后交回来。贷出者总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是同一价值的所有者，即使在这个价值已经从他手中转到借入者手中，也是这样。”①这意味着，利息实际上表现为纯粹的所有权而非实际用途的回报率。但是，“它通过使用才自行增殖，才作为资本来实现。但借入者必须把它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即作为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利息）来偿还；而利息只能是他所实现的利润的一部分。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②如果利息是全部的利润，那么产业资本家将没有生产的动力了。

利息和利润的这种关系引出了另一种关系——“两类资本家之间，即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或商业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引入这个观点，资本的不同部分互相联系着，但每一部分都有着不同的关注点、利益和需要。接下来的部分，就像上文中已经简要概述过的那样，探讨了货币价格的不合理性和矛盾性，并得出结论：不管怎样，“和价值有质的区别的价格，是荒谬的矛盾”。③

那么，这里将利息率和价值生产连接在一起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呢？马克思回到了他一开始的分析中：

> 货币或商品，自在地，在可能性上是资本，正像劳动力在可能性上是资本一样。因为1. 货币可以转化为各种生产要素，并且实际上只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抽象表现，是它们作为价值的存在；2. 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具有在可能性上已经是资本的属性，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存在着作为这些物质要素的补充的对立面，也就是使这些要素变为资本的东西——雇佣劳动。④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94—3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由于这些原因，“货币，商品也一样，自在地，潜在地，在可能性上是资本，它们能够作为资本出售，并且以这个形式支配他人的劳动，要求占有他人的劳动，因而是自行增殖的价值”。①接下来，是真正的关键点：

> 其次，资本所以表现为商品，是因为利润分割为利息和本来意义的利润是由供求，从而由竞争来调节的，这完全和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它们来调节的一样。但是在这里，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一样的明显。如果供求平衡，商品的市场价格就和它的生产价格相一致，也就是说，这时它的价格就表现为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规律来调节，而不是以竞争为转移，因为供求的变动只是说明市场价格同生产价格的偏离。②

这是一个第一卷中常见的论点——在均衡时，供给和需求解释不了任何东西。甚至连工资也是这样的：

> 如果供求平衡，供求的作用就会相互抵消，工资就等于劳动力的价值。但货币资本的利息却不是这样。在这里，竞争并不是决定对规律的偏离，而是除了由竞争强加的分割规律之外，不存在别的分割规律，因为我们以后会看到，并不存在“自然”利息率。相反，我们把自然利息率理解为自由竞争决定的比率。利息率没有“自然”界限。在竞争不只是决定偏离和波动的场合，因而，在它们的互相起反作用的力量达到均衡而任何决定都停止的场合，那种需要决定的东西就是某种本身没有规律的、任意的东西。③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资本积累的动态变成了无规律的和任意的。这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建立起来的，目前为止在整部《资本论》中用来研究资本运动规律的一般性的交战规则（rules of engagement）的大厦似乎都要被瓦解了。这座大厦倒塌与否取决于接下来几章的内容，因为马克思说："在下一章，我们要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在第二卷中为方便讨论所排除的一些特殊性在这里又被考虑在内了。如果结果是"没有规律的、任意的"，那么马克思至今为止所主要关心的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会发生什么呢？现在我们处于一个非常矛盾的境地。竞争自始至终都被看做是资本运动内在规律的执行者；但在这里，这个执行机制却被理解成作为阶级共有资本的生息资本流通的决定因素——而这个执行者却是没有规律的和任意的。

这显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框架产生了背离。马克思发现他无法把生息资本的流通放到迄今一直指导他研究的假设框架里面。虽然，有很多途径可以理解在生息资本的情形下这种背离是为何及如何产生的（不同于其他的分配形式，例如地租和商业资本的利润，马克思相信自己已经成功地将这两者纳入理论体系之内），我不由得想到，面对这种背离的未知结果，马克思一定感到非常困难，压力巨大。一方面，在这几章中蕴含的紧张情绪说明把框架限制抛于脑后的激动；但是，对生息资本的解释失去控制（这种不确定性和独立性）威胁到了他之前所建立的整座理论大厦。难怪，正如恩格斯在序言中所提到的那样，在进行这几章的写作的时候，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了。我本人也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完成了《资本的限度》中有关马克思对货币资本和金融的看法的两章内容，并且在这过程中我变得相当焦躁。因此，对马克思，我深表同情。

在这些段落中隐藏着另一个重点。马克思使用了"生产价格"这个术语，而不是"价值"。这一术语上的改变有深刻的含义，但是我不打

算在这里对其进行解释，因为在第三卷前面的几个章节(第9章和第10章)中，在分析有着不同价值构成的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如何使利润率平均化时，这一问题已经出现过了。简单地说，利润率平均化的作用就是：使商品按照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平均利润率的价值形成的生产价格(c+v+p)，而不是更早的公式c+v+s所决定的商品价值进行交换。利润率平均化的结果就是，低价值构成(劳动力比例较高)的部门中的剩余价值会向高价值构成(不变资本比例较高)的部门移动。在这里，我们就不对此做更详细的说明了。虽然我并不认为这对生息资本的流通有多大影响，但这是马克思分析中的另一个根本性转变。

那么，当竞争从一个资本运动内部规律的纯粹执行者变成一个资本积累的无规律特性的积极决定因素时，事情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在马克思草拟的几份写作《资本论》的提纲中，《资本论》由一系列的书构成。马克思认为为了使分析变得完整，需要用一册的篇幅来专门研究竞争。当然，这册书从未写出来(虽然在第三卷的最后部分，有关于"竞争的假象"的一章草稿)。在这里，我们明白了为何关于竞争的这册书可能是，并且仍然是必要的。

本章中插入的几个小段落也值得注意。首先，马克思一开始批评了吉尔巴特关于"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①的观点。这一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利息率是一种法律契约而不是一种商品交换。在马克思看来，正义是"生产关系"的"自然结果"。虽然，这种"法律形式"表现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但正义的内容"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因此，奴隶制和商品质量上的弄虚作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都是非正义的，而雇佣劳动却不是。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几次抨击了一种观点，即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之外存在一种理想化的和抽象的正义概念。他并不完全信奉柏拉图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对话录》中赋予塞拉西马柯(Thrasymachus)的观点——正义由社会中最有权威的人说了算(这是柏拉图为了说明更完美的正义理想而尽力去证伪的一个观点);然而,马克思坚决反对柏拉图式的普世理念。正义是嵌入到由一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关系中的(随着资本逐渐主宰了社会关系,自由主义的正义论产生了)。"正义的"利息率是和资本的持续再生产相一致的利息率。它明显区别于高利贷。这并不意味着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资产阶级的正义观念中不存在矛盾。但是马克思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存在一些阿基米德的支点,某种完美的正义形式和道德规范可以用这些支点评判世界。他认为,这是蒲鲁东论证的主要缺陷。

第二个插入的段落则是对蒲鲁东关于利息和信用的观点的直接批评。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提到过的那样,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并不总是公正的,但是在这里,我认为他的批评还是一针见血的:蒲鲁东在理解剩余价值理论及其与生息资本流通的关系时所犯的错误导致他认为,某种不收取利息的银行会是剥削的终结。①对马克思来说,在生产过程中对活劳动的剥削而非榨取利息才是问题的关键。只顾修改利息率而忽略在生产中对活劳动的剥削,在马克思看来,是荒谬的政治纲领。

论第三卷第22章:利润的分割与利息率

马克思承认,利息率在短期内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波动。他从所有的变动和趋势中抽象出世界市场上一个相等的利息率,以集中于"利息从利润中独立出来的过程"。②首先,他假设"总利润和其中要作为利息支付给货币资本家的部分之间的比率是固定的"。③这意味着平均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利润率决定了利息的最高界限①。如果像马克思一贯主张的那样，利润率存在下降的趋势，那么很明显，利息率也存在这样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如果利息率依赖于货币资本的供需状况，那么这个趋势如何随着工业周期的变化而变化呢？“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现代工业在其中运动的周转周期——沉寂状态、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崩溃、停滞、沉寂状态等等，对这种周期做进一步分析，则不属于我们的考察范围——我们就会发现，低利息率多数与繁荣时期或有额外利润的时期相适应，利息的提高与繁荣转向急转直下的阶段相适应，而达到高利贷极限程度的最高利息则与危机相适应。”②然而，这仅仅是一种经验性的概括，而不是理论上的论述。马克思也假设在危机的高潮时期，国家对货币供给的干预无法使利息率下降到接近零的地步（而这正是美国自2007年以来的情况）。我提到这点是因为，很明显，马克思试图掌握货币资本供求波动时的供求状态，但是除了对利息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变动关系做经验概括以外，似乎没有其他方法了。

他指出，利息率为什么会下降还有一些其他独立的原因（除了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之外）。首先，对那些靠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赚取收入的人来说，退休的吸引力是永久的——尤其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他们会希望靠借出货币资本收取利息来生活，而免受生产的不确定性的折磨。马克思引用乔治·拉姆赛的话说：“在英国，食利者阶级的人数是多么多啊！随着食利者阶级的增大，资本贷放者阶级也增大起来，因为他们是同一些人。”③这一趋势“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而加剧了。“以银行家为中介，产业家和商人对社会各阶级一切货币储蓄的支配能力也跟着不断增大，并且这些储蓄也不断集中起来，达到能够起货币资本作用的数量。”这“必然会起压低利息率的作用”。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提到这个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至关重要的问题：金融系统在集中用于流通的初始资本中所起的作用（像以往一样，他保证“这一点以后还要详细说明”）。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金融系统扮演的调动社会各个阶级的储蓄，并将这些储蓄作为货币资本进行重新配置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但是，问题在于，“一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平均利息率——不同于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规律决定。在这方面，像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然利润率和自然工资率那样的自然利息率，是没有的”。①因此，“当竞争本身在这里起决定作用时，这种决定本身是偶然的，纯粹经验的，只有自命博学或想入非非的人，才会试图把这种偶然说成必然的东西”。②但“习惯和法律传统等等都和竞争本身一样，对它的决定发生作用”这一事实也削弱了竞争的影响。而“这两种有权要求享有利润的人［产业资本家和放贷人］将怎样分割这种利润，本身是和一个股份公司的共同利润在不同股东之间按百分比分配一样，纯粹是经验的、属于偶然性王国的事情”。这和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关系大不相同（按马克思的说法，地租和利润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的）：“在利息上……质的区别相反地是从同一剩余价值部分的纯粹量的分割中产生的，”而工资和地租的情况则是刚好颠倒过来。地主提供有形商品——土地，劳动者提供劳动力，但是货币资本家只提供货币资本——它只是一种价值的表现形式，对实际生产没有什么看得见的贡献。

一般利润率当然是由决定剩余价值的因素（剩余价值量，预付资本量以及竞争的状况）所决定的。这与利息形成了对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利息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但是，存在着

> 有利于利息率固定化的以下两种情况：1. 在历史上是现有生息资本，并且有一般利息率流传下来；2. 世界市场不以一个国家的生产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条件为转移而对利息率的确定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比它对利润率的影响大得多。①

根据我之前提到的，货币，尤其在信用的形式下，是资本可以自由飞翔的“蝴蝶形式”。证券市场上的利率变动报告就像“气象报告”一样，但借贷资本的价格仍然收敛于一个一般值：

> 在货币市场上，只有贷出者和借入者互相对立。商品具有同一形式——货币。资本因投在特殊生产部门或流通部门而具有的一切特殊形式，在这里都消失了。在这里，资本是以独立价值即货币的没有差别的彼此等同的形态而存在的。特殊部门之间的竞争在这里停止了；它们全体一起作为借款人出现，资本则以这样一个形式与它们全体相对立，在这个形式上，按怎样的方式使用的问题对资本来说还是无关紧要的事。如果说产业资本只是在特殊部门之间的运动和竞争中表现为**一个阶级的自在的共有资本**，那么，资本在这里则是现实地充分地在资本的供求中表现为这样的东西。②

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想法。在不理解货币资本是如何作为一个阶级的自在的共有资本运作的情况下，我们究竟如何能揭示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呢？

> 另一方面，货币市场上的货币资本也实际具有这样一个形态，在这个形态上，它是作为共同的要素，而不问它的特殊使用方式如何，根据每个特殊部门的生产需要，被分配在不同部门之间，被分配在资本家阶级之间。并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出现在市场上的货币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资本，会越来越不由个别的资本家来代表，即越来越不由市场上现有资本的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的所有者来代表，而是越来越表现为一个集中的有组织的量，这个量和实际的生产完全不同，是受那些代表社会资本的银行家控制的。因此，就需求的形式来说，和借贷资本相对立的是一个阶级的力量；就供给来说，这个资本本身作为群体表现为借贷资本。①

为了减少由于竞争、供求情况、经验规律以及风俗习惯产生的利息率变动的“偶然性和无规律性”，马克思做了很多努力，这一切的核心问题在于金融和货币系统运行的高度不对称性：个别资本家不得不向控制大量一般等价物的银行家借入货币资本，才能完成特定的生产项目(这也反映了第一卷中提到的M－C和C－M运动的不对称性)。

论第三卷第23章：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而且这两类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产生了利息率。②马克思问道：“只使用自有资本，不使用借入资本的资本家，怎么也要把他的总利润的一部分，归入利息这个特殊的范畴，要特别把它作为利息来计算？从而进一步说，怎么一切资本，不管是不是借人的，都要作为生息的资本，和作为生出纯利润的资本的自身区别开来？”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要求我们

> 从这样的前提出发：货币资本家和生产资本家实际上互相对立，不仅在法律上有不同的身份，而且在再生产过程中起着完全不同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的作用，或者说，在他们手中，同一资本实际上要通过双重的完全不同的运动。一个只是把资本贷出去，另一个则把资本用在生产上。①

紧接着显现出来的就是财产所有权法定地位的重要性。“因此，他支付给贷出者的利息，表现为总利润中属于*资本所有权本身*的部分。”②因此，利息

> 对他来说只是表现为资本所有权的果实，表现为抽掉了资本再生产过程的资本自身的果实，即不进行“劳动”，不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果实；而企业主收入对他来说则只是表现为他用资本所执行的职能的果实，表现为资本的运动和过程的果实，这种过程对他来说现在表现为他自己的活动，而与货币资本家的不活动，不参加生产过程相对立。③

利息“归货币资本家所有，归资本的单纯所有者，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之前和生产过程之外单纯代表资本所有权的贷出者所有”。“总利润的这两部分硬化并且互相独立化了”（注意此处关于独立化的主题），“好像它们出自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源泉。这种硬化和互相独立化，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和整个资本来说，现在必然会固定下来”。④而且，“不管能动资本家所使用的资本是不是借入的，也不管属于货币资本家的资本是不是由他自己使用，情况都一样”。⑤事实上，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强调是作者加的。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20—4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资本的使用者，即使是用自有的资本从事经营，也具有双重身份，即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和资本的使用者；他的资本本身，就其提供的利润范畴来说，也分成资本所有权，即处在生产过程以外的、本身提供利息的资本，和处在生产过程以内的、由于在过程中活动而提供企业主收入的资本。①

这种量的分割一旦转变为质的分割，就会“对整个资本和整个资本家阶级保持这个质的分割的性质”。②

货币资本作为产权要求利息这种被动性，与利用货币资本去生产剩余价值和获得企业主收入的生产资本家的能动性相对立。这一分割不仅适用于整个资本家阶级，而且也内化到资本家个人身上。

“不管产业资本家是用自有的资本还是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都不会改变这样的情况，即货币资本家阶级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家，货币资本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本，利息是作为一个与这种特别资本相适应的独立的剩余价值形式，来同产业资本家相对立的。”③但是，“不管他的资本在起点上已经作为货币资本存在，还是要先转化为货币资本”，单个资本家“总可以进行如下的选择：或是把他的资本作为生息资本贷出去，或是把他的资本作为生产资本来亲自使它增殖”。④一个创业者可以通过借入资本来开设一家企业，但一旦生产出剩余价值，创业者就可以选择把部分剩余价值借出去而不是进行再投资。

但是，认为“全部资本都转化为货币资本”是非常“荒唐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资本不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即不创造剩余价值(利息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也会提供利息”的观点是“更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22—4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加荒唐的”：

> 假如大部分的资本家愿意把他们的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那么，结果就会是货币资本大大贬值和利息率惊人地下降；许多人马上就会不可能靠利息来生活，因而会被迫再变为产业资本家。①

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点：生息资本的循环服从于剩余价值生产，并由剩余价值生产支配。

因此，虽然“自然利息率”并不存在，但是这里也暗示着货币资本家和剩余价值生产活动之间必须保持力量平衡（或者在个人层面来说，保持一些情绪上的平衡）。目前，我们仍无法获知这一个平衡点在哪。（它仅仅是失常的和偶然的吗？）但是，这种相对于货币资本的长期的不均衡的结果将会是它的贬值——这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日本于1990年开始，而美国于2007年开始盛行的超低利率是预示这种不平衡的信号吗？

接着，马克思考察了它对阶级关系的影响。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和对抗发生在剩余价值生产中。但是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是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结果，

> 在利息的形式上，这种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却消失了；因为生息资本就它本身来说，不是以雇佣劳动为自己的对立面，而是以执行职能的资本为自己的对立面；借贷资本家就他本身来说，直接与在再生产过程中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相对立，而不是与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相对立。生息资本是**作为所有权**的资本与**作为职能**的资本相对立的。但是，资本在它不执行职能的时候，不剥削工人，也不是同劳动处于对立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之中。①

怎么强调从阶级斗争的动态过程来思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都不为过。虽然在劳动过程中和劳动力市场上工人与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关系是很清楚的，工人和作为所有权的货币资本之间的关系则显得非常的抽象和不透明。发动工人去反抗货币资本的权力及其流通方式存在更多的问题。小企业比工人群体看上去更有可能反抗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权力。这些斗争一般很难整合到通常所说的阶级斗争里。从历史上看，反抗货币资本家权力(更为一般地反抗食利者)的斗争倾向于采取(并继续采取)民粹主义形式。最近，我们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能直观感受得到的民粹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生息资本给生产资本施加了生产剩余价值的压力；利息率越高，这种压力就越大。于是，生产者就对工人们说，他们所遭受的高剥削率反映了高利息率，从而把他们的注意力从生产资本家身上转移到银行家的贪婪和权力上。阶级斗争的动力因此被错放甚至是扭曲了。

然而，有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货币资本家和生产资本家这两个不同角色被内化在同一个人身上自然而然地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把自己的企业家收入当作

同资本所有权无关的东西，宁可说是他作为非所有者，作为劳动者执行职能的结果。因此，在资本家的脑袋里必然产生这样的观念：他的企业主收入远不是同雇佣劳动形成某种对立，不仅是他人的无酬劳动，相反，它本身就是工资，是监督工资，wages of superintendence of labour，是高于普通雇佣工人工资的工资，1. 因为这是较复杂的劳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25—4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动，2. 因为是资本家给自己支付的工资。①

但是一旦事情被如此观念化了，资本家就可以选择自己干活（并给自己支付监督工资），或者雇佣其他人来做这项工作。这样，人们就很容易忘记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不同部分，并且它们的［在一般工资和监督工资之间的］分割丝毫不能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它的起源和它存在的条件”。②这一章的剩余部分讨论了这一选择的结果。

资本家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利息只代表了资本的所有权”，那么利息相对于剩余价值生产“只代表两类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这样，这个利息形式

> 使利润的另一部分取得企业主收入，以至监督工资这种质的形式。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所要执行的特殊职能，并且恰好是他在同工人相区别和相对立中具有的特殊职能，被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职能。他创造剩余价值，不是因为他作为资本家进行劳动，而是因为他除了具有作为资本家的属性以外，他也进行劳动。因此，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与剩余价值相反的东西，是所完成的劳动的等价物。因为资本异化的性质，它同劳动的对立，被转移到现实的剥削过程之外，即转移到生息资本上，所以这个剥削过程本身也就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与工人相比，不过是在进行另一种劳动。因此，剥削的劳动和被剥削的劳动，二者作为劳动成了同一的东西。③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29—4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当然，所有这些都反映在“资本家的意识中”。①

这样一来，“利润的一部分事实上能够作为工资分离出来”。在以更为复杂、更为细化的分工为特点的大规模生产企业中，这种工资实际上付给了经理人。“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和指挥的劳动”(注意这里的必然性)，不过这种结合的方式有所不同。②企业中复杂的协作关系需要一个“乐队的指挥家”(在第一卷关于协作的章节中出现的形象)，并且这种形式的生产劳动可以要求得到一个更高的报酬率。然而，通过统治权和独裁来管理剥削也需要一种管理的权威。马克思在这里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话，大意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内，统治权把各种统治的职能加在掌权者身上，这就是说，在经济领域内，他们必须会消费劳动力”。③一旦他们足够富有了，“主人就会把这种操心事的‘荣誉’让给一个管家”。管家的形象在第一卷中关于协作的那一章里就已经提到了。但是，许多生产方式都存在劳动的监督问题。从马克思给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对奴隶劳动的管理是资本主义管理实践的一个重要先驱。种族低劣的信条在为组织特殊的“其他人”从事劳动进行辩护上起了重要作用。根据奥康瑙尔律师在纽约(“在热烈的掌声中”)的演讲，主人确实有权利要求“正当的报酬，来报答他的主人为统治他(奴隶)，为使他成为一个对自己和社会有用的人而花费的劳动和才能”。④目前，已经有许多文献证明了在不列颠被广泛运用的工厂管理技术，事实上是西印度群岛甘蔗种植园中为管理大批奴隶所率先使用的。

“尤尔先生早已指出，”马克思继续写道，“‘我们的工业制度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32—4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33—4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无论事实如何，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进行了"。①这种管理工资"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都是完全同企业主收入分开的"。②但是根据马克思简要的描述，这两种情形中的做法显然完全不同：

> 在合作工厂中，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失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随着信用而发展起来的股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占有权相分离……③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

> 企业主收入和监督工资或管理工资的混淆，最初是由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所采取的同利息相对立的形式造成的。由于一种辩护的意图，即不把利润解释为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把它解释为资本家自己劳动所取得的工资，这种混淆就进一步发展了。针对这种情况，于是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要求：要把利润实际地缩减为它在理论上伪称为的那种东西，即单纯的监督工资。④

但是，非技能化使得监督工资也倾向于下降，所以这一错误理论承受了更大的压力。随着工人合作社的形成和股份公司的发展，"混淆企业主收入和管理工资的最后口实也站不住脚了，利润在实践上也就表现为它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在理论上无可辩驳的那种东西，即表现为单纯的剩余价值”。①

本章最后很有预见性地提出了一种扭曲：“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一种涉及管理工资的新的欺诈在股份企业中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们之上，出现了一批董事和监事。对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②

这些理论的当代意义需要进一步的说明。在马克思的年代，监督工资实际上可能远远低于企业主收入。但是一旦引入这种差别，所有者和监督者之间的权力平衡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发生变动。比如，在股份制企业中，监督者——即 CEO 和经理——越来越成功地以所有者的利益为代价中饱私囊。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一本很有影响力的著作③中，伯利和米恩斯指出，一个特殊的管理层的兴起彻底重塑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关系。马克思借用尤尔先生的观点，预言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潜在意义，以及管理阶级出现的可能性。他并没有预测到它的全盛状态，部分是因为股份公司形式那时才刚刚起步。但是，他确实预见到了后来被称为“货币管理资本主义”下产生的各种新的“欺诈”方式的可能性。

在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形式——合作社中（就像罗伯特·欧文所做的社会主义实验那样），管理者报酬的问题也出现了。坦率地说，如果今天所有的机构和公司都以“蒙德拉贡模式”（在前面讨论过）运作，那么我们将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美国大学校长的年工资不会超过十五万美元，而不是超过一百万美元；而助理教师将不会只赚两万美元（如果他们足够幸运的话），而是能赚五万美元一年。

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明显具有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Adolf A. Berle and Gardiner C.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即使是在19世纪的下半段，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关于"其他人的钱"的观点还是被理解为玩笑的说法——而这正是马克思所认识到的一点。但是现在，这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即使近来用股票期权支付管理者工资的习惯模糊了所有权和管理的区别，这个问题也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因此，马克思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评论具有当代意义。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从根本上指出了作为资本的形式或报酬的监督工资的演变，掩盖了对生产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

论第三卷第24章：从拜物教到虚拟资本

"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第24章以这句话开头，"信用和虚拟资本"一章紧随其后。马克思的思路开始转变，拜物教的极端形式——信用货币——控制了资本运动规律。它产生了虚拟的形式，这些形式神秘化、扭曲并最后破坏了马克思迄今为止所关注并将之理论化的资本积累的运动规律。这里的语言振聋发聩：

> 资本表现为利息的即资本自身增殖的神秘的和富有自我创造力的源泉。现在，物（货币、商品、价值）作为单纯的物已经是资本，资本表现为单纯的物；总再生产过程的结果表现为物自身具有的属性……因此，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自行增殖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币，纯粹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一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
>
> ……
>
> 下面这一点也是颠倒的：尽管利息只是利润即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现在利息却反过来表现为资本的真正果实，表现为原初的东西，而现在转化为企业主收入形式的

> 利润，却表现为只是在再生产过程中附加进来和增添进来的东西。在这里，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物神的观念已经完成。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资本的生息形态，资本的这样一种简单形态，在这种形态中资本是它本身再生产过程的前提；货币或商品具有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增殖本身价值的能力——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显眼的形式。①

这种神秘化对庸俗经济学家来说简直是求之不得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把资本说成是价值即价值创造的独立源泉”，有着“独立的存在”。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资本家对这种拜物教形式的颠倒扭曲已经迷信到何种程度，以至于他们不能理性地安排自己的再生产？如果说竞争的强制规律和他们所能获取的全部市场信号给他们指明了错误的方向，那么资本除了给自己挖下更深的陷阱——即便没有自掘坟墓那么严重——还能做什么？

这一问题贯穿了整部《资本论》。它第一次也是最明显的一次出现在第一卷关于工作日那一章中——竞争使资本不断延长工作日，甚至到了危害生产剩余价值的人的生命的地步。在这个例子中，国家对工作日长度的干预才把资本家从这种“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②的政治主张中拯救出来。因此马克思在这里明确谈到资本如何“取得了它的纯粹的物神形式和资本物神的观念已经完成”是非常有趣的。好像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任务就是为了揭露统治资本主义体系的拜物教，他在这里完成了这个计划。

这一结果有很多的推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种拜物教形式(马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41—4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原文为法语 après moi, le déluge，直译为“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相传出自法王路易十五之口。——译者

克思用几个令人叹服的段落回顾了这个问题，并引用歌德的话“货币现在害了相思病”）怎样产生出一种复利的幻觉和幻想。某位普赖斯博士，我们读道，“简直为几何级数的庞大数字所迷惑”，①在1772年这位评论家想入非非，投资“一个先令，在耶稣降生那一年以6%的复利放出，会增长成一个比整个太阳系所能容纳的还要大的数目”。②在这种魔力下，一个硬币的初始存款就能简单地偿还现存的所有债务（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这种观点也可以在1851年的《经济学家》杂志里找到：“资本加上每部分储蓄资本的复利，把一切东西都攫取走了，以致世界上能提供收入的一切财富早就成了资本的利息，”它又意味深长地补充道，“所有的地租现在也是对以前已经投在土地上的资本支付的利息。”对此，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一说法意味着“资本的天生固有的规律，凡是人类所能提供的一切剩余劳动都属于它”现在却明显属于“资本作为生息资本的属性”。③

通过指出“只有当利润（剩余价值）中再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即被用来吮吸新的剩余劳动的那部分，可以叫作利息的时候，资本的积累过程才可以看作是复利的积累”，马克思把资本能自动进行复利增长的“玄想谬说”拉下神坛。但是，存在另外一个事实：“现有资本的一大部分，会不断在再生产过程的进行中或多或少地贬值”，部分是因为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会降低过去劳动的价值，也可能导致利润率下降，正如第三卷的前几章所说的那样）。那么，创造和毁灭的均衡点在哪里呢？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 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同一，为资本的积累设置了一个质的界限：总工作日、生产力和人口（可以同时剥削的工作日数目由人口限定）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在各个时期的发展。相反地，如果剩余价值在利息这个没有概念的形式上来理解，那么，界限就只是量的界限，并且会超出任何想象。①

这个物神的威力恰恰在于，它在幻想的外面有一层真实的外壳。在生息资本这一形式上，“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完成了。按照这个观念，积累的劳动产品，而且是作为货币固定下来的劳动产品，由于它天生的秘密性质，作为纯粹的自动体，具有几何级数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②随着资本力图把过去和现在劳动的使用囚禁到这种拜物教观念中，和自己对永不中断的复利增长的承诺，苦果便酿成了。要发现这一切中的潜在矛盾并不困难。当在没有界限的货币系统内流通的生息资本上下盘旋，到达复利资产和虚拟资本价值的最上层时，实际剩余价值生产的量的界限很快就被抛在脑后了；只有在危机来临的时候，这种限制力量的存在才被承认。

论第三卷第25章：信用和虚拟资本

在第24章的振聋发聩的揭示之后，接下来的两章有点令人失望，尤其是看到25章的标题，似乎许诺要揭示虚拟资本的秘密。这部分是因为马克思决定避免“详细分析信用制度和它为自己所创造的工具”，③包括国家信用的发展。他把自己的考察范围限定在“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因为这些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的特征所必要的”。换句话说，他又回到了一般性层次的讨论上，把其他情况都排除在外。前几章中那些狂热的主张如今又被冷静分析的努力限制住了。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商品贸易的繁荣，信用制度也在“扩大、普遍化、发展”。先买后付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货币被越来越多地用作“计算货币”。支付的承诺也可以流通，马克思把所有这样的业务概括为“票据”。由于许多这样的票据通过债权债务的平衡互相抵消，因此，即使没有金属货币的或者国家纸币的参与，它们也能作为货币来执行职能。

马克思引用了一位叫威·利瑟姆的银行家的话（我赞同他的观点——虽然我不知道如何加以说明），他试图去计算在英国境内流通的这种票据的总额。很显然，这些票据的名义价值远远超过了我们手头的黄金总量。利瑟姆写道：

> 汇票没有别的办法加以控制，除非防止出现货币过剩，防止出现低利息率或低贴现率，这样可以避免产生一部分汇票，并不致使汇票过度膨胀。要判断票据有多少是来自实际的营业，例如实际的买和卖，有多少是人为地制造的，只由融通票据构成，这是不可能的。融通票据，就是人们在一张流通的汇票到期以前又签发另一张代替它的汇票，这样，通过单纯流通手段的制造，就创造出虚拟资本。在货币过剩和便宜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办法被人使用到惊人的程度。①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这是这一章中唯一一次明确地提到虚拟资本。只有在第29章，马克思自己才分析了这个范畴。但在这里，他的确考察了这类用欠款凭证进行的交易中的一些做法——产权通过欠款凭证而没有借助于传统的货币易手。

这种交易定义了一种新的和非常特殊的经济角色，即货币经营者——或者银行家。这些中介人不仅专门从事票据贴现，而且从事“生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息资本的管理”以及货币借贷业务。“这方面的银行业务是：银行界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相对立的，不是单个的贷出者，而是作为所有贷出者的代表的银行家。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①——回想一下，货币资本就是资产阶级的共有资本。“银行的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银行的利润一般地说在于：它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马克思简要描述了几种银行类型的各种职能之后得出结论：银行实际上只是利用自己的良好信誉介入了所有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在某些情况下也发行一些银行券，而“银行券无非是向银行家签发的、持票人随时可以兑现的、由银行家用来代替私人汇票的一种汇票”。②发行银行券的银行通常是“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之间的奇特的混合物，事实上有国家的信用作为后盾，它们的银行券在不同程度上是合法的支付手段”。虽然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对此做过多说明，但事实上，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从商业交易活动中发展起来的银行系统和银行职能，而不是私人和国家职能奇特结合的“混合物”。在文中插入一些实例来说明这种严重扭曲的任务也留给了恩格斯，而也正是这些扭曲促成了1847—1848年和1857—1858年两次经济危机。

论第三卷第26章：货币资本的积累

这一章主要是由对一些评论家言论的大篇幅引用，以及对《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的一些证据的大量引用(其中最主要的是奥弗斯顿的证据)构成的。尽管马克思到处插入了一些批判性的评论，但是很难找到任何系统的批判。很难说马克思是全盘接受了他在文中所介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绍的一些观点，还是他只是为了接下来的批判性考察才复制的这些段落。

比如，他以对科贝特①的《通货论》的大段引用开始。我认为这段引用的文字非常有趣。在英格兰，货币形式的财产的稳定积累给科贝特带来这么一个问题：

> 在获得货币的愿望之后，下一个迫切的愿望是，按照某种会带来利息或利润的投资方法，再把货币投放出去；因为，作为货币的货币是什么也生不出来的。因此，如果在过剩资本不断涌来的同时，投资范围得不到逐渐的充分的扩大，那么，寻找投资场所的货币就必然会周期性地，在不同情况下多少不等地积累起来。多年来，国债一直是英国过剩财富的一个大吸收器……在经营上需要巨额资本并不时地吸引多余的闲置资本的各种企业……至少在我国是绝对必要的，以便为在普通投资部门找不到地盘的社会过剩财富的周期积累打开出路。②

马克思没有对这段做出任何评论，不管是批评的还是肯定的。但是，在整部《资本论》中有几个地方，我称之为“过剩资本的处理问题”的确出现了。在科贝特的解释中，有一点令我很感兴趣：国债是一种受欢迎的“排水口”，而远不是一贯被认为的糟糕的负担；那些大企业（比如说，大型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项目）对吸收过剩资本也是“绝对必要的”。所有这些都和这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般观点相一致，即财富的积累必然和债务的积累是齐头并进的。我无法得知马克思是否本来打算明确讨论这个观点，但是，他的确没有否定它。

① 科贝特(Thomas Corbet)，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追随者。——译者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从这一章中，我们知道，马克思对当时的英格兰银行董事诺曼先生提出的所谓的“通货原理”肯定是持否定态度的。并且，他肯定也不赞同“高利贷逻辑学家”、银行家奥弗斯顿勋爵的观点。但是，因为在这里提出的许多问题在后面得到了处理，所以我也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放到本书的下一章。

六

马克思论信用制度
（第三卷 第27—37章）

在第28章之后，马克思论述信用对资本的作用的文本质量迅速恶化了。正如我之前指出的，在第30章之后，恩格斯发现“真正的困难”开始了：

> 从这章起，不仅要整理引证的材料，而且需要整理思路，因为思路不时为插入的句子、离题的论述等等所打断，然后再在别处展开，而且往往是完全附带地展开的。因此，第三十章是经过挪动和删节编成的，而这些挪走和删去的东西在别处得到了利用。第31章写得又比较连贯了。但手稿中接着是题为《混乱》的一长篇东西，都是议会关于1848年和1857年危机的报告的摘录。在这些摘录中，汇集了23个实业家和经济学著作家的证词，并且有些地方加了简短而诙谐的评注。①

几经尝试后，恩格斯放弃了重建马克思《混乱》中的观点，最终他将自身的努力仅限于复制马克思的笔记，并强调了一些他临时做出的批判性补充。

我并不推荐读者一上来就全面细致地阅读第30—35章。必须强调，理解《混乱》这篇存在很大的挑战。马克思不是暗示过资产阶级的思想存在混乱，而他自己的思想并没有吗？如果是这样，那么马克思在澄清这一问题时做得很差。或者马克思的意思是信用货币世界中的矛盾太深了，以至于可能产生全面的、破坏性的混乱和危机？这两方面的意思马

克思也许都有。看来的确需要在这方面做一些说明。因此，在深入探究各个章节和评论更加相关的段落之前，我想先对我所理解的总体脉络做一个综述。必须澄清的是，我这样做并非是要声称我的解读是唯一可能的，更不用说是唯一正确的。

综　述

在第27章里勾勒出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作用的轮廓之后，马克思用两章分析了银行和银行家为资本的生产或实现提供流动性（现金或银行券）的作用。接下来关于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的三章主要集中于虚拟资本开始独立的运动后产生的后果，这里容许与剩余价值实际生产无关的各种投机和权力关系扭曲的存在，尽管剩余价值生产好像还对金融体系的过度膨胀有某种隐约的限制性权力。接下来的三个技术性章节主要由官方报告编成，很难从中看出马克思自己的观点，因此我并不在这里尝试综合或解释这些材料。最后一章关注前资本主义关系，对历史上以高利贷形式存在的信用做了有趣的描述，并提供了一些关于政治可能性的有挑战意味的看法。

一些关键的线索贯穿这些章节。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信用制度增强对“阶级的共有资本”的深远影响，正如他早在第22章和对商业资本的总体介绍中陈述的那样。无论怎么强调这种想法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它将货币资本循环看作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引导了实现总体资本再生产的资本流动。此外，它意味着一种资本的社会化——标志着资本特征的一些根本改变。例如，股份公司有利于集体、联合资本的出现，一方面允许了资本主义在规模、范围以及形式上的巨大扩展，另一方面为资本主义开辟了一条通往世界市场的道路，在世界市场里联合劳动和集体产权会得到更快的发展。马克思甚至认为股份公司会由于其联合的特性而成为向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基础。这个观点在现在看来即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便不是错误的，也是很奇怪的，但在他那个时代确实存在一些有趣的原因使人考虑这种可能性。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崛起所固有的积极和消极的可能性在法国银行家伊萨克·贝列拉身上有很好的体现，他具有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①因此，就让我稍微偏离一下话题来谈谈这种“有趣的性质”是什么（正如马克思在36章所做的）。

19世纪30年代，贝列拉兄弟（伊萨克和埃米尔）从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那里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并把一些乌托邦想法（尤其是关于联合资本力量的观点）在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付诸实践。根据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圣西门（1760—1825）“天才般的如百科全书一样的头脑”。②圣西门想要给国王提供建议，于是他给国王寄了很多书信，提出了改善集体生活的各种途径，以避免他所极度厌恶的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暴力变革。圣西门大概是最早提出欧盟之类想法的思想家之一。假如人们听从了他的建议，两次世界大战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他提出政府应该具有合理性和代表性，从而在仁慈的君主制度下可以通过立法保证所有阶级的利益。他还强调了将资本和劳动力（包括手工艺人和资本主义企业家）结合起来以建造有助于提高每个人福利的大规模（一定程度上是有计划的）项目和市政工程的重要性。为了使之变为现实，就需要将分散在社会中的以浪费形式存在的小量货币资本以联合的形式集中起来。

路易·拿破仑在1851年发动政变，次年登基，是圣西门思想的“粉丝”，有时被称为“骑在马背上的圣西门”。他通过兴办大型项目来调动1848年危机和革命运动后闲置的资本和劳动力。在这些项目中，贝列拉兄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创办了新型的信用机构，把无数分散的小额资本集合成圣西门所主张的联合资本，因此支配了第二帝国的金融体系。他们通过对信用纸币的控制，成为豪斯曼男爵重建和改造巴黎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大规模计划的关键参与者，以此吸收剩余资本和劳动力。他们热衷于建造住宅楼和百货商店，同时也垄断了公共设施(如煤气灯)和城市内部新的运输、通信事业。但是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繁荣，伴随着贝列拉兄弟和保守派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业之间传奇性的敌对竞争(左拉的小说《金钱》中有集中的描述)终于在1867年的金融崩溃中结束了。这次崩溃完全摧毁了贝列拉兄弟的投机信用帝国。马克思写以下内容的时候很可能考虑到了这一敌对关系：

> 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各个生产当事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①

罗斯柴尔德(犹太人)信仰金是货币基础的“天主教”，贝列拉兄弟(也是犹太人)则信仰纸币。崩溃发生的时候，纸币变得一文不值，而金不仅没有贬值，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诱人了。

对信用纸币和商品货币(如金)之间紧张关系的描述在这几章无处不在。马克思在后面论述贵金属和汇率的章节里才明确地阐述了这种关系。要是没有这方面的论述，那一章会显得相当散漫：

> 正是信用和银行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迫使所有货币资本为生产服务(也就是说，使所有货币收入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又在周期的一定阶段，使金属准备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它不再能执行它应该执行的职能。正是这种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引起了整个机体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这种过敏现象。①

金属准备保证银行券的兑现，因此担当着“整个信用制度枢纽的职能”。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构：

> 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我在第一册第3章论述支付手段时已经指出，信用主义转变为货币主义是必然的现象。……一定的、和总生产相比为数很少的金属量，竟被认为是制度的枢纽。因此，即便把金属在危机时期作为枢纽的这种特性的惊人例证撇开不说，这里也产生了美妙的理论上的二元论。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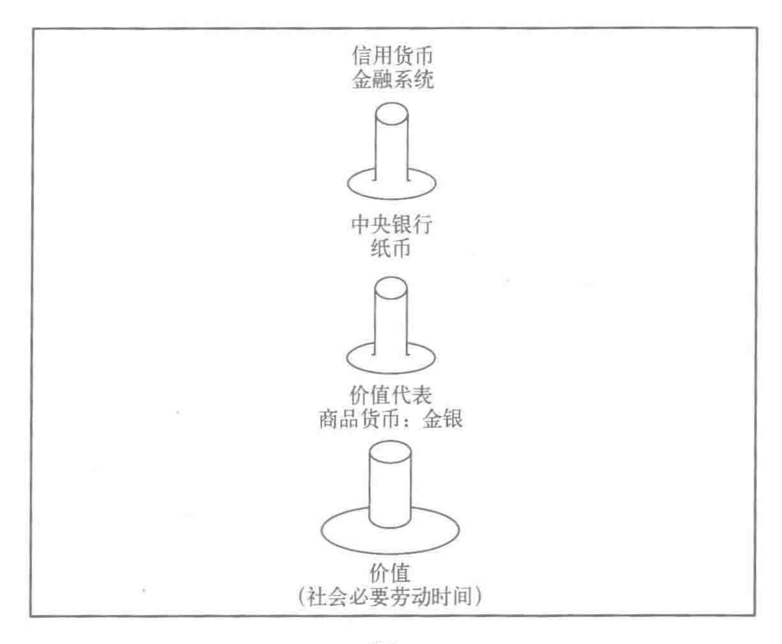


图3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48—6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尽管连全球信用和货币体系中徒有其表的金属或商品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被废除了(虽然所谓的主张回归金本位的人还很多)，全球金融体系枢纽(以美元为中心)的等级制结构设想貌似依旧是合适的。我们比马克思活着的时候更接近这样一种现实：

> 同样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和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像的东西。
>
> 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而应当能够满足这种巨大要求的全部金银，不过是银行地库里的几百万镑。①

马克思在前面已经更加充分地论述了这些关系："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商品相对立，或者说，交换价值必须在货币上取得独立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②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货币就是这种独立形式。那么当信用货币和信用业务取代了商品货币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第一，"在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会突然作为惟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同商品相对立。因此，商品会全面跌价，并且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货币，就是说，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它们自己的纯粹幻想的形式"。这里确切体现了拜物教理论。第二，"信用货币本身只有在它的名义价值额上绝对代表现实货币时，才是货币"。当金流向国外时，信用兑换成货币的可能性，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即它和现实的金的同一性，就成问题了。为了保证这种兑换的条件，就采取各种强制性的措施，提高利息率等等。……信用货币的贬值（更不用说它的只是幻想的货币资格的丧失）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①

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发生的事情吗？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努力去纠正的“不可避免的”的问题吗？

尽管“信用货币和‘真实’货币之间的紧张关系很久以来都是可辨认的”，但是

> 这种情况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表现得最为尖锐，并且以矛盾百出、荒唐可笑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1.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为直接的使用价值，为生产者本人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已经完全废止，因此，财富只是作为社会过程而存在，这个社会过程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错综交织；2. 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企图突破对财富及其运动的这个金属的限制，突破这个物质的同时又是幻想的限制，但又不断地在这个限制面前碰破头。②

因此，商品货币形式是生产扩张的一个障碍，这种障碍可以用信用货币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84—5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来克服或绕过。但是，有时信用货币的质量与可靠性只能由它们与商品货币的可交换性来证实。

有一件事对于所有的分析者(包括马克思)而言都是非常困难的，即要理解两方面的差别：一方面是财富在金融和信用制度内的循环，另一方面是“实际”财富的生产。华尔街和大街①之间的关系(或者用英国人的话说，城市和商业街之间的关系)使每个人都感到迷惑。目前关于如何对待欧元的争论对这种困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阐述。马克思认为，纯粹基于商品货币的货币体系将会成为资本进一步积累的障碍，这是因为金的数量满足不了需求。我们现在所谓的“金融抑制”是一个明显的、持续的危险，当货币(任何种类)的数量不足以支撑资本积累带来的持续扩大的商品量流通时，这种“金融抑制”就会出现。因此信用货币不但对资本主义的持续扩张是必需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有初步的证据表明(虽然据我所知还没有经验研究)资本积累的历史是和信用货币的积累以及与其共存的债务积累同步进行的。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资本才能“没有限制地”进行积累。但是如果资本积累取决于同时进行的信用货币和信用票据的积累，那么必定会产生一种基于信念、信任和预期且会周期性突然失控的拜物教信仰。信用货币不是简单地代替贵金属货币：他们会把货币体系和货币的概念带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上，会欢迎而不是揭穿在信用制度中所隐含的拜物教。信用“泡沫”，资产泡沫，以及投机性的繁荣和萧条都是资本为了将自己暂时地从货币—商品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然而，这些限制在危机阶段重现了。信用债务数量增加周期性地脱离了实际的价值生产量(无论怎么测量)；然后，商品货币(代表着价值)就通过金融危机消除了信用货币的狂热。正是硬通货的规则把华尔街和大街联系起来了。这就是货币基础中的“天主教义”。顺便一提，这个

① 大街(Main Street)，来自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同名小说。区别于华尔街(Wall Street)，代指中产阶级或普通民众。——译者

有关宗教的比喻反映了天主教会长期以来禁止利息的态度(这种立场在当代的伊斯兰教法律中仍然存在，天主教会也直到19世纪晚期才抛弃了这种立场)。马丁·路德有名的对邪恶的高利贷和“公道的”利息率的区分，是新教徒反抗罗马教廷的重要理论依据。

对信用制度至关重要的是，它具备冲破一切资本积累的货币障碍而无限制增长的能力。纸币(欠条)的创造会导致无限制的可能性。美国2001年之后的房地产泡沫就是这样出现的。价格在上升，每个人都从房价上涨中大赚一笔，而且他们赚得越多，价格就涨得越多。房子就像ATM机一样，没有提取的限制，直到人们意识到房地产的价格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他们收入的支付能力。房地产市场的崩溃接踵而来。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土地投机热潮破灭之后发生了相同的事情。当崩溃来临时，所有者(掌控着硬通货)的资产流动性才是最重要的。当人们发现流动性不足的时候，止赎、损失和资产贬值就越积越多。

那么这件事普遍的现代意义是什么?世界货币体系中的贵金属货币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被正式废除了。这也许看起来与马克思的思想并不相关。他不是说过“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吗?当然，金依旧扮演一个重要的残留角色。当对纸币和信用货币的信念发生严重的动摇时，金价会激涨，正如过去几年中发生的那样。少数人依旧感觉金是最保值的物品，有关投资金的广告非常多。也许投资金是对的(如果金价在未来五年内翻了三倍，那么我们将后悔没有投资)。但是在当代，要回到金本位是不太可能的。传统的观点认为这对持续扩张的世界贸易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会使世界陷入长期的萧条当中。世界经济依赖于信用经济，并且摆脱不了。

但是，如果整个货币体系中的贵金属“枢纽”消失了，那么什么会取代它成为枢纽呢?答案就是世界央行和国家监管当局两者的结合体(我把它称作“国家-金融联合体”)，它们共同形成了全球货币和信用制度的枢纽。对于马克思而言，这种枢纽就是英格兰银行，而对我们而言，

就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和世界其他央行及监管当局，比如英国、日本和欧盟的央行。然而它们的效果是，用人造的制度取代依赖于实际商品生产(金和银)的调节机制。人们的判断是信用创造的唯一规则。但是，人造的制度能正确发挥作用吗？我们必须转而关注央行的组织和调节，以及政策是如何由国家机构制定出来以应对信用制度的周期性过剩的。

如果央行和监管当局的建立是有问题的，或者如果他们按照某些错误的经济理论(如货币主义)去运行，那么政策就会深深影响危机的形成和克服。在很多人看来，央行政策加剧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如19世纪20年代温斯顿·丘吉尔担任财政部长时试图使英国回到金本位的决定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现在有些人说本·伯南克在美联储采取的政策完全使美国走错了方向，而艾伦·格林斯潘那些当时看起来极好的政策促成了2007—2008年毁灭性的经济崩溃。当然，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管制失灵影响了最近的几起事件，也有人鼓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危机的解决之道就在于建立一个更好的监管机制。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样的一个欧洲央行呢？它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唯一目标而不顾失业，它面对希腊债务危机时束手无策，仅仅推行紧缩政策使得希腊元气大伤并日益衰退。人造的制度是不可靠的，受制于各种社会势力和矛盾意见。他们创造了一个大不相同的调节机制，和商品货币依然作为枢纽时的央行相去甚远。

即便在马克思的时代，金融机构及其政策的不可靠性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马克思把“错误的”1844年英国银行法案作为最好的例子。这项立法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了“一个发行部和一个银行部”。[①]前一个部门持有政府债券和金属储备，以此为储备金发行银行券。该部门用银行券(对贸易极为便利)换取金，并承诺如果需要的话，银行可以“支付给持券者”金(在英国的银行券上，依旧可以找到答应支付给持券者的语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句)。因此，在任何时候，我拿着银行券去银行就可以换金。简而言之，银行券是可兑换的(停止兑现往往是那时候的政治选择，实际上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就曾经中止兑现金)。另一个部门则贴现票据，承兑支票，发行债券并参与其他传统的银行业务。1844 年的立法在银行的两部分之间创造了一堵防火墙。但是在 1848 年，一场信用危机打击了银行部。人们对已贴现商业票据和债券失去了信心，发生了银行挤兑。银行部用光了金，而发行部门却拥有大量的金：

> 但是，把银行分成两个独立的部门的办法，实际上使银行董事会不能在决定性时刻自由支配它可以支配的全部资金，因而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当发行部还有几百万镑金和 1 400 万镑担保品原封未动时，银行部却已经濒于破产了……这样，1844 年的银行立法就直接促使整个商业界在危机爆发时立即大量贮藏银行券，从而加速并加剧了危机；这个银行法由于在决定性时刻人为地增加了对贷款的需求……促使利息率在危机时期上升到空前的高度。①

这与 2011 年危机中希腊债券利息率发生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 所以，这个银行法并没有消除危机，反而使危机加剧了，以致达到了不是整个产业界必然破产，就是银行法必然破产的程度。危机曾两次(一次在 1847 年 10 月 25 日，一次在 1857 年 11 月 12 日)达到这个高度；当时政府暂停执行 1844 年的法令，解除了银行在发行银行券上所受的限制，而这个办法已经足以打破了两次危机。②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三卷，第 628—62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三卷，第 62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我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说1844年的银行法案是危机的起因：但是该法案的确加强、加速了其他原因（马克思没有说是什么）造成的危机。但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无法对不可避免的周期性危机作出恰当反应呢？这一定是欧洲央行在债务危机时一直被问到的基本问题。这次危机在2011年不仅“吞噬”了希腊，也“吞噬”了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马克思把1844年的银行法案描述为“错误的”，可以猜测他认为可能存在一个不会加剧危机的更好的法案。人类的信用和银行制度可能会被建设得足够灵活，以适应变化的产出、价格和（更重要的）投资者的情绪。但是存在一个能容纳促进危机形成的基本矛盾的金融制度吗？凯恩斯主义者的调控政策全赖于此。马克思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像1844—1845年那样不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这种货币危机。但是，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①

信用制度深深地根植于商品货币，但后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被彻底、正式地废除了（在30年代之后，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意中忽略了这一点吗？），这意味着什么呢？很难说马克思会支持当代的哪些转变。他肯定会更支持凯恩斯主义而不是货币主义（他多次批判了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但是我认为，他将永远不可能相信金融改革能够抑制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更不用说克服了。我认为仔细地阅读这些章节，你会支持这个观点。提出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随着对信用的分析，马克思似乎把他对资本的定义放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中。

在金融体系内发生的明显的、周期性的狂热引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容忍这种现象的发生？马克思的回答是非常清晰的。货币关系要适应资本积累的持续扩张，那么信用就是绝对必不可少的。由贵金属基础（以及可以兑换金的银行券）所形成的障碍一定要克服，因为金和银不仅不合适（因为它们相对于商品产出波动变化并不灵活），而且在根本上是不够的（由于储量的有限性）。此外，一切资本投资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都预期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都具有的投机性质必然会被嵌入到生息货币资本的循环流通中去。并且，正如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看到的，变幻莫测的不同周转时间（特别是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只能由一个活跃的信用制度来调节；从储备中释放的“非能动资本”在加速（而不是阻止）资本积累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贝列拉兄弟的做法就十分具有代表性。他们打破了货币基础的限制，让控制了大量金的保守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大惊失色。但是1867年的崩溃表明了贝列拉兄弟做法的弱点，因此似乎证明了罗斯柴尔德的（以及马克思的？）信念——金具有终极的力量。但是贝列拉兄弟在这十五年间成功吸收了剩余劳动力和资本，并且彻底改变了巴黎的建筑环境。当我们漫步在巴黎的林荫大道上，享受着公园、供水和下水道系统，欣赏着市中心的宏伟建筑时，至今仍感到震撼。贝列拉兄弟是空想家和冒险家，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他们拥有信念并且能把事情做好；而故步自封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则相反。

这引出了一些关于信念、信仰和心理学的有趣问题。左拉的小说《金钱》以萨加尔（贝列拉兄弟）和甘德曼（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第二帝国时期的斗争为中心，描写金融投机中人们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下面是萨加尔说的一番话，他想要说服他严肃、高尚、好沉思的侄女卡洛琳娜夫人，改变她瞧不起他的投机活动的想法：

> “看这儿，”萨加尔喊道，“你将会看到这些无人区和荒芜道路的彻底的复兴，我们的铁路将会穿过这些地方——是的！当我们把新的血液注入到这个体系的干涸的血管里时，土地将被清整，道路和运河将被建造起来，新的城市将会破土而出，生活也会好起来的。是的！这就是货币带来的奇迹……”
>
> “你一定要明白，投机、赌博就是核心，是心脏。是的，它从各个小支流中吸引、收集了血液，然后再在河流中把血液输送到各个方向，于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货币流通，这正是大企业的生命

所在。"

"投机——为什么是我们所必须经历的刺激物？因为投机是强迫我们生活、奋斗的永恒的欲望。没有了投机，噢我亲爱的朋友，什么类型的买卖都会没有……投机和爱情是一样的。相爱和投机都充满了肮脏；相爱时人们也仅仅考虑他们自己的喜悦；但是没有爱情就没有生命，那么世界就将终结。"①

读了这段文字，你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提到贝列拉时会说起他"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信用制度看上去是混乱和不受约束的，它酝酿投机热潮和周期性崩溃的能力不受限制。这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利息，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的话来说，属于特殊性，并且由其他特殊性调节(如果可能的话)——比如货币的供给和需求，还有不同资本派系之间的竞争。因此，利息注定是偶然、不受约束和失常的。利息也取决于信念。信念的心理学，正如凯恩斯后来极力强调的那样(左拉也有精彩的描述)，变得很重要。但是在马克思那里，问题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了出来。归结起来，就是要问：当资本和资本家受困于资本表面形式固有的拜物教时，他们将如何发挥作用？一旦在自己的拜物教迷宫里迷了路，资本家该怎样知道他们困境的根源，并找到出路呢？我怀疑这就是马克思这部分手稿的原标题《混乱》的含义。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深入地理解虚拟资本这个范畴，我们马上就会着手。

马克思还暗示了资本的过度生产和过度积累趋势(这就是他后来所提到的资本"过剩"，这种趋势在早期被看作是资本运动一般规律的基本特点)会触发信任危机，甚至是周期性破坏信用制度的信任危机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将货币基础的"天主教义"(实际价值是由商品货币即金银代

① Émile Zola, *Money* (Stroud, UK: Alan Sutton, translated by Ernest Vizetelly, 1991), 232.

表的)看作是投机热潮的最终抑制力。因此，虽然商品货币(贵金属)从代表价值的中介作用中解脱了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不太可能会同意把价值本身从资本运动规律的“仲裁者”的中心作用上移除。价值的非物质却客观的力量和信用制度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了最明显的理论问题。

马克思没有给出最后的答案，但他在这些章节里提供了一些洞见，为我们的分析奠定了基础。其中最主要的是虚拟资本和投机资本塑造(“扰乱”也许是个更好的词)实际的资本积累运动规律的作用。但是和马克思那时候一样，华尔街和大街之间的关系现在依旧是不清晰和有争议的。马克思提出正确和关键问题的直觉能力对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有帮助吗？当我们对单个章节进行深入研究时，记住这个问题是很有用的。然而，我将从讲述信用制度前史的第36章入手。

论第36章：信用制度的前史

“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我们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叫做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资本的洪水期前的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中。”①这一陈述与前面有些地方相对应。②要注意的是，生息资本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这和马克思偶尔重复的亚当·斯密的错误故事(从物物交换到货币经济最后到信用经济是一个自然的进化过程)是严重矛盾的。③商品化、货币以及劳动力的买卖都必须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正如我们在第二卷的第一章中所见到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甚至连生息资本也必须存在于其自身独特的生产方式产生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之前。

剩余货币(贮藏)一直存在也必然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剩余货币只有在货币所有者自身变成放款人时才能变成资本。这就要求货币可以作为资本去占有别人的劳动。①

"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和商人资本的发展，并且特别和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是联结在一起的。"②"在古代罗马，从共和国末期开始，虽然手工制造业还远远低于古代的平均发展水平，但商人资本，货币经营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却已经——在古代形式范围内——发展到了最高点。"③在商人资本那一章，马克思抱怨了经济学家的"混乱"，这些经济学家把货币和商人资本看作是生产的分支(如农业、工业和其他劳动分工)，而不是流通中的范畴。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高利贷有两种形式："第一，是对那些大肆挥霍的显贵，主要是对地主放的高利贷；第二是对那些自己拥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放的高利贷。这种小生产者包括手工业者，但主要是农民。"④因此，"一方面，高利贷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财富，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破坏和毁灭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⑤总之，这样就完成了第一卷中所描述的原始积累过程(虽然马克思在这里没有用这个术语)。在这个过程中，"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财产导致了不依赖于土地所有权的货币财产的形成"。⑥这就呼应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论点——货币(资本的"蝴蝶"形式)和商品具有最高的流动性，帮助商人资本取得了对封建地主的统治。

然而，大规模货币资本的集中能否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完全要取决于历史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情况”。①高利贷也许帮助削弱和摧毁了古代和封建的生产方式，但是其本身没有也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尽管高利贷集中了货币的力量，但“高利贷资本使这种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同时使这种悲惨的状态永久化，在这种悲惨的状态中，劳动的社会生产率不像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那样靠牺牲劳动本身而发展”。②它“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附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③

高利贷毁灭性的力量激起了公众的憎恶和许多强有力的制度的抵制，比如天主教会直到19世纪后期还禁止高利贷。这章的最后提到了马丁·路德区分高利贷和“公道的”的利率的主张——这是同罗马教廷决裂的新教改革的一个方面。马克思认为，

> “拿这个［高利贷者的］利息的水平和现代利息率的水平加以对比，是相当荒谬的，因为除了归国家所有的部分外，高利贷者的利息会占有全部的剩余价值，而现代的利息，至少是正常的利息，只是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在进行这种对比时，人们忘记了这样一点：雇佣工人为雇用他的资本家生产和提供利润、利息和地租，即全部剩余价值。”④

因此，作为资本主义下的生产者，劳动者不能成为债务奴隶。但是马克思有预见地指出，他们作为消费者可能成为债务奴隶⑤。马克思在这里极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4—6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为罕见地提及了工人作为消费者担负债务的可能性。

因此，“高利贷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用，只是因为它会破坏和瓦解这样一些所有制形式，正是在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础和它们以同一形式的不断再生产上建立着政治制度”，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他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和时候，高利贷才表现为形成新生产方式的手段之一；这一方面是由于封建主和小生产遭到毁灭，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条件集中为资本”。①马克思没有详细阐述这些“其他的条件”是什么，但是他谨慎地没有指定任何条件(比如生产力的革命或是在心理上对世界认识的根本转变)，意味着他已经考虑到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变的多种条件而不是作单一的解释，其中高利贷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信用制度是作为对高利贷的反作用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我们对这一点不要误解，决不要把它理解成像古代著作家、教父、路德或旧的社会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这一点所表示的，恰好就是生息资本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②这暗示了什么?

> “对于那些不是或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上进行借贷的个人、阶级或情况来说，生息资本都保持高利贷资本的形式。例如，在下列场合：或者出于个人的需要去到当铺进行借贷；或者是把钱借给那些享乐的富人，供他们挥霍浪费；或者借给那些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如小农民、手工业者等等，即自己仍然占有生产条件的直接生产者；最后，借给那些经营规模很小，接近于自食其力的生产者的资本主义生产者。”③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8—6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简而言之，我们认为高利贷行为会在资本主义中持续存在——从当代美国穷困的市中心(在那儿当铺是重要的金融机构)到无处不在的寄生在印第安农民身上的放债者。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息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区别在于“这种资本执行职能的条件已经变化”，从而“和货币贷出者相对立的借入者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得到贷款的人即使自己没有财产也会被看作是一个“潜在的资本家”。“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有能力和经营知识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成为资本家。”这看起来是经济辩护者所钦佩的事情，因为“这种情况虽然不断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优秀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①对于这种阶级关系的永恒存在来说，资本“白手起家”的神话可以有效地巩固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地位，同时使资产阶级得到更新和保持活力。因此缺乏向上的流动性(或是向上的流动性减小，正如美国近期那样)往往被看作是不利于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就现代信用制度促进了这种向上的流动性和灵活性来说，它也有积极的一面。

马克思随后简单地阐述了高利贷是如何被“驯服”的，即生息资本的流通如何从属于商业和产业资本，而不是相反。他认为12和14世纪在威尼斯和热那亚形成的信用合作社至关重要，随之而来的是17世纪以荷兰为中心的发展，“在荷兰，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业已经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而在发展的过程中，生息资本已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②

现在这已是经济史中的公论。熟悉乔万尼·阿里吉著作的人应该会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发现，他对金融化促进全球资本主义霸权转移——从意大利到荷兰，再到英国，然后到美国——的论述，和马克思有相似之处。但这仅仅是马克思全部论述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方面。关于威尼斯和热那亚，马克思写道：

> “如果说在这些城市共和国设立的真正的银行同时是使国家以未来的税收作为担保取得贷款的那种公共信用机关，那么，不应当忘记，设立这种组合的商人自己就是那些国家的第一流的人物，他们一心要使他们的政府和他们自己都摆脱高利贷的盘剥，从而更严格地更牢固地控制国家。”①

这表明“国家-金融联合体”(State-finance Nexus)对资本崛起为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至关重要。资本主义历史中这种国家-金融联合体的潜在重要性被低估了。现在有大量关于中世纪后期以来形成的所谓的“军事-财政国家”的文献，它们关注的焦点是中世纪后期的持续战争中国家力量和金融化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以及这种国家形式怎样成为创造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曾经模糊地暗示过这些条件)的重要代理人。对那些更偏向文学描写的人，我推荐你们看看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的历史小说《狼厅》，描写的是托马斯·克伦威尔的生活。托马斯·克伦威尔是亨利八世的财政顾问，在那个时期的国家和资本的融合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了，这部小说充斥着宫廷阴谋(从安妮·博林②的婚姻、死刑到托马斯·莫尔爵士③的死刑等等)；但是透过表象，我们能看出英国政府的性质通过重要的方式演变。在重要关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0—6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安妮·博林(Anne Boleyn)，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一世的生母。——译者

③ 托马斯·莫尔(St. Thomas More又作Sir Thomas More，1478—1535)，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著有《乌托邦》。——译者

头，最高的银行机构(现在是美联储)必须与解决货币问题的国家力量(现在是美国财政部)相结合，共同设计出能应对威胁国家和资本的危机的政策。到现在还是这样。这些共同政策必须同时处理商业债务和国家债务，并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雷曼兄弟宣布倒闭后，美国媒体报道最多的两个人是财长亨利·鲍尔森和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总统则没什么好说的，这绝非偶然。这便是现实中暴露出来并人格化了的“国家-金融联合体”，不过它还是更喜欢隐藏在暗处。欧元危机之所以愈演愈烈，正是因为这种国家-金融联合体还没有保持一致，没有在整个欧盟里发挥适当的作用。意大利和希腊任命了“技术专家”政府，丢弃了民主选举政府，表明“国家-金融联合体”要求走到台前直接进行统治。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现在似乎已经意识到，需要(很大程度上与他们自己主张的政治信仰相反)修改或重新商定欧洲宪法(并修正欧洲央行的权力)，以应对(也许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在威尼斯和热那亚很久之前就出现过的同样的问题。

即使如此，

> 这种反高利贷的激烈斗争，这种让生息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要求，只是这样一种有机创造物的先声，这种有机创造物以现代银行制度为形式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条件。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了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建立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①

在英国，金匠(在保持贵金属的垄断权力上他们有既得利益)和典当业者(反对英格兰银行，因为它的目的是加强公开货币市场的运作)都大肆咆哮着反对这种转变。“我们所发现的无非是这样一种要求：生息资本，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总之，可供借贷的生产资料，应该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它的一个条件。”马克思幽默地说道：“如果我们只是抓住这些著作中的词句，那么，这些著作同圣西门主义者的银行幻想和信用幻想一直到用语上的一致，往往会使我们感到吃惊。”①这使他对“圣西门宗教”和我前面详细谈到的贝列拉兄弟的作用做了一些评论。

> 但是，绝不要忘记，第一，货币——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第二，信用制度以社会生产资料(以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在私人手里的垄断为前提，所以，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②

马克思显然把话说得太死了，因为我们现在的货币体系就不是以贵金属为基础的。我们也许要用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列宁一个世纪前提出的目的论观点，即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采取的最高级也是最后的可能形式。虽然毫无疑问金融资本在一些历史阶段上变得更为突出，甚至拥有霸权地位，但是我认为资本各部分之间的力量均衡不会注定只向一个方向演变的。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处于这样一个阶段，货币和国家之间的“内在关系”已经变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很难想象一个可以从外部对金融化进行调控的国家力量。证据便是美国最近的多德-弗兰克金融管制改革法案。这个法案基本上是由银行家写的，不仅实施得不清不楚，而且每条每款都主要遵循了银行业游说集团的意志。但是，如果我的观点——国家-金融联合体在资本主义历史中发挥了长期的作用——是对的，那么这种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内在关系”不过是使资本回到了它的起源。那么，这究竟是意味着国家仅仅是资本的一种工具，还是意味着近年来国家和金融(注意，只是金融，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的融合已经变形成了某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东西？确实，债券持有人现在对国家政策的公开影响力似乎比以前更大了。但是我还记得哈罗德·威尔逊(20 世纪 60 年代的英国工党首相)曾经抱怨“苏黎世侏儒”决定其经济政策的力量，正如他让步于伦敦金融家的需求而牺牲英国生产资本的利益一样。这和比尔·克林顿著名的失意的感叹相同。在他的首次就职典礼前，克林顿对他的经济顾问们说：“你们的意思是说，我的经济政策和连任前景都要取决于一群该死的证券交易员的观点？”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的确如此！”我认为，我们对国家和金融的力量交织历史的了解，还没有精细到足以判断我们现在是否处在不同的处境的地步，尽管我们确定地知道金融管制和金融制度改革的问题现在已成为了国际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解决。

但是马克思特别讨论了信用制度内部的“内在力量”将把我们引向哪里。“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因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从而自在地，但仅仅也是自在的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叙述，但是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在其他地方会重复提起。“银行业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①]那么资本将走向何方？当然了，正是这个问题使伊萨克·贝列拉兼具“骗子和预言家”特征。

贝列拉“预言家”的一面对马克思来说很重要：

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三卷，第 68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与此相反,关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种种幻想所以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作为它的形式之一的信用制度完全没有认识。①

所以事情很快就清楚了:蒲鲁东认为无息贷款将是社会主义的灵丹妙药的想法是非常无知的。

马克思在这里想要表达的似乎是:高利贷在资本主义的崛起中发挥了重要的先驱(虽然是旧式的)作用,但要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它必须被彻底改造为货币市场的社会性和生息资本的循环,因此在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中生息资本注定要扮演先驱性的角色。然而,向社会主义的"有机转变"将依赖于许多其他的条件和因素。因此,这就留给了我们一组十分诱人的开放性问题:货币、银行和信用在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将起怎样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建立之后,它们又将扮演什么角色?

此外,在这一章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 我们已经知道,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资本的最古老形式。但是,生息资本自然而然在人们的观念中表现为真正的资本的形式。在商人资本中存在着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而不管把它说成是欺骗,是劳动,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相反,在生息资本中,资本自行再生产的性质,即自行增殖的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却纯粹表现为一种神秘的性质。②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因此一切都好似源于利息。结果便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的认识就完全错了。"生息资本能够也确实走了不会被剩余价值生产直接限制的道路。我们在后面虚拟资本那里再考察这些道路。但是在这里，马克思说：

> 把用于个人消费的房屋等等的租借也扯到这里来，那就更不恰当，更没有意义了。工人阶级也会受到这种形式的欺诈，甚至受到的欺诈是骇人听闻的，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但是，工人阶级也会受到供应他们生活资料的零售商人的欺诈。这是伴随着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直接进行的原有剥削的一种第二级剥削。①

马克思对这些"第二级"剥削不太敏感，不管它们有多么恶毒。此处是马克思罕有地提及第二级剥削的情况之一。这暗示着：对资产阶级整体而言，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缺口。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七

信用和银行系统的作用（第三卷 第27章开始）

那么，为什么信用对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必要的呢？在什么意义上能把金融部门的活动看作价值和（或）剩余价值的生产？第27章，马克思列举了许多金融部门发挥的重要作用。总结如下：

1. 它促进了货币资本在部门和产业之间的顺畅流动，这样利润率到处都被平均化了。马克思在此之前把信用的功能归为“阶级的共有资本”，我认为主要就是这个意思。资本的“蝴蝶”形式不停地移动，使不同产业、活动和地区的收益率标准化。

2. 它显著地减少了（a）流通费用——通过免除商品货币的使用，用纸币取代黄金和降低了为适应商品交换的波动而持有准备金（窖藏）的必要性，同时（b）减少周转时间（或者“加速商品形态变化的速度”和加速“货币流通的速度”）。这种流通的加速通常会延伸到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总之，它促进了资本的加速（周转时间的分析很清楚地表明了这点）。

3. 它允许股份公司的成立，使可能的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允许以前的政府职能私有化，并有助于集中资本（正如第一卷中提到的）。这意味着许多资本主义企业现在取得了和私有、个人相对立的社会特征。马克思有些令人惊讶地推断：“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它加强了这种转化——“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①

后一种转化会导致一系列后果。如果经理确实只获得监督工资，那么资本现在就表现为产权，这种产权是由谋求利息的纯粹的货币资本的所有权内生的，是“与一切在生产中实际进行活动的个人(从经理一直到最后一个短工)相对立的”。②剩余价值的生产表现为满足这种权利的一种纯粹手段。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资本家变成了其他人的货币资本的管理者：

> 在股份公司内，［生产］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③

不论什么时候，当“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这个概念被马克思提起时，它通常意味着某种进步的可能性。资本通过成立股份公司而获得的“社会化”表明它处于一种有潜力向不同方向演化的过渡状态。这对资本的运动规律如何运行产生了影响：

> 因为利润在这里纯粹采取利息的形式，所以那些仅仅提供利息的企业仍然可以存在；这是阻止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庞大得多的企业，不一定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④

保罗·博卡拉(Paul Boccara)，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家，认为这是这些年中阻碍利润率趋于下降的主要力量。投资于大规模基础设施的资本(不论是由国家还是股份公司融资)的确可以，而且一般也是以这种方式流通的——只要求利息，事实上补贴了其他地方的利润。个别资本家也可以选择租用他们的大部分不变资本(比如叉式升降车和其他形式的机械)，从而节约了大量不变资本的费用(对他们而言)。他们只支付了以商品形式借贷的资本的等值利息，而不是支付商品的全部价值(利息加利润)。

现在，固定资本的物理量(physical mass)嵌入建成环境(这个物理量证明了生产中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比率极大提高的观点)中，这种固定资本的绝大部分主要不是通过相关商品的直接买卖而是作为获取租金的生息资本进行循环。地租的榨取和生息资本流通(巨额的抵押贷款市场的存在就是绝好的例证)之间的关系就成为资本主义动态中的重要特征。这是一个马克思几乎没有涉及的话题(尽管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抵押贷款被定义为“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

但是更深层次的可能性是这样的。生产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引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①这是相当惊人的陈述。它意味着什么？这种转变不一定指向进步的方向：

> 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引起国家的干涉。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②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第二帝国时期巴黎风趣的评论者们说，资本和商业变成了“其他人的钱”，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这就是贝列拉兄弟构想的世界：圣西门的乌托邦成为反乌托邦。马克思指出的“金融贵族”在今天更加显要。

“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马克思认为这里涉及的社会化有巨大的潜在重要性。“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结果，“在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资本起源于节约的说法，也变成荒唐的了，因为那种人正是要求别人为他而节约”。①

告别节俭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兴起的韦伯式神话吧——“资本是本人劳动和节欲的果实”这一“幻想”破灭了②。它揭露了节欲论的谎言，破坏了利润作为资本家美德的回报的道德说教。资本家只是借他人的储蓄来赚钱。

> 在资本主义生产很不发达的阶段还有某种意义的各种观念，在这里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在这里，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行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①

总之，信用制度成为原始积累的当代形式的主要工具，我将这种原始积累的当代形式称作“掠夺式积累”。今天的金融贵族的财富有多少是通过金融体系的阴谋剥夺他人的财富（包括其他资本家）积累的呢?

但是以上论述存在一些深层次的不一致，马克思没有明确地阐述。他考察货币经营资本历史时要阐明的一般主题是，高利贷和利息必须被规训并服从于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特殊的产业资本循环的要求。然而这些段落意味着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完全不受控制，以致它现在反而以有害的、扭曲的方式威胁到资本和剩余价值生产的世界。它以掠夺式积累而不是在生产领域剥削劳动力为中心。它在经济中再次引入高利贷业务，尽管和很久以前的高利贷完全不同。这会威胁到资本积累的持续性吗？马克思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确实暗示了这种可能性。

这个问题似乎渗透到了随后的研究中。结果是一个有趣的分析式描述，对理解当前我们所处的全球状态及其金融矛盾是有帮助的。“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②这无疑是亚当·斯密声明他反对股份公司的基本理由——除了为大规模运输企业（比如运河）和公共设施融资外，否则它们就无法建成。信用制度的兴起清楚地表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99—5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会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总之，信用是使资本积累避开所有限制的主要手段，因为信用货币可以无限制地创造出来。马克思继续陈述：“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注意这里的目的论，但同时也要注意这里没有直接暗示新的生产方式可能是什么样的）。从这一立场来看，信用制度大大促进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信用制度“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①

所以“骗子”伊萨克·贝列拉预言的是什么？马克思提出一些积极的可能性。股份公司强调生产的社会化，于是出现了“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这种财富“仍然局限”在私人所有权的“资本主义界限之内”的“对立”。这种社会化可以得到解放吗？这种矛盾可以得到利用吗？马克思似乎这样认为：

>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①

如果没有工厂制度的兴起，这种强调合作和有组织的企业内部分工的合作工厂就不会出现，同时信用制度提供了

> 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②

这种积极的可能性被社会主义思想家反复提起，比如彼得·德鲁克关于“养老金社会主义”的评论，或更积极的鲁道夫·迈德纳(Rudolf Meidner)的计划——用工人的法人所有权逐渐取代资本主义，即用股票来支付工人的一部分工资，从而最终将现在雇用他们的企业的所有权授予工人。③虽然这种转变的希望继续不断涌现，但不幸的是，主要的历史趋势毫无疑问是相反的、消极的那种可能性。

这使我们想到了整个《资本论》三卷中不时地提到的观点——集体的、联合的劳动组成了建立反资本主义替代选择的基础。由于这里是马克思极少地实际上描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机制的几个地方之一，所以迫切需要做一些评论。马克思完成这一章的草稿后，恩格斯插入了几页来描述公司资本的力量的演化。可以推断出，恩格斯认为从这一切中建立任何进步事物的时机都早已过去了。恩格斯在其他地方写到，马克思非常尊敬圣西门的思想，即为了进步的目的运用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Peter Drucker, *The Unseen Revolution: How Pension Fund Socialism Came to Americ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76); Robin Blackburn, “Rudolf Meidner: A Visionary Pragmatist,” *Counterpunch*, December 22, 2005.

联合起来的资本的力量。在这里，马克思美化了这个思想，并提出了通过工人的协同控制来管理联合起来的资本的前景。尽管他承认这些工人合作社注定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许多缺点，但它们至少为通过合作运动和实践的传播来征服一个国家提供了一个依据。马克思似乎认为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曾经真实地存在过这种可能性，而恩格斯则似乎认为这一时机很快地消失了。但是即使在那时，这种可能性真的存在吗？

这一问题很重要，因为当代许多正在进行的运动相信这一时机已经再次来临了——通过接管工厂进行的生产的民主化，可选择的“团结经济”（Solidarity Economy）的发展，物物交换网络和其他合作形式——它们本身就是一条通向一个彻底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重建的道路。尽管许多参与者意识到，在合作社形式里，不仅自我剥削十分困难，而且不可避免地再生产出了他们寻求取代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很多缺陷，这条道路还是经常被描述为民主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唯一选择。似乎信用制度的兴起和资本社会化提供了合作社和工人控制可能兴盛的“自然”基础。然而，这里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中把所有信用集中于工人控制的国家手中的要求。

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时代中引人注目的例子——蒙德拉贡。它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成功了。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能生存下去部分是因为它在生产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流通间建立了联系。它有自己的信用和零售结构。股东之间的报酬差异是相当有限的，并且决策的制定是民主的。讽刺的是，左翼对蒙德拉贡的主要批评是它像公司和股份企业一样运作。因此，正如马克思直觉地感到的那样，在联合起来的资本（圣西门曾做过大量阐述）和可替代的合作起来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产生和生存）之间存在着潜在的连续性。如果地球被蒙德拉贡覆盖，如果工人控制的企业在阿根廷可以生存并扩散，即便它们必然再生产出资本主义形式的竞争和自我剥削，那么我们也将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且可能进步得多的世界里。马克思提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并将其描述为自我解体的矛盾时，说的是这个意思吗？这些

问题很有意思。

但是也有许多引人警戒的故事。前些年，皮奥里和萨贝尔写了一本颇有影响力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他们提出，弹性专业化和小批量生产的新劳动实践，为工人控制的小规模合作生产(如第三意大利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区所展示的)开辟了空间(和1848年存在的相似)；这种形式将打败公司主导的工厂生产形式，并提供转化到分散的社会主义的机制。① 皮奥里和萨贝尔发起了一场相当有效的运动(特别是在欧洲)来说服组织起来的工人放弃对新技术和新组织形式的敌意，让他们像拥护自由解放一样拥护弹性专业化(他们非常迷恋蒲鲁东的观点，当然这些观点是马克思不能容忍的)。皮奥里和萨贝尔没有意识到的是，弹性专业化促进了灵活积累下的恶意剥削的实践，而灵活积累居于新自由主义计划的核心。弹性专业化成为所有采用它的生产场所中规训和压制劳动力的主要手段。现在再没人亲切地说它能带来解放了。历史上很多事物看似蕴含着解放的可能性，结果却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支配性实践的回归，这的确很令人悲哀。所以，当心你自己的愿望。

论第三卷第28章：流通手段和资本

第28章主要辨析图克和其他认为货币作为资本和作为流通中的通货存在差别的人的观点。我不会在任何细节上检查马克思的批评(以及恩格斯的补充)。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更有意义的区别是货币被资本家用来购买用于生产的商品，还是被借来购买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这个区别是“收入的货币形式和资本的货币形式之间的区别”。②两种货币的使用都包含在产业资本的流通中。马克思有时把流入生产的信用称为“货币

① Michael Piore and Charles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资本”，与流向消费者支持市场中价值和剩余价值实现的“货币经营资本”相对立。

银行家能为生产提供借贷资本，为消费者提供用来购买已经生产出的产品的信用。比如，同一个银行家可以借钱给开发商建设住宅，同时借钱给用抵押贷款购买这些房屋的消费者。对支付手段的需求(消费者信贷)和对购买手段的需求(借贷资本)既不同步也不相等。但是任何一个的缺乏都会构成产业资本流通的障碍。尽管马克思没有提出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推断这种可能——在放松信贷和大量流动性过剩的条件下，关键商品(比如住房)的供给和需求都能创造投资“泡沫”，这恰恰是因为生息资本可以自由地流动，同时影响了供给和需求条件：“两个流通领域具有一种内在联系，因为一方面，待花费的收入的量表示消费的规模，另一方面，生产和商业上流通的资本量的大小，表示再生产过程的规模和速度。”①

在这里很多附属特征成为焦点，比如货币流通速度，以及信用制度在适应这些需求中的作用。很明显，信用可获得性的变动会产生周期性的波动——表面的繁荣，随后是实际的枯竭。马克思简略地指出了这种运动的货币和信用方面通常是如何运行的。我们在许多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上看见的——2005—2012年从美国到爱尔兰和西班牙——是资产泡沫的产生，随后是资金流在房价背离了收入后剧烈的崩溃。

论第三卷第29章：银行和虚拟资本问题

银行资本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流通的？这是第29章关注的问题。它引发了对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的讨论，马克思称之为“虚拟资本”。

银行资本自身包括“(1)现金，即金或银行券；(2)有价证券”。有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价证券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商业证券即汇票，它们是流动的，按时到期的，它们的贴现已经成为银行家的基本业务；另一部分是公共有价证券，如国债券，国库券，各种股票，总之，各种有息的而同汇票有本质差别的证券，包括地产抵押单"。①银行持有的资本可以分为银行家自己的和别人的存款——也就是，存款和储蓄，以及银行有权发行的其他票据。

马克思仔细考察了当银行资本为了利息的回报而借出时会发生什么。他指出，利息可以看作是任何收入流的等价物。如果利率是5%，那么"每一笔固定的二十五镑的年收入，都可以看作五百镑资本的利息"。但马克思评论这是一种"纯粹幻想的观念"。收入流的后面不一定要有任何实际的货币资本。比如，许多美国公民每月都会收到社会保险支票，但认为这笔货币流是某些国家持有的资本的利息的想法是一种幻觉。然而，社会保险接受者如果承诺把每年收到的二万五千美元交给银行，就可以获得五十万美元的货币资本来买房子。二万五千美元的年收入被资本化为五十万美元，即使社会保险金后面没有初始的货币资本量(只是国家提供每月收入的一种承诺，它以对工资征税的方式获得资金)。这使我们考虑马克思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虚拟资本。

"国家对借入资本每年要付给自己的债权人以一定量的利息。在这个场合，债权人不能向债务人宣布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他的债权，即他的所有权证书。资本本身已经由国家花掉了，耗费了。它已不再存在。"②比如，它已被花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上。

> 对于国家的债权人来说，1. 他持有一张比如说一百镑的国债券；2. 他靠这张国债券有权从国家的年收入即年税收中索取一定的金额，比如说五镑或5%；3. 他可以随意把这张一百镑的债券卖给别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人。如果利息率是5%，国家提供的保证又很可靠［现在希腊政府国债的情形就不是这样］，那么占有者A通常就能按一百镑把这张债券卖给B，因为对B来说，无论是把一百镑按年息5%借给别人，还是通过支付一百镑而从国家的年赋税中保证每年得到五镑，是完全一样的。**但在这一切场合，这种资本，即把国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资本，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①

所以这是马克思对虚拟资本最初的定义。马克思继续解释：“这不仅是说贷给国家的金额已经不再存在”，因为它已经被花掉了。“这个金额从来不是要作为资本支出的，不是要作为资本投下的，而只有作为资本投下，它才能转化为一个自行保存的价值。”换句话说，国家的行为没有产生剩余价值，尽管表面上似乎有额外的价值被生产出来，因为国家对它借的货币支付了利息（可能是其他地方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且，买卖国家债券的交易表明似乎原始资本是可以回收的（有时甚至会有额外利润，如果对债券的需求超过了供给）。但是“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一旦债券不能卖出，这个资本的假象就会消失。然而，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这种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②马克思提到的“独特的运动”是那种我们看到的股票和债券市场每天甚至每小时的价值波动。

生息资本因此表现为“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③当资产阶级理论家把工资流归于劳动者并且创造出物化在工人身上的虚拟资本时，这种颠倒错乱更显著地表现出来了。工人的价值就被计算为年工资的资本化价值。所以根据这个理论，如果工人投资教育和获得技能，人力资本价值就可以提高，他将以更高工资的形式得到回报。按照人力资本理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强调是作者加的。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工人是资本家！“资本家们思考方式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

这种非常实用的劳动观在我们扭曲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中居然成了支配性的观点。如果工人得到低工资，那是他们自己的错，据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努力地对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如果他们都正确地投资，那么每个人都会有更高的工资。然而现在，我们为什么能看见拥有博士学位的出租车司机？任何情形下，如果工人真的是资本家，他们就可以像普通的资本家一样能选择或为工资而工作，或干脆懒洋洋地躺在吊床上靠他们的资本的利息生活。

所有这些背后有一个简单却关键的原则，即资本化：“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式叫作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一个资本会提供的收益。”[①]这笔收益流的所有权证书可以按照这个资本化的价格交易。“因此，和资本的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②]

怎么强调这一论述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在第一卷，马克思评论说资本的概念使它看起来像是“会生金蛋的鹅”；而在这里我们看到，自我增殖过程的拜物教外观如何采取了虚拟资本这种特定形式，将自己隐藏在神秘中，即使它在债券、有价证券和其他市场中再真实不过了——在这些市场中不同收益和收入流的所有权被资本化并作为资本出售。

> 即使在债券——有价证券——不像国债那样代表纯粹幻想的资本的地方，这种证券的资本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我们上面已经讲过，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28—5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强调是作者加的

> 信用制度怎样产生出联合的资本。这种证券被当作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权证书。铁路、采矿、轮船等公司的股票代表现实资本，也就是代表在这些企业中投入的并执行职能的资本，或者说，代表股东所预付的、在这些企业中作为资本来用的货币额。这里决不排除股票也只是一种欺诈的东西。但是，这个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它只存在于后一种形式，股票不过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①

事实上，它是对可能产生剩余价值的未来劳动的索取权，其中的一部分是利息(对纯粹的所有权的回报)。

这些债券、股票与证券的市场当然是波动的："这些所有权证书的价值的独立运动，加深了这样一种假象，好像除了它们能够有权索取的资本或权益之外，它们还形成现实资本……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②价格可以依据未来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景而上升或下降。价格下跌和危机使资产价值贬值，但是"一旦风暴过去，这种证券就会回升到它们以前的水平"(假定它们是可行的而不是欺骗性的)。美国在2007年后住房资产价值损失巨大，五年后也没有丝毫恢复的迹象。但是，马克思很有先见之明地指出，这些资产价值在危机中的贬值"是货币财产集中的一个有力的手段"。或者，正如银行家安德鲁·梅隆③很久以前说的，"危机中资产回到它们恰当的主人那里"，也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29—5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on，1855—1937)，美国银行家，梅隆家族成员，曾任美国财政部部长。——译者

就是回到他那里。危机中财富和权力加速集中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2007—2012年的金融危机证实了这点）。

投机性运动不一定是有害的。“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不表示已经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一个国家就绝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裂而减少分文”。①这是因为

> 所有这些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在一切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都有巨额的所谓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moneyed capital）采取这种形式。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这种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的资本价值的积累。②

如果在马克思的时代就有这种“巨额”的资本流动，那么现在我们需要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描述它呢？

“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③这一点没有任何地方比银行系统自身表现得更明显了：

> 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在这里，不要忘记，银行家保险箱内的这些证券，即使是对收益的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可靠支取凭证(例如国债券)，或者是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例如股票)，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要求权，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要求权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此外，还要加上这种情况：这种虚拟的银行家资本，大部分并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资本，而是代表公众在他那里存入的资本——不论有利息，或者没有利息。①

对信用制度的综合观点——根据马克思的想法

是否存在某种途径，能将马克思关于信用制度作用的一般概念综合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让我们想象在某种称为信用制度的有限实体内，被银行家、经纪人、货币交易者等人持有的一大笔钱。信用制度的底部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之下是商品货币，特别是金和银。这些商品货币是价值的代表——价值基于世界市场上人类劳动的社会化。马克思假定货币体系是这种垂直的等级制结构。

在这个结构中，每一层在什么程度上受到其他层运行的规训呢？在一个紧密联系的体系中，信用制度的行为会受到价值要求的严密控制——通过中央银行和商品货币这些中介层。显然，马克思设想的是一个松散地联系的体系。信用业务是自主的，并独立于价值生产。信用制度内的业务也逃离了中央银行的控制，不论后者如何努力地想规训它们。中央银行的设计和行动可以与那些保存“真实价值”(正如商品货币所代表的)的要求不一致(马克思指出1844年银行法就是这样)。

但是在第一卷，马克思也指出了商品货币代表价值时的几种深层次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矛盾(例如：一种特殊的具体的使用价值，比如金，用来衡量抽象的、普遍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某种程度上劳动的社会化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价值关系是不稳定的。在这个等级制组织的货币体系中，从一层强加给另一层的规训的脉冲是无处不在的，但也是很不清晰的。我这么说的意思是，强烈的影响力在不同层间不停地渗透，但它们产生的信号通常是令人困惑的和矛盾的。

我认为，这是马克思将信用制度解释为“自主的”和“独立的”但仍包含在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之中的理由。我们前面已经遇到过“自主和独立但包含在”这种陈述，很明显在谈到货币和信用制度的枢纽时需要对它作出某种解释。我最喜欢的类比是它有点像青少年：一方面他们永远要求并声明他们独立和自主的权利，同时另一方面，他们的资金和法律保障锚定在家里，所以当事情出问题时他们就跑回家找妈妈和爸爸。某种程度上这看起来是一种恰当的类比，这是货币和信用制度发挥作用的总体方式，每一层枢纽都由永远喧闹的青少年构成，而顶层运行的“宇宙之王”则最为混乱。当体系坠毁时，他们都冲回到家中去找父母般的政府，希望得到救助，而政府作为一位宽容慈爱的家长，总是会救助他们。

在这个层级枢纽中，规训的影响显然不是单向的。对“疯狂”的信用上层建筑内的事件，人类劳动的社会化这一深层基础不会对其施加一些决定性——即使是隐约的控制力。商品货币(马克思解释为一种“永远”不能被超越的、根本的、难以克服的障碍)现在已经废除了，以支持一个没有约束的信用制度适应无止境的复合增长的要求。周期性地，信用制度和价值生产动态中的事件会创造压力，要求对中央银行和货币体系内的其他管制性力量进行彻底改革和重置。(我们现在正经历这一过程吗？)由于每一层都围绕下一层普遍存在的状况“轴转”(使用马克思的术语)，没有必要假定这些机械的枢纽有固定不变的形式。

但是，尤其是在危机时期，似乎有某种位于价值关系世界中的规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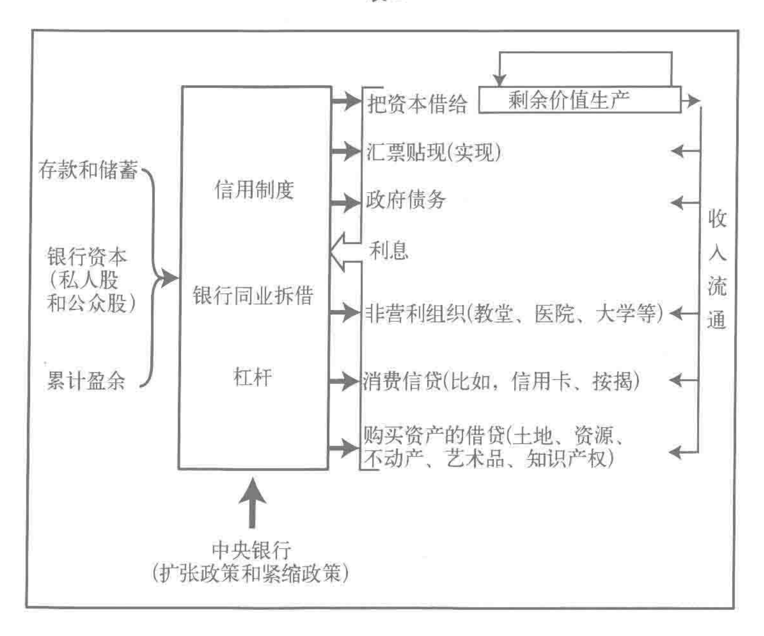
力量，恢复了体系的秩序。然而，马克思也承认，信用制度内的信任危机和预期危机，会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造成严重破坏。

马克思重建的货币和信用制度的等级制结构，大致就是如此。对于如何才能最好地理解它的作用，马克思似乎非常矛盾。在这儿没有清晰的理论引导我们。问题是要在给定的情形下弄清实际上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每一层似乎都构建得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商品货币构成了无止境的积累的限制性障碍。另一方面，它们对疯狂的投机活动和虚拟资本的流动施加了强有力的规训力量。商品货币的废除（我认为马克思绝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如果他曾经认为这在技术上可能的话）把无止境的资本积累从货币的锁链中解放出来，但这把规训信用的重担转移到不可靠的、有时反复无常的人类机构手中，比如中央银行。那么中央银行（和其他方面的国家管制机构）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不破坏剩余价值生产条件的情形下恢复信用制度内的秩序，而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尽管凯恩斯主义者继续幻想它的可能性）。等级制结构绝不可能是稳定的。

但是我们也需要更仔细地考察生息资本是如何横向地流通的。生息资本的“流”来自某个地方并分散到各种不同的渠道，其中只有一部分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有关。

处于信用制度内的货币资本家只是在某种很小的程度上使用自有资本经营。但是他们的货币权力主要来源于集中他人的剩余货币——这些人使用银行服务，要么将其作为资金转移的中介，要么作为存放（暂时地或长期地）闲置现金余额（不然会被贮藏）的安全场所，并以利息率作为回报。这些剩余货币来自各种类型的消费者，也来自我们在第二卷中看见的，需要贮藏货币来满足周转时间差异和固定资本投资与替换需要的资本家。银行靠利息差赚钱，比如，3%利率借入的货币，以5%的利率借出。通过这种方式，货币流向信用池中，可利用的信用规模不断增大。但是这样集中起来的货币最终流向哪里呢？

表2



借出的形式有多种：

1）借贷资本

货币借给生产者，用来购买从事剩余价值生产所需要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假定生产资本家借钱购买机器。这笔钱在机器的生命周期内和利息一起被偿还。因此借贷资本被消费了，并在消费后回到原来的所有者那里。这些借出的货币用来进行实际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其中没有任何虚拟的东西（尽管所有这种投资从定义来说无疑都具有投机性）。然而，当货币以发行股票的方式取得时，事情看起来有些不同。股票实际上是一种附属于纯粹的货币所有权的财产权。它实际上是对未来剩余价值生产的一个份额的法定索取权，并且没有终止日期，即使货币已经在生产性消费中用光了。股票在用它购买的机器已经摊销完或耗尽很长时间后都可以买卖。①股票价格依赖于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对未来剩余价值生产的预期。它的价值的运动受各种投机性力量的影响，并可以进行各种操纵，直至实施完全的欺诈。因此，股票与证券是一种虚拟资本的形式，但是它们的虚拟特征因为与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依然保持的宽松联系而得到缓解(用货币术语来说，企业收益支撑了股票价值)。然而，像安然那样的公司，虽然股票价格很高，并没有剩余价值被实际生产出来。它公布的收益是欺骗性的。

2）用于价值实现的借贷

货币可以被借出去实现已经生产出的商品的价值(甚至是还没生产出的，正如还没收割的农作物或将要建的房屋)。贴现率等同于那些将来某天到期的汇票的利息率。银行家提供货币来实现商品价值(以一定的贴现率)，并接收汇票，希望在它到期时实现全部价值。与这种做法同时进行的是商人的活动，他们也扮演了货币兑换商的角色。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不论这种活动对生产资本家平缓和缩短周转时间有多么的必要，总是有各种欺诈和行骗的机会。利用汇票开出的汇票的堆积本身就可以独立酝酿一场崩溃和商业危机，这场危机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发展到对资本流通和实现的条件产生深远影响的地步。用于实现商品价值的借贷(购买手段)可以与用于生产的借贷(支付手段)相结合，这样信用制度就可以同时控制给定商品(比如房屋)的供给和需求。所以很容易看到这样做是怎样经常引发资产泡沫的，比如大致发生在2000年后的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资产泡沫。

3）政府借贷和国债

政府可以凭借它获取收入(通过税费)的能力借到资本。它承诺将预期未来收益的一部分作为一笔资本的回报。政府债务的证书在借到的货币花光很久以后都能交易。大部分政府花费的货币与剩余价值生产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直接的关系(尽管它经常通过形成一个可行的市场而发展出间接的关系，比如，军事装备)。这是最卓越的虚拟资本。政府一般不

生产价值或剩余价值(例如，它维持君主制和打仗)。收入税被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利息支付，它可以被资本化为一个总额，从而作为对未来收入的索取权进行交易。政府支出的一些类别确实和剩余价值生产相关。存在政府运营的企业(这些企业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很重要，直到大约1980年后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浪潮的兴起，但它们在中国仍然很重要)。尽管这些企业不一定要获得利润，但它们以更低的成本向其他企业提供投入，这影响了整体的利润率。政府也投资于生产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公路、公共设施、排污和供水等等)。它可以提供这些不变资本投入，只要求利息作为回报，因此有助于缓解任何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比如，债务融资的“生产性政府支出”这个范畴早在豪斯曼男爵重建第二帝国巴黎的基础设施时就变得极为重要了。但是大多数的政府债务是纯粹虚拟的。

4）非营利组织的借贷

包括私立医院、大学、教堂、博物馆和各类文化机构。对它们的借贷属于虚拟资本的范畴，因为他们多半不生产价值或剩余价值(尽管一些大学和医院的分支机构通过创新和研究直接涉及剩余价值生产)。用于支付借贷利息的收入有各种来源，但在我们的时代主要是依靠使用费和捐赠。

5）消费者信贷

迄今为止，美国最重要的消费者信贷形式是房地产抵押贷款，马克思明确将其列为虚拟资本形式的一种。美国的抵押贷款市场在2007年达到顶峰，总计为十四万亿美元(相比之下，那一年总的GDP大约为十五万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支付利息的收入流来自工资、薪金和政府再分配。房屋一般不用于价值或剩余价值生产，因此按揭贷款属于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当然，如果我把房子变为血汗工厂，它就成了生产中的固定资本。尽管家中没有发生直接的价值或剩余价值生产，家务劳动在确

定劳动力价值方面的作用显著影响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消费者信贷现在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它在管理经济中的总需求和为“第二级的剥削形式”提供充足机会中起了关键作用。马克思偶尔承认这种“第二级的剥削形式”，但一般将其作为边缘形式而不考虑。

6）为了取得和购买资产及其他索取收入的纸质证书而进行的借贷（比如自然资源的特许权、专利、土地和房产的租金）

资产市场（从艺术投资到土地和资源买卖的所有事物）的扩散已经成为近来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显著特征。大量过剩的货币经营资本涌向这些市场。

银行家一般不歧视（尽管他们可能会专门化）这些不同的借贷选择。他们的资本会流向任何需求、回报率和安全性最有利的地方，以及任何未来前景看起来最光明的地方。预期——对未来的信念——在这些市场的运转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也存在这种可能，即一些投资可能性被其他需求（和预期）更高的投资所“挤出”。（这是常见的对大规模政府借贷或资产泡沫的批评：它们挤出了对生产性活动的投资并增加了其他投资活动的利息成本。）信用制度通常不歧视不同形式的投资，当然也不歧视纯粹虚拟的投资，部分虚拟的投资（至少与剩余价值生产存在松散的联系），以及作为借贷（货币）资本直接参与产业资本循环的投资。在生息货币资本的流动中，不平衡会频繁发生。恰恰因为这些资本是独立的、自主的，它们可以影响总体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运动规律，同时自己周期性地单独酝酿一场危机。例如，如果大量过剩的货币经营资本流入土地和房地产市场（正如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以及2000年后的美国、西班牙、爱尔兰等国的情况），那么，就会造成信用流通的巨大扭曲和资产价值的投机性繁荣，直到崩溃发生并进行强制纠正。

如果我们从多种视角来观察这些信贷流通，很明显，银行业和信贷阶层（马克思偶尔称其为“阶级”）在维持、扩张（如果可能的话）虚拟资

本流通的不同市场方面有很强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如果渠道相对容易操纵和利用的话。例如，即使在泡沫状况还不明显的时候，美国采取了许多措施把信用扩张到房屋所有权。这是资本从一般消费者，特别是从劳动者那里重获财富的主要方式。

与生产性相反的榨取性活动长期主导了这些信用市场。在银行体系内，面向剩余价值生产的借贷活动、剩余价值实现的借贷活动以及借给虚拟资本市场的活动之间并没有防火墙。根据自身利益经营的货币资本家，在信号与剩余价值生产的需求脱节的市场中所做的个人决策在总体上可能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不稳定和周期性危机来源于信用制度内部。

货币资本、现实资本和产业周期

我不打算对货币和信用相关的其他章节做任何研读或解释。但是一些提出来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特别是在第30和31章中。

尽管显然被货币、银行和信用世界的易变性与投机的不安全特征所困惑，马克思力图理解发生在他身边的周期性繁荣和萧条背后的逻辑(如果有的话)。很明显它们成为了资本再生产的主要威胁，并强制流通中的大量资本周期性贬值。第二卷中强调的资本流通过程的连续性显然经常遭到破坏，这种破坏在第二卷中假定为可能的但没有详细说明。

经常出现在第三卷这些章节中的问题是：考虑到产业资本流通易于发生矛盾的性质，为什么流通过程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和必然的？金融体系“疯狂”和“颠倒错乱”的方面对资本运动规律的整体影响可能是什么？比如，什么程度上货币资本的积累是

> 资本的现实积累的标志，即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标志，又在什么程度上不是这种标志呢？所谓资本过剩(plethora)，一个始终只用于生息资本即货币资本的用语，仅仅是表现产业生产过剩的一个特殊方式呢，还是除此以外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现象呢？这种过剩即货币资

本的供给过剩，是否与停滞的货币总量（金银条块、金币和银行券）的存在相一致，从而现实货币的这种过剩，是否就是借贷资本的上述过剩的反映和表现形式呢？①

用当代的说法，当世界"充斥着过剩的流动性"（正如IMF在2008年危机爆发前经常声称的那样）时，这一信号是现实资本的过度积累呢，还是单纯的作为潜在借贷资本的货币的过剩呢？相反地，"货币紧迫，即借贷资本不足，又在什么程度上反映出现实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不足呢？"或者它仅仅意味着"流通手段的不足？"②

再一次用当代的说法，货币供给收缩和银行间信贷的冻结是由中央银行和国家权力机关施加的金融收缩的信号吗？还是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的信号？

这背后有一个更一般的问题：债务的积累和财富的积累在什么程度上是有关联的？这是虚拟资本形式的增殖所提出的问题。比如，"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有"。因此，"连债务积累也能表现为资本积累"。③但是，像往常一样，"表现"这个词标志着在拜物教面具的背后很可能有别的事情正在发生。发生了什么呢？问题是国债（虚拟资本）积累可以转化为实际的货币资本，从而使虚拟资本变成现实资本。但这假定了国债是可以交易的。这反过来意味着虚拟资本继续和以前一样流通。股票和有价证券也是如此，它们是"不存在的资本的名义代表"：

当这些证券的积累表示铁路、矿山、汽船等等的积累时，它们也表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示现实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就像动产征税单的扩大表示这种动产的增加一样。但是，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①

在当代我们恰好有许多相关的例子：为了得到足够的创业资本，许多人在房地产市场繁荣时期对他们的房子的按揭进行再融资，只有在危机后才发现他们取出并变成投资资本的虚拟资本不再存在，而且他们现在在房子上的欠债高于房子的市场价格。但是如果在此期间他们的创业很成功，那么他们可能已经收回了足够的利润以补偿早先从虚拟资本(现在已经被拆穿)到现实货币资本的转换。许多人在房地产按揭市场从事虚拟资本的欺骗交易后变得极为富有，他们已经把欺骗性的索取权变为现实的货币权力。

这凸显了马克思如何以关联的、流动的方式使用范畴。以同样的方式，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通过用途的变化，可以在一夜之间由固定资本转为流动资本或消费基金的一部分，所以某一时刻是虚拟资本的东西可以瞬间转化为另一时点的现实的货币权力(对资本或消费的)。当按揭贷款打包成为债务抵押债券时，它们似乎以过去的两倍的虚拟状态存在；但是当对冲基金经理把它们卖给毫不怀疑的、轻信的投资者并出色地赚了十亿时，很遗憾，他获得了一点都不虚幻的实际货币权力。

对这种形式的财富积累的阶级后果，马克思有一些非常敏锐和尖刻的言论：

> 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40—5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博已经取代劳动，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并且也取代了直接的暴力……这种想象的货币财产，不仅构成私人货币财产的很大的部分，并且正如我们讲过的，也构成银行家资本的很大的部分。
>
> ……整个信用制度的惊人的扩大，总之，全部信用，都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这些人总是以货币的形式或对货币的直接索取权的形式占有资本和收入。这类人的财产的积累，可以按极不同于现实积累的方向进行，但是无论如何都证明，他们攫取了现实积累的很大一部分。①

这些资本家的“阶级”行为——用“他人的钱”进行欺诈和投机式的欺骗，甚至剥削其他产业资本家——在这些章节中遭到猛烈的抨击。可是尽管它的阶级后果能够直白地观察到，但很难阐明总财富的创造以及基于剩余价值生产的资本运动规律发生了什么变化。②

接下来的段落中，马克思试图揭示信用制度功能的发挥可能存在的内外部限制，特别是在资本家相互提供的商业信用方面。这些限制来源于“产业资本家和商人的财富”以及贷款多快能回流。由于“市场会扩大，并且会远离生产点”，因而“信用必须延长”，这反过来意味着“投机的要素必然越来越支配交易”。“大规模的供应远地市场的生产”使信用“必不可少”。的确，信用“的数量会随着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大而延长”。③马克思认为这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信用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商业在地理范围上的扩张要求信用制度的扩张。这样，全球空间关系的生产和彻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41—5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44—5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底变革就与信用制度的发展紧密相连。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话来说，信用制度是促使资本“以时间消灭空间”的主要手段。

但是马克思在这些章节试图理解的中心问题是信用在推动产业(或商业)周期的繁荣和萧条中所起的作用。这是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发展的明显特征，并且大致持续十年。(1836—1837年，1847—1848年以及1857年都是引人注目的高潮/崩溃年代。)马克思并没有根据自己对资本运动一般规律的理解，提供一个阐述这些波动的前后一致的理论，虽然他确实把货币资本的周期性“过剩”和在第三卷前几章阐述的资本过度积累理论联系起来了。但是他的确提供了对产业周期典型路径的一般性描述，阐明了货币资本的需求和供给以及货币资本家(银行家和其他中介)的特殊活动和日常工作是如何影响周期的路径的。他也关注了货币和信用体系内的不同“枢纽”(中央银行政策及商品货币的角色)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以一个略微不同的观点结束危机理论，因为马克思揭露的细节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潜在矛盾。

马克思几次试图描述周期。在我看来，最好的描述在第546—547页，我能做的最好的就是把它复制在这里：

> 只要再生产过程顺畅地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障，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产业资本就会过剩，不过这种过剩是在产业资本不能执行自己的各种职能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有大量的商品资本，但卖不出去。有大量的固定资本，但由于再生产停滞，大部分闲置不用。

这如实地重复了第二卷开篇章节中识别的可能会发生中断的点。接着就提出了货币循环内发生了什么的问题。一般的模式大概是这样的：“一旦新的危机爆发，信用突然停止，支付停滞，再生产过程瘫痪……在借

贷资本几乎绝对缺乏的同时，闲置的产业资本发生过剩。”①所有这些相当准确地描述了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后的有关状况。

借贷资本的积累可以从正常资本的积累中“沉淀下来”。“在现实积累不断扩大时，货币资本积累的这种扩大，一部分是这种现实积累扩大的结果，一部分是各种和现实积累的扩大相伴随但和它完全不同的要素造成的结果”②——比如，生产性公司的股票和证券价值上升——“一部分甚至是现实积累停滞的结果”——过剩商品没有卖出去，但是它的贴现价值通过汇票实现了。但“这种积累可以表示各种和现实积累很不相同的要素”——比如，资本化后上升的资产价值、政府虚拟资本的形成或消费信贷。总结果就是“在周期的一定阶段出现货币资本的过剩”。③

随后信用就收缩，“(1) 因为这种资本闲置不用；(2) 因为再生产过程顺畅进行的信念已经遭到破坏；(3) 因为对这种商业信用的需求已经减少。”④信用的缺乏使得

> 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在危机中，因为每个人都要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所以，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停滞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地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作为商品充斥市场。因此，如果把这种情况归因于生产资本的缺乏，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好在这个时候，生产资本是过剩了，无论就正常的、但是暂时紧缩的再生产规模来说，还是就已经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46—5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萎缩的消费来说，都是如此①。

过剩资本的作用，以及找到有利可图的手段来吸收这些过剩资本的问题，在这里有力地提出来了。通过提及“萎缩的消费”，马克思回应了第二卷中一个逐渐变得关键的主题。在这里，他建立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描述了周期性运动中阶级之间的动态关系。

“我们假定整个社会只是由产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构成”——撇开其他所有特征，比如价格波动和信用制度所助长的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这样，

> 危机好像只能由各个不同部门生产的不平衡，由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他们的积累之间的不平衡来说明。然而实际情况是，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而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时才能被雇佣。**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②

这当然是最有名的论断之一(第二卷第351页也有)，和利润率下降是“现代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规律”这一断言一样，也需要结合上下文语境来理解。对产业周期的研究表明，这两种陈述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对立。由于群众消费受到限制，利润率在短期内可能会下降。这和第三卷前面章节中通常用来解释利润率下降的机制是非常不同的。但是解雇工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47—5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强调是作者加的。

人会减少市场需求，使得商品卖不出去和生产能力闲置，从而诱发资本家减少工资并解雇更多的工人。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产业周期中这种螺旋式下跌的可能性。这是否形成了一个长期趋势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信用制度允许资本摆脱这种直接的消费限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的。“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不顾消费界限”。①在大约1980年以后的工资压制的新自由主义时期，私人消费主要是通过扩展消费信贷来维持的。

马克思也观察到这种螺旋式下降在信用的帮助下如何可能反转过来。大量的闲置借贷和货币资本——伴随着低利率——在危机后形成，并成为复苏的关键。“在危机以后的复苏时期，人们要求借贷资本，却是为了购买，为了把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或商业资本。所以，这时，要求借贷资本的，或者是产业资本家，或者是商人，产业资本家把借贷资本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②低利率使对固定资本的长期投资和开启全新的事业看上去更有吸引力。③在扩张的初始阶段利率通常维持在较低水平，这时宽松信贷发挥着其最具有建设性的作用，而这有助于进一步的扩张和世界市场的一体化，正如我们所见的。

接着马克思致力于考察他的论证在各个方面的最终形式是什么。这一论证依赖于对周期性和暂时性的形式的描述，这一形式不可避免地产生于与固有的过度积累和过度扩张趋势相关的信用制度的调解作用。我在这所能做的最好的就是详细地引用他的原话。在他第一次试图解释周期性运动如何开展时，马克思写道：

> 如果再生产过程再一次达到过度紧张状态以前的那种繁荣局面，商业信用就会大大扩张，这种扩张实际上又是资本容易流回和生产扩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大的“健全”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利息率虽然已经高于最低限度，但是仍然很低……由于资本回流容易并且具有规则性，加上商业信用扩大，这就保证了借贷资本的供给（虽然需求已经增长），防止了利息率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到这时，没有准备资本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资本而完全依靠货币信用进行操作的冒险家们，才引人注目地涌现出来。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固定资本的显著扩大和新型大企业的大批开张。现在，利息提高到它的平均水平。一旦新的危机爆发，信用突然停止，支付停滞，再生产过程瘫痪……在借贷资本几乎绝对缺乏的同时，闲置的产业资本发生过剩……这种产业周期的情况是，同样的循环一旦受到最初的推动，就必然会周期地再现出来。①

当然，马克思在这里假设，并不存在通过政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矫正这些连续发生的事件的企图，虽然他确实认为“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这整个过程都被概括在一个段落中，这一段非常重要，因为它说明了与过度积累趋势相关的信用与其货币基础之间的张力是如何失去作用的：

>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53—5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投机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这种强行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全部人为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并且，在这里，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在这个纸券的世界里，在任何地方显现出来的都不是现实价格和它的现实要素，而只是金银条块、硬币、银行券、汇票、有价证券。在全国金融中心，例如伦敦，这种颠倒表现得尤为明显。全部过程都变为不可理解。①

最后，马克思转向考虑这些周期性的推动力是如何采取地理形式的。例如，关于进口和出口，

一切国家都会先后卷入危机……那时就会发现，一切国家，除了少数例外，出口和进口过多，以致**支付差额对一切国家来说都是逆差**，所以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支付差额的方面。例如英国正苦于金的流出。它进口过多。但同时，所有别的国家堆积着过多的英国商品。所以它们也进口过多或被输入过多。②

信用改变了这幅景象，但没有改变根本问题：

危机也许首先是在英国，在这个提供信用最多而接受信用最少的国家爆发，因为支付差额……**对它来说是逆差**，尽管总的贸易额**对它**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来说是顺差。……在英国以金的流出作为开端并且伴随着这种流出而发生的崩溃，使英国的支付差额所以得到结清，部分地是由于英国进口商人宣告破产……部分地是由于在国外廉价抛售一部分英国商品资本，部分地是由于出售外国有价证券，买进英国有价证券等等。现在轮到另一个国家了。……1857年，美国爆发了危机。于是金从英国流到美国。但是美国物价的涨风一停止，危机接着就在英国发生了。金又由美国流到英国。英国和大陆之间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普遍危机的时刻，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的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是像排炮一样，按照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①

这种地理上的运动在2007—2008年美国危机爆发后十分明显，随后危机就传到了世界上不同的地方。这的确"像排炮一样"，尽管很难预测危机接下来会在哪里发生。我在其他地方提到过，资本永远解决不了危机趋势：它只是转移危机，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从世界的这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在马克思看来，"这个现象的普遍性恰好证明：（1）金的流出只是危机的现象，而不是危机的原因（2）金的流出现象在不同各国发生的顺序只是表明，什么时候会轮到这些国家算总账，什么时候会轮到这些国家发生危机……"②尽管马克思强调了普遍性，但这种集中于"金的流出"的连续发生的事件只是现在危机采取的一种可能的地理形式。在我们的时代，特别的是迅速增长的主权债务，比如希腊——部分产生于希腊为支付德国生产的商品而向德国和法国银行进行的过量借贷。欧元的创造促进了这个过程。欧元使更有效率的生产者（德国）受益，而破坏了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56—5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南欧低效率的经济体的生产。结果是德国和法国银行持有的虚拟资本价值受到威胁，这反过来威胁到法国的主权债务，甚至最终威胁到德国，除非整个欧元区协调行动。结果证明在欧洲中央银行的“错误”章程下，协调行动特别困难。排炮，确实如此。

所有这些与信用市场相关的运动是容易察觉的。但是马克思不相信这些运动是危机的根源。根源在于资本过度积累的基本倾向和独立自主产生的过剩货币资本这两者的结合，而后者是出于自身利益堆积起来的。回想一下，

> 仅仅由于这些和现实积累相独立、但和它相伴随的要素扩大了借贷资本的积累，就总会在周期的一定阶段出现货币资本的过剩；并且这种过剩会随着信用的发达而发展。因此，驱使生产过程突破资本主义界限的必然性，同时也一定会随着这种过剩而发展，也就是产生贸易过剩，生产过剩，信用过剩。同时，这种现象必然总是在引起反作用的各种形式上出现。①

我通常将这些组合称为“过剩资本的处置问题”。资本过剩的趋势，特别是货币形式的资本过剩的趋势，是所有危机的根源——这个论点值得探究。过剩资本很容易被吸收到虚拟资本形成和流通的通道这个事实，成为既不能逃避也不能压制的中心问题——考虑到资本的货币形式在货币资本家的绝对权力的支持下，在克服贮藏的必要性上发挥的积极作用。

从第二卷到第三卷，再从第三卷返回第二卷：一个总结性评论

马克思一生经历了两次主要危机，作为一名活跃的学者和社会活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的参与者，如果他只追求完整地陈述资本纯粹状态下的运动规律，而找不到用这些规律的知识来剖析这两次危机的方法，就十分可笑了。1847—1848年以及1857年的金融和商业危机迫切需要充分的解释(1873年的危机也是如此，尽管那时马克思大部分的理论著述都滞后于他的解释)。因此，把第三卷中的材料理解为第二卷分析的继续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因为只有在这些有关金融的章节中这几次危机才被认真地解释了。这迫使马克思抛弃了第二卷中明显存在的严格(很大程度上是死板的)的自我限制，以揭示这些危机年代中显著困扰金融和商业世界的拜物教和谎言、愚蠢和疯狂。因此，第三卷的大部分语言和第二卷克制的、技术的语言有根本的不同。从非专业读者的角度看，似乎马克思把他自己从支配第二卷的枯燥的、科学的限制中解放了出来。比如，通过再次运用拜物教这个概念，他使自己更加接近了资本表面状况的动荡不安和它们对未来转变所拥有的消极和积极的多重潜力。

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它和写作的年代是不一致的。第二卷的大部分内容是在完成第三卷的草稿后写的。因此，为什么马克思在写完关于商人资本和金融的激动人心和十分迷人的(尽管令人沮丧的是它不完整，而且有时前后不一致)材料后，在第二卷的论证中又回到枯燥的、技术性的叙述风格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最终的答案，也不能说自己有什么权威见解。但确实有一个我比较赞同的理论。马克思当然知道他需要弄清1847—1848年和1857年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和我们需要弄清2007—2012年发生了什么类似)。马克思对这些危机的研究表明，事件本身以及当时的评论家对它们的解释充斥着如此之多的拜物教式的理解。这就提出了在马克思逐渐形成了对资本运动规律的理解的背景下，理解投机经营特别是虚拟资本显而易见的颠倒错乱的问题。马克思从没被他遇到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拜物教所阻止。相反，他非常期待能揭露它们所隐藏的东西。他典型的回应是深入挖掘来揭示支撑它们的必要性和矛盾。他相信这样做，就有可能更好地理解所有表面上的动荡和所有明显的矛盾，而

这些动荡和矛盾是金融和信用世界以及与它们相关的危机的特征。

在这个背景下，他回到第二卷中资本内在本性的问题就说得通了。马克思寻找的是这种内在本性的某种 X 射线，它能说明信用制度充满矛盾的颠倒错乱现象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必然产生。为什么资本根本的、潜在的矛盾总是采取金融和商业危机的形式呢？为了揭示所有问题的答案，他在第二卷研究资本积累与流通时抛开了信用制度和生息资本的流通，以便于理解为什么资本的流通和积累必然要求信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资本来发挥作用。总之，从第二卷中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资本在缺乏信用制度时无法生存，为什么财富积累和债务积累必然是同步进行的，以及在一个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体系里，为什么价值和它的货币表现之间的中心矛盾内化为供给和需求永远不会也必然不会相等的矛盾。在我看来，上面从第三卷第 554 页引用的冗长段落，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亚当·斯密认为银行业和金融是非生产性的活动。第三卷的解释使人倾向于相信马克思同意以下判断：由于严重背离了(如果不是一种有害的赋税的话)实际的财富和价值生产，货币资本的寄生性赘生物和金融体系内表现出的颠倒错乱的程度应该受到自我谴责。我们时代流行的看法也倾向于这个观点。这立即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容许这些呢？然而，第二卷阐明了信用的绝对必要性——不仅促进了价值生产，而且也增强了直接创造和捕获剩余价值的能力。类比第一卷中机器的作用，对我们在这里的理解有些帮助。机器是不变(通常还是固定的)资本，因此不生产价值。接着马克思继续阐明它如何成为个别资本家(我先进的技术为我生产了超额利润)和整个资本家阶级(生产工资商品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并扩大了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相对剩余价值的一个来源。同样地，信用自身不生产价值，但它有助于生产的巨大扩张和剩余价值的实现，比如，通过减少贮藏必要性的方式。

贮藏问题实际上非常重要。通过对第二卷的研究，下面的内容变得十分明显：在缺少信用制度的情况下，如此多的资本需要被贮藏起来，

以满足从固定资本流通到周转时间差异等问题的需要，以至于资本积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而在最差的情况下会不断恶化直到慢慢停止。当然，从贮藏中释放出来的货币能否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货币资本，还依赖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可获得性，以及所有资本循环所需要的其他条件(包括有效需求的活力)。但是如果没有贮藏货币的释放，可利用的潜在的货币资本会非常少。这是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清晰地向我们阐明的。

马克思是否成功地摆正了与资本运动规律相关的信用和金融(以及商业资本)的角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而且这当然是可以进行辩论的(我认为他只成功了一部分，而且他没必要将自己束缚于某种科学至上主义的幻象，他觉得为了保持可信性必须遵照这种科学至上主义)。但是，如果我理解得没有错，第二卷的一个关键目标是深入剖析第三卷的金融章节中展现出来的恶毒的拜物教，那么第二卷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的地位就重新确立了，理应得到更细致深入的研究。马克思清楚地明白，他需要从流通的角度构建一个和他在第一卷中从生产的角度构建的一样的，关于资本运动规律的有说服力的模型。悲剧的是他没有完成这项工作，并且他在把生产和流通这两个视角综合为一个可行的整体之前，便过早离世了。

八

资本的时间与空间
（第二卷 第12—14章）

谢天谢地，第二卷第12章到第14章，是相当简单明了、清晰易懂的。它们没有造成特别的困难，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只是重复了第5、6两章周转时间的主题。因此，在遭受了第三卷中金融投机的混乱与困惑后，我们可以方便地从这里重新切入第二卷。

在这里，马克思考察了一些影响资本总周转时间的生产和流通方面明显的重要事实。总周转时间等于资本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但是，生产时间分为劳动期间——生产价值的劳动实际上被用于商品生产的时间——以及完成商品生产过程所需要的不需要劳动投入的时间（例如，像大部分农业生产一样）。第12章是关于“劳动期间”的，它被定义为将价值和剩余价值凝结到一个既定的商品比如机车或棉花之中的“许多依次进行、互相连接的工作日”。第13章是关于“生产时间”的，它被定义为劳动期间加上任何完成商品所需的不需要支出劳动（例如，发酵、成熟、干燥的时间，等等）的额外时间。第14章论述“流通时间”，就是将商品带到其消费的最终目的地而花费的时间。这一章特别吸引我，因为流通时间受交通运输（我们之前已经遇到过这个话题）的时间和费用以及区位选择（比如，为了实现交通运输时间和费用的最小化，投入品供应商趋向于聚集在主要的生产地点周围）的影响较大。它开启了空间关系、集聚经济以及空间生产对资本流通和积累的作用问题。

马克思指出，劳动期间、生产时间以及流通时间之间持续时间的不一致性，是“无穷无尽的”。这使总劳动分工中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可

能存在协调问题。虽然棉纺织可以在一年中持续进行，但是棉花的收获一年只有一次。由此产生了复杂的问题：为了弥补不同周转时间之间的脱节，有多少资本被束缚（以商品或货币形态贮藏）住了？贮藏资本是不活跃的，因此不生产剩余价值。例如，大量原棉的库存使许多这样的商品资本处于不活跃状态。马克思指出，这样的资本，从技术上讲是"已贬值"或"闲置"的资本。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关键的问题需要用信用制度或其他方式来解决。

因此，为寻找减少处于闲置状态的资本数量的方法而产生的压力不断增加。这样，像加快周转时间和库存管理那样的技术，以及像信用制度那样的制度安排就开始发挥作用。缩短劳动期间和生产时间的竞争动力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技术和组织创新（例如日本20世纪80年代倡导的"及时生产"体制）已帮助商品资本的库存（因而是闲置资本）减小到了最小值。虽然棉花的收获一年只有一次，但世界上不同地区收获季节的差异帮助解决了棉花一年内的可获得性，也因此减少了对大量库存的需求。资本主义历史中一直有节省运动的费用和时间的持久动力。

论第二卷第12章：劳动期间

假定有两个生产部门，一个是棉纺业，一个是机车制造业，它们都具有同样的十小时的工作日。在前一个生产部门，一定量的成品"每天、每周都被产出；在另一个部门，劳动过程也许要反复进行三个月，才能制成……一台机车"。因此连续的和分立的生产过程一开始就存在差别。完成不同的分立的生产过程所需的时间也存在显著不同。"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不仅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发生，而且在同一个生产部门内部也会发生。"马克思给的例子有启发性，"建筑一所普通住宅比建筑一个大工厂需要的时间少……制造一台机车需要三个月，制造一艘装甲舰则需要一年或数年……一条农村土路也许几个月就可以修

好，而一条铁路却要几年才能建成”等等。他概括道，“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是无穷无尽的”。①

这些差别影响周转时间。周转时间越长，商品完成前所需要的流动资本就越多。“周转速度”影响着盈利能力。②

马克思将“劳动期间”定义为提供一件成品所必需的“许多依次进行、互相连接的工作日”。③一百个单独的十小时工作日构成一个一千小时的劳动期间。他指出，“由于危机而发生的社会生产过程的中断、紊乱，对于具有可分立性质的劳动产品和那些在生产上需要有一个较长的互相连接的劳动期间的劳动产品，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影响。”④在连续生产的情况下，即使生产停止，流动资本也没有受到重大损失；而在机车制造的情况下，所有已经对象化在产品中的流动资本不是被搁置就是被白白耗费掉了，因此这意味着从事这种形式的生产具有更大风险。

当然，固定资本也参加这些不同的周转过程，但固定资本自身的周转（例如，一台蒸汽机）并不受它参与生产的产品的不同周转时间的影响。但是流动资本的支出则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比如说，工资需要每周预付，生产资料同样也经常在提供一件成品所需的几周或几个月的期间内被连续购买。劳动期间越长，资本回流以及剩余价值通过最终产品的销售而实现前，所要预付的流动资本就越多。这成为个别资本家的沉重负担。“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太发达的阶段，”马克思指出，

> 那些需要很长劳动期间，因而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大量投资的企业，特别是只能大规模经营的企业，例如筑路、开凿运河等等，或者完全不是资本家经营，而由地方或国家出资兴办（至于劳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55—2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力，在较早的时期，多半实行强制劳动）。或者那种需要较长劳动期间才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很小一部分是靠资本家自己的财产来生产的。①

换句话说，它们是在信用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马克思继续引用房屋的例子：

> 在给私人建造房子时，私人分期付款给建筑业主。因此，事实上他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支付房屋的代价。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时期，一方面大量资本集中在单个资本家手里，另一方面，除了单个资本家，又有联合的资本家（股份公司），同时信用制度也发展了，资本主义建筑业主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为个别私人定造房屋。他以为市场建筑整排的房屋或市区为业，就像单个资本家以作为承包人从事铁路建筑为业一样。②

马克思引用了一个1857年银行法委员会的报告，关于投机房屋建筑的策略，按揭贷款、土地收购以及借入资金杠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任何一个建筑业主不从事投机建筑，而且不大规模地从事这种建筑，就得不到发展。建筑本身的利润是极小的；建筑业主的主要利润，是通过提高地租，巧妙地选择和利用建筑地点而取得的"（然后他引用了伦敦贝尔格雷维亚的高档社区为例）。我认为这个过程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重要的多，但是由于它还涉及租金的榨取和占有，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深究，我也尽量不作赘述。但是注意一下马克思在这里举了多少关于在建成环境上的投资（这个话题是在这种特殊的场合提出来的，但马克思出于特殊的考虑而没有将其独立出来讨论）的例子是十分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有趣的。

正如我们最近清楚地看到的，这类过程一直具有危机倾向①：

> 建筑业主不再是为顾客，而是为市场从事建筑……以前，一个建筑业主为了投机，也许同时建筑三四栋房屋；现在，他却必须购买大块地皮……在上面建筑一二百栋房屋，因此他经营的企业，竟超出他本人财产的20倍到50倍。这笔基金用抵押的办法借来；钱会按照各栋房屋建筑的进度，拨给建筑业主。一旦发生危机，分期垫款就会停止支付，整个事业通常就会停顿；最好的情况，是房屋停建，等情况好转再建；最坏的情况，就是半价拍卖了事。②

2008年之后，在美国、西班牙和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最糟糕的情况报复性地展开了。在这个最近的例子中，房屋投机制造了一个资产泡沫，它的破裂实际上引发了危机。然而，这里马克思将房屋市场的崩溃视为根源于其他地方的商业与金融危机的结果。

“举办劳动期间相当长而规模又很大的事业，只有在资本积聚已经十分显著，另一方面信用制度的发展又为资本家提供方便的手段，使他可以不用自己的资本而用别人的资本来预付、来冒险的时候。”我们在关于金融和信贷的章节中看到，个人的创业活动转变为用“别人的钱”做生意，这种转变对于资本如何运行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的例子主要是关于大规模的城市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我认为这绝非偶然。虽然马克思在这里没有这么说，但很显然虚拟资本的参与已经触手可及了。

然而，马克思主要关心的，是“可以增加一个工作日的产品”以及“缩短劳动期间”的事情，例如“协作、分工、机器的使用”。“机器缩

---

① 房地产行业的投机行为在1857年的危机中似乎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成为国会质询关注的焦点。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短了房屋、桥梁等等的建筑时间”，[1]在船只建造上“造船技术的改良，提高了船速，从而缩短了航运业投资的周转时间”。[2]然而，许多这些进步取决于配置更多的固定资本。这本身产生了严重的冲突(或者说矛盾？)，因为一部分资本为了促进其余资本加速周转，而不得不放慢了周转速度。这个停滞和运动之间潜在的冲突在第二卷的大部分篇章中无处不在。

协作可以由于同样的目的而调动起来：“动用庞大的工人大军，从而在许多地点同时施工，就可以缩短一条铁路建成的时间。”近几年，中国有一些出于这样的目的而对技术和劳动力大军调动的惊人案例。在本书所基于的那些讲座中，为了阐释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观点，我展示了一个惊人的视频，讲的是中国在九十小时内建成了一座十五层的宾馆。在 YouTube 上搜索标题“九十小时内在中国建一座十五层的宾馆”就可以看到它。现在又有一个标题为“十五天内在中国建造一幢三十层高楼”的视频。当然，在这两个例子中，零部件是预制的，但是观察和思考劳动过程的性质也是十分有趣的。重点不仅在于协作、机械化以及对分工的协调，也在于劳动强度，这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逐渐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一个主要贡献者。当然，工人仅仅获得九十小时(轮班工作)的工资。

以上事例的背景是，资本必须充分地集中并且在开启这样的劳动过程时立即可得：

> 问题在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散或集中在单个资本家手中，也就是，资本的积聚已达到什么程度。信用会引起、加速和扩大资本在个人手中的积聚，就这一点来说，它会促使劳动期间从而周转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时间缩短。①

注意周转时间的加速与资本集中、国家的活动以及信用制度的兴起之间的联系很重要。我通过对城市化历史的研究而对这个题目作的非正式观察表明，马克思指出这些联系在追求缩短周转时间的过程中变得日益紧密是非常正确的。

在马克思看来，缩短周转时间的这个动力的大小，在养羊的例子中解释得最精彩。“以前，英国羊，像1855年前的法国羊一样，不满4年或5年是不能宰的。”因此大部分人吃羊肉而不是羔羊肉(在狄更斯的小说中请客吃羊排是常事)。但是随着贝克韦尔的出现以及他的“新莱斯特羊”，“一岁的羊已经可以肥育，无论如何，在满两年以前可以完全成熟”，从而生产时间缩短了一半多。②所以我们现在吃羔羊肉，而不吃羊排。而且春天的羔羊一年内就能食用。在农业方面，这种对所谓的“自然的”生命周期的干预到处可见。甚至已经证明了加速龙虾成熟的可行性——通过明智而审慎地将龙虾笼从一个温度的水生环境移到另一个中去。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中，“自然”再生产的周期绝不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论第二卷第13章：生产时间

生产过程通常含有“与劳动过程长短无关”的生产中断。马克思提供了大量的例子，例如：酿酒需要经历一个发酵过程，陶瓷需要干燥，漂白业需要长时间的化学反应过程；并且在农业生产的许多领域，有时很长时间内不用投入劳动(最明显的就是林业——树木可能要花上一个世纪才能长成)。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我每年都在阿根廷住一段时间。在一月的某天，一台巨大的机器同一辆卡车和三个技工一同出现，在一天中收获二十公顷的小麦。第二天，另一台机器同三个人出现，在一天中种二十公顷大豆。两个月后，又一台机器到达，给大豆喷上恐怖的杀虫剂；接着，三个月后，一台机器出现，收割所有的大豆。几个月后，当又一台机器来给土地施肥后，另一台便来种植小麦。所涉及的固定资本很大，但是与生产时间相比，劳动投入以及劳动期间都是十分短暂的。“在所有这些场合，在大部分生产时间内只是间或需要追加劳动。”①

直白地说，将生产时间缩短到技术上可能达到的最小程度的动机，是十分强烈的。马克思因此引用了炼钢史上的进步，“炼钢法由1780年前后发现的搅拌炼钢法，变为现代贝氏炼钢法和以后采用的各种最新方法”。虽然“生产时间大大缩短了，不过固定资本的投资也相应地增加了”②——再一次强调了减速和加速之间的潜在矛盾。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农业是最难缩短生产时间的领域。这对于资本意义重大，对于劳动更加重要。马克思大量引述了基尔霍夫的著述，他强调了这些区别对资本和劳动的不同影响。对于后者，农业工作机会的季节性是主要问题。例如，在俄罗斯，每年只有一百三十天到一百五十天可以进行农业劳动，“织工、皮匠、鞋匠、锁匠、制刀匠等等”如果不是为各自村庄生产的话，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农业和农村副业相结合”是解决自然强加的季节性就业结构问题的有效办法。“后来，当资本主义生产完成制造业和农业的分离时，农业工人就越来越依赖纯粹带偶然性的副业，因而他们的状况也就恶化了。我们以后会看到，对资本来说，周转的一切差别都会互相抵消，而对工人来说，就不是这样。”③农业中季节性劳动的问题不会消失。在美国，外来工成群结队地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走过东西海岸的农业区，收割季节性农作物(例如水果和蔬菜)。在淡季返回墨西哥或加勒比之前，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十分可怕的条件下，暴露在各种不同的有毒杀虫剂中。

虽然马克思承认在许多工业部门，这样的季节性问题或劳动期间与生产时间之间巨大的间隔不会发生(除了在危机条件下)，仍旧有几种投资形式受这种问题的折磨。结果是“流动资本的支出，在一年的各个不同时期是极不均衡的”。①已投入的固定资本在一年当中有一部分时间得不到利用，因此它的循环也被中断，这引起“某种贬值”。最有趣的例子是林业，林业的生产时间和劳动期间是如此的不一致，以至于“造林不适合私人经营，因而也不适合资本主义经营……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②如果这在马克思的时代是对的，那么它在今天就是一个影响范围更大的问题，因为热带雨林在拉丁美洲、亚洲东南部以及非洲持续飞速地消耗——但是现在它们对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以及森林自身消失的影响已被记录在案。

最后，马克思回到了在第六章中提出的作为流通费用的储备和存货的形成问题。但是，在这个例子中，它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生产体系，“必须有一定的生产资本……处于储备状态，以便逐渐投入生产过程”。③这种储备应该有多大呢？马克思指出，它的大小“取决于它在更新时困难的大小，取决于供应市场的相对距离，取决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等等”。④但是它对“流通领域”条件的变化也是很敏感的。尽管马克思没有说这些条件可能是什么，不过，对我们来说，最近有个很明显的例子，即所谓的“及时生产”体制及其变体。这个体制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0世纪70年代末最先兴起于日本工业。最优的运送规划，在网络信息系统（随后是计算机化）以及可靠的运输体系的帮助下，将需要持有的投入品储备量减少到最小，因此释放出一大波“停滞”或者“闲置”的资本以供使用。这些体制很快便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中传播开来。

最后，马克思观察到，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的关系，可以有“种种极不相同的情形”，一部分产生于生产过程自身的属性，一部分反映了流通领域内条件的变化（例如更容易接近供应品和市场）。因此我们接下来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后一部分。

论第二卷第14章：流通时间

本章是马克思对空间结构和动态在资本运动规律中的作用论述最明确的一章。这一主题经常突然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当中，却通常都高度浓缩而又晦涩难懂。尽管没有否认它的根本重要性，甚至有时还对其加以强调，但除了本章及其后的若干页以外，鲜有对其进行系统论述的尝试。如果我们想要重建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及其内部矛盾的空间和地理动态的观点，就必须深入考察本章——这一章的评论主要是技术性的（因此也与《资本论》第二卷的整体基调相一致）——以及其他各处分散的论述。我的这一尝试以论文发表在1975年的《对立面》（*Antipode*）杂志上，它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激进地理学杂志。当然，这并没有引起人们很大的关注，即使我把这许多的发现吸收进了《资本的限度》的最后部分，意图强调空间的生产和空间（地域）关系在资本主义历史地理中是多么的重要。[①]非常不幸，到目前为止，空间的生产、空间关系以及地域形式

---

① David Harvey, “The Geography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Marxian Theory”, *Antipode* 7: 2 (1975), 9-21; reprinted in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位置”）的问题，在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中不是被极大地忽视了，就是被视作显而易见从而是不值得研究的问题。直到最近，人们才越来越认为资本积累的这一方面和日常生活的变化动态是基础性而非边缘性的问题。马克思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充分显示了他非凡的精力。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共产党宣言》对我们今天称之为“全球化”的简洁描述：

>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
>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
>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

造出一个世界。①

因此，那个面向商业精英的国际新闻频道“CNN”的格言是它“跨越了国界”（当然，从不提及阶级！）就不足为奇了。资本主义所制造的，那些“飞行常客”所信奉的“世界主义”正在大量上演。

我们再看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诸多类似段落中的一部分：

我不论是从矿山弄来金属矿石，还是把商品运到商品消费地去，这同样都是位置的［v—20］移动。改善交通运输工具也属于发展一般生产力的范畴。②

……

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③

……

所以，流通时间只有从它是利用劳动时间方面的自然限制这一点来说，才决定价值。……可见，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因此，资本一方面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下册)，第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下册)，第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减到最低程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更多地消灭空间。①

之所以这样，因为“过程的经常连续性，即价值毫无阻碍地和顺畅地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或者说，由过程的一个阶段转变为另一个阶段，对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说，同以往一切生产形式下的情形相比，是在完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为基础条件”。②

把这些从别处摘录的论述作为第14章关于流通时间的讨论的前言极为重要，它部分地强调了那些看似粗糙地堆砌在本章中的各种材料远远不是次要的、一次性的观察的结果。这些材料提出了一些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空间动态的原理，因而需要我们去研究，甚至苦心钻研。马克思集中研究的一个原理是：“在运输工具发展的同时，不仅空间运动的速度加快了，而且空间距离在时间上也缩短了。”③

然而，马克思以一个简短的陈述开始了第14章：“商品的销售市场和生产地点的距离，是使出售时间，从而使整个周转时间产生差别的一个经常性原因。在商品运往市场的全部时间内，资本束缚在商品资本的状态。”④正如我们在对信用制度进行讨论时所看到的，除非有货币资本家时刻准备着贴现那些附属于商品运动的汇票(因而长距离贸易与信用制度之间有很强的历史联系)，否则资本就不能转化为货币形式。马克思称为“出售时间”的是流通时间中最重要的部分。毫无疑问，存在努力把出售时间缩减到最短的强烈的竞争性动机(正如我们在第三卷对商业资本的分析中看到的那样，但在这里生产者似乎同时也是自己的销售当事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下册)，第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下册)，第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人）。“商品的销售市场和生产地点的距离，是使出售时间，从而使整个周转时间产生差别的一个经常性原因。”①

商品到达市场所用的时间取决于商品的性质（比如重量和易腐性），以及可采用的交通运输工具。出售时间的差别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商品之间，也在相似商品的不同生产者之间出现。然而，

> 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良，会绝对缩短商品的移动期间；但不同的商品资本…在流通时间上发生的相对差别，不会就此消失。例如，改良的帆船和轮船，缩短了商品的移动时间，从而也就缩短了商品到达远近港口的时间。［相对的差别］仍然存在，虽然往往是缩小了。不过，由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这种相对差别会以一种与自然距离不一致的方式发生变化。例如，一条从生产地点通往内地一个人口聚集的主要中心的铁路，可以使内地的一个不通铁路的较近地点，比这个自然距离较远的地点，绝对地或相对地变远。同样，这种情况也会使生产地点到较大的销售市场的相对距离发生变化，由此可以说明，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变化，旧的生产中心衰落了，新的生产中心兴起了。②

接下来一页中，马克思做了更详尽的阐述：

> 一个生产地点，过去由于处在大路或运河旁边，一度享有特别的地理上的便利，现在却位于一条铁路支线的旁边，这条支线要隔相当长的时间才通车一次。另一个生产地点，原来和交通要道完全隔绝，现在却位于好几条铁路的交叉点。后一个生产地点兴盛起来，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前一个生产地点衰落了。①

这对资本(比如，束缚于前一生产地点的资本的贬值)和劳动(比如就业机会从前一生产地点到后一生产地点的转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局部性的资本和劳动力贬值危机是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地理景观中的竞争性动荡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马克思并没有对这种地理不均衡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作更深入的分析。

交通运输工具的创新和投资持久地变革着资本所创造的地理景观。空间-经济的相对空间在不停地变换。在资本家竞争的整体景观里，由于相对区位优势的改变，整个城市的资本主义活动都将走向衰落。大量固定资本的价值都被嵌入到了土地上，随着其他地方那些激励资本活动的新的通讯线路和运输设施的建设，它们的价值要么得到增强，要么将受到威胁。马克思没有详细考察这个问题，但这些固定资本资产价值所面临的价值重估或贬值的永久威胁，是资本主义历史中不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由于历时已久的全球化进程的动力彻底转变了方向，随着生产大规模地、主要但不是唯一地向东亚转移，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许多核心地带——诸如底特律、巴尔的摩、曼彻斯特、谢菲尔德、埃森、里尔及其他老牌制造业城市——经历了极其艰难的去工业化过程。国内的地理转移——从美国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到南部和西南部——在制造不稳定和不均衡的资本主义地理发展方面，与国际转移同样重要。

马克思在这里的分析没有明确提及这些内容。他在这里所阐述的，是为发展这种分析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性和纯粹技术性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整个第二卷的理论关注保持一致的。这个基础仅仅由商品资本的流通时间(及其运动费用)，以及这种流通时间和费用对剩余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7—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空间条件的依赖构成的。

这些原理很简单。“市场距离所造成的资本束缚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时间的延长，直接造成货币回流的延迟，因而也延迟了资本由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①“在运输工具发展的同时，不仅空间运动的速度加快了，而且空间距离在时间上也缩短了。”②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概念“用时间消灭空间”，道理显而易见。服务的规模化和频繁化可以减少费用。“远距离运输比近距离运输相对地说要便宜的多”，这对扩展商品流通的地理空间非常重要。主要原因在于货物装卸费用远高于移动的费用，马克思没有提及这点。这种货物转运的高额费用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集装箱化而急剧地降低了。这个关键的创新改变了商品运动中全球化的形式与路径。

服务的频繁化和可靠性减少了生产者持有的商品资本储备(马克思在这里看到了为生产供应投入品的“准时化生产”体制在后来产生的趋势，这种体制让日本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保持着强劲的竞争优势，直到其他国家追赶了上来)。马克思同时也意识到了集聚经济的重要性——它的好处在于将同一商品的生产者连同其所有的供应商聚集在同一区域，从而大大减少了流通时间。

> 首先是运输工具的运行次数有或大或小的增加，例如，一方面，一条铁路的列车次数，随着生产地点生产的增加，随着它变为较大的生产中心而增加，而且这种增加，是面向现有的销售市场，也就是面向大生产中心、人口中心、输出港等等的。另一方面，这种交通特别便利的情况以及由此而加速的资本周转(就资本周转取决于流通时间来说)，反过来既使生产中心又使它的销售地点加速集中。随着大量人口和资本在一定的地点这样加速集中，大量资本也就集中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少数人手里。①

马克思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一个我们地理学者称之为相对空间关系的理论。②这一空间的确定不是根据物理距离，而是根据距离间的摩擦力，这个距离间的摩擦力用穿过物理空间所需的变化着的费用和时间来衡量。物理空间本身与资本并无关系。资本所关心的是运动的费用和时间，它会尽其所能地寻求费用和时间的最小化，并且减少运动的空间障碍。为此，必须不断地从根本上变革空间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用时间消灭空间"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资本主义为了实现减少空间障碍和距离摩擦力这一目标而进行的创新的历史令人叹为观止。但是障碍不仅是物质的：它们同时也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减少资本运动（不一定是人的运动）的关税壁垒及其他政治障碍已经成为国际资本主义新秩序（一个充满矛盾并频繁成为政治冲突和社会斗争的焦点的过程）的"圣杯"的一部分。但是很难想象，如果 20 世纪 50 年代左右欧洲的贸易壁垒没有被逐步打破，资本积累会受多大的抑制。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整个欧洲滞留在边境海关检查点的卡车长队已经让人无法容忍。

因此，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存在差别。与资本所有的形式（货币形式、商品形式或者生产活动的形式）穿越空间的流畅运动相比，那些在资本主义空间的组织中出现的区域单位（从有限的个人和集体的土地产权到国家本身等一切东西）倾向于把事物固定在空间之中。这些最起码是我为马克思简短的论述所作的注释。

在这章稍后一点的地方，马克思从生产性消费——生产投入的供给——的角度考察了这个问题：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二卷，第 27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见 David Harvey， "Space as a Key Word"， in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London: Verso， 2006)。

> 购买时间、离原料主要供应地的远近，使人们必须为较长的期间买进原料，并且使它们保持生产储备的形式，保持潜在的或可能的生产资本的形式……必须一次预付的资本量就会增加，资本必须预付的时间也会延长。①

持有原料储备以及其他投入品的必要性的降低，使预付资本量相对于所用资本量下降了。

生产者为了接近生产资料、劳动力供给以及最终市场而进行的位置移动，尽管在文本中只是简短地提了一下，但它们却是相当重要的。既然马克思提到了在大城市中的啤酒厂，我想详细解释一下。在18世纪的英国，啤酒是一种地方性的，经常是家酿的饮品。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大啤酒厂只有在大城市中才能找到。在那里他们倾向于成为当地的垄断者，受高昂运输费用的保护而免于竞争。但是酿造中防腐剂(最显著的是啤酒花)的使用，使啤酒可以长距离运输。②通过啤酒花的调味，啤酒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销售的时间延长了。这带来的一个结果是19世纪啤酒花生产的兴起，作为农业的一个特殊形式，它主要位于我的家乡肯特郡——并且，你们应该知道，这给我提供了博士论文的题目。绝大部分听说这个事的人都会惊讶地问道：你怎么能把那么多时间花在这样一个鸡毛蒜皮的问题上？然而事实证明这个问题是十分有趣的，这个绝佳的学习经历让我受用至今。啤酒花的种植是一种资本密集型的农业形式，通过商业资本和酿造公司与伦敦的金融和信用市场联系在一起。啤酒花的种植面积随着信用可得性以及商业周期而波动。啤酒花需要大量的肥料，于是伦敦的粪便、烂布以及其他废物被一同装船运往肯特，这在伦敦创造了掏粪工的岗位。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集中在一年中的特定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这要求人们适应苦味。不过，尽管啤酒花已经被化学防腐剂所代替，啤酒花的苦味仍作为我们的一种文化习惯被保存下来。之前出售的家酿的麦芽啤酒更为香甜，但它的缺点是会迅速变酸。

时间段，于是伦敦东区贫困的工人阶级在每年啤酒花采摘期都会向这里迁移。那个场面非常令人震撼，我到现在仍记忆犹新。去年我在伦敦打了一辆出租车，那个年长的司机向我讲述了他年轻时（现在采摘全部是机械化的）那些关于啤酒花采摘的欢乐回忆。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我有多么开心。

到了19世纪中期，一些加过大量啤酒花的啤酒甚至被出口给了在印度的英国侨居者（即所谓的“印度淡色麦酒”，仍然有一些酿酒者在生产它，例如巴斯，其位于英国中部的特伦托河沿岸）。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啤酒仍旧没有被运输到太远的地方。运输费用太昂贵，而且垄断组织仍在当地市场盛行。所以我以前喝当地的生啤酒（我小时候，需要到邻近城镇才能尝到吉尼斯生啤酒）。当我是学生时，我从肯特搬到了剑桥，这意味着我必须将啤酒从勇气牌变为鲜花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也是这样。如果你住在巴尔的摩，你喝全民波希米亚牌啤酒；如果你住在匹兹堡，你喝钢铁城牌啤酒。20世纪60年代以来运输费用的降低，引来了来自各地的啤酒。海洋运输的集装箱化，与20世纪60年代起小桶（而不是大桶）啤酒的出现，意味着进口啤酒可以在国内市场上竞争。啤酒生产通过合并成为大型公司而得到了加强，尽管不久之后便出现了一种“解药”——当地酿造。但是现在你几乎可以喝到来自各个地方的啤酒（在纽约，有一个酒吧，你可以喝到全世界各地生产的啤酒）。

冷藏技术的引入与运输费用的下降，使对食物供给作出各种全新的地域配置成为可能。威廉·克罗农在关于19世纪芝加哥的书中（《自然的大都市》）描述了冷藏技术的美好影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新鲜蔬菜和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冻肉可以提供给美国东海岸和更远的城市。①电报也使在世界范围内交流商品价格成为可能，从而能够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协

① William Cronon,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 Norton, 1992).

调全球市场。如果不能保证易腐食物的稳定供给(得益于冷藏技术和更有效、更快速及相对更便宜的交通运输体系)的话，1945 年后的都市化模式将不可能出现。如果不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造成了空间殖民化和空间关系转变，以上这些也都不会发生。即使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创新起源于迫切的军事需要(通常是这样)，但它一旦被资本迅速采用，就在城市化的重构以及空间和日常生活的生产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已成为我论证的一个主要支柱——通过一般意义上的空间生产和特殊意义上的城市化来吸收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对维持资本积累起了关键作用。对我来说，这些是我对马克思在第二卷关于交通运输发展的简短说明所作的一些激动人心的推断。

但是，马克思确实注意到了在减少流通时间的动力中，有一些迅速发展的潜在矛盾：

>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会缩短一定量商品的流通时间，那么反过来说，这种进步以及由于交通运输工具发展而提供的可能性，又引起了开拓越来越远的市场，简言之，开拓世界市场的必要性。运输中的并且是运往远地的商品会大大增长，因而，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处在商品资本阶段、处在流通时间内的那部分社会资本，也会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加①。

交通规划人员长期以来就注意到了交通会一直增长到交通网络容量上限的趋势，这使任何缓解交通网络拥堵的企图从长期来看都是一种自我挫败(一些研究表明，在伦敦的马车时代，交通移动速度为平均每小时十一英里，和汽车时代差不多)。

第二个矛盾我们以前已经遇到过：“与此同时，不是直接用作生产资料，而是投在交通运输工具以及为运用这些工具所必需的固定资本和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流动资本上的那部分社会财富，也会增加。”①

由于多种多样的贴现机制，货币流通体系并不必然与商品流通相一致，这产生了许多其他问题。周转的差别“是各种信用期限的物质基础之一，正如海外贸易，像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海外贸易，一般说来也是真正的信用制度的源泉之一”。②在第三卷关于信用制度的那些章节，马克思非常关注这些现象，但是在这里他仅仅提了一下，并没有作额外的说明。

虽然这章主要是从商品转化为货币形式的角度考察了流通过程，但马克思在结束的时候简要评论了在货币转化为用于生产的商品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他在第6章中已经说过

> 购买时间、离原料主要供应地的远近，怎样使人们必须为较长的期间买进原料，并且使它们保持生产储备的形式，保持潜在的或可能的生产资本的形式以供使用；因此，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必须一次预付的资本量就会增加，资本必须预付的时间也会延长。③

这将马克思推回到供给的季节性，以及某些商品在特定时间抛向市场的问题上。

马克思在结尾处提醒我们：所有的这些考虑因素都需要嵌入到一个循环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货币、商品和生产形式的资本不断相互渗透，而且如果不采取这些在空间和时间里连续运动的具体形式，资本将不能存在。很显然，这些资本的不同形式，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空间中移动的；货币、生产活动和商品运动两两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一致。这些不一致性中的一部分，在第二卷接下来几章中得到了考察。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九

流通和周转时间
（第二卷 第 15 — 17 章）

这三章比较难以理解和评价，我现在还不确定怎样阅读它们才好。和往常一样，马克思自己的理论阐述可能取得的进展总是和他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批判夹缠不清，很难把它们梳理开。还有，我们知道，马克思往往迷失在数字的细节中——即使是恩格斯也插入评论说，这是马克思最不擅长的地方。更添乱的是，马克思在某些时候放弃了第二卷在政治方面的克制态度，开始对资本一般的走向和共产主义可能会怎样进行了猜测（很像他在第三卷中做的那样）。这要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待我们自己完成的工作，要么是希望我们跳过细节和争议去发现并深思一些更重要的问题。

论第二卷第 15 章：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本章可算是第二卷中最单调无味的一章了——尽管和往常一样，这里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和一两个关键的见解。从恩格斯的解释来看，情况本来会更加糟糕，因为马克思留下了“一大包练习本，亲自用许多例题演算商业上的各种计算方法”。恩格斯使我们不用再重温这些材料，他含糊地指出，马克思“对数字计算，特别是对商业数字的计算，还不太熟练……而他又如此纠缠在周转的计算中，以致除了有一些未完成的计算外，最后还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和互相矛盾的地方”。恩格斯

指出，“这种不厌其烦的计算造成的不确切的结果”，使马克思过于关注琐碎的细节了①。

那么这里发生了什么？首先，马克思抱怨说，“对于这个周转机制根本一窍不通的经济学家，总是忽略这一要点：生产要**不间断地**进行，产业资本就始终只能有一部分实际上加入生产过程”。②马克思又意味深长地补充道，“忽视这一点，也就完全忽视了货币资本的意义和作用”。这至少是关键见解之一，正如我在考察生息资本流通时提到的，这一见解对理解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重申道，“这种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生产力”。③保持连续性至关重要。我们要为资本流动的中断和延迟付出高昂代价，因此要像避免瘟疫一样地避免它们。保持这种作为生产力的连续性面临许多困难，这为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发挥重要作用打开了大门(正如我们在第三卷对金融资本和信用制度的研究中看到的)。顺便说一句，在一般的讨论生产力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连续性”鲜有人提及，它的广泛影响也经常被忽视了。

熨平周转过程减少了预付资本：

> 由单纯的周转运动这一机制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还有由固定资本依次流回而形成的货币资本，以及在每个劳动过程中可变资本所需的货币资本)，只要信用制度发展起来，必然会起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必然是信用制度的基础之一**。④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并没有说是周转运动导致了生息资本流通和信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强调是作者加的。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强调是作者加的。

制度的产生。言下之意是（第三卷中关于生息资本历史的章节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由来已久的信用必须被规训、重新设计和重新定向，以满足资本周转的迫切需要。

如果这是一个基本观点（我认为它是），而不是马克思未完成的著作中常见的偶然、随意的一句评论，那么它就是本章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命题。这一观点对马克思写作计划的整体架构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对资本运动规律的研究已经促使他（有点晚地）得出结论：这些规律要求（我特意用了这个词）存在一个以特定方式发挥作用的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如果这样的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还不存在，那就必须建立起来。此外，正如我们在第三卷所看到的，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并不仅仅是由建立在基本的剩余价值生产之上的纯粹的投机性泡沫（虽然确实很多）构成的，而是解释资本持续积累的一般性和连续性实际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关键。这迫使马克思摆脱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严格限定的框架：在这里，分配的"特殊性"对资本的运动规律具有强大的内在作用。

恩格斯对马克思举的数值例子提出了异议，说它们相对来说并不足以支持这个论点。但恩格斯的反对意见也无法否定这个论点。资本以货币形式"游离"的过程要更加普遍和广泛（正如马克思本人所指出的，我们只有回顾固定资本那一章才能认识到这一点）。"本文的要点，"恩格斯说，"在于论证：一方面，产业资本的一个可观的部分必须不断处于货币形式；另一方面，一个更加可观的部分必须暂时取得货币形式。"①

那么，马克思是怎样在资本周转的逻辑内论证货币资本的必要"游离"的呢？事实上，它是这样进行的：

开始时，资本家在九周的劳动期间花费九百英镑生产一种商品，所以他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上的花费为每周一百镑（提到了固定资本的问题，但大多数情况下被抽象掉了）。我们还假设，劳动期间等于生产时间。商品资本在市场上的流通时间为三周，而在此期间，资本家已经没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有货币用来继续生产。价值生产的连续性被打破了。如何填补这三周的缺口？有两个解决方案。首先是削减每周的支出，用节省下来的货币使生产在三周的流通时间内持续进行（不过如果资本家必须使生产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有效运行的话，这种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第二个选择是当商品在市场上流通时，另找三百英镑来进行生产。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对于这两种策略之间的差别如此大惊小怪，因为基本上他们是在做同样的事情，而他后文就仅讨论了第二种情况。通过三周的流通时间，商品被转化为货币，资本家将九百英镑收入自己的腰包。但他在下一个劳动期间只需要六百英镑就可以了，因为他已经花费了三百英镑来填补流通时间带来的缺口。这样就游离出了三百英镑，到下一个流通时间开始之前都一直处于闲置状态。一般来说，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的货币要比实际上耗尽的要多，同时所需或可用的货币数量随着生产和流通的不同阶段而波动。那么，在需要它之前，为什么不把多余的钱投到货币市场上？或者为什么不能借三百英镑填补三周的流通时间，然后在流通时间结束后，当整个九百英镑回到资本家手中时再还清它呢？当然，还有另一种选择，马克思在这里没有考虑（除了偶尔提起之外）：资本家直接把商品按一定折扣卖给商人（例如，低于三百英镑），因此将他的实际流通时间减少为零。

马克思考察了三种不同的详细例子，它们的流通期间分别短于、等于和长于劳动期间。当然，他以令人难以忍受的方式研究细节，发现了一些奇特之处（假定信用制度不起作用）。尤其是，他发现有时候根本不会有资本游离出来，比如当流通期间与劳动期间相等时或者当一个是另一个的简单倍数时。当然，这些无疑是特殊情况。在其他情况下，游离资本的数量根据周转时间以及劳动期间和流通时间的比率的不同而不同。创造出来的游离货币资本的数量，也会随着确保生产连续性的周转过程的交错重叠而波动。

但是主要论点已经有所预兆，甚至有些明显了（尽管传统的经济学家此前未能发现它）："在考察社会总资本时，这个追加资本会不断地有相

当大的部分长期处于货币资本的状态。”对个别资本来说，

> 为了把资本I的流通时间转变为生产时间而必需的追加资本的加入，不仅会增加预付资本的量和总资本必须预付的时间，而且特别会增加作为货币储备存在，因而处于货币资本的状态并且具有可能的货币资本的形式的那一部分预付资本。①

像往常一样，马克思对前人的理论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 对于周转这个机制根本一窍不通的经济学家，总是忽视这一要点：生产要不间断地进行，产业资本就始终只能有一部分实际上加入生产过程。当一部分处在生产期间的时候，另一部分必须总是处在流通期间。换句话说，资本的一部分，只有在另一部分脱离真正的生产而处于商品资本或货币资本形式的条件下，才能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忽视这一点，也就完全忽视了货币资本的意义和作用。②

推而广之，这肯定也适用于货币市场和信用，虽然这里没有直接考察这个问题。

说白了，如果与生产时间相比，流通时间减少了(例如，由于运输和销售的改善)，就会有更多的货币资本被释放出来以用于其他地方。在这种情况下，

> 一些原预付价值就会以货币资本形式分离出来。它作为货币资本会进入货币市场，并且成为在那里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追加部分。由此可见，货币资本过剩是能够发生的，并且这不仅是指货币资本的供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给大于需求；这种过剩始终只是相对的过剩，例如在危机结束后开始一个新周期的“忧郁时期”内发生的过剩，就是这样。而且这是指：预付资本价值的一定部分对于经营全部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流通过程），变得多余了，因而要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分离出来；这是一种在生产规模不变，价格也不变时单纯由于周转期间缩短而造成的过剩。①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情况：像在前面的章节中简要说过的那样，运输时间的减少可能会大大减少流通时间，并因此释放出大量的过剩货币资本投入到货币市场上去，从而压低利息率。相反，如果流通时间由于某些原因延长了（例如，苏伊士运河被封锁），那么“追加资本只能从货币市场取出”；如果这是普遍现象，就可能“给货币市场造成压力”。马克思的意思大概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货币资本的追加需求将会推高利息率②。这肯定会影响货币资本的供求，而正如我们前面所了解的，货币资本的供求是影响利息率的关键因素。

我想这就是本章比较有启发性的方面。我真的觉得那些细节并不是太重要。但是，一种内在的联系在这里开始出现：一方面，是周转时间及其组成部分——劳动期间，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货币资本的作用——既包括生产内部的，又包括外部的可行的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写作计划是如何展开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个写作计划是为了揭露了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

论第二卷第16章：可变资本的周转

这同样是让人失望的一章，但其中还是有一些实质性的见解。“生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产中耗费的可变流动资本，只有在它的价值借以再生产的产品已经卖出，已经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可以重新用来支付劳动力的报酬时，才能重新在流通过程中发生作用。”这同样也适用于不变流动资本。因此，为了考察可变资本如何流通以及它如何生产剩余价值的问题，马克思将不变流动资本从不变资本中分离了出去，并“把流动资本的可变部分当作似乎是唯一的流动资本”。①这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抽象：可变资本在那里是资本唯一的形式。

接着，马克思定义了年剩余价值率。假设预付可变资本为五百英镑，周转时间为五周，每周生产一百英镑剩余价值；那么，到那年年底(假定一年只有五十周)，每五周重复进行预付的五百英镑共生产出五千英镑的年剩余价值，或1 000%的剩余价值。这是情况A。当整个五千英镑作为全年的预付资本，而不是每次五百英镑的十期分期付款时，结果看起来会完全不同。假定每周剥削率相同，年剩余价值率仅为100%。这是情况B。年剩余价值率(从而年利润率)受周转时间的影响很大。这一发现的重要性不能被低估。通过缩短周转时间，资本能获得多重优势。预付可变资本进入一种商品后再以货币形式返回的速度越快，“资本家必须从他个人的基金中预付货币的时间”就越短。结果“他预付的资本，和一定的生产规模相比，就越少”，并且“他在一年内榨取的剩余价值量也就相应地越大”。②

这个发现为什么重要？我们首先参考一下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进行的批评。这种年剩余价值率的差异使剩余价值率(从而利润率)看起来好像是取决于“某些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影响”，而不是取决于对生产中活劳动的剥削的影响。“自从19世纪20年代初以来，这种现象”(剩余价值被拜物教地归因于流通条件而非生产)，“还使李嘉图学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派陷入完全的混乱”。①

在马克思看来，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因而任何认为剩余价值似乎可以从流通中产生的理论，比如李嘉图学派的学者，都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但马克思的发现中的“奇怪”之处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了反驳李嘉图的观点，马克思有时不得不将自己的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与一个事实相协调，即周转时间不同将导致年剥削率的明显不同，而且缩短周转时间确实能够提高年剩余价值率。马克思的答案是，必须区分预付资本和所用资本。两个资本家，A 和 B，在周剥削率相同的情况下使用可变资本，每周生产相同的剩余价值。区别在于需要预付的资本数量。资本家 A 在五周内能重新获得五百英镑预付资本，然后再使用资本，而资本家 B 不得不在一年中逐步收回最初预付的五千英镑。在前五周结束时，资本家 B 仍然有四千五百英镑作为储备，实际上处于贮藏状态，用来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为劳动者支付报酬。上一章中特别强调的这个观点再次变得明显了——生产中必须有大量多余的货币，以调节周转时间的差异。

情况 A 和 B 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更快的周转时间产生了更高的剩余价值率，而是更快的周转时间减少了一次周转中贮藏的和不活跃的货币资本。如果每周给雇佣劳动发放一百英镑的报酬，那么资本家 A 需要预付五周的工资，而资本家 B 需要预付五十周的工资。这是使用信用来补救的另一个原因，尽管马克思由于某些原因在这里并没有提及。很明显，情况 B 中的闲置货币资本可以投放到货币市场上，直到实际需要它的时候再取出。但是，

> 预付可变资本，只是在它被实际使用时，在它被实际使用的时间内，才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而在它没有被使用，仅仅被预付，充当储备的时间内，不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但是，一切会使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二卷，第 33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付的可变资本和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比例发生变化的情况，总起来说，就是周转期间的差别。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律是：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执行职能的等量可变资本生产等量的剩余价值。①

A和B使用的等量的可变资本生产了等量的剩余价值，不管他们预付资本和所用资本的比率有多么不同。“生产的剩余价值和预付的可变资本（不是和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比例”的差异，仅仅是“剩余价值生产规律”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②这一切都归结为预付资本和所用资本之间的区别。

在考察了几个乏味的算术例子后，马克思提出了年剩余价值率公式：“S＝s′n表示，对在一个周转期间内所使用的可变资本适用的剩余价值率……要乘以预付可变资本的周转期间。”③马克思的总的观点并不是说年剩余价值率的差异是虚幻的或者“仅仅是主观的”，而是认为年剩余价值率是由“资本的现实运动本身所引起的”。④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因为年剩余价值率是虚幻的或微不足道的而加以排斥，但他确实说明了它是如何与剩余价值生产的基本规律相协调的。一旦我们了解到不同的年剩余价值率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差异与纯粹的流通现象无关，而是和往常一样依赖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条件。

需要强调一下年周转率的重要性，因为它无疑对利润率有显著的影响，因此任何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讨论都必须将年周转率考虑进来。马克思本打算在第三卷用一章来讨论，但最终没有写。所以，恩格斯不得不在一个单独的章节中插入他自己的解释（根据第二卷的材料）。他在那里明确指出，“两个［类似的］资本家的利润率与周转次数成反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比”，并且“周转时间的缩短”——［在他那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是运输和通讯的革命］——“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对利润的生产的直接影响，在于使可变资本部分由此提高效率”，①正如我们正在考察的这章所表明的。

马克思自己的论点可能有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马克思经常被认为持有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理论。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直接和一个间接的力量，它们可能会导致利润率上升。问题是利润率是在所用资本的基础上还是在预付资本的基础上计算的。对于资本家来说，重要的显然是后者。从本章和上一章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出，流通时间相对于劳动期间的任何减少，都可以降低对支持剩余价值连续生产的额外货币资本的需求。假设生产中剥削率不变，预付资本减少将使利润率上升。周转时间由于劳动期间和(或)流通期间的缩短而减少时，会出现同样的结果。恩格斯在第三卷中他插入的章节中明确指出，更短的周转时间(其他条件不变)意味着更高的利润率。他还指出了当时运输和通讯上的革命对周转期间实现的惊人缩减，这通过从根本上削减预付资本，必定会对利润率的提高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忘记了其中一些革新是多么的激动人心。例如，电报将信息流的传播时间缩短到了信件的二千五百分之一(相比之下，因特网只将信息传播时间缩短到了传真的五分之一)。铁路和汽船在19世纪的影响，比喷气式飞机在20世纪的影响相对要大得多。

这里，我们发现了个别资本家下述行为的一个额外动机：进一步用时间消灭空间；在商业策略中积极追求时空压缩。因为一旦成功缩短了劳动期间和(或)流通时间(例如，通过寻找让自己的商品更快推向市场的方式)，他的预付资本就能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即便所用资本的利润不变)，只要新的生产和流通策略的相关成本不会抵消掉他们更高的利润率。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但还有一种间接的方式能够解决流通和周转时间的问题，即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的发展，这是本章的伏线。为了减少覆盖不同的流通时间所需的预付资本，产业资本家可以求助于商业资本家或银行家的服务，让他们贴现汇票，或者干脆自己到货币市场上直接进行剩余资本的短期借贷。前者具有使流通时间减少为零的效果，而后者则避免了预付资本覆盖整个周转时间的问题。在第二卷中，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存在大量的、随时可得的过剩货币资本，以支持生产活动的连续性。他多少附带性地提到，正是这一点使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对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行来说非常必要。如前所述，他在第三卷做了进一步论证。产业循环系统被分解为一种二重性：一方面是货币和生息资本，另一方面是生产中对剩余价值的攫取。目前还不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影响利润率的。利润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息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而按第三卷的说法，这一关系则取决于供求状况和竞争这两个特殊性。正是在这一方向上，第二卷的这几章有助于马克思向前推进自己的理论，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指出它们的全部含义。这为一般理论留下了许多未解的难题。

然而，在第16章的结尾，通过观察可变资本的流通对市场的影响，马克思确实考虑了一些更加一般的社会和政治含义。在他的例子中，最初作为可变资本花费的五百英镑一旦作为工资到了工人手里，就不再是资本。“工人又把它们付出去，以购买生活资料，从而消费了价值五百镑的生活资料。因此，这样一个价值额的商品量消失了。这个商品量对工人来说，是非生产地消费的，不过它会把劳动力，即资本家不可缺少的一个工具，保持在能够发挥作用的状态中。”①考虑到工人的再生产对资本的生存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再次遇到了“非生产性”活动这个有点奇怪的概念。但这个逻辑是无可挑剔的：根据马克思的规定，对资本家来说，生产的唯一重要的形式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当工人花钱购买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商品或在家里吃饭、睡觉时，剩余价值是不会生产的。当工人返回工作场所时，剩余价值生产重新开始。资本家在第一个周转期结束时收回的五百英镑已经由工人生产出来。所以，资本家为第二期的可变资本预付的五百英镑，事实上是工人自己生产的产品的等价物。马克思在这里重申了在第一卷中的观点，即事实上产品应属于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只有按照资产阶级法权，产品才属于资本家。马克思这里的目的与第一卷一样，是揭露资产阶级产权的一般理论的不合法性，同时指出洛克观点中的矛盾——洛克在坚持认为私人财产权应赋予那些将他们的劳动与土地结合起来有效从事生产的人的同时，还主张在资本的统治下剥削劳动的权利。

市场内部的广泛影响也需要考虑在内。可变资本周转时间为五周的资本家A，每周需要价值一百英镑的消费资料，在五周后供给价值五百英镑的产品。资本家B每周也需要价值一百英镑的消费资料，但到年底才供给价值五千英镑的产品。供求条件中的货币失衡会产生问题，我们马上就考察这种情况的所有后果。

马克思对这种情况的评论确实有些不同寻常，值得我们思考：

> 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那么首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①

直到此时，共产主义的观念主要局限于联合劳动者为了社会的目的而自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由地控制和组织自己的劳动。但这里隐约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协调问题——长期中发展生产力和扩大基础设施将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提供直接好处。要注意马克思并没有呼吁由国家来管理，而是通过某些未指明的途径让“社会必须计算好”并大概决定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方式。另外还要注意，马克思还断言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货币资本将被立即废除”，也就是说会有一些其他形式的价值规定存在(比如社会使用价值)，不过仍然没有指明。这段评论也表明(也有其他段落支持这个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问题在于流通的货币化和货币资本以利润为导向的流通。

尽管恩格斯说第二卷“没有多少鼓动性的材料”①的抱怨可能是正确的，这段话还是标志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政治观的重要发展。它在第二卷的第三篇会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尽管大部分没有得到说明)。它提出了一些问题，“社会”可能怎样合理地协调和“计算”总劳动分工，同时怎样在缺乏市场信号的情况下，以鼓励而不是阻碍联合劳动者自由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的方式来管理长期发展计划。这里的分析在《资本论》中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地表明，在共产主义事业的核心有一个核心矛盾。只有当建立在严格的私人财产基础上的规训机制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个别资本家的自由和解放才成为可能。同样的道理，共产主义也必须在一个估计、协调、计算的总体框架下，找到一条重新定义和保护联合劳动者的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这个总体框架限制并规训必要的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的生产，使它们能增加人类解放的前景。

> 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一方面，货币市场受到压力，反过来，货币市场的缓和又造成大批这样的企业的产生，也就是造成那些后来对货币市场产生压力的条件。货币市场受到压力，是因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第5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在这里不断需要大规模地长期预付货币资本。这里完全撇开不说产业家和商人会把他们经营企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投入铁路投机事业等等，并通过在货币市场上借贷来补偿这种货币资本。①

这个过程给第三卷中分析的金融资本和信用制度一切“颠倒错乱的形式”和“疯狂的”行为提供了技术基础：

因为生产资本的要素不断地从市场上取走，而投入市场来代替它们的只是货币等价物，所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将会增加，而这种需求本身不会提供任何供给要素。因此，生活资料和生产材料的价格都会上涨。此外，这个时候，通常是欺诈盛行，资本会发生大规模转移。投机家、承包人、工程师、律师等一伙人，会发财致富。他们引起市场上强烈的消费需求，同时工资也会提高。至于食品，那么，农业当然也会因此受到刺激。但是，因为这些食品不能在一年内突然增多，所以它们的输入，像一般外国食品(咖啡、砂糖、葡萄酒)和奢侈品的输入一样，将会增加。因此，在进口业的这个部分，就会发生输入过剩和投机。另一方面，在那些生产可以急剧增长的产业部门(真正的制造业、采矿业等等)，由于价格的提高，会发生突然的扩大，随即发生崩溃。②

这与第二卷的常用语句大相径庭，而是不可思议地和第三卷中关于金融和信用的章节衔接了起来。这证实了这两卷之间内在的统一性。但是，当马克思考虑对劳动的影响时，他想得甚至更远：

这同样会影响到劳动市场，以致把大量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甚至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已经就业的工人，吸引到新的产业部门中去。一般说来，像铁路建设那样大规模的企业，会从劳动市场上取走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来源仅仅是某些只使用壮工的部门（如农业等等）。甚至在新企业已经成为稳定的生产部门以后，从而，在它所需要的流动的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以后，这种现象还会发生。例如，在铁路建设的规模突然比平均规模大时，情况就是这样。工人后备军——这一后备军的压力使工资保持很低的水平——有一部分被吸收了。现在工资普遍上涨，甚至劳动市场上就业情况一直不错的部分也是这样。这个现象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不可避免的崩溃再把工人后备军游离出来，再把工资压低到最低限度，甚至压低到这个限度以下。①

这段内容与第一卷第25章的主题的一致性是很明显的。但是在这里，马克思在脚注中添加了一个更有针对性和可能更具爆炸性的观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还有一个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全力扩张的时期，通常就是生产过剩的时期；因为生产能力从来没有能使用到这个程度，以致它不仅能够生产更多的价值，而且还能把它实现。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②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资本家为了榨取剩余价值而压低工资，使得有效需求难以维持，这一直是资本运动规律中的核心矛盾之一。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承认了这一点。工人作为消费者，从而作为在市场上实现商品资本价值的当事人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是整个第二卷逐渐浮现的重要主题。在第一卷中，这个问题通过假设所有的商品都按照它们本身的价值进行交换而被简单地忽略了。在《资本论》中，工资——分配的一个方面——通常都被当做特殊性而被排除在讨论之外，这里是将其重新引入产业资本一般流通过程的核心的几个地方之一，这对资本运动规律的内部矛盾有重大影响。

在这一章的结束部分，马克思扩展了研究思路，突破了封闭贸易的假定。流通时间越长，周转时间也就越长，因此市场的距离“必须看作是真正的物质基础”。①以英国将棉布和纱线出售给印度为例。生产者出售给商人，后者依靠货币市场取得支付手段。然后，出口商在印度市场上销售商品。只有到那时，等量的价值才流回到英国（以货币或商品形式），来提供新的生产所需的等值的支付手段（当然，货币流回货币市场）。供给与有效需求之间的缺口类似于前面所说的资本家B的年周转的缺口。供求缺口必须诉诸货币市场或信用来弥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许多问题：

> 然而，棉纱可能在印度再赊卖出去。以此在印度赊购产品，作为回头货运回英国，或把一张金额相当的汇票汇回英国。只要这种状态延续下去，就会对印度的货币市场造成一种压力，而对英国的反作用可能在英国引起一次危机。这种危机，即使在它伴随着向印度输出贵金属的情况下，也会在印度引起一次新的危机，因为曾经从印度的银行取得贷款的英国商行和它们的印度分行会陷于破产。因此，出现贸易*逆差*的市场和出现贸易*顺差*的市场会同时发生危机。这种现象还可以更加复杂化。例如，英国把银块送往印度，但是，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印度的英国债权人现在会在印度索债，于是印度随后不久又要把它的银块送回英国。①

当然，关键在于，“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②这是来自对周转时间差异——尤其是与远距离贸易相关的——研究的真正洞见。

我引用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两件事情。第一，瘟疫般呼啸而来，在流通过程中从某一处、某个时间传染到另一处的货币危机，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可以说，资本的本性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但是，第二，表面看似并不相关的三卷《资本论》在马克思理论内部有很强的内在联系。这里有无数条的线索——“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形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所设想的“有机的整体”。这种联系的建立仅仅是试探性地，在本章相当微弱。但是在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不懈研究中，马克思一直将它们铭记在心，我觉得这简直太神奇了。

论第二卷第17章：剩余价值的流通

在这一章中，马克思将剩余价值的流通拿出来详细研究。这一章被寄予了厚望，但是它实际上并没有达到期望值，理论的一些重要方面仍然处于含糊不清却又极其吸引人的状态。本章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剩余价值从何而来，而在于剩余价值借以货币化的货币从何而来？”③作为卓越的货币商品，金的生产能否提供实现剩余价值所需要的额外货币？如果不能(很明显马克思拒绝了这种可能性，尽管他并不否认金生产者的独特作用)，那我们就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有效需求从何而来，以实现不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断被抛向市场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通过回顾两个资本家 A 和 B 的情况开始了这一章，B 直到年底才能实现五千镑的总价值。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剩余价值还没有实现，因此，既不能用于个人消费，也不能用于生产消费。就个人消费来说，已预期到靠剩余价值来偿付。这方面的基金必须预付”。①预付的基金，不仅必须涵盖资产阶级的消费，还要包括所有固定资本的维修及保养。周转时间较短的资本家可以用实现了的剩余价值来支付，而不必预付。因此剩余价值在什么时候被实现为资本——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化”——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资本家把商品投入市场之前等待的时间越长，资本家不得不储备的来弥补他的消费和附加开支（如维修及保养）的货币就越多。

“一旦信用发展起来，原预付资本和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的关系就更加复杂。”但是马克思在这里像第二卷中惯常的那样，并没有深入细致地讨论这个问题。主要问题是剩余价值被资本化后会怎样。马克思回顾了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以提醒我们资本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性（就像他在这里所说的“为积累而积累”的规则）。所以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必须被用于扩张，“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涵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②

马克思描述了这种扩张可能采取的各种形式。但是，在每种情况下，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的数量和扩大生产所需的数额之间的关系，限制了马上扩大生产的能力。资本家可能需要在几个周转期间里贮藏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直到在给定的经营规模下积累足够的资金用于投资扩大生产（比如增建新厂及为其提供机械设备）。在此期间，“资本家还不能在自己的企业中使用的货币资本，会被别人使用，而他从别人那里得到利息。对他来说，这种货币资本是作为特殊意义上的货币资本”，但是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二卷，第 35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二卷，第 35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它在别人手里却作为资本起作用"。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货币市场上可用的货币数量趋于增加，从而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会重新[从货币市场]被吸收来扩大生产"。②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提及，但货币市场上货币供给的增加会增加可贷资本的供给，从而可能会降低利息率。

在简要回顾了在贮藏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之后，马克思引用了长达两页的政治哲学家威廉·汤普森的著作——1824年出版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一书。我并不打算仔细研究，但我认为读一读汤普森说了什么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很明显，有一些资本主义分析家对他们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非常敏锐而深刻的批判性观点。显然，马克思在此处引用汤普森的解释时并没有加任何批评性的评论(据我所知，他在其他地方引用汤普森时也是如此)。

纵观《资本论》，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的再生产时通常采用这样一种策略，首先好像它从事的是简单再生产，然后才是在更为现实的条件下进行的连续的扩大再生产。他在第一卷是这样做的，在第二卷的第三篇也会这样做，这一点我稍后分析。这样分离的原因是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弄清基本关系要容易得多。

因此，剩余价值的流通首先被置于简单再生产的视角之下进行考察。在几个周转期内生产和实现的剩余价值"由它的所有者资本家个人消费掉，也就是非生产地消费掉"。③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必须采取货币的形式，否则就不会有货币来购买工人和资本家消费的商品。回顾第一卷中货币那一章，我们看到"一部分剩余价值也必须经常以货币形式存在，而不是以产品形式存在"，因为它必须应付许多不同的原因(商品产出和价格的波动，等等)造成的"货币流通的变动"。经济增长一般要求金银的年产量有所增长，除非经济增长可以由提高流通速度或越来越多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地使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来满足。因此，“一部分社会劳动力和一部分社会生产资料必须每年用在金银的生产上”。①所以马克思详尽地分析了在生产金的情况下发生了什么。我在这里并不打算讨论这种情况的细节，因为我觉得它与当代资本主义货币创造和使用的一般条件无关，并且无论如何也不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个当时提出的真正的问题：实现剩余价值所需要的货币从哪来？

问题在于“资本家在把他的产品投入流通时一起投入了一个超过他的资本的余额，并且从流通中再取出这个余额。……资本家投入流通的商品资本，比他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形式上已经从流通中取出的生产资本，具有更大的价值”。“但是，商品资本，在它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和它所包含的剩余价值被耗费以前，必须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从何而来？”②马克思声称，没有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充分的解答。

让我简单解释一下这个问题的结构。纵观《资本论》，马克思假定(至少在分析关于货币资本和金融的章节之前)供给和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但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不同，不仅供求不均衡，而且资本家使出浑身解数来扩大供求之间的缺口。简单地说，资本家的需求是生产资料(c)和劳动力(v)，但他提供给市场的商品价值是 $c+v+s$，从而商品价值的供给系统性地超过了需求。此外，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的欲望则把这种不一致推向了极限。对剩余价值的额外有效需求从何而来？如果剩余价值不能实现，资本流通就会停止。

“剩余价值已经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但是，通过这个行为，不会为这个追加的商品价值的流通提供任何追加的货币。”马克思警告说，“不要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遁辞来回避这个困难。”③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马克思随后检查了此类“似是而非的遁辞”。大部分解释依赖于不同的资本在不同的时刻进入市场，或依赖于不变资本和固定资本互相关联的流量，又或者依赖于工人和资本家收入如何消费的时间结构。但是“总的答复已经得出来了”。现在我们又面临这样的情况，必须分清接下来到底是马克思的一般答案，还是政治经济学家的“似是而非的遁辞”的一般答案：“当一个 x ×1000 镑的商品量要流通时，不论这个商品量的价值是否包含剩余价值，不论这个商品量是否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这个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决不会因此有所改变。*可见，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不存在的。*”①问题于是被简化为调节一个国家的货币供给，使之足以满足所有商品交换的需要的层次。我认为马克思的意思是说，这种观点是一种最厉害、最似是而非的遁辞：它等同于马克思在第一卷中严厉地斥为“幼稚的胡言乱语”的萨伊定律。

但是它确实留下了“一个独特问题的*假象*。这就是：货币投入流通的起点在这里是资本家”。资本家花费了可变资本（v）和不变的固定资本以及流动资本（c）的货币：

> “不过，除此以外，资本家就不再是处在流通中的货币量的起点了。可是，现在只有两个起点：资本家和工人。所有第三种人，或者是为这两个阶级服务，从他们那里得到货币作为报酬，或者是不为他们服务，而在地租、利息等形式上成为剩余价值的共有者。”②

马克思在这里大胆地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构成的简单的两阶级模型。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世界，是谁为实现剩余价值提供了额外的需求？“至于工人，我们已经说过，就工人投入流通的货币来说，工人只是第二步的起点，资本家才是第一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步的起点。”①因此，解决问题的钥匙只能在资本家那里：“如果他们只是不断投入五百镑，又怎么能不断地从流通中取出六百镑呢？无中不能生有。整个资本家阶级决不能从流通中取出他们以前没有投入流通的东西。”答案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 实际上，说资本家阶级自己把用于实现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货币投入流通，乍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悖论。但是请注意，资本家阶级不是把它作为预付货币即作为资本投入流通的。这个阶级只是把它作为个人消费品的购买手段花费的。因此，这不是资本家阶级预付的，虽然这个阶级是这种流通的起点。②

马克思举了个例子阐明这一点：某资本家预付五千英镑货币资本，其中一千英镑为可变资本，在一年的时间内生产了一千英镑剩余价值。资本家“在第一年，他必须掏自己的钱袋，不能用工人的无酬的生产来偿付他的个人消费。他不是把这个货币作为资本预付。他把它花掉，把它作为他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等价物来支付”。③直到他在年末获得剩余价值。马克思在这里假定：

> 资本家到他的资本第一次流回为止。为了偿付他个人消费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额，恰好同他所生产的并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相等。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随意的假定。但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这个假定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必然是正确的。④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为了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使用了极度简化和抽象的方法，这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在其他地方引用了这一结果——例如第三卷，尽管他在那里承认了一个独立的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阶级的重要性。但其意义是深远的。首先，这个结论打破了资本主义兴起是资产阶级的“节欲美德”和白手起家的结果的理论。从历史上看，如果真的有人白手起家的话（比如英国早期贵格教徒的情况），那么必须得有一个无“节欲美德”的消费阶级，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不生产只消费。这种寄生阶级的存在不仅在18世纪的英国是有目共睹的（请读简·奥斯汀的小说），而且被正当化了——通过马尔萨斯对吸收不断扩大的剩余产品的总需求来自哪里这个问题的回答（另一个解决方法是扩大对外贸易，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将其转变为对国外市场的殖民和帝国主义统治）。另外，这一结果对我们如何阐释第二卷第三篇的再生产图式有所启发，我们很快就会考虑这个问题——虽然围绕对这一图式的阐释已经积累了很多有争议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但上面这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却鲜有人提及。

在第一个周转期间后——在这个周转期间内资本家必须支付自己的消费，资本家就可以将这笔由工人生产并通过自己的消费支出而实现的剩余价值用于消费，使其作为收入在以后所有连续的周转期间内循环（假定是简单再生产）。这与马克思在第一卷中的论点相符：资本家可能确实为生产预付了自己的货币资本，并将自己的储备金用于消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储备资金越来越多地代表着劳动者的产品。这些劳动者不仅生产出了自己再生产所需的可变资本，而且生产出了那些资本家以收入形式占有的、用于消费的剩余价值。不过，所有这些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是如何运行的还有待确定。

然而，马克思没有发展这些洞见，而是回到了金生产者的问题和一个复杂的事实：在金的生产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本身就已经处于货币商品的形式，因此并不存在如何将其转化为货币的问题。事实上“那部分生产金的资本家，则不断地投入比他们以生产资料的形式从流通中

取出的更多的货币”。①这对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产生了影响，其中有一些国家生产金，其他国家则并不生产。但是，即使他们注入市场的货币价值比他们为了生产而从市场上抽走的货币价值要多，这个超额量也不可能与在市场上等待实现的巨大的剩余价值相匹配。

然后马克思考虑了这个更加有趣的问题，即可变资本的流通是如何必然与剩余价值的流通交叉在一起的。很显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有效需求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工人的消费构成的，而这取决于工资率和就业："可变货币资本的支出增加多少，意味着工人手里的货币手段量也增加多少。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工人方面对商品的需求会增加。进一步产生的结果是商品价格提高。"②资本主义分析家总有一种倾向，将通货膨胀归因于工资压力和相对充分的就业，但在这里马克思对这种推理显然是持批评态度的。毋庸置疑的是，"由于工资提高，工人的需求，特别是对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会增加。他们在极小的程度上增加了对奢侈品的需求，或者说，在极小的程度上产生了对原先不属于他们消费范围的物品的需求"。③随着市场对这些新情况的适应，这里无疑将出现价格和产出的"暂时的波动"，但马克思非常怀疑存在任何长期的通胀趋势："如果资本主义生产者可以随意提高他们的商品价格，那么，即使在工资没有提高的情况下，他们也能这样做，而且会这样做；工资在商品价格跌落的情况下，就永远不会提高。"④简而言之，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是一样可能的："资本家阶级就永远不会反对工联，因为资本家阶级在任何情况下始终可以像他们现在不过偶尔在一定的、特殊的、所谓局部的情况下所实际做的那样，利用工资的每一次提高而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提高商品价格，从而把更大的利润放进自己的腰包。"⑤1945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后，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家迫于政治形势，在更大的程度上接受了工会和工人阶级权力，而他们则报以通胀的策略，使公司在工资上涨、就业相对充分的情况下依然能把大量的利润“放进自己的腰包”。这便是上面说的“偶然的情况”。

至于扩大再生产的情况，马克思没能找到一条明显的研究路径，这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现在必须投资于生产性消费(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增加)，从而削弱了资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如果资本家不得不放弃个人消费以进行更多的生产性消费，那么他就必须得再次深入挖掘自己的货币储备，否则就不可能清除掉已经生产出的多余的剩余价值。认为这种储备是无底洞的想法显然是荒谬的。扩大的总需求的来源问题需要加以解决，但马克思做的还不够。

我能找到的最明确的答案是资本家通过先买(从而实现剩余价值)后付(剩余价值已经货币化后)这个简单和长期存在的做法解决困难。换句话说，他们用债务支撑扩张。这涉及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在整个第二卷不愿意(尽管他承认了它的绝对必要性)从事这个研究。这可能就是解决方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在第三卷对货币市场、金融资本和信用制度的作用的探究中已经作出了暗示。把这一观点推向极致，这个论点表明，通过剩余价值生产进行的资本积累必定与市场上实现剩余价值的债务积累同步进行。

马克思近乎暂时性地承认了这一点。一部分剩余价值被投资于生产扩张，这就减少了可利用的作为收入来流通用于产品实现的数量。这样就生产出了追加的剩余价值。“这里又出现了和上面一样的问题。用以实现现在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追加剩余价值的追加货币从何而来？”①马克思和以前一样，研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的许多解决方案，它们试图通过对货币流通的考察来解决问题，最终都诉诸金生产者的活动。除了求助于信用的方案外，马克思对所有解决方案都心存怀疑，尽管它们至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少有一些技术上的可能性："只要那些和信用制度一起发展的辅助工具发生这种作用，它们就会直接增加资本主义的财富……这样也就解决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生产按它现在的规模，没有信用制度，只有金属流通，能否存在。显然，不能存在。相反，它会受到贵金属生产的规模的限制。另一方面，我们对于信用制度在它提供货币资本或使货币资本发生作用时所具有的生产力，也不应该有任何神秘的观念。"①不幸和令人沮丧的是，他补充道："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不属于这里的范围。"②

我认为，我们可以从这推断，财富的积累伴随着在信用制度中的债务积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债务的积累导致了财富的积累。后者总是取决于劳动的生产力。

本章的最后一节考虑了用于新的投资的货币怎样逐渐形成了一个潜在资本的储备，直到它足够建立一座新的工厂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假定"这里没有"信用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积累货币的"资本家必须首先"卖而不买"。如果只是发生在许多个别资本家身上，这么做不会有什么问题。而在"资本家阶级的普遍的货币资本积累"的情况下，"困难就会发生了。按照我们的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取得了普遍的和惟一的统治，除了资本家阶级外，只有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所购买的全部物品，等于他们的工资的总和，等于整个资本家阶级预付的可变资本的总和。通过资本家阶级把他们的产品卖给工人阶级，这些货币流回到资本家阶级手里"。③但是工人阶级"无论如何不能……购买代表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产品，更不用说购买代表资本家阶级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④前面已经指出，必须有作为"流通基金"来发挥作用的"货币基金"，它不同于扩大再生产需要的"潜在的货币资本"。马克思考虑了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潜在的货币资本可能存在于哪里，他认为有银行存款、公债券和股票。但是用于实现剩余价值的流通基金在哪里呢？当货币不得不被用于这个目的，甚至为此而进行贮藏时会发生什么？不幸的是，马克思没有给出答案。

十

资本的再生产
（第二卷 第18—20章）

在第二卷的第三篇中，马克思设想了一个分成两大部类的经济。第一部类为其他资本家生产生产资料（原材料、半成品、机器和包括生产的建成环境在内的其他固定资本项目）。第二部类生产供工人和资本家个人消费的消费资料（也包括消费的建成环境）。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必须从第一部类购买其生产资料。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必须从第二部类购买其消费资料。这种经济要想平稳运行，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就要互相平衡。在简单再生产（没有扩张）的情形下，流向第二部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必须与流向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资料的价值相等。

这就是马克思在这几章考察的经济的基本模型。在开头先描述出这个模型的一般特征，是很有帮助的。一旦我们牢牢掌握了这个模型的一般形式，处理马克思围绕它进行的细致研究就容易地多了。

第二卷的第438页到第442页，描述了所谓的“再生产图式”。尽管马克思使用的是一个算术例子，要给出其代数形式也很简单。在给定年份中，每个部类的总产出，在价值形态上表现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马克思把固定资本和周转时间差异的问题先搁置起来，并假定，所有产品都在一年内生产和消费。然后他构造了一个简单的算术例子，按照价值单位进行了计算，其中两大部类内的剩余价值率（m/v）和价值构成（c/v）都是相等的。因此，对于每一年，他假定：

第一部类：4 000c＋1 000v＋1 000m＝6 000 生产资料

第二部类：2 000c＋500v＋500m＝3 000 消费资料

用代数形式，这可以表达为：

第一部类 $c1+v1+m1=w1$(生产资料的总价值)

第二部类 $c2+v2+m2=w2$(消费资料的总价值)

生产资料的总需求是 $c1+c2$。消费资料的总需求是 $v1+v2+m1+m2$。如果我们假定，需求和供给是均衡的，那么

$$W2=c2+v2+m2=v1+v2+m1+m2$$

在等式两边消去同类项后，得到

$$c2=v1+m1$$

如果这个能够确保连续、平衡的再生产的必要的价值比例能够实现，那么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必须等于第一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在这个算数例子中，第二部类中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2 000c，等于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1 000v＋1 000m 的个人消费。“由此得出结论，”马克思说，“在简单再生产中，第一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 v＋m 价值额(也就是第一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与此相应的比例部分)，必须等于不变资本……也就是第二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分出来的与此相应的部分。”①

坦率地说，接着会出现很多疑问：例如，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实现过程是如何安排的，以使这个恰当的比例(至少粗略地)可以实现？当固定资本在部类间的配置不均衡和资本的周转时间不同时，会发生什么呢？并且，最重要的是，在第21章提出了首要的问题——积累如何在一个不断扩大的规模上进行的同时保持这种恰当的比例呢？

马克思所设计的图式包含了各类假设——只有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在第17章中简略陈述过)；只有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消费资料的两个部门(尽管在某些时候他确实又将消费资料分成必需品和奢侈品)；需求与供给是均衡的；所有产品的周转时间都是一年；没有技术变革；所有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产品按其价值进行交换——这还只是提到的一些主要的假设。尽管马克思最初承认，他应该“既在价值又在物质”(使用价值)形式上[①]考察再生产过程，但事实上他仅仅在价值形式上解决了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因此要假设再生产物质上的数量需求会自动得到满足。从这些假设中会引出很多问题，而放松这些假设会引起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性。

第二卷的第三篇构造了一个运行模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通过资本的连续流通实现再生产的。这显然是第二卷中的高潮部分。因此这一篇与第一卷的第七篇类似，那一篇把第一卷前面提出的许多深刻的见解整合在了一起。这两卷都包含了简单再生产和之后的扩大再生产的预备章节。但是它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第一卷中，“一般规律”综合了许多前面提出的研究结果，建立起一个能够解释规模不断扩大的工人产业后备军生产的运行模型，这些产业后备军遭受着失业和日渐加剧的贫困化。虽然第二卷也很好地利用了前四章中阐述的资本的不同循环之间的差异，但它还从许多其他重要的发现——尤其是关于固定资本的流通和周转时间的差异——中作了抽象，来构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的一个尝试性的图式。

在这些图式中，应该要注意，工人的消费占有“在比例上有决定意义的部分”。[②]因此如果这个图式有一点政治指向性的话，那就是稳定工人收入的必要性，这是为了协调生产资料的总产出和对消费资料的总需求之间的关系。这与第一卷中的发现相矛盾，在那里马克思把工人阶级日渐加剧的贫困化视作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但是，因为第二卷并没有与“一般规律”等价的一章，马克思仅仅是暗示了这个矛盾。这样猜想一下很有意思，如果“一般规律”那章没有写出来的话，我们会怎么解读第一卷呢？——因此我们只有关于简单和扩大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再生产的章节。

相反地，我们需要想象一下，第二卷中与“一般规律”那章等价的章节，可能是什么样呢？例如，为了使市场上价值实现的条件保持稳定，在很多地方，会有数量庞大的工人日益被卷入到无止境的、越来越盲目的消费主义浪潮中去吗？再者，考虑到他们痴迷于诱人的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的程度，这些工人是如何对社会主义革命失去兴趣的？反消费主义(这类运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在许多地区确实很活跃，而且它如今是很多环境政治学的核心)在革命运动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呢？当然，很难想象，马克思竟然会写下这么一章，并且对于多数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想法几乎肯定会被谴责为具有诽谤性。

但是，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很有趣的一点是，它们决不拒绝这些可能性(举个例子，这几乎就是罗莎·卢森堡对它们的内容感到如此失望的原因)。并且，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70%的经济活动，都是由消费主义驱动的(相反中国只占一半，可能更接近于马克思所处的年代盛行的情况)，而且许多所谓的“富裕的”工人，确实深深地醉心于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和所有明显的缺陷)的消费主义之中。因此，在这里我们手头就有些工具可以用来分析这一类政治经济形势。显然，这与第一卷第25章中工人日益贫困化的论点之间的矛盾，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然而，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能仅仅因为它是严重的和棘手的，就避开这个矛盾。

但是，确实存在巧妙处理这个核心矛盾的方法。马克思在某些地方提到了我们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①的存在。在当代条件下，那个阶级的主要作用是作为消费的中坚分子，并且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运行提供广泛的政治支持。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就求助过人口中的这个阶层，当马克思提到工作日的管制是如何实现的时候，因为“资本的抵抗力量就逐渐削弱了，而同时，工人阶级的进攻力量则随着他们在没有直接利害关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系的社会阶层中的同盟者的增加而加强了”。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②中设想的研究计划之一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那里他承诺，要研究“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在其对创立1871年巴黎公社的政治力量的重要描述中，马克思突出强调了负债累累的“新兴中产阶级”(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描述的“小资产阶级”，那本书分析了1848年以后的反革命运动)在这些年代的政治斗争中的作用。③

马尔萨斯首先指出了这个社会阶层在提供必要的有效需求方面的重要性(尽管他观念中的消费者阶级更纯粹地是贵族化和寄生性的，现在不具有政治可行性——除了海湾各国中)。由于我们早已接受了这个观点——一个主要充当经理层、管理层和服务角色，有着稳定且足够工资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都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可以认为，我们目前遇到的矛盾源自马克思的两阶级模型的假定，而不是任何现实情况。三个阶级情况下的矛盾可能表现为第一卷中设想的对更低下的工人阶级(例如，在中国)的工资压制，以及第二卷中设想的，收入向中产阶级(包含富裕的工人阶层和非生产阶级)消费者(例如，在美国一些工人拥有房屋所有权，且实现了郊区化的生活方式)的流动，它足够提供必要的有效需求。当然，在马克思的图式下，中产阶级的收入最终都必须来自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尽管在现代情况下，这毫无疑问会由以债务驱动为基础的国家在消费基金上的支出和促进中产阶级消费主义(尤其是与住房需求有关的)的信用扩张来补充。有意思的是，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北美和欧洲很多地区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是岌岌可危的——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过度负债——并且这与对支撑经济的有效总需求不足的大声哀叹有着直接联系。通过中国和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3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③ Karl Marx,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9).

其他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形成而可能实现的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作为一种补偿运动被抱以厚望。现在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面临很强的内外压力，采取积极措施来刺激国内市场。我们也能听到一些贸易盈余国家中有影响力的政策制定者的要求，例如德国，要求放松工资压制的倾向（第一卷中的）并且刺激消费（第二卷中的）以帮助总体经济增长（迄今为止德国拒绝了这样的要求）。我发现，倘若我们能够灵活地、广泛地加以利用，那么在再生产图式的一般框架内考虑当前的形势是很有用的。

但是，另一种巧妙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直接来自这个事实——生产性消费源自扩张中的追加投资。并没有确定资产阶级的个人消费与其扩张中追加投资的动机或需求之间的关系的黄金法则。在第一卷中，这个决策被描述为存在于每一个资本家胸中的，在对享受的渴望与对追加投资的强烈要求间的一个浮士德式的矛盾。但是，追加投资不仅取决于竞争的强制规律的力量和强度，也取决于对高利润的期望——这反过来又取决于资本家对未来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处理方法。无论怎样，总需求的扩张，对扩张和追加投资的波动的敏感度，与对工人、资本家以及人口中的其他阶层的个人消费的扩张的敏感度是一样的。

与第一卷相比，第二卷还有其他显著的差异。在第一卷中，与技术细节相比，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阶级关系的再生产，以及发现自己陷入了无止境积累（“为积累而积累”）的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更感兴趣。与“怎样”相比，他对“为什么”更感兴趣。而在第二卷，对于“为什么”的关注基本上消失了。相反，他建立了资本是怎样永远地进行积累的技术模型。读这几章的时候，记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即阶级关系的再生产，尽管很少提到它，始终是核心问题。

对给定的再生产图式的数学形式来说，你会发现，它偶尔会被适用于当代经济学的强大的数学工具详细表达出来，这是不足为奇的。因此，尽管第二卷的很大部分还处在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的庇护下，

但再生产图式已越来越被人们知晓，并且被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经济学家详细地考察并进一步地发展了。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图式似乎也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中扮演了一个隐蔽的角色。因此，尽管文学理论家、历史学家、神学家、哲学家和其他对马克思的著作感兴趣的人，很少讨论这个图式以及对它的阐释，经济学家已经对它着迷了。许多经济学家甚至推断说，马克思最终恍然大悟，抛弃了其愚蠢的、辩证的、关系性的研究方式，转而信奉起传统的经济学方法。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当然，第三篇中显而易见的辩证的、关系性的内容，确实哑然无声了，如果说不是缺失了的话(黑格尔的幽灵消失了)。但是，我们始终能够发现，马克思为接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提出的一般(和非辩证的)框架做好了充分准备。他频繁地在一种更广泛地辩证的、关系性的和历史性的批判中嵌入一种传统经济学(例如，第一卷中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可以接受的技术“建模”的方法。第二卷大部分都明显缺乏这种广泛的批判，这并没有证明方法上的任何变化。当我们将第三卷中对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的更加关系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第二卷中技术性的阐释联系在一起时，这变得很清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计划的总体性质，必然包含一个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矛盾中摆脱出来的有力的辩证性、社会性和关系性的批判。我认为，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么揭示出那个批判，要么将其注入不完整的第二卷第三篇中。

这样做，明显的方法就是要问：在似乎描述了资本积累的稳定、持续的扩张的图式中，隐藏的矛盾和对立在哪里？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就是第一卷揭露的工资压制和工人贫困化加剧趋势与第二卷中提出的工人阶级消费对价值实现的“决定性”作用之间的冲突。另一个矛盾来自马克思的分析——除了通过危机的方式，否则不可能调和固定资本的补偿、修理和维护与这个图式描述的均衡条件的关系。我们应当看到，还有其他可能性。

投入↓ \ 产出→	农业	采矿业	能源	制造业	建筑业	服务业	政府	总产出
农 业	300	10	100	20	40	10	200	680
采矿业	30							¦
能 源	50							¦
制造业	150							¦
建筑业	40							¦
服务业	70							¦
政 府	40							
总投入	680	----------						

里昂惕夫投入产出矩阵

每一列从上往下表示每个部门的全部投入的来源(注意:农业为农业提供物资,比如种子、饲料等)。每一行从左往右表示一个部门(如农业)的全部产出的去向。在这张表中,投入和产出相等,因此经济处于简单再生产的状态。

表3

在这里,插入一个主流经济学后来对马克思的图式的基本思想进行发展的例子是很有用的。我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表明再生产图式后来具有的重要性,也为这个图式是关于什么的给出一个更清晰的概念,并阐明其实际应用的可能性。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瓦西里·里昂惕夫是一名俄国经济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先是去了德国,后来又到了美国。他为了创立后来广为人知的“投入产出分析”,详细研究了马克思的模型。图6举出了一个典型的里昂惕夫矩阵,垂直一列是不同产业(投入要流向的产业)的投入数据,而水平一行是那些产业(产出要流向的)的产出数据。使用这样一个投入—产出矩阵,对于一个给定的产业(例如钢铁业),可以估计提高产出水平需要多少额外的投入(例如煤炭、能源和铁矿石),还能反复地追溯增加煤炭生产所需的额外投入(例如,额外的机器和这些机器所需的额外的钢铁)。里昂惕夫靠投入产出分析而获得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它在战后繁荣的和平年代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的一种计划工具得到了广泛利用，直到今天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仍具有重要地位。这个技术也被吸收到通常由共产主义政权设计的五年和十年计划中去了，也被许多民主的准资本主义国家所使用，例如独立后的印度。简而言之，它成为中央计划的一个重要工具。

里昂惕夫主要构建了物质(使用价值)流动的模型(马克思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是价值流动)。如果有不同产业投入和产出的足够多的数据，将投资和劳动力分配到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方面以保证平衡增长就是可能的。否则的话，这总是会存在风险的，例如，钢铁或能源生产的瓶颈可能会阻碍其他各处的增长。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和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对投资和劳动的合理的社会配置是公共政策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尽管使用这种技术进行的中央计划的名声并不太好，但在公司内部，我们正在使用其更精确的版本以确定复杂的生产体系中的最佳效率。

然而，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要解释，马克思自己想要用这个图式表达什么意思。他假定，生产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两大部类的产出和投入，在价值流动上各自达到均衡(事实上他并没有使用“均衡”这个词，而是使用了“必要的比例”)。这是否意味着协调的和永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实际上是可能的？在前言中，恩格斯就担心这些材料不能为政治鼓动提供支持，而罗莎·卢森堡认为，接受这些图式的有效性会使政治斗争变得毫无意义。或者，马克思想要说明，因为市场配置不可能趋向于恰当的比例，资本主义条件下协调的积累是不可能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会是，劳动在不同劳动部门之间比例合理的配置仅仅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吗？马克思满怀希望地说：“假如生产是共同的生产，不具有商品生产的形式，情况又会有哪些不同，这是以后研究的问题。”①不幸的是，他没有兑现这个承诺。

即使正如马克思所论证的，为个人私利而奔波的个别资本家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是不可能达到正确的比例的——“除非是偶然地”，但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5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是小型的“比例失调”危机也许可以使系统整体围绕可持续的均衡增长路径波动。毕竟，他在第一卷中已经说明了，“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①第一卷中的积累模式的最终崩溃，并不是由于任何技术上的不可持续性。它是由于不断增长的群众的日渐加剧的贫困化，这些人会反抗和剥夺越来越富裕并日渐缩小的剥夺者群体。在第二卷的末尾，马克思并没有插入任何类似的关于革命的必然性的观点。第二卷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工人阶级通过其消费积极地促进了价值的实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第一卷中的政治性减弱了——如果说不是被否定了的话。

第二卷第三篇中的思想，构思于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70年代得到详细阐述，在1878年达到高潮，那时马克思致力于其最后的理论著作，对它们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因此，这些章节是在第三卷的大部分已经初步写成，且第一卷已经出版后写出来的。它们也是在英国的工资于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内一直在稳定上升的时候写出来的，那时工人分享了生产力提高（可以说是，一个从绝对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转变）的一些好处。这些思想，是用一种技术性的、很大程度上非辩证的方式进行研究的。它们很大程度上对更广泛的历史和社会问题，以及危机形成的问题置之不理（即使危机的许多可能性已经揭露出来了）。

后来的研究从不同方向对这个图式的技术特性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且极大地提高了描述的数学复杂性。这些阐述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加深了马克思留下的奥秘。例如，安德鲁·特里格最近的一项研究说明，“如果不能清楚地说明再生产图式的目的，那么对它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它们如何同第二卷的剩余部分联系起来，以及它们如何同整个《资本论》联系起来，就不能达成一致”。②总之，用马克思自己的术语解释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4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Andrew Trigg, *Marxian Reproduction Schema: Money and Aggregate Demand in a Capitalist Econom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2.

马克思，在这个情形中近乎是不可能的。

向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经济理论都不怎么熟悉的读者介绍这些章节有很多困难，这远远超出了通常出现的不完整和离题的文本问题，以及批判和反批判的复杂的语言，更不用说马克思钻研许多会计琐事和使用转弯抹角的算术例子的倾向。后来对这个图式的数学研究，把我们带入了普通人很少涉足的领域，而马克思的阐述几乎也是同样稀少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我们解释这些图式的方式会影响对价值和价格等基本概念的解释，而当和第一卷一样对其进行探讨时，会创造出一个关于资本再生产的动态的完全不同的图像。在这些情况下，我能够做的最佳选择，就是贴近文本和主题，仅仅浏览一下那些看上去最为冗长或繁琐的内容。对于希望进一步了解这些问题的读者，我还附上了一个简短的参考书目。[①]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我和你们，亲爱的读者，必须尝试一下，去解决这个图式究竟在说什么这一棘手的问题。

论第二卷第18章：导言

在这篇导言性质的章节(很快就偏离了)，马克思的主要目的是考察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经济是如何由无数的个人活动构成的，以及那个整

---

① 关于再生产图示的文献其实有很多。有些是要求高等数学知识的，其重点是在放松马克思的一些限制性假设条件的情况下，对再生产过程的技术方面进行研究。经典的文章包括 Henryk Grossmann，*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the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Being Also a Theory of Crises* (London: Pluto, 1992)；Paul M. Sweezy，*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rinciples of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42)。对于 Luxemburg 的异议，参见 Rosa Luxemburg，*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Routledge, 1951)。调查性著作包括 Meghnad Desai，*Marxian Economics* (Oxford: Blackwell, 1979)；Michael C. Howard and John E. King，*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London: Longman, 1975)；Shinzaburō Koshimura，*Theory of Capital Reproduction and Accumulation* (Kitchener, Ontario: DPG Publishers, 1975)。对那些从凯恩斯主义的视角对这个论证的数学上的严密的研究感兴趣的读者，参见 Trigg，*Marxian Reproduction Schema*。对于这个图式的一个详尽的新古典主义研究，参见 Michio Morishima，*Marx's Economics: A Dual Theory of Value and Growth* (London: Cambridge Univermity Press, 1973)。

体是如何建构的。他一开始就提醒我们资本流动的连续性的重要性——即货币循环是如何在一个“不变的重复”过程中中介着资本的生产性循环(反之亦然)。结果就是以“流通过程中的转化”为条件的“作为生产资本”的资本的“无限的重现”。牢牢记住形式不断变换(从货币转化为生产再转化为商品最后回到货币)的思想非常重要。毕竟,作为过程以及作为流动的资本的概念,是马克思的经济和资本概念的鲜明特征。“但是,”马克思说,“正如每一单个资本家只是资本家阶级的一个分子一样,每一单个资本只是社会总资本中一个独立的、可以说赋有个体生命的部分。社会资本的运动,由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的总和,即各个单个资本的周转的总和构成。”①

个别资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至关重要的,要记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个性和自主性并非源于自然给予的权利,而是一种市场社会兴起的历史产物,是资产阶级法律的历史产物,是货币化和商品化的历史产物——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必要前提。马克思经常被描述为否认个性和自主性,但事实上他一直在强调它们的重要性,并阐述它们是如何形成的,这让我觉得很奇怪。

此外,生产性消费也包含着“可变资本到劳动力的转换”。工人作为劳动力商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另一个前提)的载体进入了市场。但是,工人也为其个人消费购买商品。“在这里,工人阶级是买者,资本家是向工人出售商品的卖者。”②这两个伟大阶级中的个人,作为买者和卖者互相联系,这与生产者和剩余价值的剥夺者之间的关系是迥然不同的。工人阶级的消费(其消费主义)成为市场中价值实现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同其他人一样,工人作为买者也拥有着自主性和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选择权。

> 因此，总括起来成为社会资本的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也就是说，就社会资本的总体来考察的循环，不仅包括资本的流通，而且也包括一般的商品流通。后者本来只能由两部分构成：1. 资本本身的循环；2. 进入个人消费的商品的循环，也就是工人用工资，资本家用剩余价值（或其中的一部分）购买的那些商品的循环。①

然后马克思明确地回顾了在第一卷和在这里阐述的内容的关系。所有物品都按价值进行交换的假设，允许他在第一卷中把除劳动力的买卖之外的流通问题抽象掉。但是，第二卷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关注的是流通而不是生产过程，向我们介绍了流通时间的复杂性。但是分析主要停留在“单个资本，社会资本中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②的层面。“现在，我们就要考察作为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各个单个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个过程的总体就是再生产过程的形式*），也就是考察这个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③我们应当回想起来，这既是关于阶级关系的再生产，也是关于通过流通过程进行的商品和资本的再生产。

那么现在我们要考虑的，就是社会总资本是如何再生产的。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货币资本在总资本中的角色的转变（或许，我们更应该称其为一个“插入”）。尽管马克思说，他认为应该在后面再进行分析，但他决定在这里就考虑这个问题。这个转变有许多重要意义。在商品流通中，商品的用途问题是最重要的。但在货币流通中，我们有可能将其用途抽象掉，将注意力集中在数量和数量关系上。我稍后会回来讨论这个差异。如果说扩大再生产有一个严重的问题的话，那似乎就是它以某种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强调是作者加的。

方式与货币资本的介入联系在了一起。当然，他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要社会地和理性地使用这些图式来安排生产，首先要求废除货币资本的力量。

从单个资本的立场来看，货币资本“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再次注意“表现为”这个词的含义。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无论是社会地考察还是个别地考察”，都假定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特别是流动资本，要求货币资本作为动力经过一段时间不断地反复出现”。①表面上看，这与第二卷开头提出的货币的概念是不同的，货币在那里并没有被定义为资本，因为货币只能行使货币的买卖职能。货币在这里表现为资本，大概依赖于其拜物教特征(这是第三卷中对货币资本分析的核心)。另外，正如第一卷所表明的，这个货币资本的数量并没有绝对的或内在的限制。

这给了我们许多暗示。货币是被私人占用的社会力量的一种形式。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一个资本家能够积累的货币权力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在社会整体中，似乎确实存在着一个限制，尤其是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金是整个货币体系的“枢纽”的世界里的话。我们有很多方法来避开这个由金施加的限制——提高流通速度，发行纸币，将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以及创造信用制度。当你处理总体经济的问题时，千万不要认为可用的货币数量会有一个界限。由于现在货币已经失去了其金属基础，它能够由中央银行无限制地创造出来。非常引人瞩目的是，美联储可以宣布在任何它喜欢的时候将一万亿美元注入经济中。尽管事实上这可能存在一些政治上的限制(导致金融萧条)，它们总是可以被绕过的。

但是马克思再一次转变了方向：“并入资本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扩大，在一定的界限之内，不是取决于预付货币资本的量。”在这里马克思回到了第一卷第22章题为“几种同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关但决定积累量的情况……”的那一节。这些方式包括让劳动力更努力地工作；利用各种方法来提高生产效率，包括通过“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科学进步的应用；从自然，以及很久之前就已经被摊销了的建成环境中的过去投资（“土地所有权早就一再被社会赎买回来了”）中提取的“免费的礼物”；科学和技术；协作的重组；周转时间的减少。①

事实上，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的东西，资本家不用支付任何东西或者预付任何额外的货币资本就能够榨取额外的价值。“但是，这一切显然和真正的货币资本问题无关。这只是表明，预付资本……在转化为生产资本之后，包含着生产的潜力，这些潜力的界限，不是由这个预付资本的价值界限规定的，这些潜力能够在一定的活动范围之内，在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按不同程度发挥作用。”②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马克思觉得有必要提醒我们这些。尽管货币资本表现为第一推动力以及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以及资本的再生产）的自我维持的发动机，但它显然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因此一方面他似乎想削弱货币资本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历时较长范围较广的事业，要求为较长的时间预付较大量的货币资本。所以，这一类领域里的生产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拥有的货币资本的界限。这个限制”——真是太出人意料了！——“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货币市场的混乱会使这类企业陷于停顿，而这类企业反过来也会引起货币市场的混乱。”③

长期投资这个严重的问题在第二卷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如果这里有使资本积累的动态彻底崩溃的情形，那么我们主要的关注点就是历时较长的固定资本投资的问题。麻烦在于，这种投资在再生产图式中基本都被假定为不存在的，尽管我们不是第一次被提醒道它们对于资本和任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691—7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何其他替代物的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在社会生产的基础上”——我假定他的意思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生产，尽管他也可以指联合的资本——

> 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在社会的生产中，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一样，在劳动期间较短的生产部门，工人将照旧只在较短时间内取走产品而不提供产品；在劳动期间长的生产部门，则在提供产品之前，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取走产品。因此，这种情况是由各该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造成的，而不是由这个过程的社会形式造成的。在社会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①

这一段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在这些章节不断重现的思想：在一个可选择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经济的建设中，这些图式可能会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处理大规模长期工程的问题，正如它在资本运动规律中是有问题的一样，对建设任何反资本主义的替代性生产方式而言也是基础性的问题。除此之外，我不会对这一观点作进一步的评论。对于物质形式的平衡与价值流通平衡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这里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暗示——我后面也会回到这个话题。怎样免除货币资本的权力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但是，纵观这些章节，马克思频繁地说明，商品流通“可以在非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②它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前做到，那么推测起来，在其消亡后它应该仍旧能够做到。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二卷，第 396—39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二卷，第 39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论第二卷第19章：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法国的医生、经济学家弗朗斯瓦·魁奈的《经济表》（1757—1759年首次出版）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图式。那么魁奈是谁？为什么他的构想如此特别、如此重要呢？魁奈（1694—1774）是路易十五宫廷里的一个外科医生。作为一个享有特权的医学从业者和国王的知心朋友，魁奈不仅增进了其医学知识，也思考很多关于国家政体的本质的问题。他对威廉·哈维引发了医学知识革命的关于血液循环的发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看到了它与资本在国家内部流通的相似之处。

我总是很喜欢资本流通和血液循环之间的对比（可能因为我恰好出生在离威廉·哈维的出生地相距大约四十英里远的地方！）。我曾把这个想法作为《资本之谜》的导言的基础，但我早就忘记了，直到为了写这本书而再次阅读第二卷的时候才被突然地提醒到，魁奈首先使用了这个对比。

威廉·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取代了盖仑统治了几个世纪的理论。在盖仑的理论中，心脏是血液生产的中心，血液从心脏流到各个器官，然后被耗尽。这是一个从生产流向消费的单方向模型。与之相比，威廉·哈维把心脏看作是使血液在全身持续循环的一个泵，血液通过与外部资源物质进行的代谢转化得到补充和净化。魁奈将哈维的概念应用到了政治经济学中，因此马克思——带着对流动性、持续性以及价值流通的强烈关注——明显被魁奈的思考方式吸引住了。问题在于，魁奈坚持认为只有农业部门才生产价值，工业生产是寄生于农业的。魁奈不敢批评凡尔赛的挥霍性消费或贵族的消费主义，因此他假称，农民和拥有土地的贵族都从事价值生产，从而掩饰了对农民榨取的剩余价值。这个“重农主义的”（主要在法国）观点与“重商主义”（当时主要在英国）形成了对比，后者将通过贸易积累金储备看作是经济政策的圣杯。

马克思反对这两个学派的思想。但是，考虑到当时法国所盛行的产

业结构，魁奈的重农主义见解似乎有一些合理性，因为从农业中榨取的剩余价值，支持了主要为贵族消费(可以去参观一下魁奈生活的凡尔赛，看看那个时代所谓的工业通常生产什么东西)生产奢侈品(珠宝、高档衣服、陶器、地毯，等等)的手工业的产业结构(与马克思看到的工厂完全不同)。

尽管马克思明显拒绝了魁奈的重农主义理论，魁奈的经济流量模型(flow model)还是很有意思的。它似乎提供了一个摆脱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弱三段论"模型束缚的科学方法，在那个模型中，像盖仑一样，生产的中心性支配着分配的特殊性，直到通过消费的个别活动将其完全消耗掉。正如皮耶罗·斯拉法——凯恩斯的一名亲密同事和李嘉图全部作品的编辑，在一篇对我们这里发展的论点有重要意义的著作中所说的："生产和消费体系作为一个循环过程的最初图景，当然是从魁奈的《经济表》中发现的，而且它与现代理论所呈现的从'生产要素'到'消费品'的单行道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①我认为要重点注意的是，后者纯粹是盖仑式的，仍然统治着传统经济学的思维。

我知道现在我偏离了马克思的文本。但是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这里的观点至关重要。正如斯拉法提到的，如果还是这种情况，即当代经济学理论陷入了盖仑模型的模式之中，而如果马克思转而接受了魁奈或威廉·哈维的模型，那么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就仍然存在彻底的决裂。我在《资本之谜》中引用这个彻底的决裂来解释，为什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没能注意到系统性风险的威胁与可能的失败，而马克思关于资本流通的连续性遭到破坏和可能出

① Piero Sraffa, *The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斯拉法所展示的是，新古典主义的整个经济学框架都是建立在一个同义反复基础上的。但是实际上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特别是 Ian Steedman, *Marx After Sraffa* (London: Verso, 1977)——用斯拉法的分析技术来摧毁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流行的(非辩证的)见解，而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在许多争论后决定完全忽视他的数学证明和发现！新古典主义者可能走出同义反复的唯一方法，可能就是辩证地重新阐述他们的论点，但是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现的严重障碍(从劳动供给到自然资源的所有东西，或有效需求的缺乏)的理论，是如何揭示危机的根源的。绕过或越过这个障碍的失败，或者缓解堵塞的努力的失败，会导致资本运动的崩溃，并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毁灭，这和动脉阻塞会终结人的生命一样确定无疑。尽管无疑这个比喻太过戏剧化了，它有一些有趣的推论。在盖仑的理论中，治疗通常都是流血类的(理解为：紧缩)，或者后面会伴随着输血(理解为：世界各地中央银行的量化宽松和流动性释放)，这两者从马克思的理论观点来看，都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理论中面临危机时的稳定政策，要求分析资本流动的持续性遇到的主要阻碍和障碍；同时采取措施解决所有障碍，努力使经济体系回到再生产图式所展示的也许可能的那种均衡——我强调了"也许"，因为这绝不是一个必然。

但是马克思的基本命题依然是：长时间中断资本流通后，资本就会灭亡。我们需要一个流量模型来理解这些动态，马克思在魁奈的基础上第一次阐明了这个模型可能是如何建立的。不足为奇的是，那些转向这个方向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例如，有些宏观经济理论家)会在某种程度上从马克思的关键创新中得到灵感——如果他们敢于承认的话，即使他们反过来又提出了许多棘手问题，与马克思的资本运动规律的一般理论中的这些再生产图式有关。

关于魁奈的公式，还有重要的一点。恰恰因为他对流通的持续性感兴趣，魁奈强烈拥护流通和运动的自由。在当时的法国，这受到了严重阻碍，不仅是因为交通运输的物理障碍，也是由于地方势力对道路和桥梁征收的数不清的通行费和关税。魁奈倡导削减和废除所有这些运动的社会和政治障碍。他首先使用了"自由放任"这个术语——一个被亚当·斯密以及后来主张自由贸易的整个李嘉图学派频繁使用的术语。

马克思实际上在第十九章对魁奈还不够重视。马克思在其他地方将亚当·斯密对魁奈的解释称为"难以置信的错误"，这一章以对斯密的这种批评为主。斯密正确地纠正了魁奈认为价值只能在农业生产中创造出来的错误观点。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错误的价值理

论，认为价值等于魁奈已经识别出来的所谓的基本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之和。当然，这个价值理论与传统的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完全不同。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统治了李嘉图之前的政治经济学的“荒谬的想法”。①斯密的价值加总理论后来被新古典学派进行了修正，将基本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成本(而不是绝对价值)结合起来形成价格(这是盖仑模型在起作用)。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进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思想的核心。斯密的“荒谬的公式”因此长存至今。

马克思的理论不包括这些。他通篇都沉迷于反击亚当·斯密的“难以置信的错误”。他发展再生产图式的目标之一，当然就是证实斯密的解释及其后来的影响是不可信的②。如果价值等于土地、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之和，那么在理论中就没有对已耗尽的不变资本补偿的位置了。在那种情形下，资本的再生产就是不可能的：

> 在这里，局限性在于，斯密没有像魁奈已经看到的那样，看到不变资本价值以更新的形式再现出来，因而没有看到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只是为他的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多提出了一个例证，而且是一个错误的例证。③

因此，这里的内容与上文(本书第四章)概述的马克思对斯密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范畴的批评是有联系的。马克思总结说，“斯密的混乱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他的教条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信条”。④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27—4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这是 Fred Moseley “Marx's Reproduction Schemes and Smith's Dogma”, in Christopher John Arthur and Geert A. Reuten, eds., *The Circulation of Capital: Essay on Volume Two of Marx's* Capital (New York: Routledge, 1998)的主要观点。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论第二卷第20章：简单再生产

第20章类似于第一卷的第21章，它们的标题是相同的。回忆一下，马克思在第一卷中使资本如何实现再生产的技术问题，从属于资本和劳动的阶级关系再生产问题。尽管第二卷的分析把资本如何实现再生产问题的技术方面放在了显著位置，但是在第一卷强调的资本–劳动关系再生产的要求的背景下阅读这些材料是有帮助的。

马克思的目标是考察社会总资本的流通。他想要知道，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与单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相比有什么显著特征"，以及"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共同特征"。他从第一卷中的立场开始：

> 年产品既包括补偿资本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即社会再生产，也包括归入消费基金的、由工人和资本家消费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就是说，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这种消费包括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即维持)，因而也包括总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再生产。①

正如前面提到的，关注点在于商品形式的资本："再生产过程必须从W′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观点来加以考察。"②这样做是因为我们需要关注哪种商品被用于哪种用途(工人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与生产消费的区别)，也是因为我们不能再假设——像单个资本流通中的情况那样——从W′到货币形式再到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购买不受任何扰乱。我们需要知道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如何以恰当的数量和在恰当的时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间提供到市场上的。再者，

> 工人用工资和资本家用剩余价值所消费的那部分社会商品产品的运动，不仅是总产品运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而且同各单个资本的运动交织在一起。因此，只是假定这个过程发生，是不能说明这个过程的。①

在第一卷分析中很普遍的一般假设，现在站不住脚了。尤其是，作为纯粹的消费的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消费，现在以在第一卷的视野中被排除掉的方式进入了我们的眼界。但是，第二卷前面的几个地方已经清楚表明了它的重要性："直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生产上消费掉的资本，就它的价值来说，怎样由年产品得到补偿？这种补偿的运动怎样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消费和工人对工资的消费交织在一起？"②

但是，为了考察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一些假设的。我们从第二卷的大部分分析所依赖一般假定开始："我们不仅假设，产品以其价值进行交换，也要假设，生产资本的组成上，没有发生价值革命"(即没有技术变革)。价格实际上可能系统性地偏离价值(第三卷的一个论点)，而且技术和组织上的变革会持续引发价值革命(第一卷中的观点)，但马克思大胆地断言这对其论证的一般框架"并不会有任何影响"。③在第二卷的大部分内容中还有一些不言而喻的假设，它们对再生产图式有重要的影响。例如，我们只考察两阶级的资本主义模型，资本家和工人在一个封闭体系中提供了所有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只在偶然情况下，才会有其他阶级，或者与前面提到的非资本主义阵营进行的全球贸易)。接下来，我们也具体假定，资本家和工人都将全部可支配收入花在消费上，而且所有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物品都每年周转一次（简单处理了固定资本的问题，但是并没有真正进入论证），以及不存在非生产活动（例如马克思所称的资本主义流通的意外开支）。显然马克思希望使用这个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无掩饰”的模型，从理论上探索可能实现平衡增长的条件。

> 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为总资本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他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①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难点。在再生产过程中，不仅价值要得到补偿，使用价值也要得到替换。例如，如果要进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的话，进入到劳动力的价值的特定使用价值必须以恰当的数量生产出来。生产消费需要的特定的使用价值，也需要再生产出来。必须假定这些物质要求与价值关系的必要再生产是相称的。但是，这并不会自动实现。在一个典型的里昂惕夫投入产出体系的模型中，生产用于制造汽车引擎的钢铁所需的铁矿石和煤炭的数量，都可以在一个投入产出矩阵中模型化为一个物质过程。这个模型是物质模型，是建立在使用价值基础上的。伴随这些使用价值关系的资金流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一个可能会平稳运行，另一个可能就不会。我们以哪个为基础呢？马克思似乎两者都想选择。然而，接下来，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使用价值和物质模型，要么逐渐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要么被假定为会毫无疑问地塑造价格和货币、价值流动。我们所得到的，在以使用价值初步定义了生产部类间的一个宽泛的划分之后，是一个反映了使用价值的差异和要求的社会总资本运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37—4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动的纯粹的价值(货币)分析。价值和货币分析与物质上的使用价值流动之间的潜在矛盾，并没有得到考察。

考虑到马克思的习惯——在《资本论》的开头就强调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对这个矛盾的掩盖暗示了这里是产生危机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应该寻找再生产图式内的崩溃的地方。事实上，这个分裂引起了从物质和使用价值方面解释再生产图式的学者(一般指新李嘉图学派，包括皮耶罗·斯拉法)与从货币方面进行考察的学者(与凯恩斯主义者类似)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认为要想合理地将这些图式用于社会协调，首先要废除货币资本的作用，这暗示了图式中的基本矛盾就出现在这里——而从货币流动的立场而言，固定资本形成的物质要求也阻碍了事物的平稳性和持续性这个事实，也暗示了一种源于与货币运动相关的物质方面的矛盾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我猜测，马克思可能会将新李嘉图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后来在理解这个图式上的分裂，看作是将资本的内部矛盾在思想领域内外部化的经典案例。当然，这些在文中都没有任何暗示。

然而，这就是我对图式内的基本矛盾所在位置的估计。但考虑到许多探索这个图式的著作都是由受过数理经济学训练的学者完成的，而且这些专家至多(如果不是完全反感的话)只对辩证法和矛盾分析表示了少许的赞赏，那么可能形成危机的地点基本上仍然没有被探索到，就不足为奇了。剩下的那些人，一定程度上畏惧于我们的经济学家同事们的超凡的数学才能，基本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回到文本中去吧……

第二、三节：部类内部以及部类之间的交换

在接下来的几页，如上文所述，马克思解决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的必要比例问题。但是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 这种互相交换是通过货币流通来完成的。货币流通成为交换的中介，同时也使这种交换难于理解，然而它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

> 义，因为可变资本部分必须一再表现为货币形式，即表现为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劳动力的货币资本，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同时进行经营的一切生产部门，不论他们属于第一部类还是第二部类，可变资本都必须以货币形式来预付。①

因此，第一部类的工人用他们的工资从第二部类购买消费资料，这种做法将第二部类一半的不变资本转化成可以流回第一部类的货币形式，使其又能够发挥货币资本的作用去购买劳动力。如果资本家推迟对工人的支付，那么他们就推迟了将他们已经生产并出售给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转化成货币的货币流动。因为这个原因，“资本家手中除生产资本外，必须要有一定的货币储备——或者作为资本预付，或者作为收入花掉”。②例如在周转时间和流通时间存在差异的条件下，流通中的货币要比与实际生产相匹配的数量多。在两大部类的交换中，某些资本家必须预付资本，其他资本家则期待这些资本。因此，尽管“最后，他们通过各自的商品等价物的交换，彼此付清了各自的款项”，尽管“他们在自己商品的价值额以外作为这种商品交换的手段投入流通的货币，按照他们各自投入流通的货币数量的比例，从流通中回到他们手里……他们并不因此增加分文”。此外，嵌入在“所有这些”中的，是工人履行自己的职责的必要性——以与第二部类的生产相匹配的方式花费他们的工资，而资产阶级同样也要履行这份资本的职责，以适当的方式花光收入中的相应部分。

第四节：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

上面最后一点引导马克思去研究必要的生活资料消费和奢侈品消费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42—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之间的区分问题。事实上，第二部类的工人买回了他们生产的商品的部分价值，从而为资本家提供了一部分继续生产所需的货币。劳动和资本在消费领域内的“老板自己开设的杂货店”关系，是一个《资本论》中经常提起的话题(包括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将劳动者描述成资本的“附属品”——不仅在生产方面，也在消费方面)。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转变，因为在这里工人阶级“作为买者和资本家阶级作为卖者”。①

实际上第二部类是分成两部分的。一部分生产“进入工人阶级消费的消费资料，但因为它们是必要生活资料，所以也构成资本家阶级的消费的一部分”。但是，马克思注意到——当然主要从他自己的消费习惯出发——“至于像烟草这一类产品，从生理学观点来看，是不是必要消费资料，在这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只要习惯上认为它是必要消费资料就行了”。②然而，奢侈消费资料，“只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尽管是由工人生产的，工人并不能消费它们。

奢侈品产业有许多独特的特征。例如，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指出，这些产业的生产力变革并不能改变劳动力的价值，因此也就不是永久的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但是，在这里，马克思很乐于重温——在惯常的错综复杂的细节中，使用我们所熟知的大量的算术例子——将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工人和资本家与从事必需品生产的工人和资本家联系起来的流通形式，假定资本家自己确定了收入中用于购买必需品和奢侈品的比例。错综复杂的流通过程建立起来了：资本家购买奢侈品，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奢侈品的价值，使得生产它们的资本家拿出一部分剩余价值来购买更多的奢侈品和任何他们所需要的必需品。同时，分部类Ⅱb 的奢侈品产业的工人，将其刚刚货币化了的可变资本花费在分部类Ⅱa 生产的必需品上。当然，这主要取决于资本家阶级如何在必需品和奢侈品之间分配收入。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很明显，“奢侈品生产中吸收的劳动力的数量……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挥霍，取决于这个阶级的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奢侈品”。但是，这对于经济形势是很敏感的。危机暂时减少了奢侈品消费，这会随之减少可变资本的花费——而这又反过来减少了对非奢侈品消费资料的一般需求。“在繁荣时期，特别是在欺诈盛行期间，情况正好相反”，这时充分就业的工人阶级得到了更高的工资，事实上可能会购买少量的奢侈品。

这引导马克思作了下述十分重要的一般性评论(我前面曾经引用过)：

> 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除了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消费或“盗贼”的消费以外，资本主义制度只知道进行支付的消费。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费者(因为购买商品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但是，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么，我们只需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①

乍一看，似乎很难调和这个叙述与第350页的脚注，那里是这样描述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56—4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事实上，马克思所说的“同义反复”并没有否认有效需求的重要性，而只是强调，唯一起作用的需求是有支付能力支持的需求。这再一次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在不考虑对使用价值的真实需求的情况下，货币(交换价值)是如何流通的。

从上下文来看，很显然，工人阶级的购买力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挥霍，以及商业周期进程中就业的涨落这类因素。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商业周期的运行受固定资本投资的波动的影响。系统性的劳动生产力变革，同样也会减少从事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因此不能将表现为剩余价值实现的一个直接障碍的“消费不足”，看作危机的唯一原因。这就是有效需求在这一章中表现为一个同义反复的原因。出于这个原因，我宁愿从危机有唯一根源的想法，转向存在多重潜在障碍点的想法。在任何历史时刻，所有的障碍都可以表现为危机最贴切的原因。资本没有解决其危机趋势，但是，正如我在《资本之谜》中所说的，资本将其转移到了其他地方。有效需求的问题——我认为马克思正确地将其描述为进一步积累的一个可能的障碍——是可能被移除的，但是它不能稳定资本积累。它仅仅是将矛盾转移到了别处。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收入在危机之前会上升，我认为这个观点从经验上来看并不正确。尽管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是这个情况，但很难说2007—2008年爆发的危机符合这个观点。因此我建议修改马克思认为有效需求与资本真正的内在矛盾无关的一般叙述，而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是那些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许多人当然会不同意。

第五节：货币流通与再生产图式

在“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中介作用”这一节中，马克思解释了，为

什么在这个体系内，由于全年中购买时间的差异，需要预付比价值交换所严格必需的量更多的货币。但是，正如第三卷所描述的，当资本由金融体系组织为“阶级的共有资本”时，马上出现了一个问题：

> 如果站在商品生产者背后的是一个货币资本家，这个货币资本家又把货币资本预付给产业资本家，那么，这种货币的真正复归点，就是这个货币资本家的钱袋。这样，虽然货币在流通中或多或少地要经过各种人之手，但大量的流通货币却属于以银行等形式组织和积聚的货币资本部门。①

但是，主要的问题在于，货币流通“或多或少地要经过各种人之手”的方式。涉及的顺序和时间问题被描述得错综复杂，比如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所支付的工资，首先流入到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只有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家采购他们所需的生产资料时，才流回到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照例，为了指出流通中的复杂的时间问题，马克思又花了相当长的篇幅来描述各种各样的可能的顺序。但是结果却是

> 转化为可变资本的货币资本，即预付在工资上的货币，在货币流通本身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工人阶级不得不挣一文吃一文，不能给产业资本家提供任何长期的信贷，这样，各个产业部门的资本周转期间尽管有差别，可变资本却要在某一短期内，例如一周，即在比较迅速地反复的期限内，同时在社会的无数不同地点，以货币形式预付。

——无论所涉及的资本周转时间如何。“在每个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这样预付的货币资本在总流通中都占有一个在比例上有决定意义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部分”。①但是时间问题（例如，工资支付的频率）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体系中必须有足够的闲置货币去填补缺口。“另一方面，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所必须转化的实物形式，即劳动力，通过消费得到了维持，进行了再生产，并再作为它的所有者唯一的商品而存在，如果他想活下去，他就必须出卖这种商品。*因此，也就再生产了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②我之所以强调这一段，是因为，这是在第一卷中至关重要的阶级关系再生产又重新回到讨论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马克思可能认为它太明显了，以至于不需要进一步的详述和强调了。

然后马克思将其注意力放到了资本家个人消费的作用上。“当一个资本家把货币用于消费资料时，对他来说，这些货币已经完结，已经走进了尘世的道路。”如果货币又流回到他手中，那是因为，他生产的商品资本投入到为了以货币形式实现的流通中。“所以，在这个场合，说资本家自己把货币投入流通（在他把货币用于消费资料的时候），由此使他的剩余价值货币化即得到实现，这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这是以两种方式进行的：如果企业是在当年开办的，资本家就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要几个月，才能从自己的企业收入中取得货币供他个人消费。但他不会因此而使他的消费停止片刻。他预期到剩余价值会到手而自己预付货币。”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很早之前就建立起来了，那么资本家的消费也只是因为预期到收入会到手而进行的，即使“如果我们的资本家破产了，他的债权人和法庭”可能会对其消费习惯进行审查。③但是，要注意这其中与真实生产相关的预期和预付货币的作用。

但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它必须自己把实现它的剩余价值（同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63—4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时也为了使他们的资本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流通)的货币投入流通这样一种说法，不仅不是奇谈怪论，而且还是整个机制的必要条件，因为在这里只有两个阶级：只能支配自己劳动力的工人阶级；对社会生产资料和货币拥有垄断权的资本家阶级。

而单个资本家是这样做的："起买者的作用，支出货币来购买消费资料，或者预付货币来购买他的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他把货币预付到流通中，只不过是采取和预付商品到流通中一样的方法。在这两个场合，他都是起流通的起点的作用。"①在第17章，我们就遇到过许多这样的观点。

但是这个"现实的过程"被"特殊类型的资本家"(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介入以及政府官员、商人资本和土地所有者分别获取赋税、利润和地租的要求所掩盖。他们都预付货币，但"人们总是忘记"的是"他们最初得到并不断地重新得到的货币的来源是什么"。②这个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最终必须来源于生产。但是，在我看来，它是来源于过去，还是预期来源于未来(例如，通过债务创造)，似乎是一个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分阐述的重要区别。

第六节与第七节：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以及剩余价值在各自部类内的流通

马克思首先着眼于第一部类的不变资本的流通。产出的一部分直接回到了那个部类的生产。因为谷物的生产是需要谷物的，"煤炭进入煤炭的生产，铁以机器形式进入铁的生产，等等"。并且，煤炭当然也要进入钢铁的生产，而后者又进入挖掘煤炭所需要的机器的生产。因此，为获取生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产资料而进行的生产资料的交换是充满活力的，那么问题就是这些交换是如何有效地通过市场进行协调的。对于这一点，马克思补充了一条评论，为指望这个图式能提供一种社会计划方法的那些人提供了动力。

> 如果生产是社会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那么很明显，为了进行再生产，第一部类的这些产品同样会不断地再作为生产资料在这个部类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这些产品的生产部类，另一部分则转入其他生产场所，因此，在这个部类的不同生产场所之间发生的一种不断往返的运动。①

当然，这些就是里昂惕夫后来在其模型中所构建的投入产出关系。

在第七节，部类内以及部类之间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运动，被放到了显微镜下进行考察。我们从简单再生产情况下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总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和这个明显的恒等式出发。但是，正如上文概述的公式所表明的，这个等式会出现，是因为由第一部类生产并流入第二部类的新的不变资本价值，通过第二部类对劳动的使用而实现了。这就提出一个后面会更具体地进行考察的问题：哪个部类掌控着这些交换。这也引起了其他问题。不变资本本身不能生产价值，它的价值由从事生产性消费的劳动者简单地转移到了产品的价值中。但是，第一部类的新的不变资本的生产，既生产价值，又生产剩余价值。亚当·斯密因此错误地下结论，说社会总产品等于v+m(尽管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这样想可能是受到了误导)。正如马克思一直主张的，社会总产品应该是c+v+m。

第八节：两个部类的不变资本的流动

马克思使用惯常的会计方法来考察两个部类的不变资本的流动。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这里，他遇到了一个与我的观点——图式内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关系之间存在矛盾——密切相关的有趣的难题。马克思说，“困难不在于社会产品价值本身的分析。困难是在于把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和它的物质组成部分作比较时产生的”。①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看，这个比较是无关的——所要求的，只是产品是使用价值。但是

> 社会总资本的产品却不是这样。再生产的一切物质要素，都必须以它们的实物形式形成这个产品本身的各个部分。已经消耗的不变资本部分，只有当全部再现的不变资本部分以能够实际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新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在产品中再现的时候，才能由总生产来进行补偿。因此，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由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必须等于社会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②

所有这一切只是在用一种相当转弯抹角的方式说：如果某物作为不变资本进行生产，但作为实物产品却被证明是无用的，那么它就没有价值。确保第一部类只“按其实物形式”（马克思的意思是物质的使用价值）生产可以实现两个部类中的“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产品，是十分重要的。③

第十节：资本和收入：可变资本和工资

在转向第十节之前，我将第九节——对于亚·斯密、施托尔希和拉姆赛的回顾——放到了一边。这里首先出现的问题是生产的价值和转移的价值之间的区别。从个别资本家的角度来看，不变资本不生产价值。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它的价值仅仅被活劳动转移到了最终产品中。而从社会的角度，我们看到，第一部类以其“全部价值和它的实物形式”为第二部类生产不变资本。请注意，当马克思在文本中频繁地提到“实物形式”的时候，他是指物质的使用价值形式。事实上，“社会的年劳动大部分用来生产新的不变资本……以便补偿在生产消费资料上所花费的不变资本价值”。①活跃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既生产价值又生产剩余价值。这就是一般的经济学家，特别是亚当·斯密，所无法理解的东西。他们接受了对于个别资本家而言是正确的理论——不变资本不生产价值——并错误地将其用于社会整体，推断生产资料的生产并不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即社会总产品是v+m)。其他一些很难理解的混淆也出现了。

首先，理解“可变资本在资本家手中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在雇佣工人手中则作为收入执行职能”，是很重要的。换句话说，可变资本不通过劳动者的身体进行流通(尽管有时我会倾向于这样考虑)。工人用工资购买商品的时候，货币资本仅仅转变为作为收入进行流通的货币。同样一笔货币，在资本家手中表现为资本，在工人手中则表现为收入的形式。

在这个概念下，马克思就能够抵制工人一直都拥有资本的思想。“其实，劳动力只是劳动者的财产(它将不断自行更新，自行再生产)，而不是他的资本。劳动力是他为了生存而能够不断出卖和必须不断出卖的惟一商品，它只有到了买者即资本家手中，才作为资本(可变资本起作用)。”马克思与现在经济学家所谓的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是毫无关系的。“如果一个人经常被迫不断重新把自己的劳动力，即把自己出卖给第三者，这就证明他是一个资本家，因为他必须不断出卖‘商品’(出卖自己)。”②同样的逻辑，马克思讽刺地指出，“就算奴隶也可以是资本家”。之前我们已经遇到过这种对人力资本理论的驳斥。资本家总是可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以选择是从事生产，还是仅仅将其资本放到货币市场中去，靠利息生活。工人永远没有这种选择。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会懒洋洋地躺在吊床上，靠人力资本的利息生活！工人处在C－M－C的循环中，只能将其工资作为收入进行流通。“他的工资在消费资料中实现，会作为收入花掉；并且对全体工人阶级来说，它会不断再作为收入花掉。”①

为了使部类之间的流动能够达到需求与供给的均衡点，市场必须在所有当事人——资本家和工人——的参与下运行，他们发挥积极的买者和卖者的角色：“这种交换的一切当事人都只作为买者或卖者出现，或者既作为买者又作为卖者出现；在这种交换中，工人只是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资本家则交替地作为买者和卖者出现，而在一定界限内，只作为商品的买者，或只作为商品的卖者出现。”②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第一部类再以货币形式拥有它的资本的可变价值的部分，这个价值部分只有从这个形式才可以直接转化为劳动力……另一方面，工人为了能够再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他现在必须先再作为商品的卖者，即作为自己劳动力的卖者出现”。③马克思提醒我们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是由自由发挥作用的劳动市场的运行来中介的，记住这点很重要。

但是，两者的动机并不相同：“因为工人阶级是挣一文吃一文的，他们在能买的时候才买。而资本家，就不是这样……资本家不是挣一文吃一文的。最大限度地增殖他的资本就是他的动机。”对于资本家而言，有时候储蓄(贮藏)而不是花费是有益的或必要的。的确，“一般地说，要使营业能够继续不断地进行，不管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价值流回得快还是慢，货币形式的准备资本都是必需的”。④

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当将年产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时，许多重要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94—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的区别和相互关系，依然是看不到的。只有把经济拆解和分解为部类的时候，才可能清楚地看到“真实的”关系是什么。例如，部类之间的相互交换表明，工人会永远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那里货币资本变成了货币，工人为了生存并重新回到工作（他们永远不能获得资本）中去而将它们作为收入花掉。另一方面，资本家通过用货币资本购买劳动力、使劳动力进行工作并将凝结在所生产的商品中的劳动价值重新转化为货币资本形式，使可变资本连续不断地循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它（可变资本）会转化为某人的收入”。①

用这种方式考察事物是很有帮助的。在总循环过程的层面上看起来很古怪的东西，例如，资本家必须提供与生产的剩余价值相等的有效需求，当我们考察不同部类之间的相互交换和资本流动的时候，看上去就不再那么古怪了。马克思没有证明这一论点，但他完全能够证明。例如，在用其资本生产消费品时，第二部类的资本家为第一部类中生产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提供了有效需求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因而实现了已经凝结在其所生产的商品中的剩余价值。在提供对生产资料的有效需求方面，两个部类中组织的生产消费，要比个人消费重要得多。资本家必须为实现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提供需求的思想，看上去就不再像当经济没有被分解的时候所表现的那么荒谬了。

第十二节：货币商品的供给

我先将固定资本的问题放到了一边，以后再分析，这里开始分析马克思在第十二节中对金生产者的作用的简单考察。他说，“不言而喻，资本主义生产的年代越久，所有资本家积累的货币总量也就越大，从而每年新生产的金加进这个总量中去的比例也就越小，虽然加进这个总量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中去的金按它的绝对量来说可能是很大的”。①如果在马克思时代是这种情况，那么现在无疑更是如此。因此，尽管金和银的生产者具有特殊的作用，它并不是资本积累的再生产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既然归根结底必须把资本家阶级本身看作是投入流通的全部货币的源泉，每个资本家怎么能够从年产品中取出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他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怎么能够比他投入的货币多呢？”

马克思认为这个问题本身提的就不对，“这里唯一必要的前提是：总要有足够的货币使年再生产量的不同要素进行交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不是，“剩余价值借以货币化的货币从何而来？”确实，作为资本流通的货币和作为收入流通的货币之间，是有区别的：“资本家阶级手中现有的货币量中，从而总的来说，社会现有的货币总量中，有一部分货币是为了使资本家的收入流通的。”②为了进行说明，他又利用了前面的例子：一个开办新企业的资本家靠自己的收入维持生活，稍后“再捞回来”等量的货币。

问题部分是因为我们通常将资本家人格化为一个生产者而不是一个消费者。作为消费者，“资本家阶级以收入的形态把一定货币额投入流通”。然后“好像他们为全部年产品的这一部分支付了一个等价物，因此，这一部分好像不再代表剩余价值了。但是，代表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不需要资本家阶级花费分文。作为一个阶级，他们白白地占有和享受了这些剩余产品，而货币流通也不能使这件事有所改变”。每个资本家都“从每年的社会剩余产品总额中取出相当于他占有的剩余价值额的各种商品，并把它们据为己有”。流通机制表明，资本家阶级“把作为收入来花费的货币投入流通”，然后“从流通中再把这个货币取出”。从而“能够不断重新开始同一过程。因此，作为资本家阶级来看，它们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始终占有为剩余价值的货币化所必需的这个货币额"。

这里的逻辑有些难以跟上。但是，本质上，马克思所讲的就是，在为了消费而取出商品(凝结了剩余价值)和同时进行的出售生产的商品(凝结了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资本家得到了一个免费的商品。"如果我用一镑购买商品，商品的卖者为了取得不需要我花费分文的剩余产品，又把这一镑还给我，那就很明显，我就是白白地取得了这个商品。"

在这里，马克思假设，交换是同时发生的，而且不存在周转时间的问题。但是"在生产期间(和劳动期间不同)较长的一切产业部门，资本主义生产者在生产期间不断把货币投入流通"，以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而没有把任何等价的商品价值投入市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当股份公司等等进行为期很长的工程事业时，如铺设铁路、开凿运河、建筑船坞、大的城市建设、建造铁船、大规模农田排水工程等等，这个要素将是十分重要的。" 顺便提一下，这些投资形式的吸引力之一，就在于它们远在生产出大量商品资本之前，就能够吸收大量的剩余货币。"不是在当年生产的各种东西如地皮、房屋等等，其次还有生产期间不止一年的各种产品如牲畜、木材、葡萄酒等等，都作为商品来流通"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这些情况下，"重要的是掌握住一点：除了直接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额外，总有一定量货币处于潜在的、不执行职能的状态，一旦遇到某种推动就可以执行职能。这类产品的价值，往往也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流通的，如同房屋的价值是在若干年内以租金的形式来流通一样"。①

最后，这将我们引入了几乎是习惯性的、第二卷式的求助："在这个基础上信用制度及其机制的某些方面"如何"得到了发展"。然后他提出，流通的全部复杂性"只有通过经验才会被人察觉、引人注意，以便有计划地既用来采取信用制度的各种机械性的辅助手段，又用来实际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捞取现有的可贷资本”。①马克思在这里研究再生产图式的时候，并没有考察当生息资本流通成为主要手段时会发生什么变化。那时资本家集体可能会通过这个手段调控这些事情，或者像在这里的情形，可能会试图协调两个部类之间的流动。对信用制度的考察表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信用的优点和必要性不幸和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破坏性的投机狂热的永久威胁。

第二十章以对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理论的考察为结尾。马克思将其作为“资产阶级的痴呆，在这里暴露得淋漓尽致了”②的一个极好的例证。对此我不作任何评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十一

固定资本问题和扩大再生产（第二卷 第20—21章）

固定资本的情况

在第20章第十一节，马克思提出了固定资本的形成和流通如何影响再生产图式的问题。我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推迟到了现在，因为至少现在马克思的意图和兴趣都相对清楚了。他写道："这个关于固定资本的例子，在再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 固定资本生产和流动资本生产的不平衡，是经济学家在说明危机时惯用的根据之一。但是，如果说这种不平衡在固定资本甚至仅仅维持原状的情况下也能够发生并且必然会发生，也就是说，在理想的正常生产的前提下、在已经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也能够发生而且必然会发生，那在他们看来倒是有点新奇的。①

简而言之，比例失调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也难以确定。但马克思显然断定即使两大部类间的交换正常进行，危机也会发生。

对此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观点认为固定资本流通造成的中断证实了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再生产过程都无法顺利地进行，因此比例失调的危机自始至终既是普遍的又是无法避免的。第二种解释则认为这种危机只

是源自固定资本的流通。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固定资本流通的社会化就可以避免这一危机。固定资本流通的社会化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国家供给或干预到更为激进的社会计划的形式，包括共产主义下去商品化的固定资本投资。但马克思并未排除，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在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的帮助下，也许资本家自己就能克服困难。后一种解决方案的问题(如我们在第三卷中看到的)是它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引发了以与固定资本流通相关的货币运动为中心的投机性的繁荣和崩溃。尽管固定资本的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另一个更为严重的自发的金融危机问题又出现了。我们进一步考察这种情况。

在给定的周转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始终假定周转时间为一年)内并非所有资本都被耗尽会使问题变得复杂，马克思在第十一节评论的一开始就提醒了我们这一点。不同的固定资本以不同的比率进行周转，许多固定资本都是逐渐地或者一部分一部分地更新的，因此固定资本的维护、修理和补偿之间的界限很模糊。但马克思重现这些细节只是为了表明它们并不会真的影响问题的本质。然后他开始了枯燥的算术运算，以说明当两大部类的部分生产资料采取了固定资本的形式时，它们之间的交换是如何进行的。我不会复制这些数学计算。

他表明问题源自流通中的货币方面。马克思不止一次声称如果货币方面被排除在外，问题就会消失。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与固定资本损耗相等的那部分商品价值的货币是不会再转变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的，虽然它是补偿这种生产资本的价值损失的。它在生产资本旁边沉淀下来，保留它货币的形式”。只要固定资本能够发挥作用，它就始终以货币形式存在，直到固定资本被补偿。“一旦这种固定要素如建筑物、机器等等的寿命已经完结，不能再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这种职能，它的价值就在它旁边存在着，全部由货币补偿，即有货币沉淀的总和。”它在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才被花费到固定资本的补偿中去(马克思并没有讨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那些我们已经在第4章中考虑过的，不同的补偿费用和无形损耗的问题)。

因此，那些我们已经在第二卷遇到过很多次的“贮藏货币，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要素”，并且贮藏货币发挥了很特殊的作用。马克思在此又提出他以后“要研究假如生产是共同的生产，不具有商品生产的形式，情况又有哪些不同”。他并没有这样做，但这类说法，像我早前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引发了对这些图式在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的潜在作用的思考。这类说法还强化了这一观点：再生产图式中的问题源自货币资本的独特作用，废除货币资本是对投入和产出更“理性”的协调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当信用制度作为“阶级共有资本”进入视野时，整个框架将会不同。

不幸的是，马克思继续着他的讨论，仿佛信用制度并不存在，并且集中于由贮藏引起的不平衡。他想的例子是：第Ⅱ部类有与其固定资本损耗相应的货币基金；“在另一方面，即在第Ⅰ部类方面，却有……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这样，公式的全部基础，即以不同生产体系之间保持完全的比例性为前提的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也就遭到彻底破坏。这样，我们克服一个困难就只是创造出另一个更麻烦得多的困难。”①然后，相当不妙的是，他接着说既然政治经济学家忽略了这一问题，他将“逐个考察一切可能的(至少看起来是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更确切地说，一切可能的提出问题的办法”。②我之所以说不妙，是因为这通常预示着我们要进入更多无休止的枯燥的计算之中。

然而，在我看来，如果有人想探求马克思构建这些图式的意图，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渠道。他似乎下决心要确定必须保持的比例，并且试图找出，假定存在可用的货币协调机制，这些比例是以何种方式实现或不能实现的。他本着科学态度没有在一开始就说这种货币协调是不可能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的，但我怀疑当我们读完的时候，我们会被他说服不受扰乱的再生产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后他详细阐明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对所有结果的总结中，他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察。考虑一下我曾经描述过的第Ⅱ部类为弥补固定资本的磨损和折旧而贮藏货币的情况。显然，这里存在“某些货币错配”的情况①。第Ⅰ部类“必须压缩自己的生产，这对该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来说，意味着危机；或者第Ⅰ部类提供的产品过剩，这对他们来说，又是危机”。②这证明了危机是这一体系固有的。但马克思又指出“这种过剩本身并不是什么祸害，而是利益；但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它却是祸害”。③原因是“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问题就归结如下：寿命已经完结因而要用实物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里是指在消费生产资料生产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数量大小，是逐年不同的”。④如果在某一年数量很大，那在下一年就一定会很小。“这种情况，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量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却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要素。”⑤

使用价值的生产过剩对全社会而言是好的，因为它为人类的再生产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的生产过剩变成了坏事，因为它导致了利润的降低，甚至使资本大幅度贬值。因此市场决定的无政府状态和货币因素才是问题的根源，而非物质剩余产品的生产本身。但事实上，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再生产也并非一定是无政府

---

① 中文版将此译为“暂时的紊乱”，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译者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状态的。许多长期固定资本投资都是由国家承担的，因此存在合理的社会规划和设计的可能性。联合资本(股份公司)的形成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辟了新的、或多或少有些无政府主义的协调模式(其不利方面是建成环境投资上的投机性繁荣，而其有利方面则是共同生产集体的生产和消费资料)。

我认为，这一节中一个插入的话题也是具有启发性的。在整部《资本论》中，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假定他面对的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无论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还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他只是偶尔偏离这个假设来评论对外贸易的作用和意义。很明显，在为固定资本贮藏货币导致两大部类不平衡的情况下，对外贸易有助于恢复必要的比例。"但是，对外贸易既然不是单纯补偿各种要素(按价值说也是这样)，它就只会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① 对于如何理解资本通过地理扩张、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世界市场的全球化，借助外部"空间修复"(我这样称呼它们)来努力克服其内部矛盾，这是一个十分简洁的陈述。尽管"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根本不行的"，他后来评论说，"在分析再生产的产品价值时，把对外贸易引进来，只能把问题搅乱，而对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②马克思做出这样的假定是不是正确的还有待争论。但他自始至终都坚持这一假定是毫无疑问的。扩大对外贸易和建立世界市场或许能够暂时地缓和危机，但最终他们只是将资本的矛盾转移到更为广阔的地理范围内罢了。

论第二卷第21章：扩大再生产

在相对较短的第21章，马克思开始讨论扩大再生产的情况。我建议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在总体性地评论其意义和重要性之前应该紧紧跟随文本。马克思在一开始就让我们回顾第一卷第24章。在那一章中，他描述了已经以货币形式实现了存在于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个别资本，如何在竞争的强制规律的压力下，用额外的货币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不变资本）和劳动力以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不断地扩大积累。马克思认为，如果这适用于个别资本，也适用于社会总资本。这一扩张也许不是顺利和连续的，因为它可能需要用好几年的时间来贮藏足够的货币，以开办新的工厂或修建新的铁路。但存钱不是唯一的问题。必须随时能从市场上买到更多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用于开办工厂和修建铁路。因此，“扩大的再生产”必须在商品形式下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货币本身不是实际再生产的要素”①，因为如果没有可用的剩余商品，储蓄的货币也就没有用了。

这明显就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只能通过强调资本整体循环中的不同环节的相互联系和连续性来设法绕过。

贮藏（储蓄）的货币本身并不构成新的财富，但是它确实创造了“新的潜在货币资本”。但是，如果每个人都预期未来的扩张而进行贮藏，那现在这里就没有人会购买商品了，于是流通过程就中断了。滞销商品阻断了这一体系。只有在金的生产中，在金产品包含剩余产品，即剩余价值的承担者的时候，新的财富（可能的货币）才会被创造出来。②在每个人都只存不买的情况下，唯一可以得到的用于实现每个人的剩余价值的基金就是金生产者的剩余价值。在马克思看来，这当然是一个“荒谬”的想法。我们要深入探究这一困难——贮藏减少了开支，从而削弱了实现的前景。为此我们必须考察两大部类内部及其之间的积累过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第Ⅰ部类的积累

第Ⅰ部类中有两种资本家，那些贮藏的人(称为A，A′和A″……)和那些在这一过程中用贮藏购买新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人(称为B，B′和B″……)。这两类资本家是“互相对立的：一方作为买者；另一方作为卖者”。这两类人的活动部分补偿了相互的需要。当一个资本家从流通中撤出货币进行贮藏时，另一个资本家则将额外的购买力投入市场。如果幸运的话，贮藏者和购买者的活动将会维持两者的平衡。即使他们这样做，“在这许多点上，货币被从流通中取出，并积累成无数单个的贮藏货币或可能的货币资本。这许多点也就像是流通的许多障碍，因为它们使货币的运动停止，使货币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失去流通能力”。①贮藏太多而购买不足导致的不平衡的危险始终存在。

信用制度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在信用制度下，所有这些可能的资本，由于它们积聚在银行等等的手中，而成为可供支配的资本、‘可贷资本’、货币资本，而且不再是被动的东西，不再是未来的音乐，而是能动的，生利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对此感到心满意足。”②有趣的是，他称这一货币资本为“高利贷”。然而，纵观第二卷，按照马克思的惯例，以信用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可能得到的“心满意足”被搁置了。我们必须找到另一种与信用制度无关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信用制度所解决的问题的本质。

价值(包括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中的“实际平衡”要求“互相交换的商品具有同等的价值额”。③“这种平衡只有在如下的前提下才能保持：单方面的买的价值额要和单方面的卖的价值额互相抵消。商品生产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54—5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这个事实，已经包含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不仅起流通手段的作用，而且也起货币资本的作用。”这

> 会产生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换从而也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①

这意味着货币资本的介入，尽管是必要的，却是潜在不稳定的。货币资本似乎是这一问题的根源。

正常的平衡能通过危机得到恢复吗？马克思并没有说。这就留下了一个开放和重要的问题。在后面对这些图式的发展中，他正确地阐述了实现均衡的增长所需要的平衡（当然是在一定的假设下）。我将马克思的话解释为（尽管我可能是错的），在好的情况下，这一平衡会偶然得到实现，在坏的情况下，这一平衡会通过危机中的剧烈崩溃得以实现。

类似的考虑因素影响了生产中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扩张。第Ⅰ部类增加对可变资本的支出，创造了对第Ⅱ部类生产的消费资料的追加需求。第Ⅰ部类中的工人阶级“单方面作为商品的买者和第Ⅱ部类的资本家对立，那么，第Ⅰ部类的工人阶级就单方面作为商品的卖者，即自己的劳动力的卖者，和第Ⅰ部类的资本家相对立”。因此他们从一个部类（Ⅱ）购买商品，向另一个部类（Ⅰ）出售商品。“这一切必要的前提是互为条件的，但是，他们是通过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作为中介的。这个过程，包括三个彼此独立进行但又互相交错在一起的流通过程。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呈现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原因。”②这再次提醒我们某种危机很有可能发生。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为了贮藏，资本家必须先出售包含着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商品。事实上，是工人创造了贮藏，即潜在的货币资本。在第Ⅰ部类中，我们遇到了“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①的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扩张意味着“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的缩减。

> 因此，为了从简单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第Ⅰ部类的生产要能够少为第Ⅱ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而相应地多为第Ⅰ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完成这种过渡往往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是，由于第Ⅰ部类的有些产品可以作为生产资料在两个部类起作用这一事实，完成这种过渡就容易些。②

这的确是需要注意的：许多产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能源了，无论在哪个部类都能充当生产资料。但我认为这一论点的主旨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后果。它支撑了在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即必须优先考虑扩大第Ⅰ部类的产出，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牺牲消费品的生产。其出发点是：发展重工业，投资于生产的固定资本和基础设施的固定资本，并限制个人消费。最后当利用生产资料生产生产资料的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后，开始关注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这是许多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走过的典型路径。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与那个观点一致。马克思构建的关于扩大再生产图式的例子就是这样，并证实了这一偏见。我之所以称它为“偏见”，是因为马克思并没有证明这种优先的必要性是一个普遍的真理。而且，考虑到这种发展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它常常采取了民主国家如印度采用的五年计划的形式)应用的某些历史结果，我们最好还是回到文本，看看马克思对这一情况的假定是什么和他实际上意味着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什么。

然而，在后来的文本中，马克思拒绝了“积累是靠牺牲消费来进行的这种一般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不过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相互矛盾的一种幻想，因为这种幻想假定，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是消费，而不是剩余价值的攫取和资本化，即积累”。①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唯一的宗旨和目标就是不断创造并巩固越来越大的剩余价值和增加资产阶级的财富、特权和权力。在这一生产方式中，集中投资于为了生产生产资料而进行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忽略消费的策略是十分合理的。人民群众的消费状况与其直接利益无关。因此，在社会主义计划的实践中，这种由阶级强加的优先对第I部类进行投资的做法的继续存在应该受到质疑。

马克思进一步说明：

> 已经在一个国家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包括并入生产资本的劳动力，即剩余产品的创造者)越多，劳动的生产力，从而生产资料生产迅速扩大的技术手段越发展，因而，剩余产品的量无论是在价值方面或是价值借以体现的使用价值量方面越大。②

但是到底谁从扩张中获益仍然是不明确的。这一暗示的言外之意是资本家阶级从中获益了。

马克思仔细考察了第I部类中A′和B′之间的关系。A′通过出售反复地实现他们的剩余价值，但现在他们把获得的大部分货币用于贮藏。B′通过购买(部分来自A′)进行扩张，但进一步扩张仍然面临这个问题：如果A′不再购买，他们又能将产品出售给谁呢？简而言之，实现B′的产品价值的货币是从哪里来的？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问题在于货币“是绝对非生产的，它在这个形式上虽然和生产过程平行进行，但却处在生产过程之外。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死荷重”。这里注意“潜在货币资本”这个范畴的重要性也许是有用的(它和之前提到的“可能的资本”相同吗？它和第三卷中提到的“虚拟资本”又有什么关系？)。但是，马克思继续说，“渴望利用这种作为潜在货币资本贮藏起来的剩余价值来取得利润和收入的企图，在信用制度和有价证券上找到了努力的目标。货币资本由此又以另一个形式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进程和巨大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①

然而，这里是马克思在第二卷中谈到这些过程的另一处地方——这些过程要么使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创造成为必要，要么使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创造成为结果。他也承认了货币资本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极大的影响”，也可以推测它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产生了同样的影响。这进一步支持了这个观点：马克思写作第二卷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说明信用形成和信用制度发展的绝对必要性。

通过信用制度创造越来越多可用的潜在资本的优势是，这些货币“可以更迅速地被投入一个特殊的企业，不论这个企业是在同一个资本家手中，还是在另一些人手中”。这些潜在资本甚至能“完全离开原有的资本，以便作为新的货币资本投入一个新的独立的企业”。②“以贮藏货币积累的、还仅仅是潜在的货币资本，应当实际作为追加的货币资本来执行职能。”这意味着它被投入到流通中，用来购买新的生产资料和新的可变资本。但这仍然没有回答额外的货币来自哪里的问题。马克思的回答是：

> 我们从考察简单再生产中已经知道，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必须有一定量的货币，以便交换他们的剩余产品。在简单再生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产中，仅仅作为收入用于消费资料的货币，会按照各该资本家为交换各自商品所预付的货币的多少，回到各该资本家手中；在扩大再生产中，同样的货币会再出现，但是它们的职能改变了。A 等等和 B 等等(I)将交替地提供货币，以便使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的潜在的货币资本，并且交替地把新形成的货币资本作为购买手段再投入流通。①

总之，必须假定，扩张中要有足够的货币量(信用？)，以适应流通和贮藏的需要。因此积累的扩张必须伴随着货币供应的扩张，或与之相同的，将货币用作支付手段的便利性的增加。

> 如果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阶段，即金属流通占主要地位，而兼有信用制度的阶段，是完全适用的，那么，对于仍然以金属流通为基础的信用制度的最发达阶段，也是适用的。一方面，贵金属的追加生产，只要时而增加、时而减少，就会不仅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而且在极短的时期内扰乱商品价格。另一方面，整个信用机制不断地通过各种操作、方法和技术设施，把现实的金属流通限制在一个相对地日益缩小的最小限度，这样，整个机制的人为性质以及扰乱正常的进程的机会也会相应地增加。②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思考第三卷中谈到的商业和金融危机的非常真实的前景。在那卷中不断提到的信用制度与其货币基础之间持续的斗争在这里重新出现了③。马克思在这里说，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二卷，第 56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版，第二卷，第 56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回忆第三卷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如何不断地企图突破对财富及其运动的这个金属的限制，突破这个物质的同时又是幻想的限制，但又不断地在这个限制面前碰头”。(第三卷，第 650 页)。

> 首先要假定最简单最原始形式的金属流通，因为，这样一来，流出和流回，差额的抵消，总之，在信用制度内表现为有意识的调节过程的一切因素，才会表现为独立于信用制度之外而存在的东西，事物才会以自然形式，而不是以后来所反映的形式表现出来。①

考虑到我们所了解的信用制度作为“阶级共有资本”所发挥的作用，不难发现信用制度远不是危机的根源。信用制度不但是消除货币流通障碍的主要机制，而且是更一般的避免危机或解决危机的主要机制，即使“整个机制的人为性质”会增加“扰乱正常的进程的机会”。因此，马克思在这些段落中频繁提到信用和银行体系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它们的矛盾性质(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可能使马克思拒绝了任何将它们的作用纳入这里的系统性的尝试。考虑到马克思对作为“所有颠倒错乱形式之母”的信用制度的分析，我们将形成一个更清晰的观点：信用制度是怎样把我们从比例失调危机的煎锅中拯救出来，又把我们投入了金融和商业危机的烈火中的。

你无疑会注意到，整个第二卷常常提到贮藏的问题。货币贮藏十分重要，因为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经常在两大部类，特别是在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中产生。例如，我们首先必须获得足够的货币以购买挖掘煤矿或生产钢铁所需的机器。随后必须留出货币，以便当这些生产资料耗尽了的时候来补偿它们。在这些年中，煤炭和钢铁的生产者将不断生产和出售他们的商品，而不会购买与他们生产的产品价值相等的商品。由于大多数不变资本是固定资本，这一问题将进一步恶化。进而引发了在第4章中已经讨论过的固定资本维护、修理和补偿费用的所有复杂问题。结果是，即便第I部类内部的交换，也几乎不可能以十分和谐和丝毫不受失衡与中断影响的方式进行。当储蓄和贮藏的形成占据主导后，投资的浮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63—5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动、波动和震荡将随之而来。

尽管此类问题在生产消费品的部类(这一部类也需要固定资本)也能找到，但部类内部的动态远远没有达到潜在的破坏性。原因是构成对消费资料的大部分需求的工资往往是定期(通常是每周)支付的，而工人往往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所以一拿到工资就马上进行消费。他们没有进行贮藏(至少马克思假定这样)。生产玉米并得到与他们的劳动力相应的价值的雇佣劳动者，有足够的钱购买他们定期需要的牛奶。既然资本家是在工作完成后才向雇佣劳动者支付工资，他们就不必像购买新的机器那样为了雇佣更多的工人而贮藏货币。当涉及资产阶级的消费时，问题或许就有些不同了。对奢侈品的需求或许会波动得更剧烈，这取决于经济状况、预期和普遍的信心水平。这个问题在前面的章节已经提到过了。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例如现在的美国，预期和工人阶级大众的消费信心状况已经以一种马克思没有预料到的(尽管我们将会看到，他对此有所提示)方式变得至关重要了。工人的储蓄既有自愿的也有非自愿的(通过法定养老金计划)。

我们不仅要假定能够获得货币和额外的生产资料以继续进行扩张，还要假定资本家可以支配的额外的劳动力存在。这个基本的要求引起了对第II部类内部的流通的考察。第I部类对消费品的需要取决于贮藏的程度。这使得“第I部类形成潜在的追加货币资本(所以从第II部类的观点来看，就是消费不足)；第II部类的商品储备搁置起来，不能再转化为生产资本(所以在第II部类出现相对的生产过剩)；第I部类的货币资本过剩，第II部类的再生产不足”。[①]需要注意的是，与特定部类的立场相关，这里使用了具有争议的术语“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假定“不存在商人、货币经营者、银行家，也不存在只消费而不直接参加商品生产的阶级，所以，在这里，必须在各该生产者本人手中不断形成商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品库存，以便使再生产这个机器继续运转"。[①]尽管马克思并没有这么说，商品库存是死的资本，因此它是资本积累的累赘（事实上，贮藏采取了商品形式）。如果第Ⅰ部类吸收了过多的生产资料，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第Ⅱ部类可用于生产扩张的生产资料就少了。

但马克思在接下来的章节指出，第Ⅱ部类的资本家具有优势，因为"第Ⅱ部类所使用的工人，必须再向第Ⅱ部类购买他们自己所生产的商品。第Ⅱ部类是劳动力的买者，同时又是向自己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所有者出售商品的卖者"。第Ⅱ部类的资本家可以通过压缩实际工资，使其低于劳动力价值而直接获利。但他们也有其他手段，夺回一部分他们所支付的可变资本：

> 在名义上支付正常的工资，事实上却一部分用实物工资制，一部分用伪造通货的办法（也许还不受法律的处罚），把其中的一部分在不付相应的商品等价物的情况下再夺回来，换句话说，再偷回来。例如，在英国和美国就是这样。[②]

马克思保证稍后将列举"若干恰当的例子"来对这一主题加以说明。

既然这是这一问题突然出现在《资本论》中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之一，这一部分值得关注。近期，通过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而对美国数百万人的房屋的欺诈性剥夺，是这一观点在当代最明显的例证。过去四十年左右我称之为掠夺式积累的全部政治活动也是如此。

但是，像往常一样，马克思并没有深入考察这一问题，因为"不能利用这个机制所具有的某些特别的污点作为借口，来排除理论上的困难"。[③]在他"本质"的研究对象——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种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污点并不存在。特别是，它无助于解决两大部类之间供给和需求关系不平衡的难题。

第II部类的主要问题源自它和第I部类的关系。这与第I部类中更为严重的流通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这个主要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扩大再生产图式

马克思的核心目标是模型化两大部类间的交换关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假定了在第一卷第24章中描述的“为积累而积累”的情况。经过几页的探究，他终于在第三节提出了他认为最能揭示两大部类动态关系的模型，“用公式来说明积累”。我不会仔细检查所有初步的论断，只简单地概括他提出的解决方法。他从我们已经见过的用于简单再生产的图式出发：

$$\text{I } 4\,000c + 1\,000V + 1\,000m = 6\,000$$

$$\text{II } 2\,000c + 500V + 500m = 3\,000$$

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两大部类之间合理的交换比例要求第II部类从第I部类购买2 000c，与此相对应，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人和资本家从第II部类购买1 000V + 1 000m（代数上，c2 = v1 + m1）。注意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m/v）和资本价值构成（c/v）是相同的。

为了分析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他选择了一组不同的基准数字以便于计算：

$$\text{I } 4\,000c + 1\,000v + 1\,000m = 6\,000$$

$$\text{II } 1\,500c + 750v + 750m = 3\,000$$

尽管剩余价值率仍然相同，价值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使得第I部类的生产率（c/v的比率，也称为资本的价值构成）变成了第II部类的两

倍。马克思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方便计算，但这一变化也有一定的意义。简单再生产所需的均衡交换—— c2 = v1 + m1 ——不再成立了。实际上，存在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不足。

但这只是年初的情况。在年末时(就像马克思一直做的那样，假定所有东西的周转时间都是一年)，如果资本家牺牲个人消费，将一部分剩余价值追加投资于生产扩张，这一数字将会改变。我们假定第I部类中剩余价值(1 000m)的一半被追加投资于扩大再生产。假定资本的价值构成不变，第I部类追加的500m将用来购买额外的400c和100v(总资本变成4 400c +1 100v)。假定剩余价值率仍不变，那么现在生产的剩余价值就达到了1 100m，并且这一部类的总产出也由6 000增加到了6 600。这就形成了下一年积累的基础。第一部类年复一年地重复这个过程。

对第II部类，马克思假定了一个不同的追加投资率，在获得的750m中只有150m可用作追加投资。假定价值构成不变，这意味着在原有的1 500c和750v之外再购买100c和50v。因此现在总的购买额是1 600c和800v，从而生产的剩余价值达到800m，而总产出从年初的3 000增加到了3 200。这就形成了下一年积累的基础。第II部类年复一年地重复这个过程。

与年初的总产出9 000相比，两大部类第一年年末的总产出达到了9 800。但是注意，第II部类从第I部类购买的1 600c与第I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1 100v +500m是相等的。增长过程产生了一个奇迹般的和谐：确实，增长和新的资本积累使得原本不平衡的地方变得和谐了。当然，马克思仔细地选择了他的数字和条件使这一结果能成立。但他因此也证明了和谐的资本积累的可能性(绝不是一种概率)。他使这一进程看起来好像能不断持续下去。表1显示了这一过程持续四年的结果。它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所有其他条件保持不变)。

表 4

第一年	开始时	I. $4\,000c+1\,000v+1\,000m=6\,000$ II. $1\,500c+750v+750m=3\,000$
	结束时	I. $4\,000c+400\Delta c+1\,000v+100\Delta v+500u$ II. $1\,500c+100\Delta c+750v+50\Delta v+600u$
第二年	开始时	I. $4\,400c+1\,100v+1\,100m=6\,600$ II. $1\,600c+800v+800m=3\,200$
	结束时	I. $4\,400c+440\Delta c+1\,100v+110\Delta v+550u$ II. $1\,600c+160\Delta c+800v+80\Delta v+560u$
第三年	开始时	I. $4\,840c+1\,210v+1\,210m=7\,260$ II. $1\,760c+880v+880m=3\,520$
	结束时	I. $4\,840c+4\,840\Delta c+1\,210v+121\Delta v+605u$ II. $1\,500c+100\Delta c+750v+50\Delta v+600u$
第四年	开始时	I. $5\,320c+1\,331v+1\,331m=7\,986$ II. $1\,936c+968v+968m=3\,872$
	结束时	I. $5\,324c+532\Delta c+1\,331v+133\Delta v+666u$ II. $1\,936c+194\Delta c+968v+97\Delta v+677u$

用代数术语说，第 I 部类的追加投资是 $c1 + \Delta c1 + v1 + \Delta v1 + m01$（最后一项是指追加投资用于扩张后资本家阶级剩余的消费），第 II 部类是 $C2 + \Delta c2 + V2 + \Delta v2 + m02$。保持这一动力机制顺利进行的均衡交换条件是 $C2 + \Delta c2 = v1 + \Delta v1 + m01$。保持这一比例，我们将永远拥有和谐的资本积累。

但这为第二卷中从第 4 章开始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在一天的开始将 $c+v$ 的需求投入流通，在一天结束时有 $c+v+m$ 的供给，填补这一缺口的额外需求来自哪里呢？从个别资本家的角度看，说资本家必须提供额外的需求来吸收剩余价值似乎是十分愚蠢的。当把它们分别分解开来（第 I 部类中 A′和 B′的关系）和跨部门来看时，我们会发现有些资本家购买的超过了他们生产的，而另一些生产的超过了购买的，并

且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某些组合可建立起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动态均衡。

最大的问题是要达到这样的均衡状态到底需要什么。即怎样才能使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保持正确的比例和比率，以至于不存在一个部类生产过剩而相对的另一个部类经历消费不足的情况。显然，这一图式是不切实际的，并且马克思编造了这些数字以符合他的例子。但这一图式真的如此不现实，以至于完全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压力、限制和矛盾的本质，以及它的动态能力吗？如果不是，那这些图式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些关键问题需要综合性的评价。但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这一章中还有另一个问题值得讨论。

工人阶级的消费问题(再次)

纵观《资本论》第二卷，工人阶级的消费问题常常以某些方式被提出，而这些方式在第一卷中完全被忽略了。首先，工人阶级的消费“在总流通中都占有一个*在比例上有决定意义的部分*”。①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矛盾在于无法实现价值，因为“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在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②缺乏消费力。马克思甚至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对他在这一章中对以下观察的“附带性”的说明给予一些关注(尽管给予多大的关注还有待讨论)。这涉及“资本家先生和他们的报刊，对劳动力花费自己的货币的方式，对劳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力借以实现这种货币的第Ⅱ部类商品，总是感到不满意。于是，他们来推敲哲理、谈论文化和侈谈博爱”。然后他引用了《民族》1879年(发表在他最后一项理论工作完成之后)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抱怨：“工人在文化方面跟不上发明的进步。许多物品他们已经买得起，可是他们不知道怎样使用它们，所以他们没有为这些物品创造任何市场。”问题在于“怎样用合理的、有益健康的方法来提高他们作为消费者的地位”。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他的全部奢望没有超出缩短劳动时间的范围。蛊惑者总是煽动他去争取这种事情，而不诱导他借助自己的智力和德行的完善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尽管马克思严厉地批评了这类事情，他也接受了这一观点：工人成为“合理消费者”是使工人阶级的消费成为资本流通中在“比例上有决定意义”的部分的必要条件。“资本家又是怎样理解合理的消费呢？这表现在他不惜降低身价，在消费品贸易上直接和他的工人打交道，实行‘实物工资制’”，这体现了他的观点。他使用了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模范棉纺织厂的例子，那里的女工的供膳宿舍和宿舍为“合理消费者是何等的幸福”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但是马克思开始研究时，英国(他主要的例证)正压低工人的工资，尽管有证据表明大约在1860年以后工资开始上升。很久之后，当汽车产业在1914年引进五美元的八小时工作日后，亨利·福特派遣了一队社会工作者去教导工人如何审慎地和理性地消费。而所谓的“理性”是这样定义的——工人能为资本家生产的任何消费品“创造市场”。如何通过有组织的消费主义使消费的个别性理性化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马克思并没有讨论。但是这个“附带说明”打开了对此类问题的思考的大门，尽管马克思本人拒绝这样做。

假设

在评价这些图式的内容时，首先指出设立图式时的假设是很有用的。首先，马克思假定将生产活动分配给这个或另一个部类并不存在问

题。定义含糊不清的(面粉可以用于生产面包，而面包又能生产三明治，那么面粉在最终被消费之前是生产资料吗？)、有多种用途的和联合的产品(羊养殖生产可供食用的肉，还为工业制造商提供羊毛和皮革)被搁置到了一旁。只有两个阶级——资本家和工人(因此没有银行家和商人，无论怎样定义，肯定都没有中产阶级)。实际上不断演变(通过追求相对剩余价值引起的技术和组织变革，正如第一卷所描述的)的劳动生产率(价值构成C/V)被假定为保持不变，除了在扩大再生产图式中，为了得到平衡的数字而引入的、两大部类的价值构成的一个相当投机取巧的差异(这是否意味着就像某些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需要有一条独特的技术变革途径来促进图式的均衡？)。劳动力价值是固定的，并且追加投资率也被认为是不变的(有一个例外)。追加投资局限在部类内部，因此资本不能从一个部类流向另一个部类(为使一切都保持平衡，第二年的算术例子中追加投资/储蓄的比率中有一个奇特的波动)。

投资基金无法在两大部类之间流通，意味着没有实现部类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机制。由于这是与第三卷中考察的利润率下降相关的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这里就有一个明显的理论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交换是按价值(而不是根据生产价格，就像第三卷前几章陈述的那样)进行的，且假定所有东西都实行等价交换。尽管货币资本的介入经常干扰这一问题，但流通中的货币方面并未完全纳入分析。一切都以一年为周期进行周转，固定资本形成和流通中最严重的问题大部分都被假定没了。通过地租、利息、商业利润和赋税等占有和剥削剩余价值的其他形式被忽略掉了。

我认为，由上述假设可以明显发现，上述图式构成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如何运行的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模型。但以这种方式建模的目的并不一定是要重现现实(尽管这种成功的模型或许会为最终重现现实打下基础)。马克思也许会这么说：这样的建模是为了凸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结构(这里指的是再生产)的核心关系——本质。那么这些图式揭示了什么呢？很简单，资本以货币、商品和生产资本三种循环的方式持续流

动，通过这一持续流动的资本进行的资本积累的再生产注定是棘手的，因而具有危机的倾向，并且某种危机（由固定资本流动或更一般的比例失调引起的）或许只能以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金融体系中）造成问题更大的危机为代价来解决。我喜欢指出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危机的趋势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被转移了。我为把这一想法加到这里正在讨论的事情上感到内疚。但我认为，细读文本，特别是紧密结合第三卷分析信用和金融的材料，我们将更加支持这种看法。

资本主义下的图式：货币和信用的作用

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充当阶级共有资本的信用制度用来解决资本流动的宏观协调问题，会发生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想象，信用制度能以某种方式对这些问题施加控制力，甚至使资本流动更加合理，而不是让其处于马克思描述的狂野的市场起决定作用情况下的无政府状态？毕竟，信用制度在使周转时间更加合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解决了周转时间差异所产生的许多问题。它也通过将每月相应的贮藏变为每月简单的支付，巧妙地解决了固定资本流通的问题。我们在协调不同部门时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而按照固定利率周期性进行支付的信用制度传输和制定的信号，或许能被政府机构或同类组织用于宏观计划。这难道不是中央银行的政策——作为信用制度的枢纽并受到政府支持——被授权从事的主要事情吗？

再次，这显示了信用制度的矛盾作用。我认为，如果不将信用制度纳入这一框架，我们就无法得到这一切如何发挥作用的真实模型。这是后续工作应该研究的问题，但大部分内容至今没有人研究过。

图式的含义及其后来的发展

后来对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的地位和意义的讨论和争论，显露出了

关于如何最好地解释它们的一些重大分歧。我认为马克思建立一个各种关系能实现和谐均衡的版本，是为了说明这些条件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有些人却认为他事实上证明了这种和谐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而一旦偏离这种和谐的条件，只需要在某些地方发生一点小危机来纠正，原则上就是可控的。

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中认为这些图式表明，“积累，生产，(价值)实现与交换在发条般精密的控制下流畅地运行，毫无疑问，这种特殊类型的‘积累’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她强烈抵制那些图式暗含的政治上的消极性，指责它们存在致命的缺陷。马克思未能回答自己的问题：“用于购买剩余产品的有效需求来自哪里？”这一问题是马克思在第17章遇到的，并试图在第20章和21章解决。这也是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心问题。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似乎对于激发某种类型的凯恩斯主义思想和1930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发挥了隐含的作用。随后，大量的文献研究了马克思(理论)和凯恩斯(理论)的关系，其中关于有效总需求、追加投资率以及技术变革路径等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凯恩斯看来，要实现和谐的经济增长，政府(或者许多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如IMF)必须实施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其他经济学家表明，只有通过一条技术和组织变革(生产率c/v的演进)的独特路径，才能保持合理的比例。然而，实际的技术变革路径并不必然与平衡增长的需要相适应。偏离了平衡增长的需要的技术变革越多，比例失调的危机就越严重。

正如我们之前在货币、金融资本和信用的情况下看到的，马克思并不相信通过这种方式能够避免严重的危机(与纠正比例失调的调节性的危机截然相反)。几乎可以肯定，这是马克思与凯恩斯不同的地方，凯恩斯认为政府干预能广泛地解决危机与矛盾。在马克思之前，除了之前提到的魁奈，几乎没有人尝试建立关于资本借以再生产的流通的宏观经济模型。魁奈认为所有资本和财富的基础都是土地上的生产。而马克思的版本以工业生产为中心，尝试确定他定义的两大部类之间必要的流动和平

衡。他说，资本主义生产的“自发形式”（他的意思是单个资本家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意味着“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并且“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很容易“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平衡增长的“必要的前提是互为条件的，但是它们是通过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作为中介的。这个过程，包括三个彼此独立进行但又互相交错在一起的流通过程。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呈现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原因”。①

此类危机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献中一般被称为“比例失调危机”。危机的深度和广度目前还不清楚，但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版本可以从IMF报告常用的参考文献和其他关于全球失衡的文件中找到。可以肯定的是，在当代条件下，这通常指国家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失衡（如美国和中国），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理解为区域间能够出现也确实出现了的不均衡发展和失衡的一个版本。这一重叠和由此导致的广泛的后续研究工作，为这里识别的生产和消费的动态相互作用潜在失衡的地理版本造成了问题。

这些图式显示了为了实现和谐、平衡的增长资本需要做什么，同时也为理解这种做法的不可能性作了准备。这里仍有一些潜在的矛盾未被探索。贯穿整个第二卷的技术性的分析，指明了中断和紊乱的可能性。在更大的框架内，如第三卷描绘的那样，我们将看到这些可能性是如何在实践中更加充分地实现的。

这些图式最早应用于苏联早期，那时一个叫费尔德曼的波兰经济学家为了制订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开始探索它们的功能。后来，马克思的图式被卡莱斯基（也是波兰人）和其他直接受凯恩斯理论影响的经济学家所借鉴，用以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内构建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和经济发展理论。埃弗塞·多马，广为人知的哈罗德-多马宏观经济增长模型的创始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之一，明确承认借用了马克思的图式。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所有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型都借用了这一遗产。如果他们更认真地对待马克思的图式的话，传统经济学家将避免许多麻烦，并且（或许）大约在七十年前就能开始对宏观经济模型和公共政策计划的研究。

斯拉法的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从理论上采用了这些观点，并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效果，这点可以从他的书名中看出。因此，马克思在创造再生产图式方面取得的成就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计划的发展之间存在着重叠。

马克思揭示的关系结构实际上具有普遍意义，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定的历史关系。其特殊的资本主义性质，似乎依赖于货币资本流动作为生产和消费各部门、各部类之间关系的协调者的独特作用。但是如果这些图式以物质使用价值（而非价值或交换价值）的方式建立又会怎么样呢？能用它们规划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物质关系而不用考虑资本积累吗？马克思清楚地说明这一流通过程“可以在非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①

数理经济学家——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模型从数学方面进行的十分复杂的探索，无疑发展了马克思的洞见，尽管是以非辩证的方式。但是考虑到马克思阐明这些材料的方式，以后很难找到其他（替代）方式。如果这是将来最主要的方式，那么第一次将这些材料及其后续的发展介绍给新的读者时，应该达到怎样的程度呢？理解这些后续的发展需要相对高级的数理经济学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掌握多少相关的数学工具），我所能做到的最好的就是提供一些参考，那些倾向于在数学道路上走得更远的人或许可以由此出发。

大体上，有两个发展了这一图式的学派依赖于与马克思的研究意图相关的经济思维框架。例如，森岛通夫将这些图式转变为新古典均衡理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论，并使用高度复杂的数学技术说明了这些图式事实上暗示的经济发展轨迹。这些结果十分有趣。放弃了积累分别发生在各个部类的假设后，马克思的数字例子描述了“在生产必要消费资料和奢侈品的第Ⅱ部类的资本价值构成(或是资本更密集)比第Ⅰ部类高的情况下，围绕均衡增长路径的是爆发性的震荡”。“如果第Ⅰ部类的资本价值构成比第Ⅱ部类高，结果是对均衡增长路径的单调性偏离。”这种做法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它们表明了即使使用极其简单的模型，计算均衡增长路径也是如何的困难。

另一个学派，大多数是凯恩斯主义者，也研究了这些数字，表明一切都取决于创造一个可行的技术——它能同时平衡部类间的物质和价值交换，而且追加投资率和就业率必须在一个严格限定的范围内步调一致地移动。同样，其含义是，平衡增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马克思的直觉——它只能被“偶然”地实现——是正确的。

那么，马克思在其他地方得出的结论——危机是对平衡增长的均衡条件的暴力修复，至多是暂时的，不可能是永久性的——是完全合理的，即便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这个结论有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推论，即这个难题：如何通过有意识的社会计划和设计将这些动态关系连接起来，以满足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

理性的社会主义计划的可能性

在这些章节中(和其他地方)，马克思几次提到在社会整体内，将劳动合理分配到劳动分工的不同方面的问题。他建议要设计社会手段以完成这一目标。这与通过货币流动和市场过程达到的资源配置的无政府状态，以及由此导致的危机的不合理性形成了对比。这个观点——通过应用再生产图式，平衡增长原则上是可能的——被赋予了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它们被当作是合理规划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与消费的有用工具。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

> 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①

在第三卷第49章(写于19世纪70年代的主要理论研究之前，该处只是简略描写了再生产图式)中，他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的生产类别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②这意味着，马克思认为这些图式在理性的社会主义计划的发展中能发挥某些作用。事实上，再生产图式并不能解决此类问题。但它们原则上表明了，为了在一个合理有序的社会中实现平衡增长，需要多少生产资料以满足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扩大再生产的需求。在任何可供选择的社会里，此类协调都必须由社会来组织，特别是考虑到马克思不断强调，货币资本在这样的协调中发挥作用会造成很多问题，因而必须被废除。换句话说，这些图式必须被改写成纯粹的使用价值和物质条件的形式(也就是里昂惕夫后来设计的形式)，而不受货币流动和盈利性考虑的引导。

整个《资本论》中，马克思也经常提及生产中剥削性的资本和劳动的阶级关系，将其看作基本问题，需要由"联合劳动者"在集体的基础上自由组织他们的生产来解决和取代。这就是"替代性的选择"在个人企业层面上的含义。但这个替代性的选择，像他在第三卷中承认的那样，是有限的，因为它最后只会复制资本主义企业的问题(甚至导致长期的自我剥削)，除非采取措施同时控制资本的三个循环并使它们服从社会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9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的控制。

马克思在这里似乎暗示，联合工人控制生产的反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应该由协调劳动在社会整体内部各种相互关联的劳动分工中配置的社会手段来补充——如果不是被后者取代的话。这里考察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区别只不过是它的一个变种。但无论是在社会主义下还是资本主义下，这当然都是同样重要的。尽管它对规定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到底是怎样的显得至关重要，但构思和组织反资本主义方案的这部分内容更为困难。马克思在这里回避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或更深入的思考。

可以这么说，目前，我们更关注反资本主义方案中的“联合劳动”的方面而不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合理配置劳动力的问题。部分是因为后者与共产主义甚至社会民主国家——目前人们不再轻易相信(在我看来这么做是对的)这个制度——的统治和镇压有关，部分是因为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计划的经验总的来说不尽人意(尽管说它彻底失败了是错误的)。但是，正如马克思在其他地方说的那样，我们不能以这些特别的污点“为借口，来排除理论上的困难”。

不幸的是，通常情况下，当代左派太倾向于避免这种理论上的困难。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需要建立协调机制，以避免生产过剩、供应不足和物质流动中的瓶颈问题，以在一个可接受的物质福利水平上再生产日常生活，并与生态条件维持即使不是良好的，也是能接受的关系。在不受控制的市场中，由于缺乏对货币流通和谋利活动的协调，如何实现以上目标是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并且如何在不建立类似国家机构的东西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马克思的图式的一个方面说明了那些可能出错的事项，这在不假思索和未经证明的情况下成为一个标准的做法。在马克思的算术例子中，第Ⅰ部类的变化驱动了整个扩张。由此而来的观点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经济和发展计划应集中投资于资本品和生产资料的生产，让消费品的生产随后再跟上。社会主义发展模型严格地遵守了这一传统。后殖民政

府，如加纳，在20世纪60年代也成为这种思维方式的牺牲品，至今仍然没有完全从它的影响中恢复。

第II部类必须依靠第I部类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这一切之所以出现既是因为马克思独断的选择，也是因为两大部类间的关系的不平衡性质，后者是第I部类相对第II部类更高水平的贮藏的不同影响造成的。社会主义的过渡当然要彻底消除这些差异。这将完全有可能扭转两大部类的关系，使第I部类为第II部类服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的目标是积累资本，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生存和消费需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世界的目的将完全相反。

十二

反 思

那么，我们能从建立了《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联系的“生产和实现的矛盾统一体”中，得出什么结论呢?

第二卷说明的是，资本循环的连续性不断地受到产生于实现过程中的限制和界限的威胁。这些界限不同于那些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熟悉的、在劳动力市场上和生产领域内的界限。但是，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强调的，对实现过程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和界限，构成了一个对持续积累的动态的永久的威胁，并且频繁地引发重大危机。马克思甚至这样说道：“资本不可遏制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①

这些界限可以共同被看作是消费的界限以及“为积累而积累”规定的情况里的协调的界限。然而消费这样一个过于粗略的范畴本身难以涵盖所有涉及到的问题。首先，区分生产性消费（对原材料、能源、半成品和固定资本项目的消费）和最终消费（雇佣劳动者、资本家以及“非生产阶级”对消费资料和奢侈品的购买和消费）是至关重要的。为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对剩余价值进行的再投资行为，持续地扩大着生产性消费。但是，正如第二卷所说的，生产性消费产生了对用于生产每一个独特的商品的特定的使用价值的需求。这些特定的使用价值的性质和数量随着技术需求不断变化。这些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因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在

寻求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过程中驱动了显著的变化（在第一卷中全面考察了相对剩余价值）。与此同时，新的需求和欲望（例如，最近的手机）的创造要求一个范围更广泛的商品投入，并且这些投入必须在资本需要它们时已处在准备好的状态。正如马克思在他对再生产图式的研究中所阐释的，虽然通过市场机制的供给，资本完成对所有这些需求的一种理性的协调不是不可能的，然而没有太多扰乱而完成均衡增长的可能性无疑是十分低的，这从而预示着比例失调（使用价值对一系列给定的生产过程的需求来说过多或过少了）的周期性危机。对均衡的波动性偏离是一回事，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而对均衡的单调的偏离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命题。

但是，不仅物质形态的使用价值的流动需要协调，货币（和价值）流动也需要与均衡增长的目标相一致。作为劳动的社会性的物质代表，货币与使用价值的性质毫不相关，货币量的流通必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保持均衡：不同劳动分工中的货币协调极易发生严重错误。正如马克思令人信服地指出的，这个问题不在于货币的总量可能相对不足，因为有许多能适应商品交换增加的货币机制（比如，对计算货币的使用）。问题在于在一个错综复杂的交换模式中，以不挫伤在每个交易点上实现利润的可能性的方式动员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当任何错误发生时——它必然会发生，我们很可能目睹生产过剩危机（就像马克思在第二卷前四章中所阐述的），其可能的表现形式是产生闲置的货币资本、闲置的生产能力和无法以可获利的价格售出的过剩的商品。结果是一场资本贬值的危机。危机会持续多久和影响多深，取决于各种实际情况。

然而，资本家之间围绕生产资料商品进行的复杂的交易，最终也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商品在最终消费领域的实现。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在这个领域，我们立即遇到了这样一个潜在的矛盾：价值与其货币形式的膨胀可能是无限的，然而对某种特定使用价值的需求却不是无限的。没有用处(就没人想要、需要或者渴望得到它们来说)的产品没有价值，引申一下，所有生产这种产品的投入品也同样会贬值。尽管资本主义有着创造新需求和新需要，以及引发各种欲望(尽管我们会认为它们愚蠢或者没有意义)的悠久历史，人类的消费能力却从来不是永无止境的(臭名昭著的菲律宾独裁者的妻子伊梅尔达·马科斯，柜子里有六千多双鞋子)。价值增殖的持久的推动力因而遇到了一个一般的潜在界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到的“异化消费”，这是一个不能轻易超越的界限。

但是，对于最终消费，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之间是存在区别的。在必需品消费领域中存在的限制与界限和与奢侈品相关的这些界限不太一样。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的需要、需求与欲望不是受到人类难以吸收更多使用价值的限制，而是受制于缺乏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起因于强加在劳动者身上的工资合同——这种合同更关注当前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扩大市场。所以，对工人来说，获取足够的日常消费品以保证合理的生活水平的可能性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正如马克思多次提到的，这产生了一个难以解决的主要矛盾，也是在总需求中的危机的常见征兆。

对于由资本家自己和马克思所称的“非生产阶级”(不生产只消费)组成的资产阶级的消费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马克思在分析中通常不考虑所谓的非生产阶级，但是在他为《资本论》所设计的各种大纲中，他清楚地承认了他们的重要性。然而，即使我们将这些非生产阶级考虑在内，在某一时刻，很明显他们的收入最终取决于用这种或那种手段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榨取(例如，养活了军队的赋税)。这留下了一个问题：如何解决马克思在第二卷提出的价值(c+v+s)的供给与资产阶级向流通中投入的需求(c+v)之间的深层结构性失衡问题。然而，最后，可以这么认为：资本家和非生产阶级占有的剩余价值最终提供了这

一部分差额需求，这种需求的时间结构使先买后付，或更重要地求助于信用（这样更迅速）成为必要。

我们迄今为止所概述的都没考虑到周转时间差异的影响（劳动期间、生产时间、流通时间）。特别是，我们根本没有关注恼人的固定资本流通问题（和类似的拥有很长生命周期的固定项目，比如包括在消费基金中的房屋）。第二卷不遗余力地理论再现了这些流通过程如何运行并塑造了资本积累的时空而没有——这是关键——求助于信用体系。正如第一卷所提到的，结果是更大数量的货币资本贮藏在不起作用的非生产性状态。持有货币储备的必要性在于应对周转时间差异和周期性的固定资本更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越是错综复杂，就越需要贮藏货币。这种贮藏日益成为积累扩张的限制。这也使得创建一个适当的货币市场和成熟的信用体系愈发显得必要。结果是资本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存在的地点，这样“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独立（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①

所以，将第三卷中关于商业和货币资本的章节纳入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可能理解将信用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中独立和自主的力量解放出来的必要性。马克思怀着地租、利息和商业利润最终都将由产业资本的流通规律规训的看法开始了他的研究。尽管在他看来，他已经说明了商业资本被规训的可能性是如何实现的，并且花费了很多精力来尝试说明（在我看来并不成功）地租为什么同样也是如此，他清楚地看到生息资本和货币资本却绝不是这样的。它们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以及作为与产业资本循环相关（如果不是凌驾于它之上的话）的外部力量而获得的权力，对于促进与推动资本积累的持续进行是必要的。这就是货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资本作为“阶级的共同资本”所要做的。并且不难看到，例如在抵押融资的情况下，对租金的占有更可能与生息资本的循环混合在一起，而不是严格受到产业资本流通的要求的规训。回想一下，“所有的地租现在也是对以前已经投在土地上的资本支付的利息”。①然而，现代信用制度的兴起将大量贮藏货币释放出来，将之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活跃的货币资本，同时也释放了通过土地进行的虚拟资本流通的狂暴力量，将资本积累的两个基本当事人(资本和劳动)转变为产业资本与借贷资本的冲突(与工人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因而危机的演变趋势是我们现今所熟知的金融和商业危机。

或许我会因为上面所讲的而受到批评，认为我超出了马克思所涉及的领域而拓展到我自己的领域了。我想要予以反驳的是，在关于货币和金融的章节中，有很多对马克思的思想彻底重建的迹象——尽管放到他全部著作的背景中，这更应该被看成是一种对马克思最初思想的深度挖掘，而不是一种根本性的背离。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强调他对拜物教概念的重提和从这种拜物教概念到虚拟资本概念的转化的原因。马克思对货币资本的幻觉和幻象，对任何收入流资本化的幻想，以及对由此产生的过剩货币资本(IMF 通常称为流动性过剩)的无限积累的鞭辟入里的揭露，使他坚信：“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那么首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②只有考虑到货币资本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开始发挥的通过不断压制工人的抱负而推动持久积累的作用，这个立即废除货币资本的要求才是有道理的。如果在那个时代事情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货币资本毫无疑问现在已经到达了其影响力与权力的巅峰。

虽然仔细并批判性地阅读第二卷以及第三卷有关分配的章节可以启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发我们了解极为广泛的话题——从周转时间差异到信用供给的不断波动，我们仍然很难对资本的运动规律在当今条件下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作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坦白来讲，完成对马克思1878年之前的成果的整理，并且要理解他在1856年—1857年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为自己制订的宏伟计划要走向何方，我们仍然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在此首先重温一下马克思的最初设想的惊人的广度和深度，是有用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若干大纲之一中，他写道：

> “一、(1) 资本的一般概念。(2) 资本的特殊性：流动资本，固定资本。(资本作为生活资料，作为原料，作为劳动工具。(3) 资本作为货币。二、(1) 资本的量。积累。(2) 用自身计量的资本。利润。利息。资本的价值：即同作为利息和利润的自身相区别的资本。(3) 资本的流通。(α)资本和资本相交换。资本和收入相交换。资本和价格。(β)资本的竞争。(γ)资本的积聚。三、资本作为信用。四、资本作为股份资本。五、资本作为货币市场。六、资本作为财富的源泉。资本家。在资本之后可以考察土地所有权。然后考察雇佣劳动。以所有这三者为前提，价格运动作为在流通的内在整体性上被规定的流通来进行考察。另一方面，三个阶级作为在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上和流通的各种前提上来看的生产。其次是国家。(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国家对外：殖民地。对外贸易。汇率。货币作为国际铸币。——最后，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解体。个人劳动实际转化为社会劳动以及相反的情况。”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完成如此庞大的计划，马克思必定得是玛士撒拉①。并且毫无疑问，从上文以及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随后的描述可以看出，他宏大的抱负在于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描绘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可以通过做一些一般的标记，来帮助我们批判性地和更细致地理解马克思在第二卷做了什么及其为什么这么做。首先，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卷中，他一直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建构的“肤浅的三段论”式的框架下进行研究。他的论证的清晰明了取决于他严格坚持在一般性的水平上重建积累和实现的动态，而不诉诸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第二卷是目前为止马克思用他所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浅显的三段论式框架进行研究的最杰出的例子。通过这样，他试图建立对“纯粹状态”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理解。一旦成功了，他就能将他的发现纳入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广为提及的更为有机的思考模式中。

尽管马克思严格遵守了这个框架，他承认存在普遍性、特殊性甚至个别性能直接影响资本运动规律的情况。虽然他在第一卷中没有涉及供给和需求的问题，比如，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缺口和如何填补这个缺口成为第二卷的关键问题。尽管在第一卷提到了消费（还有生产性消费和个人消费之间的关系），但是并没有对其进行分析，这个问题在第二卷才逐渐成为一个分析的重要主题。并且，尽管马克思似乎相信他已经在第三卷分析了生产资本的需要规训着商业资本的收益和地租的作用，作为分配的第三个主要支柱，利息和金融必然要摆脱这种规训性力量的控制。这样，竞争和货币资本供求的偶然性将决定一切，而资本的联合形式创造了一种不同的新情况——社会主义或许会从中产生。

结果是留下了一个未完成的理论大厦，它对于资本主义可能采取的各种历史地理结构有着很强的解释力，但是对解释现实情形却不是

① 《圣经·创世记》中的人物，据传活了965岁。——译者

这么有帮助的。这种现实情形包括对纯粹状态的偏离、纯粹状态的不完善以及对其进行的政治干预，以及那些金融的特殊性或者消费主义离奇的个别性等居于支配地位的情形。最重要的是，商业、金融危机和已确立的充满矛盾的资本运动规律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马克思的理论究竟能为我们做什么呢，而我们又需要做什么来分析当前的困境呢？这个问题是任何对资本主义历史作马克思式理解的尝试的显著特征。比如，我们不能将最近发生的事情强行归入到马克思理论的某些版本中，也不能期望现成的答案会自己出现。但是马克思真正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思考方式——深入到拜物教世界的表面现象之后，来识别我们目前条件下的解放的内在可能性。

当然，在第一卷中，有各种关于历史表象的本质与形式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跨越理论与历史之间的鸿沟。在推导出绝对剩余价值理论后，在漫长的前资本主义历史（对他人的时间与劳动的占有是某些阶级社会形式形成的基础）背景下，我们深入了解了历史上关于工作日长度斗争的细节。在推导出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后，我们深入考察了作为这种理论的表现的组织形式变迁（协作、分工以及工厂制度）和新技术（工具机的产生——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自动化和科学技术的应用）的全部历史。从理论上建立起包含生产出失业人口和劳动产业后备军的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后，马克思具体研究了这种劳动产业后备军存在的历史形式，及其作为农村的、移民的和最终城市化的工人的生活条件。

第二卷没有尝试把这种历史事实加入光秃秃的理论探讨之中。可以说作这种尝试有一些内在的困难，源于这里关注的是流通而非生产过程。我不相信情况就是如此。即使是前三章——将第 4 章中的产业资本循环的整体分解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不同循环——也可以以一种更贴近历史的方式来描述。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在阅读第三卷中历史性章节时的发现，这些章节讲述了商业资本和信用关系的历史。

某种程度上，这些章节与围绕工作日长度的斗争的章节有着相同的职能，它们重新提到了农奴制度与其他动员和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写第二卷的大部分内容时就已经完成了关于商业资本和信用的历史性章节，但是他极少向我们提及第三卷中具有历史启发性的材料。

第二卷所缺少的不仅仅是历史。当我们深入到第三卷中有关金融和信用的材料时，我们发现自己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卷入到《资本论》中对1848年和1857年实际危机的具体分析当中。尽管这些危机被描述为商业和金融危机，并从某种程度来说“独立自主”于马克思在别处提到过的资本运动的深层规律，但是不难看出，我们在第二卷第一章概述的中断与阻碍的多种可能性在这里转变为历史事件和现实。

然而，马克思理论中一些缺失的重要内容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对《资本的限度》一书的总结中，我提出了两个需要立刻引起我们注意的一般话题：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社会再生产的问题。有趣的是，在我关于第二卷的课程的最后几节课的讨论中，参与者在没有受到我的任何影响的情况下几乎都只提到了这两个话题。对于这些问题，我现在将增加与自然关系的动态的问题，马克思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普遍意义，但却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性中予以详细研究。当然，现在有大量关于这些话题的文献。但是，20世纪7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激烈争论使马克思主义者精疲力尽，关于社会再生产和政治主体性的研究从政治经济学领域内消失了，许多环保运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采取了敌对态度，这些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加剧了而不是缓和了困难。

例如，除了谈到有关决定商品易腐性的物质条件，“自然”磨损的速度，与劳动时间相对的生产时间，固定资本的生命周期，克服空间距离的费用和时间，还有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能力等等以外，第一卷中时常被提到的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在第二卷中鲜有提及。因而我们对资

本的空间和时间的变化有所警惕，但是却几乎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可能的结果(或矛盾)，以及这种变化与世界市场的建构和居于支配地位的地缘政治结构的关系。并且尽管马克思十分不屑于马尔萨斯对人民大众的贫穷和苦难所作的“自然性”解释，他也并不否认，自然的稀缺性(尤其是随着地租的榨取和投机而恶化了)和人口增长的动态，对于同时获得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供给的能力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一些主题也被逐渐插入到分析中来，这些分析对理解马克思所谓的“决定论”和“目的论”的偏好是有意义的。例如，“自主的和独立的”这个短语在文本中多个关键地方出现，有必要得到一些解释。因为许多对马克思怀有敌意而又不正确的批评，都集中于他可能没有充分重视个体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和力量，并把每个人都刻画成盲目服从他们控制不了的某种抽象力量的机器人。这些批评真的很奇怪，而且恰恰是人们所钦佩和频繁引证的亚当 · 斯密提出了超出任何人控制的“看不见的手”的观点，而且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决定了总的结果。马克思仅仅在第一卷第2章采用了斯密的视角，那一章几乎始终坚持着后者乌托邦式的主张。自由主义者一直继续拥抱斯密的这种乌托邦幻想，却指责马克思的做法，这真是咄咄怪事——但如果人们意识到，马克思采用斯密的模型是为了阐明它并不能为所有人的福利发挥作用时，他们的做法就不那么奇怪了。斯密的模型恶化并加剧了阶级不平等，可以推测，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面对同一个理论，资产阶级愉悦地拥抱斯密的版本而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版本。

这里的要点当然不是去否认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而是去认识(a) 能使个体主观能动性活跃起来的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还有(b) 在竞争的强制规律和市场交换的中介作用下，总体结果与个人意图是多么的不同，根本上有效的价值规律在这里发生了改变。

但是马克思在考虑商业资本、生息资本和货币(金融)资本的流通时扩展了“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个主题。我认为这意味着，作为特殊性，这些形式的流通不需要，并且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直接而又机械

地服从于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然而，正如信用体系所显示的“枢轴”结构和商业与金融危机的演变所表明的，某种力量规训着商业和金融世界中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运动，使其服从于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需要。

我自己并不清楚这个规训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相信马克思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只是处于开始阶段。我猜测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认为关于金融的章节可能是第三卷中最重要的部分的原因。当然，马克思也引入了一些最小化原则进行分析(比如，如果所有资本家都放弃生产而靠利息生活，那么资本积累很快就会停止)。并且存在这样一个推测：危机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信用安排的发展之间关系融洽与否的测度。

在本书的导言中，我识别了马克思的著作中可能被称作“决定论”的方面。我认为全世界在任何一个历史时刻都可能有大量特殊的分配和制度(政治)安排以及消费体制，“只要它们不会过度限制或破坏规模不断扩大的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在一些安排和体制比其它的更为成功的条件下，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压力很可能推动向更为成功的积累模式的转变。在历史中我们已经见证了这种事情的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西德和日本引领了这种转变。然后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现在则是东亚模式。但是正如全球霸权转移的历史所表明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因素从未消失。资本主义在地理上的不均衡发展一直带给我们这样的热点问题：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来说最成功的积累模式是什么。在我看来，答案应该是使资本成功地实现再生产的根本方式。这个答案同样适用于流通的独立和自主的形式，及其周期性引发的危机。没有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资本不可能适应、再生产和增长。

这说明了资本和譬如消费的个别性相比，是多么的稳健和富有弹性。由于这可能是马克思理论中问题更多的部分之一——他没有讨论消费主义，更不用说将其理论化了——让我给出一个我个人的非常奇怪并

且完全独特的例子。我一直都对英式苦果酱情有独钟。我们英国人对这种独特味道的喜爱也许是一种基因的遗传，也许是一种怪异的文化意识，但是我们很多英国人只有在早餐时吃点苦的东西才能开始新的一天。我在20世纪90年代回到英国时习惯了自制果酱(就像以前我妈妈和祖母那样)。偶然的一次，我惊奇地发现我很多搞学术的同事都和我有一样的习惯。每当一二月时，全英国的厨房都在忙着做果酱。当我回到美国后，我买不到做果酱用的苦橙子。为了买到苦橙子并将其制作成果浆，我总能为自己在一二月份时待在欧洲找到借口，当回到美国后我就可以用这些果浆制作苦果酱。我甚至设法获得了在一月份去科尔多瓦的邀请，那里苦橙子铺满了壮丽的清真寺旁边的美丽的穆斯林院子。我采集了一些苦橙子(我的做法令当地人大为吃惊，他们一直告诉我这些橙子不能食用)，并在我的旅馆房间内将它们做成果浆——这引起了旅馆员工的议论，因为他们都受不了果浆的那种刺激性气味。他们显然认为我是一个疯子。还有比这更奇特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下面要讲的一个引人入胜的马克思主义风格的故事可以将我奇怪的消费行为和上下文紧密联系起来。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了19世纪肯特郡种植啤酒花和水果的行为，研究中我发现19世纪40年代在肯特郡中部的自耕农和西印度糖料种植园主之间形成了一个奇怪且不太可能的联盟。两个集团都叫嚷着要减少对糖征收的关税。对于水果种植者来说，这意味着更便宜的糖料和对用来制作果酱和蜜饯的水果的更大需求。这段时期是自由贸易思潮在英国最为盛行的时代，这个思潮是由希望通过低廉的食物价格来降低劳动力价值，从而增加他们可以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曼切斯特工厂主引导的。这股思潮主要关注面包的价格，工人们需要在面包上加点东西。富含糖分的果酱(连同甜茶叶)可以及时为长时间工作的工人提供所需的能量。因而，正如悉尼·明茨在他的著作《甜味与权力》中指出的，产业利益促进了工人对这种可以及时补充能量的含糖食物的消费(因而茶歇时间一直是英国工人阶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对与劳动力价值和强度(在关于“工作日”

的章节)有关的贸易政策的分析为这些工人阶级消费形式的推广确立了背景。

但是苦果酱的故事并没有得到解释。带着这样一个疑问我们回到《资本论》第二卷。蜜饯和果酱制造者一般在12月份左右时就会用光新鲜水果和果浆。一二月份的时候，有些人在西班牙(那里的人只是喜欢橙树开花的样子，并不指望它能结可以食用的水果)看见这些不能吃的苦橙子从树上落下。凭借来自西班牙的苦橙子，蜜饯和果酱制造者使其固定资本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全年不间断地得到了利用(第二卷提到过的问题)。因而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问题在将苦果酱推向早餐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个食用富含糖分和维生素C的苦果酱的文化习惯在英国根深蒂固，并一直延续至今。

没有什么决定了我这个奇怪又独特的文化习惯。我可以随时戒掉这个习惯(最近确实戒掉了)。但是资本为这种看起来独特的文化习惯的形成和流传创造了某种“可能性条件”。住宅所有权和“美国梦”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子。我很高兴能发现这些可能性条件是什么，并且这个马克思主义式的推理可以帮助我理解自己的一些奇怪习惯和品位是怎么来的，这真的很令人陶醉。

我讲述这些个人的琐碎趣事是因为我坚信，随着将马克思的抽象分析用于现实分析，他的理论的可信度将越来越高；并且如果马克思的理论不仅能阐明资本运动的抽象过程，还能揭示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包括为什么这么多的英国人喜爱苦果酱)的本质，那么这个理论就会成为寻求一个替代性的、更平等且更少暴力倾向的生产方式过程中的一个解放性工具。

有趣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概念在第二卷中比《资本论》中任何别的地方都表达得更加明确。似乎马克思头脑中有这么一种混合物——联合起来的工人控制了他们自己的生产过程和报酬水平，被嵌入到拥有更广阔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中，这个社会组织能够在国际分工的条件下，用合理制定和协调的非商品化物品(使用价值)的流通模式替

代货币资本流通的破坏性力量。废除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社会是马克思所有反资本主义构想的核心。其推论是基于公平与正义并且专注于人类解放的社会永远不会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建立：在那里货币已然成为一种私人占有的社会权力形式，在那里商品市场交换的货币协调是日常生活借以不断再生产的基本社会关系。坦率地说，马克思极少的阐述构成了一个相当不充分的和乌托邦式的计划。但是它们确实强调了不断深化的劳动分工下的国际协调问题。众所周知，这是反资本主义的左派所不愿面对的问题，部分是因为在转向反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中，它们无可厚非地对任何似乎依赖于国家权力的事物表示了不信任。第二卷也阐释了资本错综复杂的周转过程，这个过程的建立是为了支撑看似无限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也是为了使资产阶级的权力得以长久延续。马克思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如果生产和商品的连续循环不发生相应的彻底转变的话，无论何种资本的流通（比如货币资本）都无法得到根本改变。

一个可选择的非资本主义社会是什么样的，将由未来几代的知识分子和积极行动者们根据当时的各种可能性来决定（包括马克思没有想到的电子化的社会协作模式）。然而马克思长久以来奠定的基础为资本流动的系统性却又充满矛盾的特征描绘了一幅令人惊叹的图景：它必须被转化为使用价值的流动，这种使用价值的流动能够养活这个星球上超过八十亿的人口——为其提供衣食住行。对于一些如此著名地说出我们的任务是改变世界而不是认识世界的人，马克思花费了极大的时间和精力剖析、理解并阐明到底什么需要改变。在这方面仍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是同样必要的是我们一如既往地开始改变世界的任务——特别是因为有大量迹象表明作为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气数将尽，并且再也不能不计任何社会、政治与环境后果地通过“异化的消费主义”以复合增长率实现无穷的和愚蠢的增长了。马克思说：“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来。用暴力消灭

资本，——这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①

现在是我们都要听听这个忠告的时候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下册)，第268—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译后记

在国际进步思想界，哈维已经位列当代最为知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行列，在中国大陆和海峡对面的台湾，哈维在进步学术圈内也不陌生。已有哈维诸多著作翻译出版。南京大学胡大平教授已有专文介绍哈维的学术贡献，读者可以自行阅读了解，这里不再重复相关内容。

2001 年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阅读了哈维的 *The Limits to Capital* 一书之后，深受哈维的学术思想的影响，也促进了自己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解。2004 年毕业之后，不仅是自己而且要求我指导的研究生坚持阅读哈维的著作和学术论文。2009 年，我和我的研究生们一起翻译了 *The Limits to Capital* 一书，可惜由于版权原因，一直没有能够出版。但是，我和我的学生们在阅读和翻译这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时，受益匪浅。

2009 年，我开始承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本科《资本论》（上、下）课程的教学任务。为了吸引学生对该课程的兴趣，我准备组织学生翻译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以《资本论》研究为主题的著作和学术论文。恰好 2008 年美国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哈维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宣讲《资本论》第一卷。随后，以此为基础，《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也出版了，我在获得该书后，组织本科同学翻译了该书，经过我校译后，作为《资本论》课程内部教学参考文本使用。

2012 年春，我在美国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系访学，其时哈维宣讲《资本论》第二卷的视频和相关文字材料已经上线。2013 年 9 月，恰在我承担了本科生《资本论》（下）课程教学任务时，《跟大卫·哈维

读〈资本论〉》(第二卷)英文版出版了。美国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系博士生黄国治立即借阅该书扫描了发给我，作为我教学《资本论》(下)时的参考。在我组织下，选修该课程的部分同学于2014年1月份初步完成了《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一书的翻译。这些同学是夏梦寒、吴哲琴、肖佳笛、吴慧纹、辛晓彤、王云桦、唐寅铭、任佳蕾、徐嘉雷、潘越、鞠彬、邱艳慧等。

2014年春，《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面市，我才得知上海译文出版社购买了该书的版权。通过网络获得该书责编张吉人老师邮箱后，我委托我的研究生汪家腾同学联系了张老师，最终确定我们来翻译《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一书。

在阅读了本科同学完成的初译稿后，我发现这些同学一是对马克思文本很不熟悉，二是语言能力差强人意，初译稿存在不少问题；专业术语翻译不准确而且不统一，马克思的文本引用存在不少错误，不少地方存在少译、误译或机译现象。我们必须在初译稿基础上一句一句地重新进行校译。

我和我的研究生李连波同学一起，对初译稿一句一句地先后进行了三遍重新校译，最后由我统一定稿。汪家腾同学对本书涉及的相关人物或术语加了译者注。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其中的不妥和讹误之处依然难免。敬请读者们批评指正。

谢富胜

2015年5月